

解构党专制： 中国的根本出路

张博树 著

《观察》制作

www.observechina.net

www.observechina.com

www.guancha.org

作者简介

张博树，1955 年出生于北京，1972 年初中毕业后进北京一家国营工厂工作，开始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文革后的 1978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同时自修德国古典哲学，1982 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在北京联合大学任教 3 年后，1985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研读西方马克思主义、欧陆批判理论、社会生物学，分别于 1988 年、1991 年获得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91 年起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至今。其间曾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中密歇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术机构从事学术交流。

早年学术兴趣集中于“自私的”市场经济行为的哲学人类学根据，提出“总体人学构想”，并试图据此理解、阐释中国的经济改革。1989 年，震惊于当局对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镇压，治学方向和研究计划做出重大调整，下决心追索百年来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的成败教训，并最终确定了 20 世纪中国专制主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专制）批判的研究主题。1996~2000 年曾“下海”（兼职）办企业、办学，从多方面体察变化中的中国社会。2001 年回到书斋，致力于《从五四到六四：20 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六卷本）一书的写作。目前，该书已完成第一卷。同时进行创作的还有《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的系列报告，就操作层面如何解构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体制、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可行性问题进行系统研讨，并提出建议。

已出版的主要学术著作包括：

专著《经济行为与人：经济改革的哲学思考》，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译著《交往与社会进化》（原著者 J. 哈贝马斯），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专著《Marxism and Human Sociobiology: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社会生物学：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维度看》），Alba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专著《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专著《“利维坦”导读》，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专著《重建中国私立大学：理念、现实与前景》（与王桂兰博士合作），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目 录

序 言 5

第一部分 解构党专制要从当权者自身做起

为六四正名，不应再拖下去..... 8

有感于今天的青年人不知赵紫阳..... 10

改变中共执政理念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更重要

——写在中共 16 届 4 中全会公报发表之际..... 12

再论改变中共执政理念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更重要..... 14

三论改变中共执政理念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更重要..... 16

四论改变中共执政理念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更重要..... 18

五论改变中共执政理念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更重要..... 20

SARS 挑战中国新闻制度..... 22

中国公民应有更多渠道参与全球事务、影响政府外交

——中国网民反对日获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有感..... 25

政府的游行恐惧症和“稳定”偏爱..... 27

两岸沟通有利于大陆民主化..... 29

台湾国民党主席选举给大陆的启示..... 31

第二部分 党专制从哪里来的？

党专制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起源..... 34

党专制逻辑的列宁主义起源..... 53

第三部分 党专制下的社会与文化

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研究

——在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学术讲演..... 73

中国民主化问题的独特性

——在美国中密歇根大学的学术讲演..... 90

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政治性剧场行为..... 93

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死亡？

——读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有感..... 98

中国现代“党化教育”的制度化过程..... 100

从高中政治教材编写看“党化教育” 114

为青年女教师卢雪松叫好..... 129

中国私立大学的过去与未来

——在北京卓达大学的学术讲演..... 131

第四部分 建构一个符合宪政民主原则的现代国家

双轨共和制：关于中国宪政国家结构性改革的一种设想..... 146

“中国文化战略”：概念辨析与制度前提..... 154

全球治理与民主

——兼论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重构..... 160

序 言

我是北京人。1989年天安门公民维宪运动爆发时，我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兼在大学里任教，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六四长安街头的血腥结局，促使我中断了原来的研究课题，下决心搞清楚“中国的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从那以来，十几个寒暑过去了，一个有关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研究的庞大写作计划制定了出来，并于2002年开始实施。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工程。六卷本的著作，迄今第一卷尚未完成；全部完工，大概得20年以后。

毫无疑问，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特别是它的最为成熟的形式——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权的专制主义——在今天仍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正是这个现实使我越发深切地感到，我们的研究不仅是为了总结过去，更是为了变革现在，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在研究历史时，我们的角色是思想家和学者，在面对现实时，我们又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战士。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勇气、自己的学识为改变这个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本着这样一个想法，最近几年来，我陆陆续续在海内外的刊物、网站上发表了一些政论性短文和通俗性学术文章。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首刊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其中不少被《燕南网》、《真话文论周刊》等网络刊物转载。本书所集结的20余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就是从这些文字中挑选出来的。

我特意选择了“解构党专制”作为本书的主标题，包含着一番良苦用心：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是当前中国所有政治-社会痼疾的总根源，因此，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害人的制度，这是本书作者的总的判断，也是本书立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其次——我主张，这种“改变”不应是“推翻”，而是逐步“解构”；“解构”说的通俗些，就是一点一点儿地“拆除”，一间旧房子，我们要改造它，又暂时没有别的地方住，就只能采取整体重新设计、但分步实施“拆除”、在“拆除”的同时进行“重建”的办法。中国的事情也是这样。党专制是肯定没有前途的，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它推倒，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内部情况极其复杂的大国，加上中共几十年来实行的高度社会控制，扼杀了一切独立民间力量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民主的培育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制度变革的条件只能一步步积累，制度变革本身也只能一步步进行。这就是本书的基本主张。我给自己的自我定位是：理论层面不妥协的批判反思，实践层面务实的理性渐进立场。学术化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实践意义上渐进革命的鼓吹者与行动者是可以融于一身的。

这部文集在内容上分为4个部分：

第一部分“解构党专制要从当权者自身做起”包含十几篇短论，它们大部分写于最近一两年。我不讳言，这些文章（特别是其中论“改变执政理念比加强执政能力更重要”的一组短文）首先是写给中共的各级执政者看的。很多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告诉我们，由当权者主动进行的改革，通常是代价比较小的改革。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共执政者也做出明智的选择。我相信，中共党内（包括它的高层中）不乏有识之士；中共党内民主力量的增长及其与民间

自由力量的结盟,当能为中国现行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的和平转型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当然,其他的可能也不是不存在。“党专制”继续苟延残喘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死而不僵、或者由于社会矛盾积聚爆发而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当然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怎么办?促动体制内外都来思考理性转型的可能、条件并积极付诸行动,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事情。

第二部分“党专制从哪里来的?”包括两篇文章,它们都节选自笔者正在写作的《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中的第四章。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迄今仍被奉为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基础,尽管已经越来越形式化而失去其实质意义。这两篇文章就是想告诉读者,从逻辑上讲,党专制其实恰恰肇源于马克思的学说和列宁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梳理这个话题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和逻辑演变的角度理解今天的党专制。当然,作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成熟形态的党专制还有一个独特的起源,那就是前现代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皇权传统如何共同造就了中共的党专制,是一个极有挑战性的课题。我的那部六卷本专著将为回答这个问题做出尝试。

第三部分“党专制下的社会与文化”收录了笔者在不同场合所作的几次学术讲演和其他几篇文章,这些文章截取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些断面进行分析,试图说明党专制对当代中国人生活和心灵的影响。讨论教育的那几篇文章尤其值得关注,这首先是因为前几年我自己就曾“下海”办教育,又有多年在大学教书的经历,还曾参与过高中政治教材的编写,对中共党化教育的贻害有较深刻的体会。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政治性剧场行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一部分中辑入的有关文章,只是从政治哲学和批判社会学角度对之进行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

第四部分“建构一个符合宪政民主原则的现代国家”辑入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体现了从实践角度关注未来、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具体思路和建构性设计的意向。特别是“双轨共和制”一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意向。论“全球治理”的那篇文章,是本文集中最长的一篇文章,该文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置于全球文明变迁的总背景下加以观察和界定,相信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不过总的来说,这一部分的内容显得不够充实。对一部文集来说,这也许是个很难避免的缺点。我正在考虑在适当时候专门写一本书,讨论如何“建构一个符合宪政民主原则的现代国家”,更为系统地表述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今年8月份以来《改造与建设》、《燕南网》等国内网站先后被封。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党专制的顽固和中国民主转型的艰难。它也是促使我把这些文字集结成书,以纸质传媒的形式出版的重要原因。人家封闭网站就是不让社会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寻求新的表达渠道就是希望继续传播自己的声音。从政治哲学意义上看,这不仅是在捍卫作者“说”的权利,也是在捍卫读者“听”的权利,捍卫作者和读者交流的权利,一句话,捍卫中国公民社会的权利。

其实,正是在这种可能仍然很漫长的拉锯式的交锋中,党专制的解构已经开始了。

作者

2005年11月2日于北京东郊望京寓所

Email: zhangboshu@263.net

第一部分

解构党专制要从当权者自身做起

为六四正名，不应再拖下去

今年是 1989 民主运动十五周年。毫无疑问，这场伟大的公民维宪爱国运动已经载入青史，她并不需要谁来为她“正名”。所谓“正名”者，无非是指镇压了这场爱国运动、从而铸成历史大错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承认当年的镇压是错误的，承认当局对“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定性是错误的，承认这么多年来掩盖事实真相，企图靠淡化历史、消除历史记忆来否定历史的做法是错误的。在这个意义上，为六四正名，其实是执政党自我修正错误的一次机会，可惜这样的机会被一拖再拖，至今已拖了 15 年。

前不久蒋彦永医生就“平反”六四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信说出了许多中国公民的心里话。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内的广大党员和党内高层人士对此同样报有共识。

为六四正名，不应再拖下去，至少出于如下几个理由：

其一，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法治的社会。以反腐败、倡民主、公民维宪为特征的 1989 民主运动本身就体现了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六四的殉难者至今没有得到抚恤，因六四遭到迫害、或受到直接间接影响的大批人士至今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制造六四惨案的国家责任至今没有追究，这样一个巨大的民族伤痛没有抚平之前，我们又怎能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

其二，众所周知，造成今日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从长远看，中国政治改革和民族发展的根本之途是改变这种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不合理的独裁体制，回归政治民主化和制度现代化的世界文明主流。我相信，所有善良的中国公民都希望能以稳妥的、和平的方式推进这个进程，希望中国共产党主动顺应历史大势。为六四正名，应该是这种顺应的第一步。

其三，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重要发展，但由于权钱交易和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制度代价。今年年初有关温家宝总理亲自为民工讨工钱的报道，凸显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层危机。可以说，屡禁不止、到处蔓延的腐败才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首要原因。这个问题，1989 年如是，今天依然如是，只是与 15 年前相比，今天腐败的规模不知要大了多少倍。即便从“稳定”角度考虑，为六四正名也势在必行。

其四，为消除六四镇压对执政党形象的恶劣影响，政府编造了有关“1989 政治风波”的系统谎言。15 年来，这样的谎言充斥在我们的媒体宣传中、领导人的讲话中、甚至学生使用的教材中。人们在所有的官方正式场合不敢讲真话，政治性剧场行为比比皆是。这种情形严重地摧残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躯体。诚然，政治性剧场行为并非现在所独有，中共延安整风时期、1957 年反右和文革，都是政治性剧场行为风行的时期。但今天已经不同了，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崇尚人的尊严的伟大时代。人的尊严不允许面对罪恶历史时的精神上的残缺。为此，也必须为六四正名。

其五，为六四正名，推进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更理性地处理港、澳问题和台湾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都希望祖国统一，民族和睦团结。但制度认同先于文化认同却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中国大陆更加民主了，港、澳的民主建设更加自主、更加

成熟了，才会促使海峡对岸的中国人收回、或至少是收敛其“台独”主张。台湾近年来的政治民主化有许多值得大陆研究、借鉴的地方，但这种借鉴只有在大陆启动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

其六，为六四正名，也将有利于中国改变“冷战思维”，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一个不敢正视自己所犯错误的政党和政府，是不会得到人民的真正信服的；同样，一个不敢直面自己历史（特别是历史中丑恶的那一面）的民族，是不会得到其他民族的真正尊敬的。当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对外代表一个民族国家时，这个民族国家的公民当然有权利要求政府不能无视公民的集体意志，他们也有权利要求执政者在世界面前不能歪曲自己的民族形象。只有尊重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民族国家政府才有资格成为当今全球治理的合格参与者。

六四既是一段挥之不去的历史，又是检验当今中国政治家的试金石。从现实看，为六四正名可能还需要政治家们拿出一定的勇气和胆略，从历史长远看，这一步却是毕竟要迈出来的。谁率先迈出了这一步，谁就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功臣。

（本文作于 2004 年 3 月 25 日，首刊于《北京之春》2004 年 5 月号）

有感于今天的青年人不知赵紫阳

过几天，就是 1989 民主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十六周年纪念日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曾发表一篇短文“为六四正名，不应再拖下去”，今年本不想再写什么，然前不久和晚辈的朋友聊天，谈到单位里有的青年人年初听说赵紫阳去世时居然不知道赵紫阳是谁，心中不免感到震撼，还是坐到电脑前，要敲下这些文字。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干了错事，甚至犯下罪恶，都不可怕，只要他（她或它）勇于面对它，老老实实在地承认它，下决心纠正它，就会得到被迫受害者的宽恕和谅解。当年的纳粹犯下灭绝犹太种族的滔天罪行，但今天的德国人从心灵深处真正地忏悔并向受害人谢罪，仍然得到了全世界善良之士的认可。日本人这方面则要差得多。在要求获得历史公正这个意义上，中国人、韩国人和所有当年受害的亚洲人敦促日本政府和日本民族做出深刻反省，乃是天经地义的当然之举。

国内的事情同理。16 年前中国共产党用残暴手段镇压了和平请愿、示威的学生和市民。这种镇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讲不通道理的，天理难容的。16 年来中国政治的演变证明了当年示威者大部分要求的合理性和民主诉求的正确性，也证明了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基于陈旧的政治思维逻辑而把公民维宪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荒谬和悖理。国人要求执政党和政府承认这件事做错了已经呼吁了 16 年。可以说，这种要求同样是天经地义的正义之举、当然之举。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执政党仍然没有就这样的要求做出正面回应，反而继续维护十几年来精心编造的有关六四事件的政治谎言。尤其可怕的是，我们的学校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充当了传播这种谎言的系统工具；善良的、然而又是怕事的、作惯了“顺民”的家长们则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今天的年轻人，居然有人不知道十几年前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要职的赵紫阳，居然有人不知道曾经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做出巨大贡献的赵紫阳，居然有人不知道为寻求民主、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一个改革者的操守和责任，并为此丢了官职的赵紫阳！

这是今天的年轻人的悲剧，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

执政当局是这个悲剧发生的始作俑者。执政者对此难辞其咎。

我还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当年镇压了 1989 民主运动是执政党犯下的大错，那么这么多年来政府试图通过系统传播的谎言来抹掉当代民族历史中这带血的记忆就更是错上加错。我记得有一位美国学者叫康纳顿的说过：“极权统治剥夺臣民的记忆之日，就是他们受精神奴役之始。”统治者惯于使用“有组织忘却”的方法来达到自己阻断记忆从而阻断历史（那些对统治者而言不光彩的历史）的目的。这当然是出于统治者的私心。然而，历史是真的可以被阻断、记忆是真的可以被抹去的么？否。只要一个民族还没有失掉自己的良心，真实的历史就会被保存；更何况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一个全球民主的时代，一个全球资讯共享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要想维持专制主义的谎言，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对于公众，我想说的是：在专制条件下公民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包含着保持记忆、反抗强迫性遗忘的斗争。我们这样作，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的民族。应该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告诉自己的孩子，你所知道的历史事件、历史过程是什

么，你对它又是如何判断、如何评价的。不要担心“误导”子女，只要他们从各个角度获得足够的信息，就会做出他们自己独立的判断。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后代从我们对历史的叙述中体会到“真实”的价值，“良心”的价值，这样，通过我们这一代人所传承下去的，就不仅是未加删改的历史本身，更是一个民族，一个现代民族，在追求民主过程中形成的价值传统。

对于当权者，我则想说：这个谎言应该结束了。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身考虑，为六四正名，应该是纠正自己的错误、实现民族和解、在较为坚实的基础上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社会的良好契机。现实地说，如今胡温一代领导人，对六四天安门开枪并不负有直接责任。纠正自己前任的错误，既是现任领导人的义务，又是走出迷谷、推陈出新、在新的执政理念框架内寻求自身变革的机会。这固然需要智慧，但首先需要勇气。我赞成冯崇义、丘岳首两位先生的提法，民族和解应该从“缝合伤口”开始。我们要求执政党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并不是纠缠历史，而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以利未来。

谨以这篇短文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十六周年，纪念年初逝世的、为中国宪政改革做出贡献的赵紫阳先生。

（本文作于 2005 年 5 月 29 日，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改变中共执政理念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更重要 ——写在中共 16 届 4 中全会公报发表之际

刚刚闭幕的中共 16 届 4 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如此严肃的形式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这在中共执政以来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在党风、民风、世风日下，权力腐败已成顽症的情况下疾呼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体现了胡温一代新领导人深深的危机感和希望有所作为的责任感。我想，包括笔者在内的每一个中国公民，对此都会感到欣慰。

然而，我以为，从中国民主化和制度现代化的发展逻辑看，改变中共执政理念是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更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共自 1949 年执掌除台湾外的全国政权以来，一直秉承一党专权的执政理念。这个理念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和认知背景，这里不去细论。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执政理念的一党专权是和现代宪政民主的本质要求相冲突的，它的弊端也早已由 55 年来中国社会曲折的发展历程所证实。没有制约的权力将是暴政的开始，失去制约的公共权力势必走向自身的否定。寄希望于执政党内部的自我监督机制来解决公共权力的异化问题同样没有出路，因为在一党专权的专制主义语境下，对权力结构、特别是最高当权者的有效制约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而没有这样的制约和监督，所谓“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又都将成为空话。

那么，出路何在？出路在于改变中共的执政理念本身。中国共产党在结束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内战和混乱、建设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方面，是有其历史功绩的。至于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没能在夺取政权后引导国家走进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轨道，则是历史的与认知的双重局限使然。今天，情况已经全然不同了：“冷战”结束，宪政民主、人权作为人类的普适价值已经在全球水平得到揭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再置身于这个民主化的世界大潮之外。把“多党制”、“三权分立”等继续解读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认识上是荒谬的，实践上是有害的。中国共产党要真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最根本的是应该丢弃一党专权的陈旧政治逻辑，树立为实现多元政治基础上的宪政民主而工作的新的执政理念。

确立这样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的根本意义在于：执政党不再把自己视为“人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不再把曾经引导革命取得成功、并据此获得“人民拥护”作为取得执政地位的天然理由。更重要的是，宣布“为实现多元政治基础上的宪政民主而工作”，意味着执政党将主动创造有可能对自身执政地位提出挑战的民主政制之制度环境，从而将自身纳入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平等竞争的格局之中。显然，只有真正大公无私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是否有此胸怀、有此胆略也将是衡量一个党口头上、还是事实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一块最好的试金石。

毫无疑问，由于长期以来对任何有组织的反对派之合法存在的制度性否定，就现今中国而言，没有什么人、什么社会力量能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威胁。从中国社会之大、情况之复杂、治理之难度等等角度言，也没有什么（极端分子除外）希望马上取共产党执政地位而代之。对执政者来说，真正的危险乃是来自陈旧、僵化的执政理念自身，因为它无法阻

挡党的各级组织在权力异化规则的支配下变质、溃烂的趋势。而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才是当今中国的最大危险。记得当年胡适曾劝告跑到台湾的蒋介石改变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政策，办法是将国民党分为两个党，两党和平竞争，一党执政，一党监督。当时台湾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曾撰文提出建议，一是由执政党来扶持反对党，二是在执政党内扶持反对派。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理解当年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希望当权者痛改前非、走上宪政民主制度之路的一番苦心。

民主化是当今世界大势，但中国的事情归根结底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去办好。我相信，中共执政者扭转目前的权力蜕变趋势、恢复这个党建党之初的神圣宗旨的最好办法（也是唯一办法）就是在党的执政理念上“与时俱进”，跟上全人类发展、进步的步伐，变一党专制为真正的现代多元民主政治，并主动地、适时地为这样一场变革创造条件。如此，则是中国之大福，中国人民之大福。如此，则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真的会提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将在真正的民主规则语境下得到检验和人们的认可。

（本文作于 2004 年 9 月 20 日，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再论改变中共执政理念 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更重要

提出“改变中共执政理念比加强中共执政能力更重要”，其前提在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现存中共一党专权的“党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不但在理论上有悖于民主宪政的真精神，而且在实践操作上已经遇到、并将继续面临难以克服的问题和挑战。人们看到，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谱系中，一方面，有“权贵资本主义”和各种相关势力的疯长；另一方面，又有成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的个体、人群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农民、进城打工的民工、城市下岗人员、拿不到足额退休金的退休工人，等等。不能说政府全无解决问题的举措（比如最近推出的减免农业税的政策），但在一个个正在发生溃烂的基层权力场里，再好的政策举措也可能变了味道。也不能说官场中的共产党员绝无廉洁奉公者，但在一个整体癌变的环境里，正常细胞对抵制这种癌变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正不压邪”——这恰恰是专制主义病理学的逻辑。

更可怕的是“党治”结构所内具的脆性特征：由于缺乏吸纳不同声音、特别是底层社会诉求的机制，缺乏有效的民意表达系统和沟通系统（公共传媒由于必须秉承“主旋律”的指令而往往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失去其公共性），社会“减震器”失灵，任何一个局部事件都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乃至动荡。无论对执政者还是对大众来讲，这种情形都是非常危险的。最近连续发生的“万州事件”、汉源农民“暴动”事件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出现的“工潮”、“上访潮”，虽然起因各不相同，但却暴露出同样的问题：从公民权利角度看，往往是处于“弱势”的个体或群体之公民权益受到侵害；从社会运行角度看，则是权力的脆性特征凸显，权力控制失灵，尽管是局部的，但已足以警醒当权者。

显然，在专制主义语境内无论怎样试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上述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依靠日益先进、越来越“现代化”的监控和暴力手段可能得逞于一时，但到头来只会进一步加剧现存体制的脆性和不稳定性。总之，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这样，问题就回到“改变执政理念”上来。也就是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有勇气宣布“为实现多元政治基础上的宪政民主而工作”，这将意味着执政党主动创造有可能对自身执政地位提出挑战的民主政制之制度环境，从而将自身纳入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平等竞争的格局之中。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格局，则公众的利益表达和公民权益的维护就获得了制度保障，现存权力结构中的脆性就可以减少以至于消除，社会才能够真的实现“长治久安”。——当然，这样的“长治久安”已经建立在宪政民主基础上，而不再是专制主义社会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是否可以这样表达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假如我们认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只能“改良”，不能再“革命”，那么就一定要创造使“改良”（渐进改革）得以可能的条件，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化，一是民间自由力量的增长。二者的良性互动有可能给理性的、平稳的中国宪政改革带来最大希望。而实现民间自由力量的生长，执政党必须做两

件事：解除“报禁”以允许人们说话，开放“党禁”以允许人们结社。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形成正常的、对公共权力运作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公民社会，它将构成中国的宪政民主的真正基础（中国未来的宪政改革，包括政党制度改革、议会制度改革、选举制度改革、行政制度改革、军事制度改革、公务员选拔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等，都必须以一个较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前提）。而如果继续抱着专制主义的老套子不放，在制造矛盾的同时又掩饰矛盾，甚至认为这种掩饰乃“加强执政能力”之举，等到哪一天真的“官逼民反”，“门前政治”变成了“逼上梁山”，那就一切都晚了，中华民族就将陷入大的灾难之中。相信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一天。

（本文作于 2004 年 11 月 3 日，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三论改变中共执政理念

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更重要

从今年年初开始、预计将进行一年半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被媒体宣传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之举。的确，这一轮党内整肃的规模是多年来少见的，从中不难体会执政党最高当局希望扭转腐败颓势的内心苦恼和焦虑。

然而，“保先”教育真的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化解执政党面临的危机么？我以为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一党专权的制度本身造成的，并非“教育”不力的结果。**一党专权意味着党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党不必担心来自其他政治力量的挑战，却必须面对自己身体内部长出的毒瘤；毒瘤的病理学分析结果并不复杂，它的病因就是权力的异化，病理形成条件则是权力垄断基础上权力与利益的结盟。是这样一种政治生态决定了执政党的**变腐趋势**。这种趋势是长期的，它恒久地、又是时时刻刻地威胁着执政党；又由于这种威胁是由身体内部生发出来的，所以它更具致命性。

我相信胡温并非没有看到这个危险，但用“保先”教育的方法试图化解危险、扭转颓势，却是极其陈旧的政治思维逻辑的产物。所谓“学习动员”、“分析评议”、“整改提高”一套，是中共自延安整风以来直至文革党内整肃（后来又扩展为群众整肃和“群众运动”）的老套子。它早已成为中共“党文化”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毛泽东那个时代诉诸党的“先进性”和“无产阶级政治本色”对普通党员还有一定的感召力，但残酷的党内斗争和压抑正常人性的“先进典型”已经形成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说一套作一套的“党文化”特色，那么在权力与利益广泛结盟、威权主义盛行于中国大地的今天，通过教化而实现自我整肃这种“党文化”遗风恐怕只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政治化剧场行为**的泛滥。即便我们假设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发动这次“活动”的意愿是真诚的，决心是坚定的，“党文化”的传统及其潜规则也会自动消解掉这种“真诚”和“坚定”。近来在不同场合与具备共产党员身份的朋友谈及一些单位的“先进性教育”如何走过场、如何规定写总结的字数、如何从网站上下载官样文章然后掐头去尾调整段落属上自己的名字了事等等，似乎证实了我的忧虑。不要忘记，目前正在进行的“保先”教育还仅仅是“第一批”，范围局限于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下边还有“第二批”和“第三批”，范围将扩大城市和农村的广大基层。胡总书记希望“活动”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真正成为群众满意的工程”（胡锦涛在山东寿光调研时“语录”），但更大的可能却是运动再一次走过场，剧场行为更大范围和更多层面的表演，以及“党文化”遗风的再一次展现。

最根本的问题是，这种借助传统方法解决今日问题的企图表明，中共自我整肃的**着力方向**是错的。如果说，不是别的、而是现存政治体制及其生态结构决定了执政党自身的**变腐趋势**，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就只能是改变这种政治体制和它衍生出来、既保护它又消蚀着它的生态结构。而改变政治体制的前提，是改变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只有通过建立多元民主基础上的权力制衡机制，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鼓励民间利用各种形式对公共权力进行

批评和自由监督，执政党的变腐趋势才能得到遏制。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去谈“教育”和“学习”才更加合理。——当然，这里所谓“教育”和“学习”，已经不再指中共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教化，而是指对**宪政民主知识**的学习。须知，建立起新的、以多元民主认可为核心的执政理念，对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内的各级中共执政者来说，乃是一项新的“系统工程”。它要比沿用延安时代的老套子痛苦得多，也艰难得多。然唯有如此，中共才真的有希望；“教育”也才能在改善、提高“执政能力”上真的有所帮助。

（本文作于 2005 年 5 月 16 日，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四论改变中共执政理念

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更重要

“执政能力”要具体分析。从宪政民主和制度现代化理论角度看，有两种不同的“执政能力”：一种是与权力的一般公共职能之承担相联系的能力，这种能力无论民主政体、专制政体都需要。还有一种能力只和专制政体相联系，是为维护、强化专制政体服务的能力。

先来看前者。是凡权力，都拥有一定的公共职能。即便是在皇权时代，政府也有维持公共管理与服务的责任，否则一个社会就无法正常存续和运转。现代社会中，执政者作为公共权力的受托方，自然要承担更多的公共职责。比如，在促进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又纠正市场运行的天然弱点（弱肉强食、重效率而轻公平等等）方面，政府就必须做许多事情，包括制定有利于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有效规则、维护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建立社会利益转交系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如此等等。值得注意者，是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在履行上述职责时必然会呈现出的能力差异。一般来说，民主政体在履行此类公共职责时会表现出较高的能力，因为权力制衡结构本身和有效的舆论监督都使公职人员为恶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专制政体在履行此类职能时，其能力往往大打折扣，原因不在于专制政体的执政者不希望政府作好这些事情（即便从“稳定”角度出发，这些事情也是应该作好的），而在于专制政体的结构本身限制了执政能力的“提高”，在某些场合，甚至会引起这种能力的退化。近年来被频频曝光的各地“豆腐渣工程”、“政绩工程”、官商勾结鱼肉乡民、地方当局为牟小利破坏环境之类，从问题的发生乃因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这个意义上说，都是执政能力受制于专制政体结构的有力证明。

再来看后者。那种只和专制政体相联系，为维护、强化专制政体服务的“能力”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往往表现得很充分。最简单也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执政党对媒体的控制。“党管媒体”从延安时代甚至瑞金时代就开始了，“党的喉舌”就是“人民的喉舌”，二者的“一致性”典型地表现了“党”是“人民”的天然代表者的逻辑。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党”自己也承认犯过不少重大的错误，但这样的错误没有一个是“人民的喉舌”首先揭露出来的，而是由党自己纠正，再通过“党的喉舌”告诉人民。于是，原来的“正确”突然变成了“错误”（一位朋友曾戏言，如果把建国以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全部摘下编成一本书，一定会在令人啼笑皆非之余，产生重要的警示价值）。近些年来，更有人创造了“舆论导向”一说，党的文件也在强调新闻媒体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从形式上看，媒体宣传越来越“人性化”，但党对媒体的控制也越来越成熟化、精致化。CCTV等“主流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有明显倾向性的报导、对国内负面现象报导“分寸”的把握、及至最近对连宋访问大陆的引导性“解读”等，都有这样的成分在内。显然，此类做法与新闻报导的客观性原则和言论自由原则是南辕北辙的。这种操控媒体的“执政能力”越强，离真正的民主政治就越远。

应该看到，类似媒体操控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陈旧的执政理念的产物。要改变这种做

法，首先要改变执政理念本身。《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里应该加上的一句话是：这种执政地位同样**不是**不可更动的。我在这组小文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宣布“为实现多元政治基础上的宪政民主而工作”，意味着执政党将主动创造有可能对自身执政地位提出挑战的民主政制之制度环境，从而将自身纳入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平等竞争的格局之中。显然，只有真正不怀私利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是否有此胸怀、有此胆略也将是衡量一个党口头上、还是事实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一块最好的试金石。

这是一个新的执政理念。只有在这个理念下，执政者才能推进与一般公共权力职能相关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改变乃至废除那些与宪政民主原则相背离的“加强执政能力”之举。

（本文作于 2005 年 5 月 17 日，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五论改变中共执政理念

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更重要

中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既需要量的积累，也需要质的跃迁。一般而言，量的积累多起步于**体制内**改革；质的跃迁则往往标志着**体制性**变革时代的到来。但我们要同时看到，体制性变革本身也需要量的积累，没有这种积累，任何实质性的社会变革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目前中共“加强执政能力”的各种举措和努力，大多属于体制内改革的范畴；**要把体制内改革向体制性变革推进，中共改变自己的执政理念是当务之急**。只有改变执政理念，才能甄别哪些“执政能力”需要提高，哪些“执政能力”则根本要不得；只有改变执政理念，执政者才能在新的历史时空框架内与成长中的公民社会联手，创造真正的“和谐”和中国民主的未来。

应该承认，从现今正在掌权的胡温一代中共领导人，到包括笔者在内的、目前正值中年的一代人，再到我们的下一代人，大多数国人都缺乏宪政民主的基本知识，乃至有些人视“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如猛兽，好像“资产阶级政治”都是“金钱政治”，骗人而已。这是半个世纪来中共党化教育的恶果，这种教育使几代人远离世界文明的主流，窃窃自喜于自己编织的乌托邦美梦而不觉。其实，早在 20 世纪初，我们的先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改革家、革命家们就已经理解了宪政民主的真义。比如，梁启超 1912 年就曾云“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1913 年 6 月，进步党一刊物发表“党论”一文，谓“所以称为政王者，必有相对立而并存者始谓之为政党，否则非政党”。故“宪法政治之下，必有扶持政府之政府党，另一方面又必有反对政府之反对党。一党在朝，以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孙中山也曾提出两党政治的主张：“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以求进步也。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抱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策，以图进步焉。”（以上引文可参见张玉法著《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岳麓书社 2004 年版，页 27-28）这些当年中国先进分子的常识，后来却成了意识形态的禁区，继而又成为一代代中国青年的知识盲区。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么？

一句话，我们大家都需要补课。

目前正在执政的中共各级领导，包括中央政治局领导，尤其需要补课。

还应该看到的一点是，任何改革都是有代价的。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化、特别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表明，由执政者**主动**进行的改革，将是成本相对低廉、社会付出较少代价而获得进步的改革，因为它可以有意识地化解改革进程中必然会发生的新事物与旧遗存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这样的**战略识见**，等到维持旧体制的成本已经大于体制本身的吸纳极限再去考虑体制性变革，则一切都可能来不及了。整个民族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中国从扭曲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之改革中生长出今天的市场经济，已经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至今，这个过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仍有尚未突破的瓶颈。但整个民族毕竟从开放的市场和它蕴含的自由选择的原则中初步体验了现代制度文明所内具的力量。我们这个民

族能否从已经延续 50 多年的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之改革中，实现**质的突破**，生长出、创造出符合宪政民主原则的多元政治结构，将是一个更大的、更艰巨的挑战。它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这一步总是要迈出来的。实现这样的社会转型需要许多条件，需要许多操作层面的准备，还需要作深入的**政治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探讨。什么时候有关中国多党制问题的研究不再作为学术禁区、作为“意识形态问题”遭到禁止，什么时候公民自由结社成为可能，什么时候人们可以在媒体上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必担心受到指控，就证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确实在发生变化。

一向秉承一党执政原则的执政党改变这个理念，将是执政党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贡献，不管它过去犯过多少错误，乃至罪恶。

但愿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

（本文作于 2005 年 5 月 17 日，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SARS 挑战中国新闻制度

SARS 事件所呈现的政治-社会视角

作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 SARS 传播目前已在中国得到初步控制，但对这件事情所凸显的政治与公共领域层面之制度问题的反思才刚刚开始。人们在问：为什么在广东已于 2002 年 11 月发现首例 SARS 病人、2003 年初这种可怕的传染病已经在广州等大城市肆虐并随后波及香港等地，广东的医务工作者已经用忘我的工作、甚至宝贵的生命换来医治“非典”、控制 SARS 病毒传播的有效经验的背景下，北京仍然于 2003 年 3 月~4 月爆发了 SARS 的大流行？2003 年 5 月 18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载文“北京医护人员 SARS 高感染率真相”称：3 月 5 日由解放军 302 医院接收的北京首例输入性 SARS 患者来自山西太原，而这位患者的病又是此前在广东出差办事时不幸染上的。患者不但把 SARS 传染给她的亲属，而且使救治过她的 302 医院 15 位医务人员先后染病。显然，这里有医疗信息不畅、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以致全军最著名的传染病医院竟然未能分享广东同行的经验；但更令我们注意的是另外一点：既然广东爆发的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烈性传染病，为什么没有采取强有力的隔离措施（就象 4 月 20 日后北京所做的那样）以防止疾病在全国的扩散，并动用现代社会高效、覆盖面广的新闻传媒系统告之公众身边的危险，并具备基本的防范意识？

事实上——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南京市舆论调查分析中心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的一项调查——在从新闻媒体得知 SARS 信息之前，有高达 40.9% 的被调查者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知道此事。尽管许多人表示更愿意相信来自官方的报道，但媒体的沉默曾一度令民众失望。信息渠道集体性的失语，导致公众不得不转而寻求小道消息，以满足自己的信息渴求（见 2003 年 6 月 12 日《南方周末》）。

更说明问题的也许是这样一件事：一位叫蒋彦永的退休老军医根据自己调查来的确凿无疑的数字于 2003 年 4 月 4 日致函 CCTV-4 与凤凰卫视，驳斥了前一天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关于中国政府已经有效控制“非典”的说法，并表示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你们（新闻工作者）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 SARS 斗争的行列中来。”这位老军医的勇敢行动不但打破了北京 SARS 疫情的信息封锁，而且用直率的语言点明了他所理解的媒体的天职和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信息封锁的两条站不住脚的理由

就此次 SARS 事件而言，中国官方一度实施信息封锁大概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经济层面的考虑。向社会如实公布疫情势必影响公共服务、餐饮、旅游、娱乐等行业的正常经营，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二是政治层面的考虑。传染病疫情的爆发涉及国家形象，所以只要能够“内部解决”，就还是不要声张出去的好。这大概就是广东呼吸病研究所的钟南山院士提出与香港同行合作实施 SARS 科研攻关时似乎感受到某种政治压力的原因（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志采访钟南山的“面对面”节目曾涉及这个话题）。政治考虑中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时间因素。不要忘记，2003 年 3 月初北京发现第一例“非

典”病人并迅速扩大疫情的时候，正值每年一次的“两会”在北京召开。按照中国“传统”，这样的“国家大事”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所有其他事情都要为此让路。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卫生部在明知北京已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扩大的情况下却要召集各医院领导开会，强调“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

然而，这样的“考虑”真能站得住脚么？否。

信息封锁的结果，不但不会减少经济的损失，只会加大这种损失。传染病传播有其特有的规律。现代交通手段、特别是远程交通手段的进步使人际之间的面对面交往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迅捷；而通过面对面、近距离传播的传染病也因此获得一夜之间传布四方、甚至走向全球的可能。如此，SARS 疾病给一个街区、一个城市造成的经济上的危害，在未能有效切断传染源的情况下，就完全可能迅速演变为一场国家的、甚至全球的经济灾难。至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其荒谬更不待言：传染病是人类生命的可怕杀手，难道还有什么东西（不管它是国家的“面子”、“机密”，还是正在进行的“重大”政治活动）能高过人类生命的价值？按照官方的解释，国家所从事的一切工作，包括每年一度召开的“两会”，其根本目的不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福祉么？而当越来越多的公民的健康乃至生命受到一种来势凶猛、且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的威胁时，以“两会”正在召开，需要“创造安定的条件”为由向社会封锁疫情消息，难道不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逻辑？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日内瓦时间 2002 年 11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9 日下午 2 时，席卷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SARS 疫情，已经导致全球累计临床报告病例 8421 例，其中中国内地 5328 例，占 63%；全球死亡病例 784 例，其中中国内地 340 例，占 44%。由于北京 2003 年 4 月下旬后采取了有力的隔离措施，较快地遏制了 SARS 的蔓延，中国政府也加强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同时提高了疫情公布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初期的被动局面。然而，已经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这种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的教训，难道不需要、不值得我们驻足深思？

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新闻制度改革

在我看来，SARS 狂潮作为公共生活领域（而不仅是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它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收益之一是促使我们更严肃、更深入地思考中国威权主义现行制度的某些缺陷。这些制度的运行原则、运行机制显然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过去就存在，但 SARS 的冲击使问题本身的尖锐性、全局性更加凸显，更加暴露无遗。这里，我首先指的是中国现行的新闻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现行新闻制度的主要特点（也是根本缺陷）就是政府对传媒的高度垄断。什么消息可以让公众知道，什么消息不能让公众知道，信息报道的方式和尺度如何——这一切都由政府主管“宣传”的部门说了算。中国的所有主要传媒都是官办的（“国有”的），各大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在重大事件的报道、宣传上必须服从“上级”规定的统一口径。这种“传统”可谓根深蒂固，以致到了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程度。但是，从建设民主宪政体制和现代公民社会角度看，这样的“传统”必须予以革除，而且已经到了应该行动的时候。

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核心就两样东西：体现民主制度本质的公民权利和建立在委托-受托基础上的、作为受托人的公共权力。公民权利包括公民对重大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以 SARS 疫情为例，当这样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突然而至时，公众希望从媒体那里获得更加真实的信息，不仅是作为有可能受到疾病侵害的生命体，作为公共卫生系统内的被保护者，而且是作为政治行动意义上的公民。公民有权知道身边正在发生的事

情，有权知道这些事情的性质、可能对自己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有权知道政府已经或将要采取什么措施，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且有权对政府的不当行为提出批评。而政府作为受托公共权力机构，则有义务如实、及时地向社会通报它所掌握的信息，接受公民的监督，并在此基础上求得公民对政府工作的配合。

这里，我特别想就公民的参与权多说几句。前边提到老军医蒋彦永给媒体写信揭露北京 SARS 疫情的真实情况。这显然是生动体现了公民对社会事务参与权的正当之举。曾经采访过蒋彦永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 Susan Jakes 指出：“我觉得蒋彦永医生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一个人勇敢地说了真话，对其他医生、其他人是一个激励。”“他体现了作为一个医生的最高准则，‘医生’在他眼里不仅是一个职业，更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然而，在我们的某些官员眼中，情况却似乎并不是这样。我在 2003 年 5 月 30 日下午观看了卫生部答记者问的电视现场直播。当几位外国记者不断追问中国官方对蒋彦永行为的看法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蒋大夫不过是成千上万中国医务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员”，他甚至责问记者们为什么只是对蒋彦永大夫感兴趣。这样的回答当然十分不智。高强不会不明白记者追问这个问题的寓意所在，但这位官员没有敢面对封闭的、落后的中国新闻制度这个现实，正是这个现实迫使蒋彦永以孤注一掷的良心表白方式成就了一个公民的英雄壮举。

当然，话说回来，仅仅靠少数公民自我牺牲式的良心表白确实还不足以撑起公民社会的大厦。中国的真正希望在于：改变陈旧的新闻管理体制和僵化的意识形态观念，把新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逐步实现媒体产权主体的多元化、民间化，尊重公民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使更多的公民敢于讲真话，能够听到真话，在制度层面上落实宪政民主的真精神。

——我想，这就是 SARS 事件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给予我们的主要启示。

（本文作于 2003 年 6 月 18 日，首刊于《北京之春》2003 年 8 月号）

中国公民应有更多渠道参与全球事务、影响政府外交 ——中国网民反对日获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有感

近日与朋友谈及日本正努力活动希望成为联合国改革后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国内网民纷纷表态反对，在若干“主流媒体”办的网站上，签名反对日本企图的网民已逾千万。

中国人对这件事情的强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给中国人留下了过于痛苦的记忆；日本政府对过去战争罪行反思与谢罪的迟迟不到位，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公众指责日本的正当理由。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网民的行动，乃是其**政治意向的真实表达**。借助互联网实现的、由上千万公民个体发出的声音的汇流可谓中国公共领域进步的一个标志。

由此使我联想到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公民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并通过这种讨论影响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动，乃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通则。如果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公民实现这种参与的机会和渠道仍嫌太少。**比如，就上面这件事情来说，我所看到的公民意志的表达渠道似乎仅限于官方媒体办的几个网站，更具影响力的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反倒没有充分报道，更谈不上深入的分析和民意表达。也许是中宣部又有什么“内控”精神？如若如此，则又一次证明了现行体制和我们这个制度的缺陷。在专制主义条件下，“子民”是无权过问国家的外交事务的。我们都记得毛泽东那个时代，政府习惯于拿“人民”说事，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发表对外主张，实际上“人民”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在官方组织的“游行”、“集会”之类场合扮演“人民”的角色。应该承认，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人们至少不必再去被动地经常扮演此类角色了。开放政策的实施，已经使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正在艰难行进中的国内民主化进程，也使中国公民有了一——虽然仍很有限——就公共政治话题、包括国际事务和政府外交政策发表意见的可能。

我在《全球治理与民主》一文中曾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说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文明正在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那么全球治理的一个基本条件却是各民族国家内部政治民主化的成熟。实际上，这里涉及了三个层面的东西：公民个人权利、民族国家、全球治理。**当全球治理是以政府合作的形式进行时，公民乃是通过他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来参与全球治理的。**这样，所谓“各国政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的关系”实际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前提，那就是背离个人权利的民族国家是否有权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联合国是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协调机构，这就要求参与联合国事务的各国政府在确定大政方针时，必须充分考虑它所代表的公众的民意。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全球公民社会**同样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全球公民社会”，按照何增科给的定义，乃是指各国“公民们为了个人或集体的目的而在国家和市场活动范围之外进行跨国结社或活动的社会领域，它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盟、全球公民网络、跨国社会运动、全球公共领域等”。而全球公共领域又是指“公民个人或集体活动于其中的国际公共空间，公民们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创办报刊杂志或出版书籍、建立网站等多种形式，就他们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或国际政策等展开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对话、讨论和交流，

形成全球性观念意识、文化价值和国际舆论”。目前中国网民关于日本争获安理会席位问题的讨论，就显然带有诉诸国际公共领域的性质。问题在于，**公民参与全球公共领域的活动，也要以国内一定程度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化作为基础**。我想至少可以列出如下理由来支持这一主张：

首先，只有政治开放，公民才能更顺畅地获得与他们讨论问题相关的更详尽的信息。公民不仅有权知晓本国政府对相关问题的态度、观点，而且有权知晓其他相关国家政府的观点，知晓不同于政府观点的其他观点以及支撑这些观点的依据。这样，媒体（包括报刊、广电、网络）的**全面开放、解禁**就是必要的。公民在全面了解各种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更理性的判断、观点和主张（这一条当然包括允许专家学者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以便成为公众思考问题的参照）。

其次，只有政治开放，公民才可能以更多的形式、通过更多的渠道参与全球公共领域的活动。就这次网民行动而言，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么个特点：他们的行动都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而不是以**组织**名义进行的。中国大陆迄今还少有这种建立在独立结社基础上的组织，而那些在民政局注了册的“社团”似乎又没有勇气、也没有习惯去独立地组织什么活动。这是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重大缺陷。它不但影响了国内公共领域的生存质量，而且限制了中国公民参与国际公共领域活动、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的能力。要改编这种情况，**允许公民自由结社**是当务之急。

最后，只有政治开放，公民才能更有效地了解、参与和监督政府的决策，包括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仍以日本这件事情为例：人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近邻今秋进入安理会的梦想大有实现的可能。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出的“一票”可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一票怎么投？这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全体中国公民的事情。无论政府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不要忘记，国际事务毕竟是复杂的），如果它能够通过政治开放而实现与公民的有效沟通，则此类决定都可以因其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而增强自身的合法性。

总之，中国公民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参与国家外交政策的形成。这是建设一个**民主社会**的需要，也是中国人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全球治理”的需要。

众多中国网民的行动，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本文作于 2005 年 3 月 31 日，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政府的游行恐惧症和“稳定”偏爱

4月9日北京自发的反日游行是近年来少有的较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和示威活动。在中国其他城市，也爆发了程度不等的民众反日游行示威。就这件事的直接起因和性质看，它是继“网上签名”后中国公民反对日本“入常”、以集体行动方式介入全球事务、参与全球治理的又一个表现，也是公民以集体行动方式影响政府外交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网上签名”一样表征着中国公共领域的进步。

奇怪的是政府的态度。如果说“网上签名”活动还是在政府办的网站上进行的、从而间接表示了某种“默许”乃至“支持”姿态的话，那么政府对游行的态度却显得复杂得多，也暧昧得多。据载，4月9日北京的游行是经过公安局批准的，但没过几天，随着各地抗议活动的增多，政府就加强了对此类活动的限制。4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希望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够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活动，不做影响社会稳定和有损首都形象的事，不信谣，不传谣，要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高校系统则连续开会，“传达上级精神”，对学生作“疏通工作”，不要上街。4月17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更是分别发表评论员文章《从构建和谐社会看稳定》和《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人民日报的文章称“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相当复杂，既面临大好机遇，也遭遇严峻挑战。团结一心，保持稳定，我们才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应对挑战”。大概是怕报道游行影响了“稳定”，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所有“主流媒体”在面对反日游行示威这件事上集体“失语”，变成了哑巴，这对于这样一个功能强大的媒体机关来说，似乎显得十分滑稽：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游行（特别是欧美国家的民众游行）通常都会得到及时报道，唯独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却不愿意让本国的老百姓知道！这难道不是一件怪事情么？

我们的政府似乎患了一种“游行恐惧症”，自从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凡规模稍大的、自发而非政府组织的民众聚集，都会引起当政者的紧张。与“游行恐惧症”相对应的是对“稳定”的过分的偏爱。似乎自发的民众集会或游行总是有碍“稳定”；要“稳定”，群众活动就只能在“党的领导”和政府规约下进行。

我以为，无论“游行恐惧症”还是对“稳定”的偏爱，从认知上讲，都源于陈旧的、过时的、与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传统政治思维逻辑。从专制主义立场看，任何独立的、有一定规模的民众活动都可能超出政府的“操控范围”，从而具有危险性。中国从皇权时代起，当政者就习惯于像手握一把沙子一样控制自己的臣民。沙子是松散的，必须按照统治者的意志才能形成某种形状；换言之，沙子堆成的形状必须是统治者意志的表现。我们可以假设统治者的愿望是“好的”、“善良的”，因为它相信（过去的统治经验也告诉它）只有这样一种治理方式才会有社会的“稳定”。“稳定”用皇权时代的词讲就是“国泰民安”。国家富足，人民“听话”并安于自己的小康生活，确实是皇权时代的最高政治理想。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正在走向民主，世界也正在走向各主权国家宪政民主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民主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有公开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权利，也有选择表达政治见解的方式——包括集会和游行示威这种方式——的权利，无论是对国内事务，还是对全球

事务。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公民自发的、独立的政治行动，恰恰不是对“稳定”的破坏，而是对“稳定”的维护，因为只有在民意表达及时有效、民意表达渠道畅通的社会里，才能形成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而“稳定”——真正的**稳定**——只能建立在民众的**政治自由**和**宪政民主机制**日益完善的基础上，它不能靠剥夺、压抑公民的自由权利去获得，只能靠保护、提升公民的自由权利去获得。

事实上，通过自发的集会、游行之类活动，公民可以体会到什么是**公共事务**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什么叫对公共事务的**自觉参与**。这种精神的养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皇权-子民传统的民族来说，有着莫大的**启蒙**意义；对于如今我们这个物欲横流、人们似乎只知金钱不知其他的威权主义社会来说，也有着巨大的**精神重振**意义。当然，公民的行动、尤其是集体行动（尽管这种行动还不是**有组织的**）会对政府构成**压力**，不管行动指向是外交问题，还是内政问题（严格地说，即便是“外交问题”，它也必然是“内政问题”，因为它总涉及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但这样的压力对政府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会促使政府学习如何与**独立的**公民沟通，如何用**民主的方式**建立起政府与民间的互信。

没有人提倡公民行动中的过激行为；但我们要看到，公民行动本身也有一个学习过程，只有借助不断的实践，中国公民的政治表达行动才会趋于成熟而更为理性化。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责任是疏导，而不是简单的压制，更不能以此为由指责公民的行为破坏了“稳定”。

以上所述，乃是从**宪政民主逻辑**出发而对公民政治行动意义及何为“稳定”的解读，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一个自信的政府不应该害怕公民游行，一个自命要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政府不应该害怕公民独立的、集体的政治行动。这种行动，不管是对外的，还是对内的，都将有助于祛除我们这个民族躯体上和灵魂深处的**专制主义**积习，都将有助于赢得国家民主化的发展和建立在现代多元政治民主基础上的真正的社会和谐和稳定。

（本文作于 2005 年 4 月 18 日，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两岸沟通有利于大陆民主化

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破冰之旅”，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

大陆-台湾问题，涉及两个互有联系的方面，一个是**统一还是分裂**，另一个是**民主还是独裁**。连战来访，呼吁“和平”和“双赢”，呼吁“一加一大于二”，反映了台湾岛内相当比例的公众不希望两岸对抗和分裂的民意。抛开国民党此行对台湾内部政党政治和执政党、在野党之间关系的微妙影响不谈，国、共之间这次相隔 60 年的“党”与“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沟通，毕竟有利于缓解两岸的紧张情势和遏制“台独”。这也是连日来大陆媒体报道的重点。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是被大陆媒体刻意**回避**的，那就是民主和独裁问题。国民党也曾有过独裁的历史。台湾的民主化就是与独裁的抗争中逐渐发展的。——当然，上个世纪 80 年代蒋经国主政的国民党顺应时代要求，以**执政党身份**主动推进了这个进程，在历史上也留下光彩的一笔。如今，台湾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高于大陆，它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也远高于大陆。这正是台湾公众面对大陆的“统一”诉求总是有些疑惧的现实原因。昨天连战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谈到了胡适和傅斯年，谈到了北大的自由传统，谈到了中国百年来的思想发展，但他没有展开这个话题。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来北京的目的首先是寻求对话，而不是宣讲自己的政治理念。大陆传媒也没有对连战讲演的这方面内容做出任何回应。这种回避则显然是大陆政治环境和媒体控制的产物。

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海峡两岸最终走向统一**，**大陆的政治民主化将是关键的促成要素**。在当今人类已经达到的文明水准上，民族统一仅仅诉诸**文化认同**是不够的，**制度认同**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国两制”并不是对未来两岸统一之政治架构的准确概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最终应该在“一国一制”的体制框架内相互拥抱：这就是一个**中国**，大家都生活在尊重自由、尊重人权、体恤民生、实行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的中华大家庭中。

就大陆方面而言，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制度转型还需要时间，需要创造条件。迄今为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把建设多元的民主政治列为目标，它仍然被陈旧的“**一党**”治国理念所左右。大陆的普通公众虽然多憎恨独裁专制，但对于现代自由民主政制究竟为何，也缺乏实际体验。要促使执政党改变执政理念，公民提高民主素养，需要执政党自身和民间都做出努力，也可以借助很多其他的机遇。**海峡两岸的沟通就不妨看成这样一种机遇**。连战作为台湾在野党的领袖能够违背执政党的意志到大陆造访这件事本身，就给大陆这边的中国人一个信息，它告诉我们，民主机制有可能以比较灵活的方式创造条件，开拓出更宽广的政治行动空间，与对手达成沟通或妥协。甚至，报导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活动的台湾媒体也会给大陆的电视观众留下印象：东森电视台的主持人在评论台湾政治和台湾政界的领袖们时似乎更加开放而“随意”，不像我们这边，只要涉及“重大新闻”或领导人的报导，电视台就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面孔。

民主政治之扎根于一个民族是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累积过程。我们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以为两岸多沟通好处多多，它不但有助于减少两岸的不信任与敌意，

创造和平的氛围和条件，而且，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长远意义上，都将有助于大陆自身的民主化进程。

（本文作于 2005 年 4 月 30 日，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台湾国民党主席选举给大陆的启示

昨天（7月16日）台湾国民党主席选举揭晓，台北市长马英九战胜立法院长王金平，当选国民党的新主席。对大陆公众来说，台湾岛上的这次在野党党内选举，有这样几个事实值得关注：

首先，这是国民党建党100余年来第一次有两人同时竞争党魁位置。王金平、马英九几乎势均力敌，选情空前激烈。投票时间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随后开始计票，到晚间9点多，计票结束，马英九得375056票，王金平得143268票，马英九成为国民党新任党主席。

其次，据BBC和美国之音报导，虽然选战中出现过双方阵营互挖墙角、互相攻击的现象，甚至有贿选传闻，但马、王二人至少在可见的言行中保持了君子风度。在开票统计确定前，王金平见票数相差太悬殊，先致电马英九恭贺对方当选，随后在总部发表谈话，承认败选。马英九在笃定当选新任的国民党主席之后，亦匆匆前往王金平的竞选总部，虽然并没有见到王金平，但马英九表示希望王、马团结，共治党中央，有赖王金平协助党务改革。马还表示，愿意邀请王金平担任国民党副主席。

再次，这次国民党选主席，被认为不仅是国民党问鼎2008年“总统大选”、希图夺回执政权的一场“资格赛”，而且是国民党党内民主化进步的重要标志。

以上几点，对于关心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公众来说，都不无启发价值。

大陆现存政治体制远远落后于今天的台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管台湾岛内的政情如何复杂，不管——由于受到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统中某些官场或民间“潜规则”的影响——台湾政治中还有多少与现代民主宪政并不完全吻合的东西，台湾的政党政治、选举政治毕竟已经迈出了坚实的几步。台湾的“总统”已经实现了全民直选；国民党的竞选党魁也标志着在这个小岛内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的申扬。而在大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仍然是一党统治的天下。我们这里的选举制度的大体情况是：除村民委员会是直选外，直接选举仅限于县、乡级人大的“人民代表”，市（自治州）以上人大代表实行间接选举（由下一级人大“选举”产生上一级人大代表）；官吏（从乡镇长到国家主席）则全部是间接选举，也就是由各级人大“选举”同级别的政府官员。又由于无论“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也无论被选的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府官员，候选人的产生都握在中共各级组织部门的手中（法律规定的允许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发生实际影响），这使得选举只不过是徒具形式，走走过场而已。由选民在“组织推荐”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名下划个圈，或者由被“组织”钦定（形式上由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在同样由“组织”钦定的同级政府官员、上一级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下划个圈，对于真正的民主来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这套制度操作的真实意义不过是为了保证“党”对代议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绝对控制。至于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建设，恐怕同样是乏善可陈。迄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和交接仍然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内定”的方式，普通党员对此绝无施加任何影响的可能。而在党专制条件下，党的最高领袖同时就是国家最高领袖，这自然意味着党内生活的非民主同时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非民主。

简言之，我们的民主建设任务任重而道远。要解构党专制经营几十年造就的这个巨大的制度，解构党文化给人们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和心灵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需要中共党内

的有识之士和民间自由力量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肯定是艰巨的，可能需要一、两代人乃至更长的时间。不过我们应该有信心。台湾国民党执政时，也曾奉行威权主义的统治，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浮出水面，是在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短短二十几年，台湾岛上的民主化已经取得这样的成就。大陆的情况当然要复杂些，但完成专制到民主的转型，这一点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一样的。我们面临同样的任务，只不过台湾走在了大陆的前头。

相信台湾的经验对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会是个重要的参考。

（本文作于 2005 年 7 月 17 日，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第二部分

党专制从哪里来的？

党专制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起源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社会革命学说对 20 世纪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科学共产主义”理想曾激发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改造社会的渴望，并把这种渴望转变为行动。然而，历史的诡秘却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中国化”并没有真的给中国社会带来福音，反倒促成了以党专制为根本特征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形成；革命者本来要造就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民主，结果反倒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独裁和现代制度建构中彻底的不民主。这是现当代中国演变史中的最大悖谬。

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国家实践进程的发展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之现代专制主义导源于列宁主义的建党模式和苏维埃国家实践，而俄国人社会变革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又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旨在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一整套学说。所以，在本文中，我们的任务是认真考察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考察“科学共产主义”中哪些成分真的是科学，哪些成分是乌托邦，它们又怎样为 20 世纪的激进共产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¹ 事实上，正是这种理论在俄国人的革命诉求中转变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并经由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中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乌托邦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之现代专制主义的基本构造，包括它的**逻辑基础**（发生学根据）、**意识形态基础**（合法性根据）和**组织基础**（实际建构原则），从而背离了制度现代化的普适发展道路。

应该强调的一点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现如今中共专制主义执政者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使本文的讨论不但具有学理性，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我们研究、解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及其异化的过程，研究诸如“阶级”、“阶级斗争”、“人民”、“无产阶级专政”等概念如何从 19 世纪的激进学理变为 20 世纪之苏俄和中共专制主义基础概念的过程，也就是这些概念作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和**除魅**过程。我们的研究既带有现代一党专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之发生、演变的**逻辑发生学**探究性质，同时又必然含有从科学意义上**解构**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意向**。这件事早就应该作。但愿我们现在作这件事还不算太晚。

¹ 应该说明的是，本文并不是、也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方位研讨，这不是两、三万字能够完成的事情。这里，我将主要关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包括它的哲学人类学假设、它的逻辑命题的基本展开方式和由此引出的实践性结论。对政治经济学等问题的讨论也将服务于这一目的。还有一点也应该是言明自明的：本文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严肃理论的基本价值。关于马克思取得的理论成就，我曾在以前的几部著作中作过探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拙著《经济行为与人》（那本书从如何理解经济行为的“自私性”出发讨论了马克思的人性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得失）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社会生物学》（该书分析了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生物学的长处以增进对人的本质的整体理解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本文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讨，乃是我个人十几年前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考察的一个继续。

马克思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杰出反叛者。作为反叛者，他们兼有**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双重特征。而这两个特征又都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创造活动。

我们先来看看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马克思。**马克思寻求一个完美社会的深层精神冲动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理想主义首先具有深刻的、道德意义上的救世特征。**我们可以从这位思想家成长的人文主义环境、青年时代接受的变革社会的理论（先是自由主义，后是“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以及他吸收并改造这些理论的独特方式中追索其精神形成的轨迹。

马克思的出生地是德国西部一个叫做特利尔的小城。这个地方原属于普鲁士的莱茵省。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20年间，莱茵省一直处在拿破仑法国的占领下。占领者在这里摧毁了原来的等级封建社会体制，推行民主改革，使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开始发展起来。1815年，拿破仑惨败于英、荷、日耳曼联军，莱茵省也被普鲁士收回。但当时掌权的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试图在莱茵恢复旧日的封建等级和受贵族支配的普鲁士村社制度，又强行征收数倍于德国其他地区的税款，严重损害了莱茵工商业者和自由农民的利益。这样，冲突的发生势在不免。当时在特利尔就出现了各种温和的反对派。他们组织俱乐部，举行各种政治性集会，提出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主张，比如取消国内的关税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建立议会制度，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也对这个地区的社会舆论和氛围发生了影响。反专制、争自由成为整个莱茵省的普遍呼声。

1818年出生的马克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人们都知道马克思的父亲在年轻的卡尔精神成长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这位特利尔市的法律顾问官和律师公会主席不但具有渊博的法律知识，而且深受法国启蒙哲学的影响。作为爱国者，他反对拿破仑对莱茵的征服；作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又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在莱茵的复辟。卡尔从小受到父亲的精心培育。**作一个正直的、完善的人，把自己的知识无私地贡献给人类，是马克思从他父亲那里接受的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上中学时，马克思就读的特利尔中学也是一个弥漫着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氛围的学校。校长是一位坚定的康德信徒，在他的引导下，特利尔中学的教学活动带有明显的反蒙昧的理性主义特征。1834年，由于学校教师参加反政府的自由主义示威活动，这位校长几乎被解职。教育行政当局把校里一个爱打小报告的教师提升为副校长，以便监视学校师生。据说马克思从这个学校毕业时向他所敬重的校长和老师们一一话别，却故意不和这位副校长辞行。这件事充分说明了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对政治问题已经有了鲜明的倾向性和爱憎。

上大学、特别是进入柏林大学后，马克思的视野进一步开阔了。加入博士俱乐部，使马克思结识了一批最优秀的青年思想家，他们被称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因为他们试图用**自由主义精神**来重新阐释、光大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反专制，不过它采用了更为严谨、也更为抽象的学术形式。马克思显然从比他年长些的同道们那里受益匪浅。事实上，**我们从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提出的许多命题上，都可以看到未来马克思的影子。**比如，把宗教比作“鸦片”是由著名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布鲁诺·鲍威尔首先提出的，鲍威尔对教会经典“福音书”的批判，在普鲁士政教合一的社会背景下，其实只是批判专制主义的较为隐讳的形式。阿尔诺德·卢格论证反对派之合法存在对于政治自由的重要性、论证政治自由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前提的文字也极其出色。值得注意的是，青年黑格尔思想家们的著述中既有反专制的主张，也有更“超前”的反私有制、反社会不平等的主

张。比如大马克思 6 岁的莫泽斯·赫斯，此人生于富裕的犹太企业家家庭，却违背父命，弃商从文，在法国游历期间受到傅立叶、圣西门学说的强烈影响，转而信奉社会主义。赫斯于 1837 年出版的著作《人类的神圣历史》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童年时期（人类与上帝处于无意识的统一与和谐中，以财产公有为基础），基督教时期（私有制破坏了财产公有制，利己主义膨胀，社会不平等与贫富悬殊日甚），以及始于斯宾诺莎、而于法国大革命中进入高潮的第三时期（这个时期的真正使命是结束人的堕落，恢复人与上帝和谐）。赫斯相信，在废除了私有制、实现财产公有之后，完全的平等才能实现，那时“整个大地将变作一个大花园，那里只居住着幸福勤劳的人们，他们将过着人所应该享受的那种生活。”“社会将拥有大得难以形容的剩余力量，以致能够创造奇迹。对国家来说，将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因为它再也不受制于它的成员的利己主义了。”² 我想，如果读者有兴趣，把赫斯的社会发展分期和对理想的未来社会的描述与后来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的说法³ 作个对比，一定能够发现某些神似的东西。

当然，后来的事实，包括马克思从柏林大学毕业时撰写的博士论文、特别是毕业后马克思在《莱茵报》等刊物的办报经历，证明了这位博士俱乐部的小兄弟是比青年黑格尔派诸君更才华横溢、更深刻、也更富献身精神的青年才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把握，已经有了充足的自信；在《莱茵报》作编辑期间遇到的“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又促使马克思开始关注并研究经济学。虽然这时的马克思——用官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语言——仍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救世理想主义**已经在洋溢着**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的创作中获得了充分表现。比如，马克思坚持出版自由的原则，批评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坚定地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

这位不安分的思想者精神上的一个新的“飞跃”是在流寓法国期间完成的。用著名的马克思传记作家弗·梅林的话说，当时（19 世纪 40 年代）的巴黎“精神园地中到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呈现在马克思眼前的“是一幅丰富得几乎令人目眩的思想和人物的图景”。⁴ 而马克思在巴黎期间写就的批判国民经济学的手稿，则证明了**这位青年思想家的理想主义已经“超越”了“民主主义”而和“社会主义”结合到一起**。在这部天才的手稿中，**带有思辨特征的对人的理想本质的哲学论证**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

² 关于青年黑格尔运动的详情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马泽民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一书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可参考。这里引用的赫斯语，即转引自该书页 291。

³ 在 1857 到 1858 年马克思写的《经济学手稿》中，曾这样谈到社会分期问题：“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页 104）显然，马克思和赫斯的论证都从一个简单的、原始的、相对和谐的（建立在“公有”基础上的）社会开始，经历一段私有制的发展过程，最后又走向对私有财产的否定，而达到一个辉煌的阶段。在形式上，它们都符合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1857 年的马克思早已完全进入思想和创作的成熟期，却仍然沿用了 20 年前赫斯的（严格地说是黑格尔的）论证方式，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详见本文后续文字的讨论。

⁴ 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页 101。

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生产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⁵

另一方面，由于**私有财产**表现为人的**劳动**（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自我否定**和丧失，所以——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⁶

青年马克思的胸襟博大，通过这段略带费尔巴哈风格的文字可见一斑。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理解如下一点，即这种**否定现代私有制的理想主义**一旦确定，势必会转化为**理论层面的激进主义**，并在一定条件下进一步转换为**实践层面的激进主义**。

当本文用“激进主义”这个词来形容马克思时，我首先指的是体现在马克思创作中的这样一种基本意向：现存社会制度的结局只能是**被推翻**，而不是**被改造**。崇尚**革命**而不是**改良**在马克思成为职业革命家⁷后几乎是他思考政治问题的主要特征。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几小节还会深入探讨。现在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马克思个人的**人格气质和心理特征**大概也有助于这种**激进主义立场**的形成（虽然严格地说，某种激进主义的学术主张不一定是愤世嫉俗的个人心理或不幸的个人境遇的自然结果）。用一个西方文化的比喻，马克思身上很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精神**。他并不看重世俗利益，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可以在个人和家庭生活方面做出巨大的牺牲。有这样一则资料谈到：马克思和心爱的女友燕妮结婚后，普鲁士政府通过马克思已故父亲的朋友传达给马克思，要给他一个薪俸不低的官职。这将同时意味着一份固定丰厚的收入。当时《莱茵报》已经被查封，对于一个没有固定收入、被剥夺了遗产继承、在普鲁士境内几乎已无其他安身立命机会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马克思断然拒绝了这个委任。⁸今天那些生活在威权主义体制内，拿着各种各样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资助而去“研究”马克思的人，是否能够体会马克思当年的选择呢？事实上，为了还原马克思从事思考和创作的历史和个人生活语境，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又认真阅读了以前曾经读过的梅林的《马克思传》。这位以“资本”为题写出了大部头著作、并影响了后来历史的人，居然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家徒四壁，靠赊帐和一点微不足道、且时常没有保

⁵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页84。

⁶ 同上，页73。

⁷ 这里使用“职业革命家”这个词，当然只是就其政治意义言，而非指财政意义（对马克思来说，没有什么组织为他的这种“职业”活动支付费用）。

⁸ 马泽民《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页744。

障的稿费过活！如果不是恩格斯的无私帮助，马克思是无论如何完不成他的传世之作的。⁹ 我以为，任何同样以真理追求为己任的人都会为马克思经历过的个人和家庭苦难、为这位思想者的执著、勇敢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而动容，而感慨。

当然，话说回来，无论马克思的理想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如果我们只是在上述层面讨论之，那还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的力量不仅在于他的胸襟和**个人意志的坚毅**，更在于他的**学理**。要探究马克思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中的**乌托邦**，我们就必须深入其学理，才能真正看出个所以然。

通常以为（官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往往这样论述）：成为共产主义者后的马克思在**双重意义**上超越了他的前人，一方面，他超越了“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因为他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进步**，又看到了现代私有制的**罪恶**；另一方面，他又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因为他既有变革现实社会的**激情**，又发现了**实现这种变革的力量——无产阶级和旨在推翻现代私有制的阶级革命**。正是后者，被他的朋友恩格斯誉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也似乎据此获得了**科学根据**。

我们马上就来看看，情况是否真的如此。

“阶级”的神话：马克思眼中的无产阶级

“阶级”问题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由“阶级”、“阶级斗争”学说推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成为后来苏俄和中共一党专制之专制主义政权建构和制度建构的**逻辑基础**。既然如此，我们这里有必要相对详细地探讨一下这个学说的基本内容，看一看马克思怎样界定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关于这个“阶级”——特别是它的“历史使命”——的**神话**又是如何在一种虔诚的、且自认为是“科学”的研究工作中“推导”出来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青年马克思的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到巴黎以后不久写下的。该文把一个青年思想者的激情、深刻表达得淋漓尽致，也首次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富有重大使命**的“阶级”抽象地推了出来。

马克思首先以超越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姿态宣布——

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

⁹ 在《马克思传》中，有大量关于马克思经历的苦难的描写，考虑到作者的身份（梅林是马克思的学生，与马克思一家多有接触），这些描写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比如，梅林谈到：从马克思的一些信里，可以看到家庭不和的迹象。马克思夫人，这位心灵高尚的妇女，从小过惯了物质方面无忧无虑的生活，有时不免在残暴的命运的打击下灰心丧气，以致不止一次地乞求死亡降临到自己和孩子们的身上。而马克思有时也竟认为，对于一个心怀大志的人来说，最大的蠢事莫过于结婚，因为结婚使一个人的生活为琐碎的家务所烦扰。但就是在妻子的抱怨使他烦恼时，他仍旧原谅她并为她辩解。他说，对她来讲，忍受那些难以形容的屈辱、折磨和惊恐，要比他自己更加沉重得多，这尤其是因为她不可能像他那样，在科学的殿堂里寻求避难之所。梅林特别指出：“这位崇高的人物所遭遇的这种命运本身就已经够悲惨的了；但是使它真正达到悲剧的顶点的是这一事实：马克思是自愿地担负起他那长达数十年的殉道者的事业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讲，“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进，而不让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一部赚钱的机器。”（《马克思传》页 298）

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¹⁰

年轻的思想者批评德国“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因此必须“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案）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¹¹

显然，这里提到的“无产阶级”，还仅限于德国，论证也带有明显思辨的、浪漫的性质。¹² 在稍后出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成熟”的著作中，“无产阶级”开始获得更一般的品格，论证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无产阶级”的产生

¹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页2。

¹¹ 同上，页14-16。

¹²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对德国这个当时并不发达的国度的无产阶级的描写中，马克思的激进性和浪漫性已经得到较充分的表露。比如，马克思热烈赞扬1844年爆发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页483）后来的列宁之反对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大概可以从这里找到最初的源头。

马克思还大为赞扬魏特林的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同上，页483）如果你去读一读这位确实出身“无产阶级”（魏特林本人曾是个手工业者）的人写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此书的中译本），看看他是怎样犀利而满怀激情地批评当时的“社会病态”、怎样有力地讨伐金钱和商业的罪恶、怎样憧憬一个“没有主人也没有佣人”“没有权势也没有奴役”“没有匮乏也没有淫乐”“没有法院也没有犯人”的“共有共享”的社会的，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魏特林的著作会激起马克思如此强烈的共鸣。

被置于一个更宽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基于人的生存需要的劳动生产、分工和生产方式的演进（这种演进包括“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也就是后来正统马克思主义术语中的“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被理解为历史的**基础**和历史前进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定义的“无产阶级”乃是分工、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大工业**出现）的结果。如果我们只是从社会分层的意义上来理解“阶级”和“无产阶级”，就向韦伯社会学所处理的那样，¹³ 那么这个概念本来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事实上，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描绘的“无产阶级”，就带有更直观、更为朴素的意味。¹⁴

我以为，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理解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本来蕴含着巨大的**科学洞见**，以这个见解为出发点或参照，人们是可以对许多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成果的（比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提出过“手推磨产生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样的名言¹⁵）。可惜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个原则贯彻到底**。在马克思的思维逻辑中，不难看到这样一点：他总是把人类的某种**理想状态**设定为目标，把历史的现实运动理解为向这个理想目标的逼近。而这个理想目标的**设定本身**是从来没有**证明**过的。比如，他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对抗**阶段，“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¹⁶ 但凭什么截至“资本主义”为止的人类史都只是人类的“史前史”，而非**真正**的人类历史，马克思并没有作过任何说明。当然，如果我们认真研读马克思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明其实是不必要的。**对人的理想本质的哲学设定是马克思思考一切问题的基础和思维前见；对“人本质上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理解无形中支配着马克思对“现实中人实际是什么”问题的考察**。所以，他从来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对这个前提作出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完全可能是**非自觉**的。

而对我们来说，如果真的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对马克思**这样**来论证“分工”、私有制的“缺陷”和“无产阶级的使命”感到意外了——

分工还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加重号为引者所加）形成的社会，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加重号为引者所加），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

¹³ 韦伯对“阶级”问题的处理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阶级”应该是指处于相同阶级地位的任何群体；第二，“阶级”内部的个人是不断流动的，因此，“社会阶级”的统一性打上了极为不同的烙印；第三，阶级划分不一定就导致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第四，即便有这种斗争，它也并非**必然**意味着要**改变**经济制度，而可能仅仅是这种制度的调整。（见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页 333-335）

¹⁴ 恩格斯的定义是：“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更“精确”地把“劳动”这个词改成了“劳动力”——引者）而不是靠某在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生意的好坏，取决于不受限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 19 世纪的劳动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231）

¹⁵ 同上，页 142。

¹⁶ 此语出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33。

驾驭着这种力量。

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

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这种调节消灭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其相互关系**重新**（——加重号为引者所加）受自己的支配。¹⁷

这些论证似乎是“唯物主义”的，因为马克思反复强调共产主义实现的“社会历史条件”；但被论证者的**形而上**本性却是**预先就设定好了的**，因为共产主义仍然被阐释为人的**理想本性**（非异化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复归**，而**工人阶级**则成了理想人性的**体现者**。换言之，如果说马克思把“自主活动”的人学假设当作论证的**当然前提**在许多场合可能是非自觉的，那么他却**非常自觉地把“唯物的”社会发展理论当作证明这种人学假设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其实是不彻底的，它只是**半截子的唯物论**，或干脆说变成了“唯心论”。他想把“头足倒立”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翻转过来，但仍然最终作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俘虏。请看下面这样的对**无产者之历史身份转换**的描述——

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¹⁸

请注意，“科学”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正是从这里**展现出来的**。马克思**先验地**把基于分工、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对立而出现的**无产者**转换成了享受“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的**自由存在者**。阶级区分的社会学概念被先验地转换成了**理性自由人的哲学概念**，虽然马克思接着提到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无产阶级将抛弃旧的社会地位所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但我们还是不能理解凭什么这种“抛弃”会成为某种不可逆的、走向阳光的过程，除非我们承认被抛弃者本身在历史上的存在乃是某种“偶然”。¹⁹

马克思反复强调共产主义“占有”的**集体性质**和无产者作为**个人**在其中获得的**解放**。然而，在经历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一党专制的可怕实践后，人们可能会觉得马克思关于“革命无产者集体”中“个人”和“集体”关系的论说更是一派**胡话**。比如——马克思断言——“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加重号为引者所加）。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

¹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页37-40。

¹⁸ 同上，页76。

¹⁹ 注意“偶然”这个词在这里的独特意味：“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同上，页86）

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集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加重号为引者所加）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²⁰

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当过工人，也没有体验过“工人的集体”（在这个词的经验意义、而非形而上意义内）是怎么回事。这种关于“革命无产者集体”中“个人自由”的阐释只是一个激进思想家革命逻辑的**思辨构造**。我们可以说这种思辨从某一角度看**十分深刻**，因为它毕竟建立在某种系统的人性假设基础上；从另一角度看又**令人发笑**，因为它在赋予“阶级对立”如此抽象又似乎具有历史意味的**形而上**属性时，有可能引出**十分荒唐的实践结论**。联想到后来苏俄、中共极权主义社会的现实，人们甚至会觉得马克思所谓“在（共产主义）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提法颇具**悲伤和滑稽**的味道，无论这里的“个人”是在马克思原来的语意上，还是在**极权主义现实**所规定的语境上。不要忘记，极权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恰恰是对**个人的否定**。

问题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这个思辨的构造乃是建立在对所谓“冒充的集体”（如资产阶级的**国家**）、对阶级对立中集体的“虚幻性”的批判这个基础上的。这样，**人类学**的问题又转换成了**政治哲学**乃至**政治学**的问题，由此出发，某种带有实践特征的对**旧的国家制度的批判**和对**新的政治建构的寻求**似乎已经呼之欲出。

我们马上就会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在这样做之前，我还想就**阶级神话**这个问题再从另一个角度作些补充。问题是这样的：有些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马克思的**经济学**难道没有对他的**共产主义结论**做出贡献吗？人们不是常说（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时的讲话也确实是这样说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大成就，而恰恰是这个理论证明了无产阶级将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吗？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马克思的经济学能否证明他的政治结论？——剩余价值理论的缺失

凡熟悉《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乃是论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为了在**科学意义**上证明资本家确实**剥削**了工人，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必须在**等价交换**的前提下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我们看到——在《资本论》第1卷中——问题是以相当严格的逻辑推导方式提出并展开的：如果说商品运动的公式 $W-G-W$ （两种不同商品以货币为媒介实现交换）由于满足了交换双方对不同使用价值的需求而获得意义的话，那么资本运动的公式 $G-W-G'$ （货币借助某种商品而实现自身的增殖）也必须以这种增殖（ $G'=G+\Delta G$ ）即 ΔG 的获得本身为**意义**。问题是这样的增殖如何可能？在指出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本身上、也不可能发生在商品的再度出卖上以后，马克思断言“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 $G-W$ 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且“不是发生在这种商品的价值上，因为互相交换的是等价物，商品是按它的价值支付的。因此，这种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消费中产生。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

²⁰ 同上，页 84-85。

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独特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²¹

简言之，**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理解了这一点，马克思的全部剩余价值理论就变得十分易懂、毫无神秘可言了。请看：正是由于劳动力成了商品，它在使用过程（也就是劳动）中能够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才有**剩余价值**的产生；“可变资本”（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和“不变资本”（用于购买其他生产资料的资本）的划分无非是为了说明是哪一部分资本的使用直接导致了价值的增殖，另一部分资本则只是实现这种增殖的条件或手段；这两个概念和剩余价值概念的结合还进一步导出了“剥削率”的概念，用以说明资本家**不劳而获**的性质和程度；而在《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剥削率）转化为利润率的讨论，又旨在揭示实际的剥削程度如何借助资本主义当事人的日常意识被缩小、被歪曲和被掩盖。最后，还有那个著名的“剩余价值分割”理论：商业资本家获得的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家获得的利息等等，其实都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瓜分工人的剩余劳动从而与雇佣劳动相对立这个意义上，各个领域**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其实是一个整体。

人们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提出**置疑**，乃至**反驳**。比如，一个辛辛苦苦从零起步的创业者可能说：难道在整个创业过程中我所付出的心血就都不算数么？投资活动总是有**风险**的，赚了钱自然欢喜，赔了本儿老板也只能自己扛着，而不能少给工人一分工钱。更何况我既是“资本家”，又是实际的**经营者和管理者**，难道我的管理和经营行为就不是“劳动”从而也应该有报酬么？

类似这样的反驳还可以举出很多。马克思确实不像他的老师李嘉图有过长期的经商经历。他既没有工人的实际**体验**（穷途潦倒的革命者的体验并不等同于养家糊口的工人的体验），更没有殚精竭虑的创业资本家的**体验**。无论是沿着“劳动价值”这种**客观价值论**的思路考虑问题，还是另辟蹊径从“边际效用”之类**主观价值论**的思路切入思考，经济学者们都可以在承认剥削现象的同时否认马克思对剥削的**过于绝对**的解释。不过本节不想在这个更专业的经济学问题上花费更多的笔墨。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毋宁是这样一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无论就其建构的最初意向而言还是就其最终的建构方式而言，都是服务于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革命目标的**。有一个事实需要在这里简单提及：马克思早在30岁以前就已经形成了他的政治见解和经济见解中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且终生没有本质的变化。这就是说，**马克思青年时代奠定的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见解和革命主张影响、支配了他的一生**。表达其政治见解的最突出的早年代表作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表达其经济见解的最突出的早年代表作则是1847年对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通俗演说《雇佣劳动与资本》。在这个演说中，我们已经可以读到20年后在《资本论》中予以详细阐释的那些最核心的论点的大致梗概。马克思的思路其实是相当连贯的，他的**意图**也十分清楚，那就是为了证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必须把现代私有制条件下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设定为势不两立、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两极**。就前者来说，必须证明资本主义既体现了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性进步（因为它毕竟表征着“物的依赖性”基础上“人的独立性”的发展），又是私有制和人的异化的**最后历史形式**；就后者而言，必须证明恰恰是**现代无产者才是推翻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最终力量**。这样，**人类学、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就都在这样一个关键点上**统一**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上论证**无产者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是借助他的**积累理论和贫**

²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171-172。

困化理论来进行的：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又由于“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所以必然出现**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相伴而生且互为因果的局面，即“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²²

正是在揭示这个“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做出资本积累之“历史趋势”的下述**预言**：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²³

这是一段被无数人引证过无数次的**极其辉煌的预言**，简直有如**壮丽的日出**。但人们往往忽略这样一点：马克思的积累和困化理论**暗含着**一种逻辑，那就是**无论工人的组织化程度如何进步，贫困才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真正背景，摆脱贫困则是无产者革命的直接动因**。如果承认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就很难否定下面两个推论**不是真实的**：**第一，如果工人不再贫困（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那么工人也就不会再革命；第二，即便工人因贫困而革命，这种革命也不过是为了造反者自己的利益**。这种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同类斗争**没有什么不同**。换言之，并没有理由断言工人阶级的革命一定具有**人性升华的形而上稟性**。“生产的社会化”不一定就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占有的社会化”；即便假设有这样的变革发生，也并不意味着**人性的革命就是必然的**。

关键还是思考问题的**既定逻辑**。马克思既然认定历史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会达到的目标，而此前的历史作为“史前史”无非是向这个既定目标的迈进，那么他就完全可能**无视**自己的论证中出现的**矛盾**——事实上，用“贫困”来解释无产者革命的动因本来就蕴含着**另一种逻辑关系**，后文会对此做出解释——而继续把自己的逻辑贯彻到底。这样，我们就读到了一种新的“否定之否定”，它与本文脚注3所引用的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提法虽略有不同，但体现的精神却是**高度一致**的——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²⁴

²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页258-259。

²³ 同上，页268-269。

²⁴ 同上，页269。

这显然是 20 多年前《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观点的再现。

归结起来是否可以这样说：马克思用他的经济学证明他的政治哲学和人类学，但其经济学中相对而言较科学的部分（比如对一般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探讨，这种探讨直接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恰恰是与这种证明无关的部分；而与该证明有关的部分（剩余价值理论）却恰恰是不科学的，或至少是不太科学的。这位“人间普罗米修斯”的人道主义理想、人学假设始终在支配着他的“科学”研究，这反倒使他的研究结果的科学含量大打折扣。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有很严肃的东西，很深刻的东西，对商品拜物教的解剖就是一例。对于理解市场经济和人类文明进程的负面现象，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一定会给人以启示。²⁵ 但我要同时指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尤其是那些与论证未来共产主义有关的观点，又是造成后来一系列历史谬误的理论根源。这里特别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私有制终结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断言。²⁶ 而这一切，说到底，又都要归咎于马克思人性观的偏颇。

现在，我想我们就转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与后来共产专制主义政治建构更直接的几个话题的研讨。

对“国家”的误读：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

何为“国家”？根据阶级斗争的逻辑，“国家”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首先要抓住的核心。这个思想的形成可以一直追溯到马、恩的青年时代。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撰文指出“省议会的立法”和“法庭的判决”不过是贯彻有产者和特权阶级利益的手段。²⁷ 由于拥有地产是当时参加莱茵省议会的主要条件，指责这个机构只为富人说话、办事，就显得不止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有为穷人伸张正义的道德含义在内。后来随着马、恩社会主义见解的进一步成熟，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和以议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有了一些更典型、更一般化的批判性概括。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家被认为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²⁸ 在《共产党宣言》中，则有“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之说。²⁹ 晚年的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仍然忠实于他和他的朋友几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强调“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恩格斯特别强调，“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只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物；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会消失。

²⁵ 严格地说，在《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理论仍然是服从于马克思总的论证目标的一个工具。但体现在这个理论中的对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关系的理解却是深刻的。研究者完全可以把它从马克思的整个论证框架中拆分出来，进行单独的分析。

²⁶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命运的理解，我将另外撰文讨论之。

²⁷ 见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页135-181。

²⁸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页38。

²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274。

“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³⁰

对于恩格斯这样一个富于想像力的比喻，令人恐怕只能报以无声的苦笑。问题不仅在于，据前文已经给出的分析，所谓“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只是马、恩的形而上空想，更重要的是，**基于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而给出的有关“国家”的概念性界定，乃是对“国家”之政治哲学属性的严重误读。**制度现代化理论认为，“国家”乃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创造的政治-权力建构，它经历了一个从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过程。表征现代国家之政治哲学属性的最根本的东西是**公共权力的建立**。无论是立法机构、行政机构还是司法机构，它们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产生、职能分化和制衡机制的完善本身都体现着**社会进化**的力量。当然，**利益向度**在理解国家行为方面是**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因为恰恰是对利益的保护构成公共权力建构的初始动因。然而，以宪政为核心的现代国家体制的进步恰恰体现在它可以以法治的、日益文明的形式来**合理规约**不同阶级（在这个词的社会学意义上）、不同社会集团、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或冲突，用**社会公共利益**来扬弃冲突中的、或具有潜在冲突性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这个发展和进步过程代表着人的**社会本性对自然本性的超越**。还应该看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公共权力机构都在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中。从本质上说，这种“完善”只能是**历史的**，并通过**历史本身的演进**找到**进一步完善的途径**。比如，在选举权的规定上，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开始时财产资格往往是一个重要的限定因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明整体水平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获得政治表达、政治参与的权利，并通过这些权利的使用捍卫自己的利益。而**社会公共利益**，它或是作为各阶级（集团）利益通过相互**妥协**而实现的**中和**，或是作为对冲突中的阶级（集团）利益的**超越**或**扬弃**，也将在这个过程中日益获得更直接的、更普遍的表达。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现代代议机构**，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议会作为立法机关当然应该体现公共意志，但这同样要有一个完善过程。立法机构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成熟主要表现在合理驾驭议员所代表的党派、阶级（阶层）利益与国民全体之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完全否定党派利益和阶级（阶层）利益，是对民主政体的一种乌托邦想象；只把议会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样是不科学的。**而马克思的问题恰恰在于，根据过于片面的“阶级工具论”不但否定了议会的公共权力属性，而且——更一般地——否定了现代国家的公共权力属性。在马、恩看来，“现代国家”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现代议会民主”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因此它对于无产者必然是“虚幻的”乃至“虚伪的”。马克思从不承认“资产阶级的国家”也有公共属性的一面，³¹ 他也没能看到**权力与利益之间远为复杂的关系**。这当然要归咎于马克思理论框架的**内在缺陷**。马克思正确地观察到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普遍利益实现机制的不完善，但由此把整个社会说成是“虚幻的”则犯了**学理意义上的重大错误**。

当然，**强调现代国家的“资产阶级”属性，目的之一乃是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势。**这一点我们不可不察。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那就是马克思对 1848-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

这位寄居伦敦的流亡者一直保持着对法国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的高度关注。他的几部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几乎都是讨论法国问题的。1848 年的二月革命是 19 世纪法国历史上

³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172-174。

³¹ 恩格斯倒是有过“公共权力”的说法，但他仍然是在阶级统治这个范畴内讨论“公共权力”概念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171。

的重要事件。实行君主立宪的国王路易·菲力普被推翻后，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所组织的临时政府开始管理国家，接着举行了制宪会议的选举。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选举其实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因为“继路易·菲力普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加重号为引者所加）进行统治”。³² 马克思谈到这样一个细节：工人马尔歇曾迫使临时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作。当临时政府几天后忘却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好像心目中已经没有了无产阶级的时候，两万工人走向市政厅，大声高呼“组织劳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临时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勉强同意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探求改善劳动者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行会的代表组成，由议会中仅有的两位工人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担任主席，卢森堡宫被拨给它作会址。这样——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被逐出了国家权力中心，而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完全控制了国家权力。只是“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旁边**，在银行和交易所**旁边**，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最高祭司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作。”然而——

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旁边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部，只能是一个徒有善良愿望的部……³³

好在工人到底发动起义了！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不但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甚至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饿死，就是斗争。”这位自己也在饥饿和贫困状态中挣扎的思想家斩钉截铁地断言，发生于1848年6月22日的巴黎大规模工人起义乃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³⁴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也“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最重要的是，起义的失败使工人阶级确信了这样一条真理——

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³⁵

学理的**思辨**现在已经变成**直接的政治结论和战斗动员**。思想家同时成了**鼓动者和战士**。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马克思心目中的“工人阶级专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想1848年

³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592。

³³ 同上，页384-385。

³⁴ 同上，页398。

³⁵ 同上，页400。

时的马克思本人对此也不是很清楚。这要等到 23 年后又一次革命到来时才有答案。这就是 1871 年的巴黎公社。

对巴黎公社的误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从今天的眼光看，发生于 1871 年、仅仅存在了 72 天的巴黎公社革命，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段**短暂插曲**。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法兰西第二帝国也随着路易·拿破仑的被俘而倾倒。在第二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新的临时政府，还举行了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在保皇党和共和党之间以及它们各自内部争执了几年后，才于 1875 年确认政府采取共和的形式，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巴黎公社“革命”只是在这个历史时段内爆发的一次短暂的冲突，它并未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大的影响，也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法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然而，由于在这场革命中诞生了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的措施，这次革命受到了马克思的热烈赞扬和高度评价。

《法兰西内战》，这篇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而写出的文字，就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解读**。正是这篇文字，使我们有机会通过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了解马克思到底是怎样看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关于推翻资产阶级后**工人阶级政权**和政治建构的**空想性质**和**激进性质**，正是在对巴黎公社的议论和赞扬中得到了充分的、较完整的表露。

在历数了法兰西帝国不过是“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后，马克思断言“帝国的直接对立面就是公社”：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³⁶

请注意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话，即巴黎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据马克思看，“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³⁷ 所谓“现成的国家机器”，主要指**议会和政府**（包括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等）这两大机构。既然它们只是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无产阶级就必须打碎它们，摧毁它们，并用“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恩格斯语³⁸）来代替它们。从巴黎公社提供的经验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国家机器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 它将采用**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制度**，既是行政机关，又是立法机关，而不再是**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机构。马克思甚至断言：“议会制在法国已经完结。它的最后的和全盛的时期是从 1848 年 5 月到政变为止的议会制共和国。扼杀了它的那个帝国，正是它自身的产物。”

³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58-59。

³⁷ 同上，页 117。

³⁸ 见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1891 年单行本写的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13。

既然“议会制那时已经死亡，工人阶级革命当然不能去把它从死亡中唤醒。”³⁹

- 它将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国民自卫军，这样，它既消除了巨大的捐税和国债之源，也消除了阶级统治和冒险家对国家权力的僭取。

- 它将废除“独立的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这些“恶棍”。

- 法官的“虚伪的独立性”将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献媚的假面具”。

- 它将摧毁“僧侣势力”这个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以及教会和国家的干涉。

- 所有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都将变成**真正的工人的职务**，管理将不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

- 普选权将得到真正的落实并“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选举公社自己的公职人员（而在过去，选举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为了保证**人民的公仆不再变为人民的主人**，以下两条措施是绝对必要的：第一，所有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的监督下工作，人民有权随时罢免不称职的勤务员；第二，勤务员只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

- 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各个地区的代表会议又向设在首都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他的限权委托书的约束。

- 公社又将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公社将实现**劳动的解放**。这就是说，公社将“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⁴⁰

在这样一幅对公社的彩描中，**理想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对某些**临时措施**的刻画和由此引申出的关于**未来政治设计**更深入的思考等等显然是**混杂**在一起的。关于废除常备军的说法显得有些幼稚（它把战时条件下巴黎公社采取的临时手段平常化了），但人们从军队有可能成为冒险家夺取国家政权的手段的叙述中，还是能够读出某些有价值的思想火花。强调教育和科学要摆脱政府和宗教机构的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马克思一直坚持的价值主张，但在对巴黎公社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并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之所以对存在仅两个月多一点的巴黎公社如此情有独钟，说到底是因为公社宣布的东西与马克思的政治理想有更多的**吻合**，而这位思想家也迅速用自己的更深刻的逻辑和语言对之加以引申。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对公社**政权形式**的说明。政权性质是“工人阶级”的（所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这自然不在话下；政权形式也要与资产阶级的不同，**议行合一**将是无产阶级政权机构的一大特色。据说，这种机构更“实干”而不是像资产阶级议会那样只尚骗人的“清谈”。——请读者注意，正是这个“议行合一”成为后来苏维埃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建构原则的重要“依据”。

我们不难发现**如此阐释**的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激进性**。这种激进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新政权乃是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似乎资产阶级的政权形式中**没有任何可取的东西**（如司法制度是“虚伪的”，警察则是“恶棍”等等）；其次，新的变革**就在眼前**，这种认为“我

³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页95。

⁴⁰ 同上，页59。

们的时代已经到来，且是最后到来”⁴¹ 的乐观情绪总是给马克思、恩格斯以鼓舞，尽管最后总是证明这种乐观其实是没有根据的。更重要的是**如此阐释**的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乌托邦性**。这种乌托邦性质不但体现在马克思对人人都是可以参加管理而无需任何特殊训练的过于简单化的想象上（列宁后来又大大发挥了这种想象），更根本的是在这样一点：**马克思似乎从没有认真思考过无产阶级的政权本身是否有变质的危险**。“无产阶级政权”也是一种权力，它是要由**具体的人**来行使的。权力容易置人于**贪婪**，难道无产阶级就个个都是“圣徒”？权力具有**使役性和强制性**这样两个特征，难道无产阶级的掌权者就没有利用权力**为非作歹**的可能乃至**内在行为倾向**？

当然，马克思谈到了为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所要采取的两项措施，但随便找来一位稍有头脑的中国公民，他都会指出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很难落在实处的。“随时罢免不称职的工作人员”？这需要一定的**制度结构**来保障这一点。在“资产阶级”政府框架内，这是通过**权力制衡**做到的。而否定了三权分立合法性的“无产阶级”政府又当如何呢？至于“只拿和工人一样的工资”，我们的中国公民会更加发笑：这不是绝对平均主义么？假如真的实行这样的政策，那用不了多久，就会变得人人怠工而没有积极性，政府的工作将难以为继。更何况这种情况并不会真的出现，因为掌权者迟早会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安排和调整，不管是通过公开的形式，还是通过隐蔽的形式（今天制度经济学揭示的“寻租”、“设租”之类勾当已经证明人类的**为恶**智慧有多么出类拔萃）。恩格斯曾认为限制工人代表的工资就“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⁴² 这是对人类为恶本能的明显低估，亏的恩格斯还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商人！

马克思对公社“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赞不绝口，却没有认识到这是很多社会革命都会促成的伟大的、但带有**临时性**的社会场景，中国的六四民主运动同样如此。⁴³ **更关键的问题是马克思没有看到他所热烈颂扬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结构形式上蕴含着巨大的危险**。三权分立式的结构制衡在马克思那里似乎不屑一顾，是因为马克思把公共权力的缺陷仅仅理解为有产阶级统治的结果，而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的为恶本性在适宜条件下发作的结果。这样，他就不可能看到即便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权，也会迅即面临公共权力作为权力都会遇到的一切挑战。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这套理论与实践做法的空想性质在当时并未充分表露。到苏俄十月革命以后，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了。

可以说，在对权力（公共权力也不例外）之**异化**可能性的**理解**上，马克思既比不上他的前人邦雅曼·贡斯当，也不如他的后来者、当代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贡斯当在论“古代人

⁴¹ 此语出自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一封信，全文是“我们在 1848 年时说过：我们的时代就要到来，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上已经到来了；但这一次（指 1857 年始于美国、后蔓延到英、法的经济危机——引者注）它才最后到来，现在事情已发展到生死关头的地步了”（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 2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页 288）。然而，被认为是“发展到生死关头的地步”的危机只持续了两年，它并没有真的导致资本主义的垮台。类似这样的**误判**在马、恩还有过多次。

⁴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页 13。

⁴³ 马克思是这样描写公社革命时的巴黎的：“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发生了，抢劫也几乎绝迹了。事实上自从 1848 年 2 月的日子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而且不再有任何类型的警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页 66）凡亲身经历 1989 年北京民主运动的人，都会觉得这一段简直就是对 5 月 19 日北京宣布戒严后直到 6 月 3 日镇压开始这两周期间北京社会治安状况的现场描写。**革命净化人的心灵**在这种急风暴雨的时刻往往表现得极其突出又极其自然，但它不一定表明社会的文明水准已经有了恒久的进步。

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区别、伯林在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别时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便出于对自由的渴望而建立的政权，仍然可能演变为暴政的工具。**请看伯林对“积极自由”的说明：“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之目的，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原因……。”⁴⁴ 问题在于这种“自主”的愿望必须借助**集体解放**的形式才能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自我”可能被集体的“自我”所覆盖，双重“自我”造成了人们对“大我”（部落、种族、教会、国家等等）的崇拜和对“小我”的贬抑，且这种贬抑正好是打着**自由的名义**。伯林对一切诉诸“积极自由”的理论提出警告，就是为了提醒人们谨防此类诉求可能导致的**滥用**。当然，伯林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脑子里已经有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猖獗之类体验作为背景，这正如贡斯当在批评卢梭套用“古代人的自由”却可能埋葬了自由时，他所想的，乃是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马克思似乎没有沿着这个套路用脑子。费希特、黑格尔的思路一直在支配着他（而这个思路在伯林看来恰恰是“积极自由”的思路）。不幸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学理上的过失**；当它转变为**实践行动**时，**历史将为此付出代价**。

马克思似乎从未认真思考过权力问题的深奥和复杂。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真民主，只是因为存在“私有制”的缘故；推翻了私有制，就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创造了条件、扫清了道路。至于与权力相关的人类政治行为的**全部复杂性**（在追求权力与运用权力过程中人与人的冲突，这种冲突必然要借助的**组织化力量**及其属性，权力的**异化**、**独裁**产生的可能性及其人类学依据等）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框架内全都无从谈起。一切都被理想人性的神圣光环和“阶级斗争”的僵硬逻辑遮蔽了。这使马克思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无可救药地走向幼稚，使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政治预言变成了**童话**。迟至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仍在重复民主共和国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后国家形式”，在这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同时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⁴⁵ 这个说法与马克思在1852年写给约·魏德迈的信中的提法显然是一致的，该信强调发现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⁴⁶

而我们——一个半世纪后经历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兴奋和全部悲哀的中国人——又会从马克思的上述箴言中读出什么呢？第一，作为**追求目标**，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幻想**。在这里，乌托邦意味着某种**原则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不管人们对它的追求如何真诚。莫尔、圣西门、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同样是乌托邦，不同之处只在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多了一件“科学”的外衣。更重要的是，第二，作为**实践行为**，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走向共产主义之“过渡阶段”的“无产阶

⁴⁴ 伯林“两种自由的概念”，转引自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页68-69。顾肃在此对伯林的思想有很好的说明，亦可参考。

⁴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页314、315。

⁴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页547。

级专政”恰恰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即从追求更高级的、真正的民主变成赤裸裸的、骇人听闻的专制。道理很简单：在权力问题上，诉诸“理想人性”是靠不住的；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表明，同时支配着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利益原则是一种只能扬弃而不能废除的东西，人为地废除，必然遭到被废除者强有力的反向报复。权力不能被单一力量垄断，不管它以什么名义。事实上，被马克思赞扬备至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在逻辑上预示了未来“工人阶级政党”执政地位的唯一性和天然合法性。当然——这样一来——它也就同时预示了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政权”（权且这样称呼之）走向异化的不可避免性。只不过马克思没能估计到这一点。思想家也是凡人。

（本文作于 2005 年 3~4 月，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党专制逻辑的列宁主义起源

1917 年发生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被认为是 20 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确深深影响了历史**。就中国人而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声炮响”是祸是福，如今已有了公断。中国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曾深受俄国人的影响；中国一党专制的现代专制主义制度也是由俄国引进到中国来的。正因为如此，**要研究党专制结构的逻辑起源和发生学过程，就必须了解俄国革命，知道它何以发生，又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而研究这些东西，最好的切入方式是从讨论这样一个人入手，他就是俄国革命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作为马克思忠实追随者的列宁

列宁是一个天才的鼓动者、演说家，布尔什维克无可争议的领袖，但并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列宁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独创性**，在这方面，他和马克思不能相比。列宁的**激进**主张大部分导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接受。比如，在 1894 年、列宁时年 24 岁时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就大力批驳自由主义民粹派，阐述他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是要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作为这种活动的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⁴⁷

如果浏览一下列宁各个时期发表的主要著作，就会发现这种笃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对列宁来说是一贯的。然而，正是这种原教旨主义立场，使列宁既**没有**能对当时世界大势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走向做出正确判断，也**误读**了俄国的形势和这个正在**进行现代化制度转型**的老大帝国所面临的**基本任务**。

先来看前者。在这方面，列宁与“修正主义”的“伯恩斯坦主义者”的论争可谓代表。我曾经谈过，19 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西欧）是民主化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1890 年德国议会否决了延长“社会党人法”的法案（这个旨在限制左派政党活动的法案是俾斯麦政府于 1878 年颁布的），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党派的活动重新获得合法性。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各国经济的普遍增长，普通市民中有产者的比例也大幅增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爱德华·伯恩斯坦提出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再把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的“大崩溃”，而应该训练

⁴⁷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79。

工人阶级学会“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按民主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⁴⁸

伯恩施坦的观点遭到列宁的强烈反对。1899年8月，还在流放中的列宁读到俄国社会民主党某些成员赞成伯恩施坦而发表的文字《信条》时，立刻写了一封抗议书，指责“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要“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的党”，“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思潮”。⁴⁹那么，《信条》的作者究竟是怎样阐述“伯恩施坦主义”的呢？我们不妨简单作个引证：在指出欧洲形势的变化后，《信条》的作者谈到“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加重号为引者所加），而党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党**将承认**社会；党的狭隘小团体的、多半是宗派主义性的任务，将扩大为社会的任务，而它的夺取政权的意图，就会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⁵⁰即便在今天读来，我也要说不，这些文字写得何等之好啊！我们不难发现，恰恰是“修正主义”的上述主张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些在马克思主义语境内使用的语言，恰恰表达了**民主宪政和制度现代化的一般逻辑**。实际上，20世纪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来的，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仍有其生命力的那一部分遗产。相形之下，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立场却显得如此陈旧、死板，他对党内同事赞同伯恩施坦观点的批评，充分证明他对西欧“阶级斗争”发展的大格局的判断是错误的。

再来看后者，即列宁对俄国国内形势和社会改革之基本任务的**误读**。我们知道，俄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兼有亚洲式的专制传统和脱胎于拜占廷的东正教文化。与西欧相比，俄罗斯是落后的，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从1613年大贵族米哈依尔·罗曼诺夫被推选为沙皇起至1917年二月革命被推翻止）长达300多年的时间内，俄罗斯一直经历着“世界时间普世性”与俄罗斯“历史时间特殊性”之间的紧张。⁵¹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启了从器物上学习西欧的过程；18世纪另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叶卡特琳娜女皇的“开明专制”继续了这个过程，并把“欧化”引入精神领域。经过19世纪上半叶专制主义卷土重来的反动时期后，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标志着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一个新的起点：农民开始获得有限度的、然而又是意义深远的解放。“大改革”不仅宣布了俄罗斯封建农奴制的结束，而且带动了行政、司法、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变革。虽然俄、土战争（1877-78）后亚历山大二世的被刺（1881）使俄罗斯沙皇主导的改革又呈异相，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再度猖獗，但俄罗斯**制度现代化**的总的历史走向仍然是清晰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仍然在发展，并在威权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取得很高成就；另一方面，政治现代化也总要寻找时机适时地切入，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它就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战争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1905年革命促动了俄国国内的政治转型，**君主立宪**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总之，这是一个以俄罗斯历史进程特殊性形式体现的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看不到这一点，就说明没有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机理

⁴⁸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页4、7。

⁴⁹ 《列宁选集》第1卷，页266、268。

⁵⁰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1卷，页264。

⁵¹ “世界时间普世性”和“历史时间特殊性”的提法，见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和大趋势。

那么列宁的问题在哪里呢？当列宁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罗斯是**不可避免**的、并以此批评民粹派试图“阻止”资本主义的想法完全错误时，他本来是握有相当真理的。问题出在接踵而来的下面这个判断上，那就是**无产阶级**不仅要欢迎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不仅要最大限度地参加这场革命，而且还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为“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因此，“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而“‘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⁵² 在这个基础上一列宁满怀信心地认为——俄国无产阶级甚至可以把革命的烈火燃向欧洲，并反过来扩大俄国革命的历史范围，把革命向**社会主义目标**继续推进。⁵³

让“无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这已经是对“俄罗斯特殊性的否定之否定”⁵⁴，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而不是**制度现代化（俄罗斯特殊性之否定）的逻辑**。更何况，即便在马克思主义语境内，列宁也似乎走的太远了。同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资格比列宁还老的普列汉诺夫就不赞成列宁的意见，他认为不但要严格区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更要考虑进行这种革命的条件（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能做**超越历史条件**的革命跨越。普列汉诺夫批评列宁是“急进主义者”，列宁则反讥他的马克思主义前辈是“机会主义者”。⁵⁵ 今天，我们已不必就二人的谁是谁非做出评判；类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逻辑语境内是真问题，在制度现代化逻辑语境内则是**假问题**，且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其何以为假。我所关心的、也是从本文主题来看更重要的，乃是如下一点：既然列宁认定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还面临着走向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艰巨历史任务，他必然会提出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组织形式**问题。列宁自己是这样阐述这个问题的：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自始至终都要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⁵⁶

事实上，正是在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党**等问题上，列宁主义开始显露自己的特色。我们马上就来更深入地研究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是在**什么具体历史语境内**生发出来的，它又**怎样**包含着后来演变为共产党一党专制之**组织建构**的逻辑胚芽。

铁的政党：列宁主义的真正创造

就列宁本人而言，建设一个强有力的、足以承担革命使命的政党，是心中酝酿已久的计划。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曾回忆说，早在19世纪末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的那几年，他就开始认真考虑建党的**组织计划**，以至于把自己搞得“夜不能寐，异常消瘦”。同为流放战友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也回忆道：“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宽广的叶尼塞河边同弗拉基米尔·伊

⁵²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选集》第1卷，页562。

⁵³ 参见同上书，页588-589。

⁵⁴ 王云龙语，见《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页289。

⁵⁵ 关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争论，亦可参见王云龙同上书，页286-294。

⁵⁶ 《列宁选集》第1卷，页270-271。

里奇最后一次散步的情景。这是一个寒冬的月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西伯利亚一片冰封雪盖、辽阔无垠的大地。他雄心勃勃地跟我讲述了回到俄国后的计划和设想。创办铅印的党报，把它迁往国外出版，利用这张中央机关报来建党，这样，这个机关报将成为建造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大厦的特种脚手架……。”⁵⁷

这段回忆深情而浪漫，令人生出几分感动，又几多感慨。

后来的历史发展真和这里的描写差不多。1900 年列宁结束流放生活后，迅即在德国创办、出版了《火星报》，这张报纸成为列宁要建设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中心**。为了批驳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经济派”提倡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推崇“自治”和“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等观点，列宁撰写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建党见解。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这次大会上形成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在**组织构建原则**上产生了严重的观点对立，于是列宁又写了《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再谈他自己的建党主张。这些主张中最重要的要点包括：

● 党是由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组成的先进部队，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松散团体。应该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⁵⁸

● 党的核心应该是由一小部分精干的人组成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理由是：“（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

⁵⁹

● 在党的外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它们应服从党的监督，接受党的领导，但不可“把这些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⁶⁰

● 在党组织内，必须贯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用**集中制**反对**自治制**，就是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反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⁶¹

以上几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确勾勒出一个**全新的**，既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党、也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建党模式**。“集中制”和充当核心、领袖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这个模式最显著的特征。

⁵⁷ 转引自黄楠森、曾盛林著《列宁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页 153。

⁵⁸ 《列宁选集》第 1 卷，页 471。

⁵⁹ 同上，页 404。

⁶⁰ 同上，页 478-479。

⁶¹ 同上，页 499、508。

1947年胡适写过一篇文章，论“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⁶² 这篇文章的要旨当然在批评共产党的**独裁**，但在论及俄式政党的特征时，似乎忽视了这些特征形成的**具体历史语境**。要知道，当列宁提出以上建党原则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尚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这种非法身份不能不对党的组织构成和运行方式产生影响**。列宁自己就曾有力地阐述过秘密状态下的党为什么不能实行“广泛的民主原则”：

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

关于民主制的第二个标志即选举制，情况也并不见得好些。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但对专制的俄国来说）要所有“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来监督秘密革命家的一举一动，这在我国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必须使“所有的人”中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来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呢？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工人事业》所讲的那些响亮词句的真正意义，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⁶³

引述上面这些，是想强调一个意思：要**历史地**看问题，即便是那些**后来发展为专制主义的、极其可恶的东西**，它的起源也可能包含着某些极容易理解的**客观因素**。但我为列宁的“辩护”（如果这种引证可以称之为“辩护”的话）只能到此为止，因为列宁确实没有注意、至少是没有强调事情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集中制的弊害和党的权力中心的寡头倾向**。

研究政党组织之“寡头”问题的最好著作之一，是德裔意大利籍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911年发表的《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米歇尔斯首先承认**组织的必要性**：“组织看来是形成集体意志的唯一途径。组织能够使其成员的付出最小化，最节省精力，它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⁶⁴ 这与列宁的观点显然是一致的。——列宁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⁶⁵ 然而，米歇尔斯的下列断言却显然超出了列宁的视野：“**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加重号

⁶²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把英、美、西欧的政党称为“甲式政党”，特点包括党员自由登记入党或脱党、党员言论自由不受党纪约束、党遵循多党和平竞争的宪政原则等；“乙式政党”则指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纳粹党和俄国共产党，这些党都强调组织的严密、党员必须服从党纪、政党目标在一党专政等。见《申报》1947年7月6日。此文收入张忠栋等主编《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民主·宪政·法治卷），（台北）唐山出版社，页1035-1039。

⁶³ 《列宁选集》第1卷，页416-418。

⁶⁴ 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18。

⁶⁵ 《列宁选集》第1卷，页526。

为引者所加)。在任何组织中，无论它是一个政党、工会组织，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协会，其贵族化倾向都是显而易见的。组织的结构在赋予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却使组织化的大众发生了深刻变化，完全改变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地位。”⁶⁶

米歇尔斯也强调政党组织的**非民主特征**，但他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讨论的——

在组织的日常活动中，一定程度的专制独裁有利于政令的迅速传递和执行……。在政党组织中，特别是在那些作为战斗堡垒的政党组织中，民主不是只供自己享用的东西，而是一种对外出口的物品。任何政治组织都需要“一套不妨碍其行动自由的轻型装备”。民主与这种策略上的及时性是格格不入的，民主本身并不利于组织立即采取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政党（即使是那些民主主义的政党）对全民公决以及其他保障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得以实现的举措持有如此深的敌意；这也是这些政党组织架构呈现出即使不是绝对的专制，也至少是强烈的集权和寡头倾向的根源。⁶⁷

而米氏真正担心的是组织的这种本性所必然造成的“领袖的专断”。随着“寡头”——也就是不多几个掌控着组织大权的领袖所组成的小圈子——的形成，他们会变得日益**保守**，这个小圈子也将逐渐形成独属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有可能——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将——**背离**组织原来所追求的目标。**权力意识**总会使人变得自负，渴望**主宰他人**的欲望会迅速膨胀起来；而大众的漠不关心、得过且过，以及希望得到引导，将进一步助长领袖对**权力的本能贪欲**。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代表**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可能性**就越高。最后，当组织内的权力竞争超过了政党与其敌手间的竞争时，政党就丧失了自身的**政治纯洁性**，因为政党本来意味着迈向某种共同目标的一致意向，一旦这种共同意向不复存在或至少变得模糊起来，所谓的政党就只能是单纯的“组织”而已。⁶⁸

米歇尔斯的研究语境和讨论对象是 20 世纪初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时的德国社民党是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组织。这一点与列宁讨论问题的语境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米氏论证一个合法的、公开的党在其运行中会从民主走向独裁（寡头统治），那么列宁的**秘密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从建党一开始就不能不是高度集中的、寡头领导式的党**。但列宁只是囿于条件所限而不能实行民主，却心仪之；而米氏则断言任何组织都不免走向专制，寡头统治乃是所有政党都难以避免的结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我以为，尽管米歇尔斯的观点也有偏

⁶⁶ 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页 28。

⁶⁷ 同上，页 38。

⁶⁸ 同上书，参见页 78、89、155、175、324、325 等。

颇之处，⁶⁹ 但在对组织的本性的理解和前瞻上，米氏显然比列宁高出一筹，因为他看出了组织所蕴含的内在的危险。当然，无论米歇尔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料到、更没有论证过“组织”后来的发展：在一党专制条件下，“组织”会生发出更为玄妙、也更为可怕的功能，成为锁住人的手脚的镣铐，禁锢人的灵魂的紧箍，成为一党专制的得力助手和基本控制工具。这种研究需要新的材料和新的体验。它只能由我们来继续、来完成了。

强调集中，强调“铁的纪律”，这是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和建党实践的重要特色。这种特色不但在秘密年代，而且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也成了党的传家宝。1920年列宁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各国代表传授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经验时，就把“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当作“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⁷⁰ 此类的“传经”似乎进一步说明列宁囿于一时的经验而缺乏更深刻的反省精神，把布尔什维克党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当成了普遍真理。

当然，如果我们只是在政党建构理论内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仍然没有超出米歇尔斯式的问题域；列宁主义党建模式的真实历史意义恰恰不在于此，而在于这种组织结构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当“铁的政党”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逻辑范畴内与国家政权“合二而一”而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国实践时，也就是说，当“铁的政党”真的掌握了国家权力并形成排斥一切竞争对手的权力垄断局面时，历史的不幸才真正注定了要发生。

“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党专制的形成

如同法国巴黎公社一样，俄国十月革命并不具有共产党长期以来所宣传的那种“改变人类历史方向”的“时代意义”。就俄罗斯现代历史的发展轨迹言，导致这场“革命”爆发的内、外因素很多，而且总的讲这些因素大部分可以归结为历史演进之逻辑意义上的偶然性，比如“二月革命”后出现的混乱格局以及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罗斯国内政治-社会转型进程的悲剧性影响。对于这些，俄国人自己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⁷¹ 我们这里所关注

⁶⁹ 比如，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在他写的《寡头统治铁律》英文版前言中就指出米氏理论有其“过于武断的一面”，因为现代社会中不同的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不同的组织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功能，导致不同的结果。本书前引胡适的文章其实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李普塞所说：“在现代社会，民主可以被视为组织化群体间争夺民众支持的过程。”“许多内部结构呈现出强烈寡头化倾向的组织，却为整个社会实现民主提供了基础，并能够保障其成员的利益免受其他群体的侵害。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上的：任何群体都不能拥有某种权力基础使其能够对多数人发号施令，都不能拥有有效压制或否决与其对立的其他群体的要求的永久性权力。”（《寡头统治铁律》英文版前言，页 48-49）这样一种理解实际上预设了某种多元的宪政民主政体的存在，它的确有助于化解各政党内部的寡头化倾向对整个社会民主建构的影响。不难发现，上述对政党“寡头化”问题的讨论，反倒使我们增加了理解多元宪政民主之价值的一个有用的维度。

⁷⁰ 引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页 135。

⁷¹ 比如，可参考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一部分中的几篇文章。其中，“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会获胜，由此导致了什么结果”一文更是直接针对十月革命问题的研讨。

的，乃是借助这场革命而产生的一个**新型的政权**——布尔什维克政权，它给自身界定的“本质”属性，证明这些“属性”之**正当性**的根据，以及它在现实操作、运行中所呈现的那些**实际特征**。

研究俄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国家与革命》。该作品准确表达了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所理解的、即将进行的这场“革命”的性质。讨论是从引述（重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学说开始的。列宁强调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又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按照这个逻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不可能“合作”或“调和”的——

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

72

可以说，这是关于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将**独自垄断政权的最明白无误的宣示**。

它也同时宣示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当然在否定之列**。

按照列宁的说法，“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加重号为引者所加），——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⁷³

大概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知，即便是在 1905 年后实行君主立宪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摆脱了秘密状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杜马的**正式党团**，列宁也**从未**考虑过与其他政党在议会内真诚合作，而**只是**把议会当作工人阶级政党宣传自己的纲领和激进政治主张、痛斥沙皇制度的讲坛。⁷⁴ 1917 年“二月革命”发生后，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党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教导人民**不要相信资产阶级**。在列宁自己起草的《四月提纲》中，这位党的领袖明确提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⁷⁵ 1917 年 9 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召开全俄民主会议，并产生了“预备议会”，布尔什维克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当时身在芬兰的列宁激烈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民主会议的“错误策略”，警告他的同志们不要成为“十足的议会迷”。⁷⁶ 正是在列宁的坚持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全力准备**武装暴动**。

⁷² 《列宁选集》第 3 卷，页 131。

⁷³ 同上，页 150-151。

⁷⁴ 有关文献这样记载了列宁向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成员交待任务时的谈话。列宁说：“黑帮分子的杜马是永远不会通过改善工人状况的法律的。工人代表的任务是利用杜马的讲台，每天向黑帮分子表明：工人阶级是有力量的，是强大的；革命高潮重新到来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这个革命将把整个黑帮，连同他们的大臣和政府一起扫除干净。当然，也可以对预算提出修正案，甚至还可以提出某种法律草案，但所有这些行动应该为了一个目的：痛斥沙皇制度，揭露政府的全部骇人听闻的专制罪行，宣传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和遭受残酷剥削的事实。这就是工人期待自己的代表去做的事情。”（参见黄楠森、曾盛林著《列宁传》，页 349）

⁷⁵ 《列宁选集》第 3 卷，页 15。

⁷⁶ 同上，页 277。

从今天我们已经达到的、**制度现代化的认识逻辑**看问题，列宁当年的想法和路数**根本上就是错的**，尽管他自己极其真诚地相信他握有真理。其实，在君主立宪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党，派代表出席国家杜马的工作，公开出版、发行党的机关报《真理报》，这本身就是制度现代化范畴内**俄国民主化的进步**。可惜这样的进步好景不长。“二月革命”后俄国国内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软弱的临时政府、分崩离析的各种政治势力、军队的混乱、来自底层民众的呼声混杂在一起，最终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创造了机会。而对列宁来说，政权的获得意味着从此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改造俄国、建设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制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地成为现实。

可以举个例子，那就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布尔什维克公布的**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

“立宪会议”本来是临时政府时期就准备召开的会议，旨在使俄罗斯的政治-社会转型纳入法治的、宪政的轨道。列宁本人对这样的“立宪会议”并不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说法：“过去把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入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立宪会议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但“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77

不管怎样，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还是在1917年的11~12月举行了，结果并非布尔什维克所愿：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正式开幕。在会议进行中，多数代表不同意**事先由列宁起草好、已经以立宪会议的名义在《真理报》上刊登、并要求立宪会议“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表达了立宪会议要臣服于苏维埃政权的意思，并宣誓“立宪会议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并且认为它本身的全部任务就是规定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⁷⁸显然，这是一个**未经协商的、强加于人的文件**。而当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拒绝讨论**这样的文件时，布尔什维克党做出了激烈的反应：退出立宪会议，并于第二天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列宁本人并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他在自己起草的《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中断言，无产阶级根据本身的革命经验“打消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形式的欺骗性，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不同这些议会制形式以及一切妥协行为决裂，被压迫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被剥削劳动阶级，因此引起了剥削者的拼命反抗，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充分显示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⁷⁹

就这样，**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不但被用于否定议会制度，而且被顺理成章地用于镇压异见**。

甚至，这种**镇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发布一纸宣言，而是落实在了用**武力**表达的行动上：当彼得格勒的市民为纪念立宪会议而举行和平游行时，他们竟然饱尝了**来自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员的子弹**！

当然，**这一段带血的历史**在后来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是普通俄国人（那时他们被称为“苏联人”）所不知道的，中国人自然更无从知道。我们只是从1988年才在苏联出版、1998年才译成中文的高尔基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中，才确切得知这

⁷⁷ 同上，页363。

⁷⁸ 同上，页388。

⁷⁹ 同上，页389。

样的史实。当年的高尔基曾在十月革命前后编辑《新生活报》期间发表一系列时评，批评布尔什维克党的各种政策。其中有一篇题为“从1月9日到1月5日”的文章，就是讲的枪杀和平纪念立宪会议示威者这件事情。⁸⁰

从**逻辑**的角度讲，令我们深思的毋宁是这样一点：当年的列宁确曾**真诚地相信**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正义的**，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正是为了促进、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当第二国际的思想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列宁和苏维埃政权不该解散立宪会议、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消灭了民主”时，列宁立刻给考茨基冠以“叛徒”的罪名，强调“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⁸¹ 列宁的逻辑是：“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⁸²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人民”和“敌人”两相对立的逻辑开了一个多么恶劣的先河，在当时又导致了多么严重的后果：1922年苏维埃政权就采取过一项“非常行动”，把包括尼·别尔嘉耶夫在内的160名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授、诗人——他们构成当时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和精华——驱逐出境。更有材料显示，由于当时多

⁸⁰ “1月9日”指1905年的1月9日，那一天正好是沙皇政府下令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示威者开枪的日子。“1月5日”则指1918年1月5日，是布尔什维克镇压纪念立宪会议游行者的日子。高尔基的文章对这两个事件作了辛辣的比较，并对1918年1月5日的镇压提出强烈谴责。这里不妨摘录一段文字如下：

1918年1月5日，手无寸铁的彼得格勒的民主派——工人、职员——为纪念立宪会议举行了和平游行。

俄国的优秀人士为立宪会议的思想所鼓舞已经几乎有一百年了，立宪会议，这是一个将给全体俄国民众以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的政治机构。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在为立宪会议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死于监狱、流放地和苦役场，死于绞架上和士兵们的枪弹下。在这一神圣思想的祭坛上早已血流成河，而现在“人民委员们”又下令向民主派开枪，可他们是为纪念这一思想而游行的。我要提醒一下，“人民委员们”中的许多人在他们整个政治活动的过程中，自己也曾教导工人群众，必须为立宪会议的召开而斗争。《真理报》写道，1月5日的游行是资产者、银行家等等组织的，向塔夫利切斯基官行进的正是“资产者”和“卡列金分子”，这是在撒谎。

《真理报》是在撒谎，因为它非常清楚，“资产者们”在立宪会议开幕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他们在246名社会党人和140名布尔什维克的环境中无事可作。

《真理报》知道，参加游行的有奥布霍夫工厂、帕特隆工厂和其他工厂的工人；它知道，瓦西里岛区、维堡区和其他区的工人是举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红旗走向塔夫利切斯基官的。

正是这些工人遭到了枪杀，不管《真理报》撒多少谎，它也掩盖不了可耻的事实。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朱希渝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260）

⁸¹ 引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见《列宁选集》第3卷，页626。

⁸² 同上，页615。

数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多达 200~250 万人**不得不流亡国外！⁸³

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列宁是这样讲的：“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因为“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⁸⁴

这里，我们不必讥笑一个可能由于长期的秘密生活所致竟然把“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理解为“民主”的革命领袖。——这种逻辑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绝不能说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在“最好的建筑物”人民大会堂里开的，这个会就一定是“民主”的。我们不必拘泥于列宁的此类表述，而要抓住他的论证的**核心**，那就是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讲的，无产阶级民主表现在“完全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⁸⁵

总之，“无产阶级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工农**已经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这就是列宁的结论。这个结论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那里引申来的。它一方面把不是工农的所有其他的人都打入另类，不再属于**人民的另类**，另一方面又把**工农神圣化**。而我们又已经知道，**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党”实施自己的领导**（因为**一盘散沙式的无产者是无法承担阶级领导的重任的**），“党”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样，对**工农的神圣化必然导致对“党”本身的神圣化**。“职业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铁的政党”自然都成了“无产阶级”的天然代表。在夺取政权以前是这样，夺取政权以后更是这样。

党专制的逻辑就是这样形成的。

对于这种**名义上**是无产阶级掌权、**实际上**却由少数几个人在最高层操纵的**党专制**，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曾做出过下列分析：

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⁸⁶

事情还不止于此。一党专制不仅将窒息社会的公共生活，清除所有与当权者不同的声音，而且在党内也将形成排斥异己、领袖独裁的格局。这是党专制逻辑的必然演变和发展，

⁸³ 参见德·沃尔科戈诺夫所著《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张慕良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67、277。

⁸⁴ 《列宁选集》第 3 卷，页 606。

⁸⁵ 同上，页 607。

⁸⁶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31-32。

且为俄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掌权的历史所证明。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列宁的经济乌托邦

列宁的经济乌托邦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虽然对斯密、李嘉图作过深入研究，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机制有过出色分析，但他的经济学研究却一直被他的**人类学预设和政治哲学目标**所左右。由于马克思总是在“异化”和历史活动的“自发性”意义上讨论“交换”和后来被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归结为“价值法则”的那些现象，这位思想家不可能得出**制度现代化逻辑语境**内有关市场经济之经济结构及其**正面功能**的一般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政治学后果是**阶级神话**的完成。在这个神话中，赤贫的无产者将转变为**自由的存在者**。而对于列宁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神话，而是**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中**商品生产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思想自然成为列宁**苏维埃实践设计**的根据和出发点。

我们先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阐述这个问题的。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这样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的**非交换性**：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⁸⁷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有关说法则更为直截了当、通俗易懂：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⁸⁸

列宁对马、恩的上述观点是非常熟悉且高度认同的。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断言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政治上的迫切问题”乃是“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成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⁸⁹ 在这个“大辛迪加”里，将不再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里将贯彻**共产主义的劳动原则**。当然——列宁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此处所谓“共产主义”还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因为社会还不可能一下子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在消费品的分配领域还不得不执行“按劳分配”即“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但由于资产阶级已经创造了使人人都能参加管理的文化、经济前提，“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

⁸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页303。

⁸⁸ 同上，页633。

⁸⁹ 《列宁选集》第3卷，页199。

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总之，“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须的主要条件。”

90

列宁关于（第一阶段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社会的经典形容是：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⁹¹

这些还只是理论。现在我们看一看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众所周知，1918年到1920年，苏维埃俄国在经济上实行的是以**余粮收集制**和**国家垄断一切贸易活动**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余粮收集制意味着**禁止一切粮食私营**，农民必须把除口粮以外的全部粮食上交国家。考虑到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国内蜂起的武装叛乱、外国武装干涉、交通瘫痪、物资尤其是粮食奇缺），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带有救急的、乃至被迫的性质。但仅仅从这个角度理解战时共产主义是**不够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从当时以及后来列宁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大量言论看，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超出了**权宜之计**的范围。比如，我们可以读一读列宁1919年2月起草的《俄共（布）纲领草案》，在这个文件中，列宁列举了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经济、土地问题等方面面临的基本任务。关于**经济任务**，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现实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虽然“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但“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入银行等等”。⁹²显然，**废除货币交换和商品生产绝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作了认真的谋划**，并写入党纲，公开发表了出来。列宁还高度赞扬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革命首创精神”：“**不领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难道这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吗？”⁹³——在这样的叙述中，似乎马克思憧憬的“自由人联合体”就要由俄国工人阶级把它**开始**变为现实。⁹⁴

只是当战时共产主义在实践中遭受**重大挫折**后，列宁才意识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的**坦率承认错误**，倒是后来共产党领导人中很难再得见到的**优点**。1921年10月2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列宁坦言：过去“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⁹⁵在《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文章中，列宁更加坦率地承认：在经济建设这个“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

⁹⁰ 同上，页202。

⁹¹ 同上，页202。

⁹² 同上，页728-729。

⁹³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16。

⁹⁴ 列宁的说法是：“**普通工人**起来承担艰苦的劳动，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亿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页17。

⁹⁵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页596。

错误最多”——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⁹⁶

“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这正是从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实质**。显然，这个新政策是**不得已**转而实行的。日益明显的农业危机、规模日甚的农民暴乱、粮食和燃料困难的加重等迫使布尔什维克当权者做出政策上的调整。新政策的核心是**允许粮食自由贸易**。这就是说，农民在合法纳税后，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并从中**谋利**。从**制度现代化立场**看，这当然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转变**，须知，**经济增长动力源的自由主义式的理解、产权结构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性安排等等，都可以从允许粮食自由贸易这件事上合理地推导出来，生发出来**。但列宁并没有、也不可能这样看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确实并未否认、而是痛快地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贸易自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复活”。然而他同时强调**实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退回到资本主义**，而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⁹⁷当然，这个话说的很牵强，不过表明列宁**并未放弃他的共产主义经济乌托邦的理想**。到1922年，列宁承认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的“退却”或“换车”，但他同时说：“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后退，但是我们这样作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⁹⁸

对于苏维埃政权实行新的贸易自由政策，当时的俄国持不同政见组织路标转换派曾有“布尔什维克正在发生内部蜕变”的说法，而列宁对这种说法的**反应是很耐人寻味的**。一方面，列宁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粗鲁地公开说出的阶级真话”，他们希望苏维埃政权“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另一方面，敌人又的确“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⁹⁹既然是“阶级敌人”说出的“阶级真话”，那么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布尔什维克也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所以列宁说：“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激烈的斗争，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争。”¹⁰⁰至于“危险”，列宁曾在另一个场合仔细分析过他所理解的、布尔什维克面临的**危险**是什么——

在解决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时，危险来自政治方面。这种危险是微不足道的。在全世界资本家所支持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到来后，出现了军事上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比较严重了。而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

⁹⁶ 《列宁选集》第4卷，页569-570。

⁹⁷ 参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页501-503。

⁹⁸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页732。

⁹⁹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选集》第4卷，页678-679。

¹⁰⁰ 同上，页679。

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¹⁰¹

显然，在列宁的排列顺序中，“政治危险”是最微不足道的，之所以“微不足道”，大概是指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暴力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宣布解散议会，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当然，列宁的**浅薄**也正在于此。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政权的结构本身其实孕育着更大的政治危险**。军事危险在列宁看来是较为现实的危险，不过布尔什维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红军，战胜这种危险也应不在话下。最重要的还是**经济方面**的危险，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实正在苏维埃政权控制下的俄国**复活**，而且，这种“复活”对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来说带有不得已的**被迫性质**。“不管我们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

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复活理解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危险，这当然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经济假设和苏维埃阶级斗争逻辑的产物。在这样一个认知逻辑内，对市场机制和市场功能的承认是不可能彻底的。好在列宁作为实践家，他清楚地意识到苏维埃政权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然而，在论证布尔什维克如何完成这项“特殊任务”时，列宁再一次暴露出自己的**视野**和思考问题**角度的局限性**。

列宁认为，当时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党的官员不懂得**管理**。从1921年起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一方面表现在允许农民自由买卖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另一方面就是在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提高效益，甚至通过引进国外资本、设立合营公司来增加工业品的生产供给。问题在于——据列宁看——布尔什维克党人和苏维埃政府的官员**不会管理这些事情，不会管理经济**。“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既有政治权力，又有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就是缺本领。”“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愿违。”“资产阶级人士往往比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员懂行，我们党员虽然拥有全部政权和一切条件，但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政权。”列宁很同意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说的这样一句话：“仅仅战胜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致命打击是不够的，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¹⁰²

说刚刚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不懂得经济管理，这完全可以想象，可以理解。问题是**什么是管理？在什么意义上去谈管理？**如果承认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那么政府人员的管理只是为市场经济服务意义上的管理，只是以“看得见的手”的方式为市场运行确定基本规则、并矫正市场运行中可能出现的缺陷的管理。而国营企业的领导则是学会如何运用市场运行的知识、经验，从而更好地驾驭市场这种意义上的管理。但列宁似乎主要不是在这两个意义上谈，而是指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要比资本家更有“文化”、更能**控制、战胜**私营资本活动意义上的管理。换言之，**列宁并未从整个苏维埃经济结构的重新整合、承认市场原则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并把它纳入新的经济制度安排之类角度看问题，反而把这样考虑问题的人说成是“敌人”，这样，政治理念之逻辑框架的谬误自然决定了列宁不可能有制度现代化之市场经济制度建构的观察视野。**

当然，我们确实可以想象那个年代满脑子共产主义概念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官员，面对正在复兴的市场经济的**无措与愚蠢**（列宁自己举的例子是进口一船罐头也要由中央政治局来决定¹⁰³）。说到底，新经济政策背后的逻辑不过是：要维持苏维埃政权，就必须争取农民的支持；要获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商品**换取农民的粮食（而过去余粮收集制的强拿硬要是不行

¹⁰¹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页608。

¹⁰²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选集》第4卷，页669、680-681。

¹⁰³ 关于这件事，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页683-685。

的)；要生产商品特别是工业品，就要用资本家的知识和经验，但必须是让他们为我们服务，而不是相反。苏维埃官员的愚蠢正在于连这样的事情都处理不好。

由此不禁使我们慨叹：对当时的列宁来说，破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迷信，重新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建构的核心要素来思考，确实显得太遥远了！列宁当时面对的问题太低级，问题的实质一面反而被掩盖了。这样的实质问题至少包括：（1）如何重新认识市场经济的本性？（2）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究竟是什么？（3）如果市场经济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的复苏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政府官员有否在金钱力量面前异化的可能？又如何去面对这种异化，正视它并设法解决之？——但是，这样三个问题列宁都从未涉及，而且也不再有机会去研究，去处理。上述引文大多出自列宁 1922 年 3 月 27 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报告。两个月后列宁就病倒了。直到 1924 年 1 月 21 日去世，列宁再也没能就经济问题提出新的、有意义的见解。他的有限度的经济改革没过多少时间就被他的后继者所中断；而他的未经深刻省思的经济乌托邦则对后来各国共产党当权者的经济实践发挥了不良的、持久性的影响。这是后话。

从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列宁主义的逻辑后果

现在，我们再把话题转回到一党专制的政治建构上来。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关于领袖“专断”或“独裁”问题，米歇尔斯曾在寡头统治角度内作过深入讨论，但由于他所议论的主要对象并非执政党，所以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和需要看，米氏的研究仍然是不充分的，它的有待继续的部分，要由我们来完成。换言之，我们的任务是要探讨取得政权后、并且是在一党垄断权力的条件下党的领袖走向独裁的趋势乃至必然性。是的，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历史经验上讲，我都认为这种独裁的形成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首先，由于列宁主义否认议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也就否认了多党竞争和建立在这种竞争基础上的权力制衡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取得政权后的党形成党专制的局面乃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其次，在既没有来自外部的制约，又缺乏来自党内的制约和监督的条件下，党的领袖形成独裁和唯我独尊的局面也是必然的。而且，这种独裁还不仅仅是对党而言：由于一党专制条件下党的领袖同时又是国家政权的最高代表者，党首的独裁同时就是国家最高执政者的独裁。这样，从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包括党内独裁和国家政权独裁）就成为列宁主义合乎逻辑的政治结果。

当然，这个东西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很多人喜欢用追求权力（对权力的贪婪）来解释独裁者的行为。这种解释固然说出了部分真理，但对了解共产党领导人何以会踏上独裁之路，却是远不够充分的。一般来说，共产党的第一代革命者多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并非单纯敛权的贪婪之徒。然而，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不同观点、不同策略主张之间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掌握权力往往意味着可以强行贯彻自己的主张；坚信自己主张的正确往往又形成对其他不同观点的排斥。在残酷的、瞬息万变的斗争环境里，形成集中的而非分散的、独裁的而非民主的决策模式和领导风格尤显自然。

取得政权以后，情况会发生静悄悄的、然而又是意义深远的变化：在革命斗争年代形成威望的领袖会在以后的掌权岁月里膨胀其自信心、自负感和成就感，更加听不进不同意见。在重大的国家决策问题上，由于没有任何有效的、来自党外的权力制衡和监督，决策者事实上丧失了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纠错机制。党内“民主”则更加靠不住：在野的社会民主党

尚且有形成寡头垄断的趋势，执政的、成为国家**唯一**权力中枢的党更不可能真的有什么“党内民主”。围绕权力会形成一系列新的规则，它们只能有悖于、而不是忠实于真正的民主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一党专制的政权建构本身就是促进领袖独裁的最大的酵母，或曰领袖独裁本来就是一党专制的必然后果和体制性产物。**当然，“组织”的力量也不容忽视。无论在夺得政权以前还是夺取政权以后，“组织”都是成就领袖独裁的重要工具。**在成为唯一的执政者后，“组织”的最大变化是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构的融合。党的织体成为国家政权的**核心**，国家政权不过是党的织体的外化。领袖则同时身兼党首和国家最高执政者二职，其作为独裁者的“使动性”自然获得无与伦比的畸形展现的可能。**

以上所谈，还只是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的**一般逻辑**。在各个具体的历史场景，由于每个共产党领导者个人经历、修养和素质方面的不同，领袖独裁的表现方式、程度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当独裁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和途径对最高决策者的见解、决定提出有意义的挑战时（所谓“有意义的挑战”指本质上不同、或有重大分歧的意见、观点、政策主张），这可能是一种程度较烈的独裁，或称**强势领袖独裁**；而若提出这样的意见还是可以被容忍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忍，但这种容忍不一定意味着意见被采纳，则这样的独裁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弱势领袖独裁**，或较温和的独裁。

现在我们就以列宁和他的后继者为例，看看这个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的大致进程。

列宁是无可争议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具有战略家的才能和极高的个人魅力。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无数党内斗争，最终基本能够控制这个党按照自己的主张和意愿发展，并夺得了政权。虽然列宁的性格中有偏执、暴烈的一面，但在**列宁当政时期，俄共的党内独裁并未达到顶点，党内还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比如，在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做的主报告，加米涅夫做副报告，两个报告的观点并不一致。列宁强调要适时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加米涅夫则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党和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只限于监督临时政府。虽然加米涅夫的观点受到了“批判”，但毕竟在党的正式会议上讲了出来。再如1918年到1920年期间，俄共党内曾就企业管理中究竟应该实行“集体管理制”还是“一长制”有过激烈的争论。列宁本人主张一长制，但在不少场合遭到反对。1920年1月12日召开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就反对列宁提出的一长制原则，认为一长制会破坏工人民主的基础。在1月23日到29日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发表讲话，再次坚持一长制的管理原则，但仍然没有被会议接受，这个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在一般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形式的决议。直到1920年3月29日至4月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才结束这个争论，最终通过了列宁的一长制管理原则。¹⁰⁴ 这些都说明当时俄共党内尚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气氛**。列宁主事期间党的代表大会每年都能如期召开，也是党内生活基本正常的一个证明。

在俄共历史上构成**党专制向领袖独裁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派别活动”的批判和禁止。这一点**列宁本人要负主要责任**。所谓“派别活动”，用列宁自己的说法，就是党内“产生了几十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在列宁看来，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的。在1921年3月列宁写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中，列宁强调“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如果有人一定要搞“派别活动”，“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

¹⁰⁴ 以上这两个例，参见黄楠森、曾盛林著《列宁传》，页452-453、604-605。

开除出党”。¹⁰⁵

从表面上看，似乎党员还是可以就党的工作提出批评的，列宁所反对的只是党内形成有组织、有纲领的不同派别。但经验会告诉每一个党员，他的**个人声音**（尤其是那些不同于党的现行纲领、主张的声音）是很难被党的领导人所听到、所重视、所采纳的；不允许党员以**集合的、集体的声音**讲话，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党员批评的权利。或者，我们再退一步，承认“党内有派”有足够的理由去禁止，问题是被开除出党的异议分子是**不可能另外组党并以合法身份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这正是一党专制的可怕之处。党专制条件下的“取缔派别活动”只能强化党的领导人的独裁倾向，而丝毫无益于党的“民主”和整个国家政权的民主化。而当这种“派别活动”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影响时，¹⁰⁶对“派别活动”的围剿又被罩上**阶级斗争逻辑**的神圣光环。这样，任何独裁者都可以轻易地打着阶级斗争和“党的统一”、“党的纪律”的旗号排挤乃至镇压党内对手，而真正形成对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了不同政见之间的交锋，党的领导人对权力的争夺，也将越来越失去早先可能还具有的基于某种政治理念或策略主张而进行争辩的政见之争的性质，而变成赤裸裸的纯粹权力之争。

在独裁体制内，纯粹权力之争意义上的权力角逐的发生，多呈现于**权力交接班已成自然之势**的时候。列宁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当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已经病入膏肓、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死后唯一的执政党上层领袖发生分裂**的危险。在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这样表达了他的担心：“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中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实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¹⁰⁷

问题是**如何防止**这种可能的分裂？在回答此类问题时，列宁再一次暴露出思考角度和观察视野的局限性。病重的列宁面对这个党和苏维埃政权生死攸关的考验，其思维逻辑自然而然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对这样一个具体的、又是重大的**权力问题**的解决，列宁的思路竟明显地体现出对**阶级概念**的传统的**路径依赖**。

列宁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增加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从工人中**选拔几十个人充实到党的领导机关中，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分裂的危险，因为“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列宁特别强调——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¹⁰⁸

¹⁰⁵ 见《列宁选集》第4卷，页469-472。

¹⁰⁶ 列宁本人就是这么解释的。见《列宁选集》第4卷，页473-474。

¹⁰⁷ 《列宁选集》第4卷，页744-745。

¹⁰⁸ 同上，页748。

这段话在今天读来，已经成为**笑柄**。后来在实践中真的推行过此类做法的，大概只有文革时期的毛泽东。¹⁰⁹ 列宁对一党专制体制下领导人的合理更替问题显然也没有什么高招；在否认“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通过多党有序竞争实现国家领导人的选拔和更替机制的合理性后，列宁的自然选择是乞灵于“无产阶级民主”。但我们今天已经清楚地看到，这种“民主”压根儿就是子虚乌有，不可能存在的。从学理上讲，无论列宁的设想还是毛泽东的实践，都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神话**的产物，表现为既浪漫且幼稚的**阶级偶像化**。在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视角内，“阶级偶像化”是一个颇值得分析的现象，其特点（也是其特有的**内在矛盾**）是把某种神圣的形而上属性赋予“无产阶级”，但又必须把具体的、体现这种“属性”的工作交给某个人。然而全部问题在于，**作为阶级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把某个人或某些个人说成“阶级的代表”，乃是马克思主义最成问题的、招致了最大贻害的抽象**。而从**结构**角度看，列宁有关用“工人阶级”的新鲜力量充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张，只能在事实上帮助最高领导集体中**领袖独裁**的形成。还是罗莎·卢森堡讲的那个道理：在这样一个权力结构内，新来的“工人阶级代表们”除了鼓掌对领袖的意见表示赞同外，恐怕做不了别的什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构成权力机构中的**独立力量**。而由于他们的存在，领袖独裁正好可以打着“阶级”的名义更加名正言顺地粉墨登场。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接班，俄罗斯现代历史上最残暴的**红色独裁**就此开始。

用当代俄国学者米格拉尼扬的话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处于一种“全盘的奴隶状态”，“整个社会生活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国家变成了一座兵营。”“乍一看，俄罗斯发生的一切似乎是要结束不公正和不平等。但对财产机械地重新分配破坏了在社会机制中形成的所有有利于社会迅速发展的刺激因素。对社会财产的再分配产生的只是短期效果，只是造成了建立公正秩序的幻觉。”在短期的兴奋之后，经济生活就陷入“长时间的萧条”。而在政治方面，“定型的政治体制的目标就是要使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完全格式化，维持原状，也就是说国家重新‘吞噬’了个人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¹¹⁰

斯大林主义是苏俄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这当然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实质性的**背叛**。但我们必须注意其中蕴含的一个**历史的诡吊**：**党专制所导致的权力的异化**一方面是对马克思理想人性的否定，也是对马克思乌托邦政治哲学的否定，另一方面又是它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恰恰是马克思所钟情的“无产阶级专政”成就了一党专制，而一党专制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领袖独裁**又为人性恶的释放（权力的异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个人独裁（不管是相对温和的个人独裁，还是像斯大林那样极其残暴的个人独裁）都是借助“无产阶级专政”才成为**现实的**，不管当事人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具有**悲剧性**的是，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暴君，也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忠实地追求“人类解放”的高尚理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留待以后再展开吧。

（本文作于2005年5~6月，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¹⁰⁹ 文革期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确吸收了一批普通工人充当中央委员，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不是十大代表。参见徐景贤所著《十年一梦》中“睡梦里当上了中央委员”一节。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267-274。

¹¹⁰ 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页31。

第三部分

党专制下的社会与文化

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研究

（本文是作者 2004 年 10 月 28 日受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之邀所作的学术讲演）

各位好。今天我们探讨的题目是“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研究”。这个题目也许需要作一点更正。极权主义作为现代现象首先发端于欧洲，对它的研究也最先是由欧洲人进行的。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汉娜·阿伦特于 1951 年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这部书被视为研究纳粹极权主义的经典之作。再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哈耶克，他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也是讨论极权主义的，包括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这些当然都很值得研究，但今天我不想和大家讨论这些东西。作为中国人，我们自然对本土的历史和政治经验更感兴趣。中国 100 多年来在民主化进程中经历的艰难社会转型、它的复杂性和付出的巨大代价对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构成了强烈刺激，也为这种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我们应该——而且历史亦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拿出足够份量的、足以和我们的历史经历及代价相称的科学成果。所以我今天谈的东西，更多将围绕中国进行，而不是一般地、泛泛地谈“现代极权主义”。这是第一点说明或更正。第二点更正主要是概念性的。我以为，当我们谈论的是 100 年来的中国政治结构转型和社会发展时，用“现代专制主义”这个概念指称我们讨论的对象要比“现代极权主义”更准确些。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现代专制主义的外延更宽。现代极权主义只是现代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发展阶段，除了极权主义以外，现代专制主义还有威权主义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就历史演进而言，威权主义可能出现在极权政体之前，也可能出现在极权政体之后，在第二种情况下，威权主义往往是极权主义的变体。

我个人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已进行了 10 多年，目前正在写一本有关的专著。今天在座的有研究政治哲学、经济学和文化理论的各路专家，也有年轻的研究生。我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界定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二是如何研究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两个问题都与我们的历史经验有关，又都有很强的理论性。

先来谈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对现代专制主义的理解，不能离开现代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如果说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基本含义乃是从前现代君主专制（皇权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变，那么，现代专制主义的出现或者是这个转变初告成功后的逆向性反复，或者是转变正在进行中的病理性变异。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两种情形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都发生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简单界定为现代中国在建构公共权力过程中产生的异化。

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历史。众所周知，100 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一个世纪中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北京有个紫禁城，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中国最大的皇宫建筑群。站在太和殿的三层石阶上环顾四周，你才会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华夏前现代社会绵延数千年的皇权威严。就是在这座金銮大殿上，迄今不足 100 个光阴的 1908 年，由清王朝最后一个专制主义当权者慈禧太后把年仅 3 岁的幼童溥仪送上了皇帝宝座，接受群臣、

百姓的朝拜；而这样的故事，慈禧已经是第三次导演了（前两次一次是她的亲儿子、不成材料的同治，一次是她的亲侄子、因支持变法维新被置于死地的光绪）。今天，这一切似乎已成历史，成为影视作品表现的对象；紫禁城已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对中外游人开放，原属皇城一部分的太庙如今被称为“劳动人民文化宫”成为情侣们出入的场所。

谁能说，这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当然，世界在这 100 年中也变化了许多。横向比较，中国的变化也许并不像中国人自己感觉的那样明显。但衡量中国变化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却是世界许多国家所没有的，那就是她的 5000 年之久的文明史。一个拥有 5000 年漫长历史的前现代社会在我们刚刚经历的 100 年中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迈进，这难道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事实么？

以上所论固然都没有错，但它们只是中国百年沧桑的一个方面，一个令人感到“光明”的方面，还有另一个当政者不愿意提及、甚或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的方面，就是我们在过去 100 年、尤其是过去 50 年中遭到的挫折和失败。

中国人在 20 世纪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我以为，这个百年记录中最大的失败乃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败。由于民主化乃制度现代化的核心，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败从根本上反映、呈现了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扭曲。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产生就是和这个失败相联系的，是这个失败的结果。

诚然，从 1912 年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了“民国”时代。“民国”什么意思？民众当家作主之谓。1919 年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呼吁“民主”；孙中山的宪政构想也曾激起一代人对中国民主未来的可预期性的渴望。但北洋政府和把孙中山尊为“国父”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却没能兑现民国庄严的民主承诺。制度转型的“逆向性反复”在北洋时期和国民党当政时期都曾发生。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列强干涉，外敌侵入，连年不断的内战使民族陷入空前的浩劫；救亡形势之急迫亦在客观上强化专制体制的同时，使民主进程的内在要求退居幕后——这些都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遭遇挫折的现实原因。正因为此，人们有理由期望新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得到民众支持的合法性基础上，有效而实际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然而，历史发展是复杂的。原来的革命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并没有建立起实质性的宪政民主框架，而是继续了战争年代已经形成的、被已故政治学家邹谠先生称之为“全能主义”的政权建构思路。当 1957 年几个知识分子真诚地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时，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他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彻底葬送了本来已很微弱的中国公共领域。当然，最足以表现历史之诡秘的，还是毛泽东建立在激进、空想基础上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这个以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为空间、近 10 亿人口动员的巨大规模建构的“共产主义”实验场，以其悲壮的结局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份难以释读的遗产。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从这片废墟中走出来的，我们还远没有摆脱它——尽管从形式上看，今天这个金钱社会已经与那个“突出政治”的社会有了天壤之别。从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角度看，我们从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当代史中看到更多的是公共权力机构建构过程中发生的“病理性变异”。

这里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虽然西方学界已经对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极权主义作过不少研究，但其结论对我们的帮助并不甚大。比如，在西方很有影响的关于现代极权主义的定义由下面 6 个方面构成：（1）极权主义意识形态；（2）由独裁者领导的单一执政党；（3）实施政治恐怖的秘密警察；（4）垄断大众的交流；（5）垄断政治组织以及（6）对经济的垄断性国家控制。在西方学者眼中，典型的极权主义制度通常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

国。

这个定义基本是描述性的，要点并不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解释；而且，严格说来，作为描述性定义，如果把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和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相提并论，也会造成许多概念上和事实上的混淆。在德国，极权主义是和疯狂的种族主义与对外扩张相联系的，它固然对世界造成极大伤害，但却是一段相对短暂的历史。斯大林主义则以大清洗和秘密警察的恐怖作用而臭名昭著，同时又在自命优越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极权社会制度。中国与上述两者都不同，尤其与希特勒德国的不同更明显：无论从文化传统还是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讲，中国都不存在种族主义和对外扩张之可能。中国与苏联确曾同属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统领下的国度，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极权主义表现方式仍有诸多差异。比如，毛泽东并不十分看重秘密警察，而更相信“群众动员”、“群众运动”在实现社会监控方面的作用。

甚至这样的比较也过于表面化了：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专制主义固然符合上述极权主义定义中的大部分标准（6条中至少占5条），但形成这种东西的原因却极其复杂，既有历史的（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在现代改头换面的延续），也有现实的（落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巨大的、农民构成主体的人口规模，独特的党-政-军权力结构方式，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遭遇的挫折，建立在一系列可以理解的误读基础上的对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以及所有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等等）。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极权型专制主义的形成竟是在毛泽东一代革命领袖自信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在推进“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发生的；理想与实践间的巨大反差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明历史是以怎样冷峻而无情的逻辑摧毁了一切浪漫的想象。可以说，毛泽东的极权型专制主义，特别是该体制与它立于其上的道义基础和意欲达到的原初目标之间的巨大冲突，乃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毛泽东继承了从秦始皇到蒋介石的中国专制主义遗产的全部精髓，但这种继承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出封建历史怪圈”的过程中成其所就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极权主义专制体制又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演变为开放年代的威权主义体制。乌托邦激情不见了，一个权力和金钱相结合的社会代替了原先那个崇尚信仰的社会。在市场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威权主义作为新的独裁体制之表现形式与成长中的公共领域的斗争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点，远非经典极权主义的定义所能概括。比如上述6条定义，有些已经弱化（明显者为第6条“对经济生活的国家控制”）；有些则更加强化（如第5条“垄断政治组织”）。至于“垄断大众交流”一条则呈复杂、多面之特点：在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威权主义政体若想实施新闻与思想的有效控制，就必须比极权主义时代的极权更加极权，但采取的形式、技巧则可能较过去隐蔽而老练。威权主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专制主义，它给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提出的课题，甚至比经典极权主义还要多。

列举上述这些，无非想说明一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是一个比通常想象更为复杂、历史纵深感更强、更深刻的批判学术概念。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地照搬西学或囿限于我们原有的“正统”知识框架，都无法完成对现代专制主义的解读。

这里还想强调的一点是：现代专制主义是一种制度，这也是专制主义概念界定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前面关于极权主义的讨论，事实上已经涉及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把它挖掘得更深入些。我以为，作为一种体制或制度，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形成、运作和可预期结果都不应从专制体制自身来解释；毋宁说，它们乃发生于一个更大的历史存在或历史进程之中。要想理解中国的现代专制主义，就必须理解构成其前提并与之发生剧烈碰撞的这个历史进程本身。该历史进程指什么？——这就是我所谓的建立在哲学人类学基础上、构成世界现代化大趋势之组成部分的中国制度现代化历程。

1994 年我在广东一份短命的刊物上发表了“制度现代化：我们不应该再次失去历史”一文，这是我个人首次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这个经过若干年思考得出的概念。与通常理解的器物意义上的现代化不同，制度现代化乃指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整合以及个性建构原则对原有制度规范的取代”。三年后写就的另一篇文章“制度现代化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则进一步把这个概念中的“制度”一词界定为“人类在协调群体实践行为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方式与组织原则，这些方式规则制约甚至支配着人们公共与私人生活的性质与形式，制约甚至支配着各类资源的获得方式与使用效率，从而——在最终意义上——制约甚至支配着人类与外在自然之间以及人类自身内部依据不同定义而形成的各种群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制度现代化，就是这些结构方式与组织规则的现代化。”（这两篇文章都可以从 1998 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拙著《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中查到）从宏观看，制度现代化由三大结构性板块组成：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整合结构。所谓前现代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从上述结构角度看，就是君主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变，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变和建立在血缘家族或贵族庄园基础上的农业社会整合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变；而所谓制度现代化其实就是上述三个转变过程的统一。

不难发现，当我们把反思的视域定位于这样一个更具历史纵深意义和全方位特征的研究领域时，以现代专制主义为对象的批判学术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足以容纳课题本身之复杂性、深刻性的伸展平台。制度现代化是一个经过合理抽象、可以在规范意义上界定的普适过程；同时，作为一个过程，它又必然带有任何过程进行中不可避免的过渡性特征。制度现代化一般原则的普遍性与实施主体（现代世界中以主权划分的民族国家）之各不相同的初始条件、实施进程中遭遇的不同情境、以及实施者对此做出的不同反应等等特殊因素之间，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张力、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和各类非线性的因果关系。中国不就是这样么？作为文明古国和现代化的后来者，有多少矛盾、苦恼、问题、悖论在过去这个世纪中搅得几代人心神不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与保守、救亡与启蒙…，这些问题自然都与本讲主题——现代专制主义——有关系，或是该主题在实践—行动层面的展开，或是在文化—传统层面的展开，或是在国际语境层面的展开；但真的要拨开重重迷雾，从根本上把握对象的全貌和内在机理，我们就必须把问题还原到 20 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及其扭曲这个大语境中才有可能。换言之，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可理解性乃建立在社会转型过程之无数行动者（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也包括作为大众的普通人）和既定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间不断的互动过程及其结果中，建立在 20 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初始条件、限制因素、对这些因素的突破和突破所引发的新的反复及其斗争中；“传统”与“革新”，知识与存在，历史与现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种种对立及对立的消解，也只有在这个大语境及其造就的总体化情境中才能获得圆满的解释。

简言之，从制度现代化及其扭曲角度理解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是本人坚持的重要的学术立场和研究切入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制度现代化理论将构成我们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批判的基础平台。制度现代化虽然包括市场化、民主化、公民社会的构建等诸多方面，但核心则是政治民主化（市场和公民社会其实都可以理解为从不同结构测度对民主化界定的补充）。相对于现代专制制度言，民主化过程即是对专制体制的解构过程；反过来说，现代专制主义的形成本身，又是民主化发生扭曲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对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和对现代专制主义的批判，乃是说的同一件事情。或者也可以这样表述：中国制度现代化反思的核心即是对现代化之扭曲——现代专制主义的反思。无论是公共权力建构过程中的“逆向性反复”，还是“病理性变异”，都是制度现代化扭曲的不同表现。同时，制度现代化又是一个涵盖面更广的范畴，“结构”概念几乎可以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这又意味着，

我们对现代专制主义的体察、把握与理解，不仅可以通过那些足以“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通过决策层非程序化、非制度化的明争暗斗（这种明争暗斗几乎充斥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史），通过当权者人为制造的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红旗飘舞，歌声嘹亮”之群众游行队伍等外在现象来获得，同样可以通过无数更加烦琐、更加隐秘、更令人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的社会生活场景、生活细节来获得，正是它们，往往在更深层次、更深意义上反映、呈现了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变化。我们可以从蒋介石时代“新生活运动”的失败中、从 1949 年以来延续几十年的“单位”制度中、从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与基层干部（书记、村长、乡长）时而亲密时而紧张的关系中、从大中小学学生“爱国主义”的“德育”课本和老师们的教案中、从威权主义时代商业化大众化电视节目的编排中、从人流涌动灯红酒绿的歌舞厅咖啡厅中、从私营企业老板的政治性剧场行为中、从大大小小各类官吏的灰色收入中、从官方对腐败案件报道的“尺度”中……等等，等等，去体味现代专制主义是什么，它的活的源泉、动力和使其所是的更为宽广、深厚的社会基础。我们的目的，则是通过所有这一切，去挖掘真实的历史，发现历史背后的意义，从而洞察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及其扭曲——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可理解性。

现在，我们转入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如何研究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提出了任务，而没有界定完成任务的途径或方法。我们尚不清楚：我们如何挖掘“真正的历史”？如何去发现“历史的意义”？当我们使用“真实”、“历史”或“历史的意义”这类词汇的时候，我们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什么东西能证明我们作为批判主体对批判对象“感受”或“洞察”的客观有效性？什么东西能证明个人的一己工作可以由经验的特殊性上升为历史运动之内在“规律”的普遍性？显然，我们需要这样的工具或方法去达到上述目标。而所谓“工具”、“方法”者，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批判学术自身所建构的概念系统。

自有人类的智识活动以来，任何可称之具有科学特征的理论都表现为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组成的逻辑体系。概念作为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共相与殊相、抽象与具体、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历来是人类用以阐释此时此刻他们所理解的世界的基本手段。批判理论最核心的东西是它的反思性特征。这里，反思性意味着批判活动所依仗的思维构造将同时把对对象的思考和对这种思考本身的思考纳入其中，概念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概念建构的反思过程。作为中国人，我们于此面临的特殊困境乃在于：我们似乎是在一片平地上从头开始自己的工作，尽管它的目标明确，素材也已准备停当。我们不曾有过这样的批判而非歌颂的学术传统，就此而言，中国批判理论的构建缺乏——比如说——欧洲学术的历史连续性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在启动批判活动的构建工程之前，又必须先做一些清障工作，即把先在于我们、且已经成为我们思维方式之习惯性框架、基础的那些东西剔除出来，或至少要有明确的剔除意识；就此而言，我们又非真的从一片平地开始，因为那里还有很多尚须清理的垃圾。我们必须解构那些有碍自己从事批判思维的陈旧概念和理论框架，并使之反过来成为批判概念系统建构的酵母或刺激源。

总之，我们必须确立一系列现代专制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只有这些原则明确了，我们的研究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根据我自己的思考，这样的方法论原则至少可以举出六条。我们一条一条来看：

方法论之一，是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公设原则。

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公设的确定，从批判理论构建的角度看，有两大功能：一是提供理论判断的标准或坐标；二是构成专制主义总体化分析的深层学理基础。

20 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一方面是为了“清算”历史，同时也是为了发现历史的“意义”。在过去的 100 年中，中国进步了么？进步了多少？用什么标尺衡量这个进步（或非进步）？我们是否本来可以干得更好？还是说为了取得今天的进步，我们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凭什么讲，中国 20 世纪制度现代化的最大失败是民主建设的失败？就启蒙本身的规范意义和其遭受的挫折言，在 100 年的时间里，我们何以走了一个圆圈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出发点？我们是否曾有过其它选择或选择的可能性？对不同历史选择方式的价值判断又以什么东西为基础？如果说，制度现代化是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制度体现，那么 20 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曲折乃至扭曲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凸显了进化逻辑之普遍性与具体历史进程之多变乃至偶然性的内在张力？——显然，只有清楚地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意义；而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前提则是必须有一个判断由以进行的标准。

可能有人会说：你怎么证明你所说的“标准”具有客观普适性、从而能够构成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深层学理基础？的确，成熟的批判学术在确立自身方法论原则的同时，也必须把对原则本身之合理性的反思纳入其中。关于“客观性”，我以为至少可以从四个不同层次定义之：（1）对简单经验事实的认定；（2）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借助一定经验手段得出的可证实性结果；（3）正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规律”，这其实是对自然科学“客观性”的模仿；（4）解释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即立足于本体论而非认识论的解释者与行动者、知识与存在、历史与历史表述之间的统一。我个人对“客观性”一词是在如上定义的解释学意义上用的，这意味着，我所说的“客观性”乃是指由理解活动之本体论特征达致的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其中包括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抽象的客观性。

其实，关于一般逻辑“抽象”之可能，黑格尔早已讲得很清楚：“知性做出规定并坚持规定，理性是否定的和辩证的，因为它将知性的规定消融为无；它又是肯定的，因为它产生一般，并将特殊包括在内……”就我们的主题言，鉴于制度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已进行了数百年，在欧美已有比较成熟的形态，现代化的正、负两面结果都已经相当清晰地呈现出来，表象具体的丰富性和机体发展的成熟性为科学抽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现代专制社会中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潜能的枯竭和民主化力量的增长，同样为批判主体进行合理的科学抽象提供了可能。尽管这个抽象是在最一般的层次上进行的，但它却深刻反映出社会发展进程的本质。因此之故，言其构成专制主义总体化分析的深层学理基础，绝非过誉之词。

那么，所谓“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公设”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这里可以简单地提出两点：第一，社会进化是一个全人类普适的发展过程；各民族历史演进的具体差异无非是以正面（遵从）、或反面（扭曲）的特殊性证明社会进化本身的普遍性。第二，既然称“发展”，社会进化是有方向的，但又是生成性的，社会进化本身并无任何预定的或前定的目标。换言之，我所理解的“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遵从黑格尔的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但拒绝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目的论。

我之所以把社会进化逻辑称之为“公设”，是为了强调它在专制主义总体化中的规范地位和标尺或坐标职能，这个标尺有助于澄清学术研究中常见的一些混乱。不妨举个例子说明这一点，这就是近些年在国内大行其道的文化相对主义。

顾名思义，文化相对主义诉诸文化的“相对性”。在很多场合，它既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对“强势”文化之“霸权主义”的某种抵制，同时又含有对本土文化之“独特性”甚或“优越性”的顾影自怜式的强调。从本人立场看，文化相对主义和它的必然产物——文化保守主义——乃是对社会进化一般逻辑之普遍性品质误读的结果；历史地看，这种误读又是文明进程通过其外在表象展示其诡秘性而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知识界中的可理解反映。就其

性质言，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误读和它的对立面——表现为“全盘西化”论的文化激进主义对社会进化之普遍逻辑的误读——其实同出一根，因为他们都把“西方”的东西（西方的技术、西方的制度、西方的文明）仅仅认作是“西方”的，而忘记了“西方”的东西固然是“西方”的，但同时也是人类的。从社会进化的逻辑看，西方人不过是以欧美民族实践的特殊性呈现、体现、证明了人类文明进化的普遍性。强调这一点，在历史理解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时间方面欧洲人确实走在了前边，这使欧洲人自己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幻觉，包括那个已经绵延数百年之久的“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前见。关于“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优等文化”与“劣等文化”的争论引至了一系列复杂的价值问题与情感冲突，竟使得“承认的政治”之类话题远远超出了地区性个案范围，而具有了更加一般化的性质。不能否认产生此类问题的现实语境的高度复杂性，包括现存的国际规则、国际关系（特别是南北关系）中的种种不平等；但当我们为了获得对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本质性把握而把这些因素暂时舍象时，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社会进化的逻辑本身不允许对不同文化进行非历史的横向比较，这与——比如说——一般的价值论立场是很不相同的。从价值论立场出发，所有的文化（包括最现代的文化和最原始的文化）在价值上都是等同的，因为它们同为人类的创造，因此拥有同等的尊严，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但从社会进化的立场出发，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会看到不同文化处于人类社会进化的不同阶梯水平，有些已经达到现代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水平，有些还处于前现代农业社会水平，有些则可能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水平。显然，这些社会所拥有的历史价值是不同的，尽管它们拥有同样的人类价值。历史价值更高的人类文化（社会）群体在其文化实践的特殊性中承载了更多人类文明普遍性的品格，率先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方向。当然，在同一文化内部，人们也可以做出类似的区分：体现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之共性（从而具有永恒性或超越性）的部分和仅仅代表当下社会进化水平的部分（个别性、非永恒性部分）。正因为如此——还原到中国问题——被文化相对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中西”问题其实乃是社会进化意义上的“古今”问题。自马戛尔尼使华以来日益激烈的中西冲突，从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立场看，实乃以老大自居、但又已经不堪一击的前现代华夏皇权专制帝国与代表着更高社会进化水平的西方各国之间的对抗。历史的逻辑本身早已决定了这场对抗的结局。如果我们尚未从这种共时性的历史格局中看出历时性的历史交错特点，那倒是我们真正的不幸。

方法论之二，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总体化”把握原则。

凡熟悉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德国辩证法者，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都不会感到陌生。在黑格尔《逻辑学》中，作为认识活动的“从抽象到具体”被视为从普遍经特殊到个别的综合过程。马克思则更明确地把批判主体的认识活动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第二阶段则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特别强调“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故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马克思为此批评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我很欣赏上面引述的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事实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先看到无数作为外在具体的生活的“表象”，我们的任务则是透过这些“表象”去把握其内在的本质，得出关于这些本质的一般抽象。然后，在科学表述中，又要从本质的抽象出发，把原来抽象过程中被舍象的特殊因素一层层加入，使其成为科学研究整体把握中的具体，也就是思维的具体，后者乃是对可观察的外在具体之更深刻的本质性把握。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

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既与欧洲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有别，也非中国古代皇权意义上的专制主义，它是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及其扭曲中演化出的怪胎；而中国制度现代化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着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内在要求。从批判主体的认知活动意义讲，这个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之所以会成为中国专制主义分析的深层学理基础，是因为它乃批判思维对客观实存层层分析后得出的本质抽象。但，仅仅有这个抽象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该抽象还原为丰富的具体，在还原（或“上升”）过程中，那些被舍象的东西，将在批判主体拥有清醒的“效果历史意识”，符合解释学“视界融合”原则的前提下，被重新召唤回来，并一个一个地展开，使其构成思维中的具体的活生生的要素。在最终意义上，这个被批判主体所展示的思维中的具体应是批判客体——专制主义之现实中的具体——的深层逻辑再现。

我把这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称为总体化把握原则。这里有必要就“总体化”概念给出简单的解释。在我的理解中，“总体化”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指批判客体自身结构存在意义上的多重性。就这个多重性既体现着运动发展方向性的内在要求，又在现实运动中代表着对它的扭曲而言，总体化乃是一个有着巨大张力的、矛盾的辩证发展进程；而就这个多重性乃是诸多历史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被规定的普遍性”在这里显示为被歪曲了的个别性而言，总体化又是被历史限定了的历史存在形式本身。第二种含义的“总体化”则指批判主体把握对象的方式：在批判学术的表述中，它是“思维中的具体”展示自身、完成自身叙述的手段。当然，从严格的批判主体乃“行动中的反思者与反思中的行动者”的双重存在意义讲，上述两种总体化的含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批判主体用“总体化”原则解析现实社会“总体化”存在的行动本身，就是促成专制主义“总体化”解构的重要思想力量。还应该说明的是，“总体化”这个概念借自法国思想家让-保罗·萨特。在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中，出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填补马克思主义“人学空场”的学术需要，萨特构建了一套从“个人”出发到“群集”再到“集团”的历史人学框架，与此相应的则是从“构成的辩证法”到“反辩证法”再到“被构成的辩证法”的辩证逻辑图式。“总体化”被定义为表征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系列之发展的“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在萨特那里，“总体化”的出发点是个人，目标则是为萨特所理解的“历史人学”提供一个辩证的、又是形式化的话语框架。不同于萨特，我本人乃是从结构的多重化角度定义“总体化”。这是我们研究的主题性质所要求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之扭曲的产物，的确呈现出结构多重性的特点，无论是在横向的共时意义上，还是在纵向的历时意义上。正因为如此，作为“思维中的具体”，总体化应该是把握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演化之“现实中的具体”的得力分析工具。

那么，我所理解的20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之扭曲的“结构多重性”具体指什么呢？概略地说，它由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构成：

（1）基础层面。这就是前边分析的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公设，由于这个公设体现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人类学元规则，因此它是关于制度现代化之全人类意义上的、最一般的也是最抽象的规定。讨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成败得失，研究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可理解特征，必须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否则，我们将会在社会相对主义乃至反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过度”现代的各种“后学”思潮、以及狭隘“民族主义”的种种浓雾中迷失方向。严格地说——对中国思想者来讲——我们除了定位于“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公设”之外别无选择，这不但在于“研究的主体和对象实际上是由探究的动机所构成的，因此历史的研究被带到了生命自身所处的历史运动里”（加达默尔语），而且在于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前见”，决定了我们要在深入理解历史的基础上重构历史的冲动。“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乃是我们理解

历史、重构历史的标尺，是辨清那些如此矛盾的社会运动与人类现象的基础。把它作为总体化研究之基础层面也表明：我们已经置身于世界现代化大潮之中，是这个本质上不可遏止的历史运动中的一部分。当然，由于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在肯定人的总的发展的矢量特征（方向性）的同时，拒绝对历史作目的论式的解释，在人的生物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的永恒运动及其现实表现——制度的不断重整和创新——的过程中，历史的停滞、扭曲甚或短暂的倒退都是可能的，也是可理解的。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更宽广、也更深邃的意义上洞察生活表象中处处呈示的“偶然性”和“易变性”。

（2）中间层面。在这个层面上，考察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普遍性时被舍象掉的文化特殊性成为被关注的中心。中国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拥有 5000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制度现代化不可能在一块飞地上进行；恰恰相反，这个文明古国的所有前现代的东西——包括它的政治建构、经济建构、社会整合建构和意识形态表达——都会对社会向现代的转型发生影响。历史传统从来都是活生生的，举个例子，中国古代各种律典——唐律、明律、大清律等——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些典章制度中渗透的皇权意识、等级观念、伦理准则、宗法精神仍然作为习俗，作为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潜意识存在着，并对现实生活，包括社会转型中正在建构的制度，发生影响。梳理这种影响发挥作用的机制成为中国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使命。

当然，宽泛地讲，所有非自然地进入现代文明进程的古老传统国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此而言，在总体化的中间层面上社会进化的普遍性与前现代文化之特殊性构成内在的张力格局，并非中国所独有。那些本来是以特殊的民族形式率先实现（或证明）了人类共同发展道路的“西方人”在东方民族面前的“殖民者”或强盗面目，加剧了这一张力局面的形成。中国在这件事情上比其他民族（比如俄罗斯或日本），不过显得更加典型、更具有悲剧性、从而亦更足以表征历史演进的诡秘性而已。华夏民族历史上的辉煌和它在近世的衰落，构成一个极大的反差。从结构或系统意义上反思这段历史，已经被汉语知识界所看重，并产生若干成果。我们的任务，则是继续这种努力，并把它整合到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批判的总体化分析之中。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前现代的皇权专制之政治结构、小农/地主经济之经济结构、以宗法家族为核心的社会整合结构、以及作为上述三项之意识形态表述的政治化的儒学本来就构成了中国从前现代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巨大文化—结构性障碍；20 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的独特国际语境与国内矛盾的交织，救亡的凸显和启蒙的中断（——不要忘记，启蒙和与之相联系的文化重估本来有可能减少社会转型中辞旧迎新所必然遭遇的张力），使中国走向现代的进程显得更加凶险、更加危机四伏。终于，20 世纪中国人的制度选择及其现实运作证实了我们的担心，而这，正是总体化分析第三个层面要触及的东西——

（3）现实层面。所谓“现实层面”，指 20 世纪中国社会几个不同发展阶段（主要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呈示的制度现实及其意识形态表达。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实体，批判学术的总体化研究本来就是以此为起点的，但在表述上，它却成了最后才说出的东西。从常识意义讲，“现实”作为当下现存物仅仅是“表象”，即直观意义上可观察的外部现象；但在总体化研究中，“现实”或“表象”作为思维的具体，作为批判主体对客体总体化把握的结果，却已经获得最丰富的规定，成为包容了前两个层面所有内含的“个别”。比如，孙中山的政治构想何以在民国的实践中变成一纸空谈？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何以必然失败？威权主义时代借助“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免费午餐”何以使权贵私有制的形成不可避免？——这些 20 世纪历史上中国制度现代化扭曲的重大现象是不可能在一个平面结构上说清楚的，它们本来就是历史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同时体现着共时性与历时性两种力的特征交织的立体化作用网络的产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以“特殊”为中介的“个别”本来应该是“普遍”

的现实体现，但在中国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个作为“个别”的现实层面，仅仅是对作为“普遍性”的基础层面的表面遵从，而实质是对它的扭曲。这正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必须解开的历史之迷。

总之，作为被“思维中的具体”再现的现实的现实，中国制度扭曲的总体化行程表现为三个层面间充满张力的紧张关系，其中，“基础层面”体现社会进化的普遍要求，“中间层面”表明前现代文化对制度转型的阻遏；“现实层面”则以表面的遵从而实质的扭曲使总体化的内在矛盾发展到顶点。第三层面“实质扭曲”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使第二层面那些本该进入历史垃圾堆的东西死灰复燃，而在第三层面的意识形态表达往往又成为这种死灰复燃的遮盖或掩饰。

方法论之三，是结构性分析原则

“结构”是一个学术界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的术语。这里所谈当然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当我们把制度现代化理解为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组成的动态统一体时，这里的“结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说，“结构”是对某一社会运行系统或其中相对独立的部分之内在要素的组合及其联系做出的抽象表述，比如，“政治结构”所涉及的就是权力运行系统所包含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与联系特征。但这样的理解并没有使我们真的前进多远。人文科学的复杂性就在于所有社会构成物都既是人的创造又同时制约着它的创造者。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就此批评功能主义者把“结构”仅仅视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模式化”，“他们经常幼稚地借助可视图像来理解结构，认为结构类似于某种有机体的骨骼系统或曰形态，或是某个建筑物的构架。主体和社会客体对象的二元论与这种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的‘结构’体现人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对不依赖其他力量而构成的主体的自由创造产生的某种制约。”（参见他的《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有中译本）

对吉登斯的上述观点可做出两方面的回应：一方面，对任一个体乃至处于某个历史时空断面的群体来说，社会“结构”都是一个先在的、不容选择的现实；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不得不生活于这个既定的社会“骨架”之内，受其所限。在这个意义上，功能主义的“模式”说并无错误。事实上，我个人也首先是在同一意义上划分制度现代化进程的三大“结构”领域的。另一方面，“结构”本身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来自社会个体和群体的行动，它的基础的变更（社会“骨架”之力的组合形态乃至社会“骨架”本身之架构原则的改变）亦都要追溯到这种行动，是该行动的产物。就此而言，行动者又不是“外在于”结构的，而是结构变异中活的根本要素。因此，所谓结构问题上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只是外在观察的结果，是一种思维方法论上的“恶无限”。我们要做的，则是从行动者与“结构”互动之“真无限”的意义上理解结构形成与结构变迁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意味着：我们既不能因为强调结构包含在行动的生成过程中而忽略结构对行动的制约作用及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构对行动者而言现象意义上的外在性，也不能因为仅仅局限于这种“外在性”的观察忘记了结构与行动者间的互动才是历史运动的生命所在。

然而，这样的议论仍嫌抽象。对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言，我们需要找到更具体的概念工具以揭示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性联系。不妨从吉登斯的两个概念——结构的“使动性”和“制约性”——谈起，然后，看看有否可能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论域内延展、深化这些概念的内涵。

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吉登斯致力于构建一种“二重性”的“结构化”理论，突出点即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兼具使动性（enabling）和制约性（constraining）”。前者指“行动者使结构生成”；后者指“结构又制约着行动者”。不必援引吉登斯对此的证明

过程，因为这个观点与本书前文所述显然是一致的。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来说，我以为重要的是区分两类不同的行动者，他们对结构的“使动”方式和“受制”特征是大不相同的。第一类行动者指处于最高当权地位的人（如慈禧、蒋介石、毛泽东）——当然，在专制主义语境下，他们都是独裁者。一方面，独裁者在“结构”面前，显示出更多的“使动”（能动）特征，因为他们握有权力，拥有贯彻自身意志、又不受他人意志制约的手段。他们往往通过自己的行动，使结构趋向于成为体现自身意志的工具。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逻辑贯彻到底；那样的话，我们就将跌入“英雄创造历史”的非历史主义的陷阱。现在请注意独裁者与“结构”联系的另一方面，即独裁者“受动”或“受到制约”的方面。在这方面，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下列断言仍不失为真理：“个人因其性格特点可能影响社会命运，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尽管“偶然现象以及著名人物的特点，其表现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显著得无比”，但从历史长程看，“个人可能改变事物的个别外貌及事变的局部后果，但终究不能改变事物发展的一般方向”。用我们当下的语言，独裁者尽管大权在握，但他（或她）运用权力的方式及可能达到的效果却不能不受到既定社会结构的制约；独裁者个人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范围、程度，归根结底仍然取决于发展、变动中的社会结构的内在历史力量。也就是说，在社会进化的宏观意义上，独裁者暴露于外的“能动”（使动）特征往往与深藏于内的“受动”本质互为补充，这种“能动”中的“受动”是我们理解专制主义独裁者之历史角色的重要把握点。应该同时强调的是，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否认在专制主义语境下，独裁者个人的作用往往会通过结构、通过独裁者个人对结构的“使动”性被社会系统放大的可能，正是这种可能向现实的转化，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更多曲折、扭曲的直接原因（在民主体制下，这样的情形本来可以避免或减少）。

现在让我们考虑第二类行动者。这里指的是作为普通人的每一个个体。与独裁者相比，他们处于相对无权或彻底无权的状态；因此，作为纯个体，普通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并无意义（这里又一次显示了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不同，在民主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他对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显示其价值）。然则又何定义专制条件下的普通大众也是“行动者”？原来，这种“行动”并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为单位形成的，正是作为群体的普通人才会显示出他们的功能性价值——对社会产生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群体行动作为无数普通个体行动的有机组合既构成社会的外部表象，又深刻规定着社会的内在性质。——因为群体行动才是文化传统最有力的载体，它们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理解中最本质的要素。比如，在专制社会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作为个体的普通人面对他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是微不足道的，他只是个单纯的“受动”角色；但无数“受动”个体的总和却可能构成一种力量，一种“使动”性力量，足以影响“结构”，甚至作为“结构”去影响独裁者。这样，本来是“受动”的个体之总和，却会表现为某种群体的“能动”，这种“受动”中的“能动”在毛泽东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不妨举个例子：1955年到1956年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急速“升级”。据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早在1952年，毛泽东就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3年正式提出“一化、三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但当时设想完成“三大改造”需要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1955年春由浙江省合作化运动“过头”引发的“上马”与“下马”的争议，毛泽东本来还持谨慎态度，但当年4月他到南方考察一圈，沿路看到庄稼的长势，又听了地方领导人（尤其象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这样的人）的汇报后，态度有了根本转变。在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毛批评邓子恢等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者“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毛自己则断言农业合作化这场涉及“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但即便在这篇报告中，毛也并未改变中国共产党既定的公有化

社会主义改造日程表。值得注意的反倒是这样一种情况：毛的报告传达下去、特别是由毛亲自作“序”，仅汉文版就印刷 152 万册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以后的 1955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初，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真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发展势头之猛甚至远远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用薄一波的话讲：“短短几个月内我国农村就一举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许多地方没有经过初级社，甚至也没有经过互助组，就在个体农民基础上直接组织高级社。”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美国学者麦斯纳（Maurice Meisner）曾用“贫农的平均主义愿望”和“当地干部的政治热情”解释之，这类解释显然并不彻底。问题在于“热情的原因”，作为农业合作化的具体组织者的中共农村基层干部意识到这场运动乃是对其政绩与“政治可靠性”的检验，所以必然不遗余力而致极端。在中共政治动员系统中长期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政治行为模式也会助长不负责任的“跟风”行为的普遍化。更为深刻的是，这里似乎有某种前现代的政治传统在发挥影响：面对“圣旨”，人们不但丧失了独立判断能力，而且势必要以三倍的努力表达自己的“忠诚”。也可能还有经济、行政方面的其他原因：基层组织者由于迅速高级社化而免除了“土地分红”计算中的各种麻烦，从而减轻了行政上的压力。无论怎样，高潮是从下面形成的。它固然有决策人“使动”的重要因素（毛的报告成了新一轮运动高涨的动员令），但来自下面的回应却不能仅仅用“被动性”来解释；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被动”中的“主动”，“受动”中的“能动”。农业合作化迅速“升温”中基层组织者及其组织、依靠对象的行为，作为某种合力以反作用的形式给最高决策人以“使动”，促使毛泽东做出更加错误、更加极端的判断，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毛泽东 1955 年底到 1956 年初关于国民经济发展更加冒进的主张，并埋下了 1958 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思想认知伏笔。总之，在这个堪称经典的例证中，“受动”群体对处于最高决策地位的独裁者来说，既是“被动”的“受动对象”，又作为影响、制约独裁者行为的既定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反作用于独裁者。这种反向“使动”的方式是活生生的，它深刻说明了结构中“主动”与“被动”、“能动”与“受动”的辩证特征，说明了在特定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形成独裁者与大众双向使动的共生格局，说明了结构本身与不同类型行动者的动态的、又是统一的张力关系。

方法论之四，是历史比较与文化发生学探究原则。

结构性分析强调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中的共时性特征。这里说的第四条方法论则是强调该研究的历时性特征。换言之，我们要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审视专制主义总体化之第二层面对第三层面影响力与制约力的发生学来源，而这势必把我们带入一个更敏感、也更富争议的学术领域，那就是如何界定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如何估价历史和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本质上属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学在大陆成为显学，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现象。从方法论角度看，新儒学最大的问题是理解历史的非历史方式。这可能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象唐君毅这一代儒者，迫于战乱和共产党的改朝换代而寄于港岛一隅，身心交瘁于“花果飘零”之中，复兴儒学就不但是他们的学术主张，更是其安身立命之文化生命所在。再往后的一代或两代新儒家学人则多在海外执教，一方面缺乏专制主义压迫的切身体验，另方面又在异国他乡无时不在心灵深处感受着文化认同方面的紧张。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历史的某些非历史性理解乃至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超历史的美化仍属可以理解之举。但这种东西在 90 年代后的中国大陆盛行，就另是一回事了。我们这里不可能深入分析这种现象，但我想着重指出：与新儒家的主张相反，我在这里更强调要以历史主义的方式对待历史本身，强调我们对历史的态度首先必须是理智的、而不是情感的。理智意味着冷峻，而情感则容易导致研究视野上的盲区。

具体讲，所谓“纵向地”审视历史，包含两层方法论意蕴：一是侧重文化的进化分析而非不同文化间的横向比较；二是侧重文化的实际运作（制度）分析而非古代文献的抽象考察。

关于第一个方面，前边已经指出，就批判理论由以立基的社会进化公设言，“社会进化”的逻辑本身已经判定了对不同文化进行非历史的横向比较的非科学性。从一般价值论观点看具有同等人类价值、应该得到同等尊重的不同人类文化，完全可能、事实上也确实处于不同的社会进化水平，因此具有不同的历史价值。这是我们考虑中国问题，包括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重要出发点。一个基本事实是：不管我们的“传统文化”曾经多么辉煌，它——至少就它的主体部分而言——却是前现代的，是华夏前现代农业文明的积淀物，是中国现代制度转型中必须淘汰的东西。而且，这种淘汰过程已经开始，不管它是多么艰难。关于第二个方面，问题可能更复杂些，我们不妨做个略为展开的讨论：一般来说，对中国古代经典（比如先秦诸子的遗产）进行纯文献学意义上的研究，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毕竟，这些以文献形式流传下来的思想作品构成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文化”还有另外一部分，它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这就是在数千年漫长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中国前现代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实际制度建构及其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专制主义原则。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不但体现在秦汉以来的前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建构中，甚至体现在尧、舜、禹时代的前国家部落联合体的酋邦制度中。当然，以“文献”形式存在的文化与以“制度”形式存在的文化间并非全无关联；恰恰相反，前者往往是对后者的反映、呈示或省思。在某些场合，“文献”可能代表了文献作者对其所处时代的独立理解与把握；在另一些场合，“文献”又可能作为当时的意识形态，作为皇权合法性的论证工具发挥其功能。比如，政治化的儒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就曾经长期执行皇权意识形态的职能。但这样理解的“文献”，对“文献”如此这般的考察，也已经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考察。它的前提乃是对中国前现代专制主义制度建构的历史性理解。

这样，我们的任务已经很清楚：通过“纵向地”审视历史，我们将进行某种历史比较，从中发现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与前现代专制主义之间的历史承继性关系，探寻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制度扭曲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惰性因子制约力之间的可能关联，从而完成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形成之原因的历史—文化发生学诊断。我们应该在制度建构与运作的对比意义上，找到传统与现代间的历史延伸线，并努力发现分别影响、支配古今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功能上的相似性与自身演化的某种“合规律”的共同性。我们会发现：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我们仍生活在历史之中。当代扭曲了的制度建构（不管其名义上被称为什么），其中竟然有不少可以在历史的尘埃中找到自己的对应物。中国古代皇权制度的各种结构要素，比如皇权的至上性和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权力建构、兼具“社会管理者”和“官奴”双重身份的官僚制度、皇权体系下的司法制度和考试（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皇权的武装力量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统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小生产及建立其上的赋税制度、家族统治与家—国同构的体系性特征、等级制度与静态型农业社会对“皇权至上”的支持、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对皇权制度合法性的论证，等等，虽然大多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们作为某种文化基因，作为某种积淀了的民族传统和文化性格，仍然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对现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所谓发生学研究，就是要探讨这种影响的路径和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规则。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考察中，这显然属于深层结构的探究。这种探究之引人入胜，非亲身实践、体验不能有所悟。

方法论之五，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运用的实证分析原则

我们的任务是从总体化意义上研究 20 世纪制度现代化与中国专制主义演变的历史，这种切入和把握题材的方式决定了这项研究首先应该具有思想性品格；但任何历史都是由一系

列事件、由相互联系的人的活动及其产物组成的，没有对这些事件、这些活动的经验考察和实证分析，研究者将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或结论。当然——我想在此强调——鉴于任何历史研究都必定建立在特定研究者的知识视野和价值判断基础上，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取舍必然受到这些认识“前见”的影响，因此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对历史的“单纯的描述”。不过，这个解释学上的真理并不否认研究者在具有明晰的反思意识的基础上寻求经验客观性的可能和合理性。我所说的“实证分析”就是在这个限度内使用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上面的理由，我并不打算对 20 世纪历史上所有与专制主义相关的事件、过程、人物——进行“考证”式的研究，这不是我的任务；相反，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演变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建构的宏观联系，把握反映、呈现这种宏观联系之历史过程的本质特征，而理解历史过程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抓住历史过程因果链条中有意义的环节进行经验分析。这种分析运用得当，将会使研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果，并降低研究工作本身的成本。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就曾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事实，它们作为科学认识的范畴具有完全不同的逻辑意义。韦伯讲：“文化现实中既定事实的逻辑应用的这种对立是：（1）通过以特例说明的方式把‘具体的事实’用作一个抽象概念的典型代表，从而是用作一种认识手段来形成概念；（2）把‘具体的事实’作为环节，从而也就是作为‘实在根据’纳入一个实在的、从而也就是具体的联系中。”对于历史学来说，“现实中个体性的具体成分不仅是认识手段，而且绝对是作为认识对象，具体的因果关系不是作为认识根据，而是作为实在根据得到考虑的。”韦伯举“人格”为例：“‘人格’之‘进入’历史学所构思的历史联系，决不是以其整体性，而是以其因果上重要的表现；某一具体人格作为因果要素而拥有的历史意义与该人格根据其‘独特价值’所拥有的一般‘人类’意义彼此之间毫不相干；恰恰是一个处于关键地位的人格‘不足’能够在因果关系上成为重要的。”这很适合于分析——譬如说——毛泽东的个人“人格”对中国现代史可能发生（作为逻辑假设）或实际发生（作为经验事实）的影响。毫无疑问，作为个体的毛泽东是极其独特的。他的豪放、他的充满诗人气质的浪漫、他的叛逆性“人格”的确有其“人类”意义上的“独特价值”，但我所感兴趣者，却是这些东西作为历史形成的要素曾经发挥的作用或影响。毕竟，毛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人格倾向、思考问题的方式及由此推出的结论，在很多场合成为探究中国现代史进程中诸多因果关系的重要一环。在这个意义上，对毛泽东“人格”的经验研究，是作为把握历史之“实在根据”予以理解的。与此不同——我们不妨再举个例——毛派他的警卫员下乡搞调查、为他摸回农村第一手资料之类的经验事实，只是认识毛泽东式专制主义的一种“典型事例”，因为这种事情清楚说明了一点：毛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正规渠道获得下边的实情，只得假手这种非正规途径，而这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反映了非民主政体的制度框架内最高领导人常常遭遇的尴尬。

在实证研究中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意义及应用界限做出上述区分，是我们可以从韦伯那里学到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然实证方法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的价值尚不止限于对经验事实的认定和逻辑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制度扭曲与专制主义演变的总体化过程在总体化的现实层面上造成了许多奇异的制度景观，它们有的存在于宏观领域，有的则隐藏于微观领域，但都可以作为经验分析的对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制度所涉及的不是个别事实，而是诸多同类事实的整体，它们体现出同样或近似的规则性特征。所以，我们对此类对象的把握，应首先着眼于对经验层面斑驳陆离的制度现象之规则特征的合理抽象。根据不同的规则特征，研究者有可能区分出总体化语境内专制主义制度运作生发出的不同具体形式。限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展开、深谈了。

最后，方法论之六，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所理解的专制主义研究的解释学原则。

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中，无疑，我们会碰到大量解释学问题。一方面，各类“本文”千差万别的存在形态和历史性对理解活动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另一方面，批判思想者的理解活动本身又总是蕴含着普遍与特殊、认识与本体、生存与历史之间的内在紧张。

先来看前者。我一直以为，作为批判思想者，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它向我们提供了如此众多的专制主义第一手资料：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艺术的、甚至心理的，等等。作为“本文”，它们乃是中国制度现代化扭曲与专制主义总体化演变之各个历史时期的剖面式存档与再现。我们通过阅读，不但可以了解“本文”所记录的信息（相对于历史本身来说，这些信息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可能是歪曲的），而且还可以洞悉这些或真实、或歪曲的历史记录的产生缘由之所在。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编造历史、解释历史。这样，在面对现代史上众多的“本文”材料、尤其是由专制主义当权者自己生产或监制的“本文”材料时，保持清醒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就尤其显得重要。一个成熟的批判思想者的标志乃在于：他（或她）可以借助这些材料，读懂材料中没有公开说出的东西，甚至读出材料作者也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从这个意义讲，批判者对“本文”材料的阅读和解释过程，乃是创造性地重建“本文”作者下意识地想去完成的东西的过程，不管被重建的“本文”之作者是驰骋一时的历史伟人，还是对历史并未产生大的影响的芸芸众生。用解释学先驱施莱尔马赫的话说就是“我们必须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这个被加达默尔称之“包含了解释学全部问题”的命题，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中仍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有些时候，被解读的“本文”可能涉及多重历史时段，从而——至少在形式上——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里可以举一个艺术作品的例子：文革后期拍摄的电影《创业》。这部影片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初科技工作者和石油工人在东北开发大庆油田的一段历史。影片剧本创作、摄制和公映时间是文革中的1974年~1975年。当我们今天再来重温这部影片、并把它当作反思批判者的一个“本文”材料试图理解时，这里马上出现三个不同历史时段在理解过程中的交汇：（1）、“真实的”60年代初大庆油田创业史；（2）、70年代影片对历史的“诠释”及其遭遇的命运；（3）、今天的批判思想者对影片及影片反映之年代的再诠释，其中也包括对影片本身之独特“命运”的再理解。让我们试着做个展开：首先，考虑到60年代初中国的独特国际语境（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交恶，中国与西方又处于冷战时期）以及国内的严峻经济形势（“大跃进”导致经济滑坡，“天灾”与“人祸”同时降临），东北大庆油田的成功开发确实有其独特的历史与战略意义。当然，70年代的《创业》主旨并不在简单重复这段历史，而在通过对周挺杉、华程等人物的刻画，“讴歌工人阶级的奋斗精神”。应当承认，影片主调激昂，音乐铿锵，剧中主要角色的表演颇具感染力，以致影片1974年底在大庆试映时好评如云，在全国公映后亦引起强烈反响。如果从今天的理解高度看《创业》，这部片子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它用艺术化的形式凸显了毛泽东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最本质的那些特征，特别是“大公无私”式的精神至上论；又用60年代中期到文革时盛行的“阶级斗争”公式演绎影片的情节。可以说，这种对大庆油田创业史的“诠释”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文革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部标准的毛式“成人童话”居然引起毛夫人江青的老大不快，其结果是文化部秉承江青旨意搞出的对影片的“10条意见”。就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言，这“10条意见”本身以及毛对之的批评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标本。江青对影片的主要指责之一是“编导创作人员要把片子拉到真人真事上去”，“你们给什么人树碑立传？”这种解读方式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什么叫文革式文化专制主义逻辑；而毛对江的批评（“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以及毛对《创业》编剧张天民来信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又充分说明了事情本身的复杂性。抽象地讲，专制如毛泽东者，

他的认知逻辑与行为逻辑之间亦不能简单划等号；现实地讲，无论江青对一部电影做出的反应还是毛泽东对此的再反应，都与当时扑朔迷离的党内“宫廷”斗争有关。从这个角度看，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争论又可以作为文革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或“例证”来解读。自然，这个“本文”还有许多其他的阅读角度，比如编剧等影片主创人员演绎的这样一部在“阶级斗争”中创业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当时知识分子认知水平的真实记录，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公众对这部影片的普遍欢迎，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人们仍然在无意识地认同毛泽东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解释逻辑，又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出公众已经从情感上厌恶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而盼望国家在经济建设上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类似的解释学询问，从逻辑上讲不但可以应用 70 年代的《创业》，同样可以应用于 80 年代的《芙蓉镇》、《天云山传奇》，或 90 年代的《渴望》。任何一部引起较大反响的艺术作品，都以某种方式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兴趣和公众关注所在，同时又大多拥有时空交错、重叠的解释学特征，关键看研究者能否读懂它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读。

解释学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中还有一个巨大的实践领域，那就是揭露专制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的剧场化、面具化现象，解析包括工人、农民、党的基层官员、私营企业的老板、报社的记者编辑、给学生上课的教师、艺术团体的演职员等等在内的千百万普通人政治行为中的剧场成分，并洞察造成这种伪主体现象的制度根源。我们知道，专制主义者往往通过各种渠道、借助一切宣传手段营造一个简单化的、虚伪的世界；而在一个人口众多、国民素质相对低下的国家里，系统传播的谎言成为非反思性的大众日常意识的一部分，仍然是可能的。“非反思性”在这里意味着意识并不清楚自身内容与产生它的语境之间的关系，而以专制主义为对象的解释学要做的恰恰是析分、梳理、重建这种关系的产生过程，揭示威权主义之专制主义伪公共生活的面具特征及其形成机制。我相信，这项工作的进行本身，就是在为解构不合理的专制体制，建立自由、健康、正常、非压抑的公民交往创造条件。

那么，批判思想者何以可能做到这一点？须知，批判思想者并非单纯作为观察者，而是同时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他的研究对象的：我们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朋友、同事，与我们的父老乡亲，与我们为之动情、又为之扼腕的祖国共同走过了这段历史。我自己也曾被《创业》、《芙蓉镇》和《天云山传奇》所感动；我也曾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色上去体验这个社会跳动的脉搏，体验什么叫剧场行为，什么叫理智、良心与现实利益的冲突。这个“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从现象学—解释学角度，还是从韦伯所说的“兴趣”、“意义”角度，体验对深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必备的前提。然而，体验又必须进一步区分为纯个人的体验与把握普遍性的体验，后者乃是与体验的个别性、非反思性相对立的。比如，一个农民或失业者对他的“生活世界”也会有体验，但这种体验很难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解。普遍性理解的根本标志是认识者把自己的思维前见也纳入批判活动的反思视野，在本体论、而非认识论意义上完成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历史性统一。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就是从这个地方才真正开始的。他援引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强调“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加达默尔还指出，“理解完全地得到其真正可能性，只有当理解所设定的前见解不是任意的时候，才真正具备了现实性。在这个基础上，下面这种说法就将是“完全正确的”，即“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一个受过解释学训练的意识从一开始就必须对本文的另一种存在有敏感。但是，这样一种敏感既不假定事物的‘中立性’，又不假定自我消解，而是包含对我们自己的前见解和前见的有意识同化。”我以为，这种产生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解释学洞见已经比 20 世纪初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意义”说前进了一大步。它在理解的本体论意义上回答了人文科学的客观性问题，把这种客观性归结为在时间

之流中不断实现主客体之间、认识与实践之间、前见的形成与扬弃之间新的综合与统一的永恒的理解运动，从而扬弃了传统意义上人文科学主客体的对立。就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而言，我们已经看到，对象自身总体化发展的成熟和研讨、检视对象的手段充分化，使研究者具备了形成有根据的、有效的理解活动之“前见解”或“前见”的可能；而各种类型的专制主义“本文”在拥有制度现代化整体思维作为前提与研究视域的理解中，将会获得更加清楚、更加透彻的释读。这就是说，虽然我们内在于我们以成长的专制主义社会，这对我们的认识来说似乎构成一种限制，但当批判思维成功地确立起某种标准，某种框架，该框架体现、而不是背离了理解所应具的普遍性品格时，“限制”就将转化为对“限制”的超越之反向条件，它可以使我们反过来更深入地、也更科学地理解专制主义。

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中国民主化问题的独特性

（本文是作者 2001 年 10 月 31 日在美国中密歇根大学的学术讲演）

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令全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尤其自“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民主化的内在性质、历史经验和未来前景引发了海内外有识之士更深入的思考。在这篇讲演中，我想和大家讨论这样几个问题：如何界定中国的民主化？中国的民主化是否等同于“西方化”（Westernization）？理解中国民主化进程如此艰难的历史因素都有哪些？为什么西方政治哲学回答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学者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以专制社会为对象的批判理论？

在这篇讲演的结尾，我还拟就与这个论题相关的、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所谓“新左派”（New Left）和自由主义（Liberalist）之间的论争做一简要的评析。

一．如何界定中国的民主化？民主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

在近现代中国史上，曾有一部份知识分子真诚地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就是西方化，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只有学习、照搬西方的立宪、议会及其他民主建构，才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另一个极端表现为今天仍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200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再一次表示“要坚决抵制西方的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

如果我们可以把前者视为囿于时代条件而对中国的民主化得出的过于简单的理解，那么后者则是出于统治需要而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战略。

我个人倾向于不用“西方化”这个词来指称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其理由是：

1. 在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水平上，民主化本来是人类从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具有社会进化意义上的普适性（Universal Law）。西方国家（如英、法、美）不过是以各自经验的特殊性证明了人类社会进化的普遍性。说得形象一点儿，西方国家并不能因为在历史上率先进行了民主改制而享有“民主化”一词的专利。

2. 每个西方国家实现民主化的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西方化”并不是一个十分准确的概念。以美国为例，这个由英裔美国人创造的、植根于新英格兰乡镇自治传统的民主精神，以及在这个精神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新世界”，其成长经历显然与已有数百年专制传统的欧陆国家不同。难怪 170 年前法国的年轻学者托克维尔来美国考察时，对美国的民主制赞不绝口。当时，密歇根这块土地还没有纳入美国的行政版图，如今这里已经是一派欣欣向荣。我想，“美国精神”中这种独特的东西恐怕也非“西方化”一词所能概括。

3. 更重要的是，用“西方化”指称中国民主化的目标，有可能使人们忽略中国民主化所遭遇的特殊语境和中国民主化必须面对的特殊挑战。无疑，中国民主化是世界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部份，也有“Universal”（普遍性）的一面，但它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 or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一面，更值得重视，更值得研究。事实上，正是这个“特殊性”或“独特性”的方面，成为人们理解当代中国民主问题的关键。

二．构成中国民主化特殊语境和困境的主要因素

首先，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制度现代化史，从 1898 年戊戌变法以来的中国民主斗争与民主建构史，更多的是一部失败而非成功的记录。为什么是这样？有两个因素似乎带有关键性。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悠久的文明与前现代遗产构成中国社会民主化转型的巨大文化障碍。中国古代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但缺乏现代民主所需要的思想与制度资源。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居支配地位的儒学基本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从汉代始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直至近世，它更多地发挥着维护君权统治与地方宗法一体化（*Integration*）的功能。1911 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传统之堕性力量仍十分强大，条件适宜时，这种对于民主化而言的文化障碍很容易转换为制度障碍。1915 年袁世凯之复辟帝制和 1928 至 1949 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独裁都是证明。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对中国人来说，欧洲现代化的先行者是以侵略者的形象出现于东方的，这个问题与哲学人类学水平上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二律背反（*antinomy*）有关，我们不可能就此详细展开讨论；但作为事实，它却迫使中国人做出文化保守主义与防御型现代化的选择，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改造。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拥有较长历史传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会面临与中国类似的文化困境。使中国民主化问题更为凸显的是下面所述的第二个因素，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建立的政权本来以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为目标，结果反倒走向自己的反面，蜕变为中国专制制度的当代继承者。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府的专制与反民主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但人们往往因此而忽略了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曾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进一场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民民主”，一种比 18 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更先进的“民主”。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宣告了毛泽东这种农业乌托邦神话的终结。往下的故事就是尽人皆知的了：1978 年开始，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但这个改革设定的目标却是有限的，即推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坚持共产党对政治权力和公共领域的垄断。这种经济改革与政治—社会改革的失衡是造成官场腐败现象蔓延的根本原因，它同时构成了 1989 年民主运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的“法轮功”现象之所以勃然兴起的深层社会背景。

上述两个因素的并存与互动，就是我理解的中国民主化所特有的问题情境。

三．为什么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回答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

一百年来，中国学界曾有数次译介西学的热潮。一次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次是改革开放后的 80 年代，1995 年以来，似乎又形成了一次新的翻译高潮，而且多以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为主。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说明中国知识界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进入中国民主化问题的深层思考，并希望从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汲取有用的养料，或至少通过翻译，“借他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

我以为，西方政治、社会哲学传统中的确有很多思想资源可供中国人借鉴，特别是欧洲反专制主义斗争中的优秀作品，其讨论的主题往往令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十分贴近，“似曾相识”。但总的来说，似乎没有哪一部西方作品能回答中国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讨论的前提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所要解决的矛盾也不同。以颇受中国知识界尊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 John Rawls 为例，他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早在 80 年代就被译成了中文。近年，他的《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和《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 也被译介过来。然而, 讨论问题基本是美国式的, 或者说, 他是以美国社会为原型作为设问的出发点。Rowls 与德国哲学家 Harbermas 之间的争论, 与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 社会的学术兴奋点很少关联。

中国特有的问题情境正在呼唤自己的批判哲学与政治哲学, 它应该是民主化所内具的哲学人类学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独特经验与设问情境的统一。由于中国是一个正处于激烈变革中的社会, 各种社会矛盾的交叉与互动 (Interaction) 提供了足够丰富的背景资源与思想刺激, 使得中国学人有可能也有条件去创设以专制社会和威权主义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制度经济学、知识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 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没有对专制社会的活生生的生命体验, 这样的学问是做不出来的。

四. 关于近年来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的简要评论

应该讲, 目前正处盛年的中国新一代知识者, 已经开始向这个目标迈进。

由于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控制的相对放松, 一些学人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大胆而又谨慎地发表不同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观点。由于这些学人理论倾向的不同, 被分别称为“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是坚持 80 年代的启蒙主义, 批判专制社会对个人权利的漠视, 认为积极推进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将有助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新左派”则更多地强调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被纳入国际资本的运作范围, 认为自由主义对“主体性” (Subjectivity) 的抽象主义论说无助于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 (Modernity) 危机引发的负面结果, 主张中国社会中的“平等”问题更甚于“自由”问题, 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等等。

我以为, 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 他们思考问题的态度都是严肃的。当然, 如果让我对这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作出判断, 那么我会对“新左派”持更多的批评立场, 因为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并非单纯由讲效率但“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所致。更重要的是, 片面强调中国被纳入国际资本运作这个因素 (尽管这个因素确实存在), 事实上回避了本土政治专制仍是中国社会发展与制度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 有些持“新左派”主张的学者, 长期滞留海外, 对中国国内的实际状况不无隔膜, 难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他们有言论自由, 但其言论是否切中国内问题的要害, 就很难说了。身在国内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者的最大难处则在于: 他们并无真正的言论自由, 所以他们阐述自己的主张就不可能彻底。他们深知哪些话不能讲, 文章写出来也没有地方去发表。像我今天在 CMU (中密歇根大学) 的讲演, 在中国国内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什么? 这就是专制社会的力量! 有人把知识分子拐弯抹角的抗争自嘲为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言自语”, 这话很形象, 因为无论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 他们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普通公民中的影响都还微弱得很。

上述可悲的事实告诉我们: 要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自由交往空间和健全的公民社会,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它也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民主化的独特性与艰巨性。但我仍然相信: 只要敢于正面面对看似可怕而实际很虚弱的专制体制, 又有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体察, 中国知识分子一定能够建立自己的批判话语系统, 并以此贡献于自己的民族, 也贡献于国际学界。

谢谢各位。

(本文首刊于《北京之春》2002 年第 3 期)

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政治性剧场行为

本文的目的在于勾勒存在于当代中国威权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政治性剧场行为。本文对“威权主义”社会的定义是：对思想与政治生活的控制仍是执政者的特权，尽管该社会的经济系统可能已经开放或部分开放；公民社会极其微弱，但有渐起之势；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正在更多地转变为辩护功能。总之，这是一个正在变化中的，权力合法性及其价值系统已经面临内在危机、但远没有寿终正寝的社会存在类型。我们也可将之视为经典极权主义与现代民主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就中国而言，文革后的“邓小平时代”和六·四后的“后邓小平时代”大体符合这样的界定，虽然这两个时间段又各具不同的特点。

研究此种社会条件下衍生出来的政治性剧场行为，将使我们面对政治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作为政治存在的人、人的自由、人的自由的历史性，亦即自由与自由实现的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生发出某些新的认识。此外，作为有关中国威权主义社会的一项专题研究，本文还将证明，就批判学术的内在生命力而言，其存在合法性基础恰恰建立在对象合法性危机的前设性条件中。

剧场行为释义

剧场行为的英文表示是“dramaturgical action”。在英文中，“dramaturgical”这个词的原意是“关于剧作艺术的”，其名词形式“dramaturgy”则指“编写剧本的艺术或技巧”。“dramaturgical”的另一解释是“戏剧性的”或“戏剧的”（参见《英汉辞海》的有关词条）。这样，当我们把“dramaturgical action”翻译为“剧场行为”时，这个词就同时包含着自编自演两层意思。

在日常生活中，剧场行为极其常见。譬如，一个正在家里招待他的学生们的教师，其举止会与同他的同窗好友相聚时大不相同，也与没有外人在场的家庭生活中的更“本真”的表现不同。一对刚刚进入热恋的青年男女也是这样，其行为总带有某种“表演”成分，希望把自己美好的一面尽可能展示给对方。我们可以把剧场行为的特征归结为两点：第一，它是主体（剧场行为的实施者）把自身呈示给客体（剧场行为的接受者）的一种方式，并希图借此影响客体对主体的判断；就此而言，剧场行为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又是“表演者”与“观众”的关系。第二，这个“表演”并不意味着“表演者”呈示给“观众”的东西是不真实的，换言之，剧场行为仍然是主体内心世界**真实性**的表达，但它表达的肯定只是主体内心世界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被掩饰、遮蔽起来了，“表演者”希望呈示给“观众”的只是这个部分；就此而言，剧场行为又带有**策略**成分，“观众”对“表演者”来说已经不仅是“观众”，而且是“对手”。

本文关注的并非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剧场行为，而是剧场行为的**政治化**，亦即**政治性剧场行为**，后者乃当代中国威权主义社会中一种值得注意、但迄今很少研究的现象。

我想先把政治性剧场行为的一般界定概述如下，然后再讨论它在中国威权主义社会中的几种具体表现。

首先，政治性剧场行为也是一种“表演”，是“表演者”迫于某种政治压力、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自我呈示；因此，它远不像日常生活中的剧场行为那样适意、“自由”。

其次，政治性剧场行为的“观众”不再是学生、朋友等，尽管在很多场合，他们仍然可能成为“表演者”的受众对象；从本质上说，政治性剧场行为的“观众”乃是一种高于“表演者”、使“表演者”感到恐惧的**政治存在**，它可能是一个实体，也可能是无形的，但却永远使“表演者”感知到它的**威胁**。

再次，正因为它的被动性、受压抑性，政治性剧场行为不再是主体内心世界的真实性表达；毋宁说，这种“表达”完全成了掩饰、遮蔽主体内在自我的一种手段，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观众”引向一个虚假的主体。

最后，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剧场行为的瞬间性，政治性剧场行为在长期的、压抑的威权主义社会氛围中，将使“表演者”的心灵产生扭曲，使“欺人”内化为“自欺”，完成压抑条件下心理防卫机制的建构，以抵御道德良知的谴责。

学者的政治性剧场行为

学者的职业使命乃探索未知，“求真”是学者的基本职业道德。在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学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还有担当社会道义、抨击社会丑恶、诊断社会痼疾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学者与威权主义社会处于**天然**的对立之中。对学者的思想控制，亦成为威权主义社会的首要之务。

控制是通过科学研究或教学中一系列无形的**社会禁忌**实施的，它使学者**自觉地**意识到哪些话可以讲，哪些话不可以讲，哪些话只能讲到什么程度而不至触犯“戒条”。由于在威权主义体制中，学者在**政治上是不存在**的——或至少威权主义执政者仍力图使其政治上不存在——，对学者的“学术”作品，就只有从知识的批判社会学意义上才能获得完整的解读。在最极端的学者“表演者”那里，正统意识形态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在“表演者”的最新“学术”文本中得到反映；意识形态流变与学者“学术”文本间奇妙的“对应”或“错位”，已经成为判断学者是否“成熟”、是否精于此道的标志。

在彻底的极权主义条件下，学者的“就范”倒不一定是“表演”；尤其是当极权主义与乌托邦的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时，学者的“就范”虽然幼稚，但却是**真诚**的。比如，对 20 世纪 50~60 年代经历“思想改造”那一代中的不少人就可以作如是说。问题恰恰发生在一个正在走向开放，其民主化进程虽姗姗来迟、但毕竟已不可逆转的威权主义社会中。对自由的诉求已在干涸已久的社会肌体中躁动，尽管它还远未挣脱自由的历史性那冷冰冰的面孔。在这样一个过渡性的、急剧变化的时代，学者面临着自身正在复苏的、本真的天职与威权主义社会强加给他的“角色”之间令人尴尬的两相对立，大家都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再加上这些年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正在改善，职称、工资、住房、“拿到项目”（有了“项目”就有了资助，有了钱）作为利益诱饵越来越具有新的、令人“就范”的力量，这使得作为政治性剧场行为“表演者”的学者经历了、而且仍在经历着难熬的思想苦役。

实业者（商人或私营企业老板）的政治性剧场行为

不像知识人，实业者的政治性剧场行为带有更加赤裸裸的**策略行为**或**工具理性**的特征。

下列区分也许是必要的：当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纯粹为了商业目的、采用纯市场手段（不管是规范的、合乎市场法理的，还是不规范的、甚至带有欺诈特征的）而出现在经济生活的

舞台上时，他的许多行为尽管也具有“表演”性质，但却不是政治性的；当他寻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政治表达，但只要没有采用非正常的“寻租”手段，仍然不能称之为政治性的剧场行为；**只有当一个实业者以直接或间接的“献媚”方式讨好权力，试图借此达到经济或政治上的目标时，这种行为才是政治性剧场行为。**

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确实出现了这样一个实业者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可以断言，都与这样的剧场行为有染，而且，买卖作得越大，实施政治性剧场行为的几率越高，必要性也越大。

导致实业者政治性剧场行为的产生有两大制度性原因：

第一，威权主义社会与极权主义社会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在保持政治一统体制的同时经济控制的放松乃至逐渐放开。这样，一个新兴的、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实业者阶层的出现就成为必然。但是，从资源占有、市场环境、既定游戏规则几个方面看，他们与原来已在台上的“国有”资产的拥有者相比，乃天然处于劣势。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即使出于弥补不公平竞争给自己可能造成的损失，“寻租”行为也是必然之举。更何况，对财富的贪婪追逐使“寻租”行为在很多场合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第二，从制度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看，威权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有产者群体，终究要取得政治性存在资格，但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事实上，私企老板、商人政治上不存在的现实恰恰通过权钱交易的存在得到了确认；这是理解中国威权主义社会中铺天盖地的腐败现象的重要关节点。**被金钱异化了的权力与被权力魔化了的金钱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威权主义社会中实业者向权力**献媚**的“表演”已被发展为精巧的“艺术”。甚至，实业者的某些有助于公益事业的“善举”，其背后都隐含着政治性剧场行为的阴影。

当然，有必要说明：实业者们完全意识到了这样作的卑鄙，但这却是**无奈的卑鄙**。用一位我认识的私营企业家我的话讲，他很清楚自己在权力面前不过扮演了一个“小贱人”的角色！这个自嘲诚实而又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实业者政治性剧场行为的被动性。

官员的政治性剧场行为

官员是权力的拥有者。在一个社会实存与对它的合法性论证之间有着巨大鸿沟的威权主义社会中，在一个缺乏法制传统，“寻租”与“设租”、“行贿”与“受贿”成为**社会之常态**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官员的政治性剧场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它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对他的“子民”，官员乃权力合法性的象征，“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乃官员的标准话语。“子民”当然不等于公民；但需要在“子民”面前表演，至少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开始向公民社会艰难迈进。这个公民社会越成长，上述鸿沟的存在就越明显——只要执政者没有放弃那套名曰“与时俱进”、实则僵化垂死的教条。由于这条鸿沟的日益公开化、外在化，官员在“子民”面前的“表演”常常令人作呕。10年前，“子民”往往讥讽此类“表演”为“假、大、空”；今天，正在成长的公民则清楚地看到了“表演”背后的利益考量。

其次，在任何威权主义社会中，权力永远是稀缺资源；如何保持现有权力、攫取更高权力、或在权力受到“威胁”时如何“自我保护”，乃是官员无时不刻不在面对的问题。由此产生的、在权力系统内部的一系列政治性剧场行为将会生发出一套“暗箱操作规则”，一套**隐蔽性制度**，它使公开的制度形式化、无效化，使法律与现行“政策”成为一纸空文。近年来媒体揭露的一系列丑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焦点访谈》报道的小到一个村的支部书记鱼肉乡民、大到厦门远华走私案，无不说明**建立在明、暗两套规则基础上的系统腐败**已经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程度。

第三，也是更重要的，由于官员拥有权力，在必要时，其政治性剧场行为可以政府行政

命令或大众动员的形式出现，成为某种“集体表演”，或曰**集体政治性剧场行为**。它可以表现为一项显示“政绩”的“献礼工程”，也可以表现为重大事件或灾异发生后的“善后处理”。1990 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是国家级集体政治性剧场行为的极好标本，当时，几十万北京市民、学生被政府强行动员“参与”亚运会的筹备、甚至被强行要求“观看比赛”，以此证明六·四后北京政局和社会的“稳定”。由于集体政治性剧场行为的复杂性，涉及到动员者、被动动员者之间，以及各种动员手段（如政府与传媒机构）之间的多重互动，这个课题完全有必要单列出来，进行专门研究。

威权主义制度背景下的生存策略

说政治性剧场行为是威权主义制度背景下的“生存策略”，首先源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威权主义社会的生存空间本来就很狭窄，无论政治性的，还是非政治性的。这个说法可能招致某种反驳：以俗不可耐的大众消费文化为特征的威权主义或后极权主义文化主流难道不是远离政治的么？非也。大众文化表面上的远离政治其实正是政治无所不在的表现与证明；它们的非政治化正是威权主义政治霸权精心操作的结果。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同意，就个体而言，歌星、农民、消费者等按照不同定义划分的社会成员，凡没有主动（或被动）与政治靠拢者，尽管其行为中也不乏“剧场”成分，仍不必列入政治性剧场行为的范畴。学者、实业者与官员就不同了。学者（这里尤指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包括教师），由于其职业性质决定，不可能与政治无涉；说得更准确些，他们在威权主义社会中的“钦定”角色本来就是权力合法性的牧师与解释者。实业者则受制于威权主义社会经济开放与一统政治体制结构上的失衡，以金钱换取权力的承认几乎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最后，官员理所当然地是威权主义社会中最政治化的群体。正因为如此，他们必然是在直接体味到这个体制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又时时感受到其威胁的一群；在官僚等级的各种系列上为“生存”而进行的“表演”、争斗往往具有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性质。

无论学者、实业者还是官员，三者政治性剧场行为的共同结果乃是对人格与灵魂的**出卖**。当行为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进行政治“表演”时，他既是把观众作为“对象”，又把他们作为某种**异己**的存在，作为“他者”；另一方面，正因为他把“对象”作为“他者”，他自己也成了自身的“他者”，成了反对自身的力量，成了对自身人性本质的否定。

从时间的长程意义看，这种情形将导致如下两种后果：

对个体来说，政治性剧场行为有可能从暂时的“表演”、“做戏”**内化**为某种心理机制，从**欺骗他人**发展为**自我欺骗**。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无意识的心理防御机制的建构过程，以抵御来自灵魂深处的道德良知的谴责。但我们对此还缺乏足够的研究，现代精神分析理论也可能对此有所帮助。

对社会来说，政治性剧场行为的泛滥助长了**虚假**的社会整合与**伪互主体关系**的建构，毒化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生态。或者，更准确地讲，剧场行为的无所不在乃是一个社会**道义合法性危机**与**制度合法性危机**的最明白无误的表征。如果说，虚伪是文明社会的最大毒瘤的话，那么，与虚伪同义、但比虚伪更可怖的政治性剧场行为则既是威权主义向民主社会转化的巨大障碍，又是这一转化已经开始的信号。

民主化与威权主义社会中自由的历史性

对于政治哲学而言，政治性剧场行为的普遍存在证明了威权主义社会中人权、自由与自由的历史性之类课题的**独特性**；关于民主、自由问题的抽象议论似远不足以捕捉、概括这类

经验的丰富与复杂。同时，它也不是一个单纯归纳分析所能处理的问题；甚至它根本就不是量化研究能够把握的对象。就我所知，现代西学中还没有适于分析这个课题的理论框架，原因很简单：对于缺乏亲身体验的“局外人”来说，这种要求本身就是难为了他们。

比如，尤·哈贝马斯在其交往行为理论构建中，曾比较了四种社会行为类型：目的性行为、规范调整的行为、剧场行为、交往行为。对剧场行为的阐释显然是其中最薄弱者。【1】约·罗尔斯的《正义论》及近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在非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其理论对象预设却是一个立足于“现代立宪民主”的“良好社会”；【2】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花了很多篇幅讨论的“重叠共识”【3】对威权主义社会来讲完全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威权主义社会中根本就不存在“理性多元论”的事实，“重叠共识”自然无从谈起。

从个人自由层面言，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对公民自由的界定【4】与威权主义社会的差异亦不说自明。政治性剧场行为的存在机理已经充分证明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决定了他们的不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亦似乎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负责的是这个制度。然，另一方面，制度归根结底要靠人去改变，那些有条件洞察这个现象背后秘密的人理所当然地负有改变这个世道的使命（事实上，恰恰是那些政治性剧场行为最盛的群体有责任改变这个世界，尤其是与相对而言更加无助的、尚无“资格”“上演”剧场行为的社会弱势群体相比）。

保障一个社会公民自由，或者，更基本地说，保障一个社会公民**心灵正常的制度条件**及其**哲学预设**究竟何在——这正是政治性剧场行为泛滥促使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应该说，目前对政治性剧场行为及其相关制度背景的研究，还刚刚开始。但我们有理由期望这项研究将会获得结果：它将丰富批判理论关于“策略行为”、“交往行为”的传统界定与阐释；至少，它将证明人类行为类型与互动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我们还期望这项研究将为中国威权主义社会中个体自由、人权的历史性及民主化进程的政治哲学探究提供独特的视角，因为**政治性剧场行为的存在告诉我们：自由永远不是抽象的；要实现真正的民主与人权，就必须探究产生该现象的社会机理，深入进行威权主义的社会病理学解剖，并且——在实践层面上——最终矫正造成心灵扭曲与禁忌的社会结构与制度运行方式。**

这是当代中国批判理论应该肩负的一项任务。事实上，正是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危机本身（中国威权主义社会的严峻现实）决定了、并且召唤着中国批判理论建构的合法性。

注 释：

【1】J·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交往行为理论》）Boston, Beacon Press, 1984（Vol.1）“导言”第3节。

【2】约·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平装本导论”，页27；第1讲，页36。

【3】同上，第4讲。

【4】罗尔斯的界定如下：第一，“公民在他们设想自己并相互设想对方具有掌握一种善观念的道德能力这一方面是自由的”；第二，“公民将他们自己视为各种有效要求的自证之源，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向他们的制度提出各种要求，以发展他们的善观念”；第三，“他们能够对他们的各种目的负责，而这一点又影响到对他们各种要求的评价”。见《政治自由主义》第1讲，页30—34。

（本文作于2001年3月，2002年2月修改、补充，发表于《北京之春》2002年4月号）

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死亡？

——读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有感

有血性的中国人读费希特的书，一定会感到亲切。为什么？因为我们和 200 年前的费希特心灵相通，面临着相似的生存语境，担负着同样的“使命”和任务，那就是同专制主义进行斗争。记得将近 20 年前我在撰写自己的第一部著作《经济行为与人》时，就曾引用过费希特的话：“使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驾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最终目的。”青年费希特的慷慨激昂曾经激励了同样年轻的一代中国人为自己的理想去工作，去奋斗。

但今天我们再读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却多了一重惆怅，一份感慨，几度沉思。

中国已经不是 20 年前的中国。权力和金钱的结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存在。在这个存在面前，良知正在贬值，物欲极度膨胀，一些原本血气方刚、满怀改革志向的知识分子现在却热衷于讨好权势，或在威权主义胡萝卜加大棒的淫威下满足于蝇营狗苟的生活，“使命”之类则似乎早就抛到了九天云外。

于是，从社会演进的大尺度看，我们面临着一种奇特的矛盾：

一方面，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史正以其深刻、恢弘的历史内容，磅礴、蜿蜒的历史走势，召唤着真正富有使命感的科学总结和研究，同时它也赋予了这一代人从事这种研究的条件和可能（这里所谓“条件”和“可能”，不仅指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拥有我们的上一代似乎缺乏的知识结构和我们的下一代肯定缺乏的生存体验，而且指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已经发育成熟，乃至走向危机）；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学者”和“专家”却在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放弃自己应该担负的时代责任。他们宁愿做衙门的腐儒、官府的刀笔吏而不愿做彪炳青史的思想巨人。

这是就理论层面而言。从实践层面看，我们也面临着一种矛盾和尴尬：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长期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整个改革的瓶颈。激活中国政治的一潭死水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形成自己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要求知识分子以社会良知和公民代言人的身份去行动。然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表现并不理想。虽然我们中间有为农民讲话的李昌平，有为太石村而奔波的艾晓明，有不断发出独立声音的余杰、王怡和刘晓波，但总的讲，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我们既缺乏**正义的勇气**，更少有**思想的力量**。在社会转型的大场景中，我们还没有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甚至，面对种种社会痼疾，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表现了不应有的麻木；在权力面前，我们又显得过于怯懦。“麻木”加上“怯懦”，已经接近精神上的**死亡**。更可怕的是，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精神死亡，而是一个群体的精神死亡，且这个群体本来是应该为精神而存在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何以如此？何以至此？

如果我们可以断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群体缺席是一个大体上能够成立的现实，那么**党专制**所拥有的**制度力量**无疑是造成威权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精神死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从权力运作角度看，促成知识分子精神死亡，有两件最得力的工具：一是“收买”，这

是今日当权者与毛泽东式的极权主义的不同之处，也是“后极权”时代实施党治控制的拿手好活儿。想买房子么？想购车子么？想送自己的子女出国么？那就老老实实给政府干活，作国家的“课题”，只要你乐意，有的是“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之类等着你去挣课题费。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就不用说了，政府舍得在这类“课题”上花大钱。别的“学问”也都可以作，你尽可心安理得地当你的“专家”、“博导”，在青年人面前为人师，在新闻媒体里“聊天”、“作客”，只是要在心里记住：有一块领地是绝对不能碰的，那就是党的领导和权威。既然凡夫俗子还是大多数，党的这一招就足以令教授专家们乖乖就范了。如果还有不识时务者给党找麻烦，那么政府还有另一招，那就是“封杀”——不让社会听到你的声音，使你的社会存在成为零。今年8月份发生的《改造与建设》网站被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尽管在这个网站上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理性的、温和的，还有很“左”的观点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但如果当权者认为这个网站的存在威胁到党的“一统”，照样封杀没商量。

“收买”和“封杀”，一正一反，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扼杀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自由**，扼杀知识人对社会的**道义责任**！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群体死亡，已经发生过一次，那是1957年和后来的文革。中经80年代的精神复活后，我们现在又在经历一轮可怕的生死轮回。而且，如果说，上一次死亡是在权力威逼下的死亡，那么这一次则是**权力威逼**和**金钱腐蚀**双重打击下的死亡。

难道我们就真的死定了么？我们是否还有复活的希望？

我相信，从发展的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死亡只是暂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复活的希望仍然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里讲：“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他还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在这篇演讲的结尾，费希特特别强调：“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我也很明白，一个丧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而我想同时以一种大丈夫的道德学说向他们的灵魂深处灌输一种感情，这种感情直到将来也能使他们防止这种麻木不仁。”

我们也需要重申这种**大丈夫气概**，用公共知识分子的**浩然之气**战胜我们灵魂深处的齷齪与萎靡。

但是，仅此还不够。

既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死亡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现象，那么改变这种结构、重新建构党专制造成的公共良知的集体缺席，就成为当代中国知识人精神再生的重要切入点乃至基本条件。必须看到，知识分子自由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复活，既是党专制解构的结果，又是其前提。这种条件和结果的双向关系决定了解构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们要学会作“韧的战斗”，既是对专制者，也是对我们自身，对我们自己的灵魂。

这篇短文是谈论“死亡”的，但我愿以“新生”来结束这篇文字。

（本文作于2005年10月27日，首刊于《真话文论周刊》网站）

中国现代“党化教育”的制度化过程

历史地理解当代问题对学术来说从来都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代作为刚刚过去、或尚在进行中的历史，它所内含的许多矛盾、张力尚未充分展开，从而很难为研究者所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至少就生存背景言，研究者本身也是他（或她）所研究的这个时代的产物，他（她）的视界、感触、思考问题的方式、理解对象及自身与对象的关系的方法，都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研究对象的制约。这就是说，研究者很难把此时此地带有主体特征的对象本身**历史地**当作客体来领会；主客体角色的错位、主客体关系的多重化乃至模糊化为现当代课题研究的历史性要求设置了诸多陷阱。

正因为如此，本文对中国现代“党化教育”的制度化过程的考察仅仅是一种尝试：**我将努力把该过程理解为生成中的历史**，从客体的意义上去把握它，而把客体作为主体对研究者的影响尽可能悬置起来；同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作为生存背景、从而构成重要的思考之感性源泉的研究对象——的互动式关系，又不全是消极的，只要研究者谨记当代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那么，作为时代进程参与者的个人感受，就完全有可能被当作有价值的素材整合到研究对象的理性分析中去。

本文由下述 6 节构成：1.“党化教育”释义；2.国民党时代“党化教育”的遗产；3.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意识形态诉求；4.中国共产党“党化教育”演变的几个阶段；5.中国共产党“党化教育”的制度化特征；6.从“党化教育”的失败看当代中国专制主义制度解构的可能性及未来趋势。

1. “党化教育”释义

根据制度现代化理论有关现代政治建构与公民社会发展的总体逻辑，“党化教育”本身乃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概念。**【1】**形式上看，这个概念涉及两个语义上并不相关的部分：“党”和“教育”。“党”在现代政治建构中本来是重要的制度性构成部分，政治学把不同的政党制度理解为区分不同政治体制的重要标尺。比如，表征多元竞争的政党制度（多党制）通常与民主的政治体制相联系；而一党制则往往是政治极权主义的代名词，不管它是以赤裸裸的形式出现（法律上明令只允许一个政党存在），还是以羞羞答答的形式出现（理论上承认“共同参政”的合法性，实际仍由执政党垄断最主要的权力资源）。

“教育”在制度现代化框架中被理解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结构性要素。无论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教育的根本使命都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独立判断能力的合格的公民。正因为此，教育本来应该独立于特定的党派、特定的政府；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本来乃“教育”应有之义。

如此说来，所谓“党化教育”从民主政治与公民社会的立场看，根本就是个不能成立的概念；它在逻辑上的唯一可能，只能是政治上的一党专权，且教育已经沦为执政党的御用工具。换言之，当我们把“党”与“教育”合而论之，“教育”已经是“党化”之“教育”的时候，我们已经预设了一个**专制主义政体**的存在。“党化教育”无非是执政党通过教育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的过程。

本文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教育的意识形态化**。我在另外一个场合曾把意识形态界定如下“意识形态意味着理论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即理论成为论证权力合法性的工具。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将不再遵循理论自身的逻辑（科学逻辑或创造逻辑），而必须遵循权力的逻辑（一切以权力的维护为转移）。在专制的社会条件下，某种理论一旦被钦定为官方‘独尊’之物，往往就是其意识形态化的开始。尔后的行程则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处于鼎盛时期的意识形态，主要执行向臣民提供认知结构与行为指导、促进臣民对帝国的认同、调整可能出现的社会整合方面的冲突等功能。第二阶段为处于衰落时期的意识形态，往往伴随着政权的不稳定、内部分裂或出现社会危机而产生。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也更多地堕落为辩护功能”。【2】我认为上述对意识形态的界定与说明，同样适用于本文。需要补充的是，以权力为背景、为依托、为归宿的意识形态通常都有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排它性。所有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都是唯我独尊的。正如意识形态由以依托的权力本身是绝对垄断的一样，对权力合法性的证明也必须是绝对垄断的。这里没有歧见、异见存在的余地。因为根据专制主义的逻辑，与权力不同的声音势必构成对权力本身的威胁。

第二，强制性。强制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保证臣民对权力合法性的认同。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军事占领意义上的武力强制，意识形态更多地乃是要完成心理、认知上的强制。有两条渠道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它们是（1）**强制的内化**，即通过诉诸意识形态伦理上的正当性，使臣民的心理与认知接受过程相对容易；（2）**强制的内化**，即通过一整套制度规约，使意识形态灌输系统化、规范化、体制化。

“党化教育”——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就是这样一种借助于权力的垄断性力量，通过强制性的内化和外化，使臣民就范于“党”的声音和“党”的意志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党”与“教育”完成了它们各自的异化。

当然，以上界定还只是一个纯抽象层面的界定。

下面，让我们走进具体的历史。

2. 国民党时代“党化教育”的遗产

毫无疑问，就现代中国而言，由孙中山缔造的中国国民党是“党化教育”的始作俑者。

但是，从历史的生成意义看，国民党“党化教育”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大一统的权力特征，因为，截止到孙中山逝世时，国民党尚未取得对全国的控制。在孙中山的宪政构想中，“民权主义”本来是现代中国政治建构之基石；然鉴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民众动员的实际水平，孙中山提出在实行“宪政”之前，需要经过“军政”与“训政”两个阶段【3】，那么，这个“训导”重任何人担之？党。

为什么是“党”？孙中山从自己的屡战屡败和后中国辛亥革命6年却取得胜利的苏俄十月革命中，似乎领悟到了一个道理：“苏俄所以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此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4】这个“党治”思想可谓孙中山痛定思痛之总结，却不幸成为现代中国专制主义之起始，其结果，恐非孙中山本人能料及。

民国时期的政治学者王世杰、钱瑞升曾指出：

中国国民党执政以后，党治制度，不只是一种事实，并已一再著为法律。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首次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本由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议议定；该《组织法》的第一条并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

政务”。《国民政府组织法》虽此后常有修正，但此类规定从未或缺。到了国民十七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告成，全国统一，中国国民党训政开始，于是更有《训政纲领》的制定及颁布（十七年十月三日）。该《纲领》第一条明定：“中华民国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到了民国二十年六月初，《训政时期约法》成立后，《训政纲领》又成为《约法》的一部分，于是党治更取得法约上的根据。【5】

由“党治”而“党化教育”，在“党治”逻辑中，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1927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为了推行“党义”，国民党中央又制订了《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组织条例》、《检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条例》，从组织上规范党义教师任教资格。【6】教科书方面，南京政府教育部于1929年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其中开列的3项政治标准是：（1）适合党义；（2）适合国情；（3）适合时代性。1938年，该部又颁行《青年训练大纲》和《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强调对大、中学生进行“信仰训练”，要“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文件还规定把“党义”列为大学必修课，内容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史及国民党历届宣言……等等。【7】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已经演化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党治”基础上的“党化教育”，曾经受到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比如，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司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任鸿隽（1886—1961）专门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的文章，对此进行抨击。他指出：“党化教育”与教育本身是完全相悖的——

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我们只看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对于发展教育，改良教育的计划，一点没有注意，但小学的党义教科书，却非有不可。教科书与党义有不合的地方，非严密审查不可。老实说来，教八九岁的小孩们，去念那什么“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关税自由”的教课文字，不但不能得他们的理解，简直于小孩们心灵的发展有重大的妨害。但这是党化教育所不能避免的结果。

不但如此

就一般的教育来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于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慧上的好奇心。有了智慧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物，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已确定的了；他们的问题，是怎样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这个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慧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当时的教会，不愿意一般人有自由思想，于是乎不恤用教会的法庭来压制葛里略，逼着他发誓承认地球绕日的学说，是和圣经抵触的，是不对的。他们这种办法，不但是要压制葛里略，使他不再谣言惑众，并且要惩一警百，使同时的人不敢

有新出的思想。但是他们所得的效果是怎样？葛里略在签名悔罪书之后，口中喃喃地说道，“地球是动的”；而地球绕日的真理，也不因葛里略的受压迫而遂之湮灭。自近世文艺复兴以来，专制思想与自由思想冲突的结果，总是专制思想失败，党化教育也不能独成例外。【8】

70年后，当我们重温先人写下的这些批评“党化教育”的文字时，首先感到惊诧的并非文字所表达的思想，而是表达如此“离经叛道”之思想的文字何以可能在当时发表？这种惊诧本身即证明了我们与我们的先人所处的时代境遇的某种同构性。我以为，国民党政府能够容忍这样的言论，并非由于其“宽宏大量”，而更多的可能是顾不上。众所周知，南京政府建立后几乎没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各路新军阀的挑衅、反叛曾令蒋介石大伤脑筋；更被南京政府视为心腹之患的是江西、福建深山密林中红军势力的崛起，蒋介石动用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对红军进行围剿，终于把他们赶到西北荒漠中的延安。内忧未平，外患加剧，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1931年就踏进了中国东北，并在1937年演化为全面对华侵略战争。战争一打就是8年，直到1945年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德意日彻底垮台，中国的抗战才告结束。总之，**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代**，南京政府作为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担负着领导全民族建设国家、共御外辱的艰巨任务，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其政治专制的统治亦不得不有所收敛。平心而论，抗战爆发前的南京政府十年，在推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方面，还是有成绩的；而其统治能力、尤其是思想控制能力的有限性，则恰恰为自由理念（包括教育独立之思想）的阐发、弘扬提供了某些机会。

3.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意识形态诉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并没有使用过“党化教育”的术语，但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教育实践，却完全继承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遗产——当然，这是就“党化教育”制度特征之专制主义的本质言，而非指“党化教育”本身之内容。

1989年的“六·四”惨案，使中国执政党成为全世界的众矢之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套意识形态自然也变得声名狼藉。有研究者据此断定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自始就是一场骗局，它不过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9】。我个人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已经成为新的、与权力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然**体现事物发展逻辑的客观实存并不等同于行动者的主观认知，且二者常常正相反对**。——这种“历史的狡猾”内含的深刻，只有在通晓历史流变之辩证法的基础上，才可洞察。

如果我们把合法性定义为“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0】或奠基于“同意”基础上的“统治的心理权利”【11】，那么建国之初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并不缺乏这样的合法性。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战胜国民党，固然不全是政治理念的胜利，也不全是军事的胜利，“人心向背”在这里确乎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务实政策和建国初期共产党的清廉形象有助于执政者在中国传统民本主义的文化基础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换言之，不象1989，1949年乃至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尚无须通过暴力维持自己的政权与意识形态。

那么，何以解释建国伊始共产党就开始奉行的意识形态诉求呢？

上文曾谈到，处于鼎盛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向臣民提供认知结构与行为指导、促进臣民对政权的认同、调整可能出现的社会整合方面的冲突，等等。这些固然也是理解中

共掌权后迅速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当代史来说，有一个十分独特的因素不能不提出来单独讨论，那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者的浪漫主义乌托邦战略，这个战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意识形态建构的核心，亦同时成为执政者借助一切手段实现自身意识形态诉求的动因。

是的，毛泽东和“新中国”第一代掌权者是雄心勃勃的。他们相信自己所成就的大业不仅仅是“旧中国”历史上的那种改朝换代，而是要在“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完成一场社会革命，后者不但将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而且将导致中国社会最伟大的变革。

由此，教育也必须从“解放前”的“旧教育”变为“新中国”的“新教育”：

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维持的一种工具。它提倡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它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服务的。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在中国宣告终结，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基本上被摧毁了。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的新教育。这种新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既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我们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就是要推行这种教育，而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的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要实施的这种新教育和旧教育是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东西，是势不两立的。【12】

这段文字所反映的，还只是《共同纲领》里讲的“新民主主义”，后者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从1953年中共中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没用几年的时间，“最低纲领”迅速被超越，工业国有化了，农业集体化了，几亿农民被引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了。“最高纲领”——通过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实现似乎指日可待。

这就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曾经如此呈示。我们无须怀疑那个时代的真诚，因为真诚与愚蠢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引起人们深思的，毋宁说是执政者所认定的、这个乌托邦战略由以实现的制度形式。毛泽东宣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占据支配地位，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新的“党治”既是“新中国”伟大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制度体现，又构成新的权力意识形态所必须阐释、维护者。由此决定了：（1）它必须是排它的，因为它宣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发展中国；（2）它必须是强制的，因为它不允许人们有其它选择，而必须接受之——尽管此时的强制，似乎拥有较充分的伦理上的正当性。

简言之，这里所体现的乃是所有以权力为依托的意识形态的共同秉性：专制主义。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本身的浪漫性与其专制主义的制度实现形式的严酷性——此乃我们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诉求的两个基本点。

以中共“党治”为基础的“党化教育”也是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展开的。

4. 中国共产党“党化教育”演变的几个阶段

就根本功能言，中国共产党“党治”基础上的“党化教育”乃是服务于执政党乌托邦社

会改造工程及其意识形态合理性的论证、宣传与“普及”。这是根据前述不难得出的结论，也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工具论观点【13】。鉴于中国人口之众多、地域之辽阔、国情之复杂，“党化教育”无论作为“宣传”还是“普及”，本身也构成一个惊人庞大的系统工程。然而，在研究中共“党化教育”的制度化特征之前，简单地回顾一下“党化教育”之“正统话语”（党化教育的“标准语言”）演变的历史也许是必要的，根据是：（1）“正统话语”的演变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兴衰的全过程，对于不了解或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来说，此处的叙述或许有些用处；（2）正是在客观实存（历史的实际进程）和一相情愿式的主观解释（意识形态说教）的反差与错位中，人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看到“党化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只可遵循权力逻辑而与科学无涉、甚至是反科学的内在本性，且反过来有助于体味何以当权者必须借助强有力、又日趋顽固化的制度设施作为合法性维系的外部支撑。

根据历史的实际进程，我把过去半个世纪中共“党化教育”之“正统话语”的演变划分为4个阶段：

（1）1949-1966年：“正统话语”形成期

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确立“新中国”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及其意识形态诉求合理性的观念框架，大体又可分为立基于《共同纲领》的时段（1953年以前）和更加激进的社会主义变革时段（1953年以后）。就“正统话语”的规范性而言，前一个时段具有明显的过渡特点。比如，从1949年到1953年，高等学校被规定开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3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14】。虽然党的意识形态的唯我独尊已经成为所有课堂必须遵循的教条，但对社会发展进程的解释尚基本依据《共同纲领》相对稳健的立场。后一个时段则显然不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竣工”后，伴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激进乌托邦工程的实施，与之相应的一整套“党化教育”语言亦形成系统。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大、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中即规定：中等以上学校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一定的工作实践、生产劳动的锻炼，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革命理想，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小学学生，主要是进行以“五爱”为中心的思想品德教育，使他们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各项教学活动中，都应为实现上述要求而努力。【15】

（2）“文化大革命”10年（1966-1976）：“正统话语”强化期

“强化期”这个提法不一定准确，不过我还没有想出什么更好的提法概括文革期间中共“党化教育”的特色。简单地说，尽管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旨在铲除“党内修正主义”的更加激进的乌托邦变革运动，但这场运动从未动摇以一党制为根基的国家权力结构本身，也从未动摇“党”的“一贯正确”、“至高无上”的形象；毋宁说，该形象通过诉诸“英明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战无不胜的理论与智慧而进一步强化、神圣化。与文革前相比，文革中的“党化教育”显得更为癫狂，更缺少逻辑，更丧失理性，又更具淹没性。没有跳过“忠字舞”、没有进行过“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参加过“批斗会”、没有在“触及灵魂”与“斗私批修”的声讨和被声讨中义愤填膺或痛哭流涕的人，是很难领会“淹没”一词的确切含义的。

不过，“物极必反”也恰恰植根、生发于这个时期，尽管对“正统”的怀疑还远未挣脱“正统”对它的囿限。1971年发生的林彪“9.13事件”是促使怀疑萌生的第一支催化剂；对“四人帮”的不满唤起了更深层次的理性思索。所有这些都在1976年因悼念周恩来而引发的“四·五运动”中释放出来。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话语”至少因其在文革期间的代言人成为众矢之的而间接受到了挑战。

（3）改革开放的“后毛泽东主义”时代（1977-1989）：“正统话语”调整期

文革事实上宣告了毛泽东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破产。以 1978 年中共 11 届 3 中全会召开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使中国步入邓小平掌舵的“后毛泽东主义”时代。“党化教育”此时的任务是：既要论证新的经济务实政策并非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又要强调即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党、党所制定的路线以及以党为核心的现存制度框架仍是不容怀疑的。鉴于 1978 年底、1979 年初的“民主墙”运动和中国民间“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提法构成了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直接挑战，1979 年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在全体人民和青少年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就在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总国策的同时，也成为“党化教育”之“正统话语”调整后的基本内容。

对专制主义者来说，事情的不幸在于历史逻辑并非按照当权者的既定想象展开，也不会顾及权力意识形态总想关照的自身连贯性。市场经济引进的结果绝不仅仅是对计划经济模式的简单否定，而势必在制度现代化的整体意义上引起连锁反应，包括唤醒政治民主化的内在要求和公民社会的重新崛起。当执政者不能顺应这一历史大势而企图阻止之时，悲剧的酿成就成为不可避免了。

（4）“六·四”以后至今：“正统话语”衰变期

发生于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民主运动及其被镇压，成为当代中国史的分水岭。如果说，毛泽东一代“新中国”的开创者在推进浪漫化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过程中曾经干过许多蠢事却仍不失其真诚，毛本质上的极权主义制度运作虽严酷、专横却仍未失其合法性；如果说邓小平在领导中国 80 年代的改革时，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裹足不前、受到颇多牵制而畏手畏脚，毕竟通过市场化使人民得到了“实惠”从而在一定程度、一定意义上保留并延续了执政者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那么这种合法性由于“六·四”北京长安街头的血腥镇压而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这是一个历史的质变点。不管统治者是否承认。

在这个质变点以后，“正统话语”的衰变是不可避免的。**衰变的最集中的表征是：原先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之自明真理的东西，如今已堕落为执政党权势利益集团的遮羞布，堕落为连宣道者自己都不相信的赤裸裸的表演。**这是“党化教育”逻辑演变的终点——我们不可能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身蜕变中再推出什么其他结果。尽管 10 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新一代执政者试图通过抹掉“六·四”的黑色记忆、淡化历史的创伤、加大体制内反腐败的力度、推出“三个代表”等新的“正统话语”【16】来培植、修复自身的合法性，但只要专制主义的逻辑本身及其政策体现没有改变，它的逻辑结果也就不会改变。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5. 中国共产党“党化教育”的制度化特征

纵观半个世纪的历史，虽然中共“党化教育”之“正统话语”历经核心观念同一前提下的若干阶段性变化，但“党化教育”由以实施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建构却有高度的连贯性，且呈现出某种日趋顽固化的特点，这与后期“党化教育”话语上的衰变构成奇妙的对应关系。

本节就来探讨一下中国共产党“党化教育”之制度化特征的几个基本方面。

（1）法律地位

在现当代中国的立法实践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宪法的世界观中立原则弃置一

旁。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1条即宣称“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17】。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在“序言”中明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8】

有了“根本大法”的上述规定，“党化教育”本身自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依据。在1995年3月1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我们可以读到“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第3条）【19】。3年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上述内容（同见第3条）【20】。这部关于高等教育的立法文件虽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马上补充道“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21】。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意识形态的独断性，这一条等于什么也没说。

至于当代中国的法律文件如何成为当权者专制主义的工具和挡箭牌，有一个例子似乎很说明问题。记得是在90年代初某年“两会”（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时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国务院总理记者招待会，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一位上了年纪、鬓角已白的外国女记者问道：“李鹏总理，一个中国人能否既爱国，又不信仰社会主义？”李鹏的回答简单而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其中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所以，一个公民要爱国，就应该信仰社会主义（大意）。此事发生在哪一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我已记不清楚，但这段对答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实，借用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术语，“社会主义”之于“六·四”后的中国早已成为“简单的超意识形态的暴力”而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22】。这个幻象之所以仍作为现实被构建着，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是因为法律（包括最高层面的法律——宪法）为它提供了法统意义上的支撑。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党化教育”系统就是建立在这个支撑基础上的，后者不但使“党化教育”的内容合法化，而且使“党化教育”的巨大组织建构与制度设施合法化。

我们就来看看组织建构方面的情形。

（2） 组织手段

《中国教育年鉴》载文云：

我国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总的方面是在中共中央及其直属机构——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部署和领导各个时期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育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领导部门协助中央宣传部和各地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门共同做好这一工作，处理有关的各项事宜，在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也都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

高等学校在党委领导下，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校系的行政干部、共青团、学生会、工会、马列主义教研室和广大教职工共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常的有三条渠道，即：系统的政治理论课、时事政策教育和党团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这三者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必须分工协作，互相配合，从不同的角度来完成思想教育的任务。【23】

以上所谈，还只是普通教育系统中“党化教育”的组织化特征。中国共产党实施“党化教育”还有一支专门队伍，那就是自成体系的党校系统。从中共中央党校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地、县，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局、委都有自己的“党校”。“民主党派”则有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担当同样的“党化教育”职能。

甚至在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重建中的中国私立学校，也出现了“党化教育”的组织化趋势。比如，据北京市教科院民办教育中心主编的《民办教育参考》报道，北京市各区县教育部门党委都把在私立学校中建立“党组织”作为工作的突破点。“到2001年第二季度我市社会力量举办学校在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单位共有1548个。经审核，符合《党章》与文件规定应建立党组织的有756个，现已建立党组织716个，占94%。”“经区县调研，上半年我市民办高校中应建立党组织的有87所，已建立党组织的有82所，占96%，其余5所中，有2所已上报待批，有3所在办理党的组织关系接转手续。至此我市民办高校基本建立了党的组织。”总之，“我市民办高校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上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和紧迫感，区县教育部门党委书记亲自负责，并与区县组织部门紧密配合，抓紧党组织关系接转和审批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党建工作的开展。”【24】

当然，后边一段属于典型的“官话”、“套话”，但此文给出的数字仍是有用的信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党化教育”无孔不入的组织化特点。

（3）课程系统

前文曾述及，早在建国初期，教育部就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要求高等学校开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发展史”等马列主义课程。院系调整过程中，教育部又于1952年10月7日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指示》，对马列主义课程的设置、学时安排作了详细的规定【25】：

1953年马列主义课课程设置及学时

学校类型	新民主主义论	马列主义基础	政治经济学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总时数
综合性大学、师范学院	100	136	136	100	472
理、工、农、医专门学院	100	136	136		372
三年制专科学校	100	136	136		372
二年制专科学校	100	136			236
一年制专科学校	100				100

自1953年下半年起，“新民主主义论”课程名称一律改为“中国革命史”，1961年后又改称“中共党史”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列基础课1961年被取消，其内容合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两门课中。到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笔者这一代人上大学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等学校本科各专业一律开设“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3门课，文科要加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本人在大学读的是政

治经济学专业，接受过的“党化教育”自然比理工科乃至其他普通文科专业的学生为多。“哲学”每周上课多达6学时，两个学期下来共计216学时，读的乃是斯大林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到处充斥着用“党性”（阶级性）原则分析中外哲学史的“标准语言”。更加糟糕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后来公之于众的大量历史事实看，这门课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对苏维埃时期众多重要人物如托洛斯基、布哈林的攻击都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无稽之谈。但当时这些东西却是不容怀疑的，正如文革期间刘少奇被指斥为“叛徒、内奸、工贼”而不容怀疑一样。

到了90年代下半期，“邓小平理论”又作为“党化教育”的新文本进入各类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1999年9月6日教育部发布的一个文件就称：“当前要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进一步做好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26】照此逻辑，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之“重要思想”早晚也会得到此项殊荣的。果不其然，进入“新世纪”后没有两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成为高校政治课的必修内容。

现在要问：何以课程设置乃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化教育”的制度化呈现？

须知，在任何一个学校教学-管理系统中，课程设置都不是孤立的，而必有相应的教材、教务、学籍管理办法等与之相配套。如果体现“党化教育”要求的各门“政治理论课”乃是课程设置中的“必修课”（情形也确实如此），那就意味着学生必须获得这些课程的正式成绩，否则毕不了业。而学生要想在这些课程的考试中及格，就必须把教材熟读、牢记，并把它们移植到考试的卷面上去。——还是那句话，这里不允许有独立思考、发表异见的权利。假如哪个人昏了头，竟然无视这条规则，最后必吃亏、倒霉无疑。因为毕不了业、拿不到“文凭”，他（或她）将会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遇到一系列困难、麻烦……

这是什么？这就是**专制主义制度化的力量**！

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排它性、强制性借助课程设置、考试规则、毕业标准的一体化设计，再一次得到了证明。

（4） 师资动员

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挖掘人才、智力资源充实自己的“党化教育”队伍方面，都是不遗余力的。然与国民党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在推行自己的“党化教育”方面显示了**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动员能力与更强大的规模效益**。下面这个表记载的是1957-1965年间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的数量增长情况【27】：

1957-1965年间高等学校政治理论专任教师数							单位：人
	1957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总数	5457	4361	8990	8577	8182	8781	8032
哲学	1390	1266	2767	2882	2806	2681	2765
政治经济学	1341	1248	2735	2655	2544	2395	2480
中共党史	1348	791	2070	2153	1972	3085	2240
马列政治学	1378	1056	1418	887	860	620	547

而国民党的党义教员规模则可由下表见出【28】：

1932-1934 年间各类大学学生与党义教师人数

单位：人

年度	1932		1933		1934	
类别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学生	教师
总计	26719	26	27482	30	28599	36
国立	12863	9	12060	13	11970	16
省立	3796	6	3685	3	4476	9
私立	10060	11	11737	14	12153	11

我们将 1932、1933、1934 年学生与教师的数字相加，其总数分别为 82800 和 92，这就是说，国民党这个时期党化教育学生与教师之比正好为 900 比 1。时间后挪 30 年，1962、1963、1964 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 2265000 人（其中，1962 年 83 万，63 年 75 万，64 年 68 万 5 千）【29】，同期公共政治课教师总数为 25540 人（见上表），这意味着，共产党这个时期党化教育学生与教师之比约为 89 比 1。这证明了我们两党、两个不同时期“党化教育”师资动员规模与水准的判断。

严格地说，共产党“党化教育”的师资动员不仅指“政治理论课”的专职教师，而且还须包括学校的党务系统工作者、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专职人员以及班主任。这是一个阵容更加庞大、也更加强大的队伍。他们是“党”的声音足以面对面传达、贯彻到每个学生的人力资源保证。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党化教育”的岗位都是正式列入学校“人事编制”的，并据此获得国家财政上的支持（国家教育经费支出中的一部分将用于支付这部分人的工资）。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党化教育”师资动员背后的大一统制度支撑。

6. 从“党化教育”的失败看当代中国专制主义制度解构的可能性及其未来趋势

以上几节，我们分别考察了国民党时代“党化教育”的大致情形、1949 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意识形态诉求、中共“党化教育”演变的 4 个历史时段以及它所具备的若干制度化特征。总的说，这个话题是沉重的，我个人在写作这些文字时也深深感觉到这一点。——毕竟，我们这一代人都曾体验过“党化教育”是何物，且至今我们的下一代仍在继续体验着。但是，当我们从个人的有限中拔身出来，以冷静的观察者身份去反思这段历史时，又会惊奇地发现：历史仍在生成之中。假如说 20 世纪的中国曾由于种种原因堕入自己设计的乌托邦陷阱、尔后又转向另一个极端一步跨入金钱社会无边的道德荒野，假如说颇有文化根基的中国专制主义曾在“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的各种名义下横行一时，假如说“党化教育”作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曾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就范”，那么这只是历史呈示的一维而已。还有一维——更代表历史意义、历史真谛、历史未来之走向的一维，正在悄悄地向我们展开。这就是民主化的大趋势。

人类有许多缺点、弱点，这无可怀疑；但人类命定要走向民主，这是由奠基于哲学人类学的人的“主体间”交往的社会进化本性所决定的，且已为世界 300 年来各国的发展所证实。中国人于此确实走了些弯路，这是由于我们文化传统中那些过于陈旧却又依然活生生的积习与激进意识形态之间完成了一种奇妙的组合，后者产生的“总体化”力量（这个术语借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扭曲了现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然而，总体化达到其内在能量的最大值、构成总体化之各要素的自身张力充分展露出来后，总体化的解构过程也就开始了。

“党化教育”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事实上，当我们把以上两个维度同时纳入自己的观察视野时，就会看到**作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工具的“党化教育”在其日益膨胀的制度化过程中已经悄悄埋下了自身解构的种子**。特别是近 20 年来，伴随着中国大门的打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公民有可能通过越来越多的渠道了解外边的世界。这同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幻觉制造的前提是信息封闭。一旦信息之窗打开，幻觉的虚幻性、幻觉制造者的自欺性就将暴露无遗。如果此时幻觉制造者仍然乐此不疲，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故意地、出于某种阴暗目的而去编织谎言。在中国已经基本完成扭曲的公有制向扭曲的私有制转型、新权贵们已经成功实现国有资产的再分配的今天，这个阴暗目的除了用权力保护利益，还会是什么呢？

我在前文曾经引述过任鸿隽对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批评；由于共产党控制手段的完善与制度化（特别是对媒体和出版界的控制），我们至今尚未听到公开的、对中共意识形态诉求及其工具的同样批评。然而，对“党化教育”的怀疑、反思乃至抵制，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它们大多采取了迂回的形式。最简单的是“消极抵制”，这几乎可以在所有的大、中学校的“政治课”或“德育课”课堂上发现：学生对“党”的说教根本不感兴趣，硬着头皮听也不过为了应付考试。虽然他们的行为未必是自觉的（自觉的前提是学生拥有在掌握多种知识参照系的基础上独立判断的能力，而中国的“党化教育”不可能传授学生这种能力），反倒以十分本真的方式证明了“党化教育”在被教育者那里的**失败**。如果偶尔听到学生夸奖“政治课”老师讲得好，学生爱听，那也并没有证明别的什么，而只是证明了老师在课堂上尽可能讲了些实话。

如果我们关注那些“党化教育”的执行人——各级各类学校马列主义的教师、相关研究单位的学者们，就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在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敷衍了事，得过且过，不过混一份工资、一个职称而已。其中更有觉悟者，通过教学、翻译、著述，以种种迂回方式对当代中国专制主义进行匿名审判。此类做法不妨称之为“积极的抵制”，个中积累的抵制艺术足以生发为一门学问，一门中国威权主义社会独有的知识社会学。比如，前不久国内某家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学人文读本》，内容涉及教育独立与大学的本质、重新点燃启蒙火炬、唤醒历史的记忆、对“革命”的反思、人权高于主权、告别狭隘民族主义等重大而敏感的课题，目的是“让大学生在灵魂发育之际，能及时而确凿地听到另一种清醒而清洁的声音”。这种做法无疑是要冒风险的；然恰恰在此类行动中，人们看到了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教材编写者和出版家的道德勇气。

事实上，无论“消极抵制”还是“积极抵制”，都表征着来自民间的对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制度解构力量的形成。这个过程是静悄悄的，但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颠覆性**。

还可以再举个例子，那就是近年来正在酝酿、且在中国部分省市试行、推广的高考科目设置的改革。从本文立论的角度看，所谓“3+X”的考试方式（语文、数学、外语+综合）事实上降低了政治课在文科考试中的比分权重；理工科的考生在“小综合”（只考物理、化学、生物）的场合则不必再考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来自体制内的中国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解构开始的某种信号——**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十分微弱的信号。当然，课程设置和考试方式、内容的改革，只是专制主义党化教育制度解构的一部分。这个解构更根本的部分，应是其法律地位的重新界定和组织手段的带有革命性的改造乃至摧毁。就中国威权主义的政治-社会现实而言，这一步似乎还相对遥远。然考虑到民主化乃不可违逆之大势，考虑到中国已加入 WTO，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将进一步加速，正统意识形态已成中国专制主义的最后领地，我们似可预言：上述解构过程将继续下去，并成为中国民主化与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催生剂。

注释：

- 【1】关于制度现代化之基本概念与总体逻辑的一般演绎，参见拙著《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 章“制度现代化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 【2】《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页 238。
- 【3】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见《孙中山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7 年版），页 565。
- 【4】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的说明：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孙中山文集》页 393。
- 【5】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重印本），页 482-483。
- 【6】高奇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页 113。
- 【7】同上，页 207、354、365。
- 【8】任鸿隽“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原载《独立评论》第 3 号，1932 年 6 月，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0 年版），页 127-130。
- 【9】参见辛灏年《谁是新中国》（纽约，蓝天出版社 1999 年版）一书的有关观点。
- 【10】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页 184。
- 【11】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6。
- 【12】摘自建国后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 1949 年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上的“开幕词”，见《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页 683。
- 【13】列宁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明确谈到：“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见《列宁选集》（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卷，页 744。
- 【14】参见《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页 421。
- 【15】同上，页 420。
- 【16】“三个代表”的标准表述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见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4。
- 【17】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页 571。
- 【18】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3。
- 【19】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编《社会力量办学政策法规选编》，页 324。
- 【20】同上，页 345。
- 【21】同上。页 346。
- 【22】见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
- 【23】见《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页 421。
- 【24】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基层联络处的文章“北京市社会力量举办学校建立党组织已达 94%”，载《民办教育参考》2001 年第 4 期。
- 【25】见《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页 422。
- 【26】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及实施工作的意见”，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编《社会力量办学政策法规选编》，页 76。
- 【27】见《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页 425。
- 【28】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页 205。

【29】马宇平、黄裕冲编《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 年国情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页 838。

（本文作于 2002 年 10 月，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学术文库”网站）

从高中政治教材编写看“党化教育”

高中“政治教育”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党化教育的重镇。2004 年 3 月 2 日，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根据这个标准，新设计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将与高中其他学科一道，于 2004 年秋季起在部分省（市、区）进行实验。高中其他 15 门学科的课程标准已于 2003 年由教育部颁发，政治课的课程标准是颁布最晚的一个。

出于偶然，笔者于 2004 年 2—5 月受邀参与了由一家教育出版社组织的新教材编写工作，从中了解到高中政治课“课标”修订的某些情形。据我所知，这个“课标”从起草到最后定稿，前后共有 13 稿之多。前边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呈现出开放的姿态并体现在若干课程的设计中，但最后定稿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党化教育的成分又大大增加了。比较这些不同文本，将有助于了解威权主义条件下中共党化教育面临的困境和实施过程的某些新特点。此外，参与教材编写使我有幸结识了一批同行，并在第一现场观察他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种种心态。如实记录这种心态，从威权主义知识社会学的材料积累和学科建构角度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 文本比较

我手头有“课标”的两个不同文本，一个是 2003 年 12 月推出的“征求意见稿”（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一位官员证实，这个稿应该是征求意见稿中的第八稿或第九稿），再一个就是 2004 年 3 月正式公布的最后定稿。这两个文本都由“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和“实施建议”4 个部分构成。

“前言”部分分别论述“课程性质”、“课程的基本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关于“课程性质”，两个文本的文字是这样的：

征求意见稿	最后定稿
<p>本课程是一门对普通高中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p> <p>思想政治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主要内容；引导学生在课堂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p>	<p>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基本内容，引导学生紧密结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经历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p>

方法，提高参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弘扬民族精神，扩展国际视野，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的基础。	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
---	---

这当然还是些党化教育的老套子。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中的“扩展国际视野”一说在最后定稿中不见了。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个删除的确切含义何在。

两个“课标”文本对“课程的基本理念”的表述如下：

征求意见稿	最后定稿
1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育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相统一。 2 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与鼓励学生自主成长相结合。 3 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 4 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	1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 2 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 3 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 4 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 5 建立促进发展的课程评价机制。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第一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育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相统一”在最后定稿中变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而第二条“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与鼓励学生自主成长相结合”最终变成了“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在中国一党专制的威权主义条件下，语言运用（特别是在正式文件中的语言运用）早已成了一门艺术。把“坚持”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相提并论，“适应”可以被解读为对“坚持”的静悄悄的修正；而把“坚持”和“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把握”往往变成对“坚持”的变相辩护。第二条修改的要害则是删去了“鼓励学生自主成长”这个令人振奋的提法，代之以一个老掉牙的陈旧命题。

下面，我们着重讨论一下“课程设计思路”，这个部分在征求意见稿中本来蕴含了极有价值的改革空间，却被最终定稿“枪毙”了其中的最辉煌者。

先来看看新“课标”中课程设计的积极方面。与以往高中政治课安排不同的是，新推出的课程设计采取模块建构的形式，全部课程分为4个必修模块、6个选修模块，学科范围明显扩大（原来的高中政治课只有必修课，没有选修课）。模块内容相对独立，模块之间不存在前后承接的逻辑顺序（据教育部基教司的有关官员介绍，这种模块安排意味着新教材强调学生的生活逻辑，而不再强调学科体系和学科的知识逻辑，以与大学教育相区别）。教学课时也比过去有所压缩，每个模块36学时，2学分。这样，就必修课而言，总学时减至144，

而原来执行的高中“课标”政治课总学时是 156。

在征求意见稿中，必修课和选修课各科的名称分别是：

必修课程

思想政治 1 (经济生活)	思想政治 2 (政治生活)	思想政治 3 (文化生活)	思想政治 4 (生活与哲学)
------------------	------------------	------------------	-------------------

选修课程

走近经济学	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	思维与创新	生活与法	现代社会与治理	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
-------	---------------	-------	------	---------	-----------------

必修课的 4 个模块这里不论（因为不管如何强调“生活逻辑”，一党专制的主旋律是含糊不得的），令人感兴趣的是 6 个选修模块。这 6 门课中，除了最后一门代表了典型的党文化外（据说这门课是为中学生里面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们设计的），其余 5 门课为真正的知识传授和人文教养的培养提供了宝贵空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走近经济学”和“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两门课。我们来看一看在征求意见稿中，这两门课的教学内容是如何规定的：

征求意见稿中“走近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安排

1 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的经济学

1.1 简述斯密的生平及学术经历，阐释他提出“看不见的手”和“国家守夜人”作用的思想。

1.2 了解李嘉图成长为经济学家的经历，概述其有关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理论。

1.3 简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主要过程，认识其阐明“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

1.4 讲述恩格斯与马克思的革命生涯和友谊，理解《资本论》的问世是他们共同心血的结晶。

2 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的经济学

2.5 简述马歇尔的经济学说标志着传统经济学的终结。

2.6 列举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史料，印证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

2.7 讲述“罗斯福新政”在经济活动方面的成功事例。

2.8 解释“凯恩斯革命”的涵义，知道凯恩斯经济学说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始。

3 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

3.9 分析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提出“马克思的降世”，揭示他们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原因。

3.10 评议弗里德曼与凯恩斯经济学的交锋，说明他的学术观点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

3.11 解释加尔布雷斯为什么享有“畅销书作者”的声誉。

3.12 概述阿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4 风行于当今时代的经济学

4.13 评述萨缪尔逊的《经济学》风靡世界半个世纪之久的原因。

4.14 结合诺思的学术经历，概述他研究的两个“基本经济学原理”

4.15 评析卢卡斯对经济学的看法。

4.16 了解斯蒂格里茨的学术和实践经历，概述他的主要观点在经济学原理上的革命意义。

征求意见稿中“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的教学内容安排

- 1 形式迥异的国家和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
 - 1.1 比较民主共和制、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制的区别，说明政体与国体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明确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 1.2 比较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区别，理解国家形式既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又包括国家结构形式。
 - 1.3 列举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组织迅猛发展的资料，归纳国际组织的不同类型，说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 2 英国：“君主立宪制”与“议会之母”
 - 2.4 简述英国议会被称为“议会之母”的缘由，描绘英王在国家生活中的表现，明确英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 2.5 描述英国区域政权的组织状况，说明英国是特殊的单一制国家。
 - 2.6 分析英国政党竞选的实例，归纳英国内阁的构成及主要职权，说明英国责任内阁的作用。
- 3 美国：“联邦制”与“三权分立”
 - 3.7 简述美国总统的职权，解释美国被认为“开创了总统制先河”的缘由。
 - 3.8 解析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归纳美国联邦制的特点。
 - 3.9 简述美国国会的构成和职权，解析美国政府、议会、法院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典型国家。
 - 3.10 讲述“驴象之争”的典故，结合实例，概括美国两党制的特点和问题。
- 4 法国：独特的“半总统制”
 - 4.11 解析法国总统的职权及其与内阁的关系，比较法国总统制与美国总统制的异同。
 - 4.12 简述法国议会的构成、职权，说明其与英国议会的区别，探讨法国议会的作用。
 - 4.13 了解法国党派现状，分析法国多党制的作用与问题。
- 5 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
 - 5.14 归纳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料，评述联合国主要机构的职权和作用，表明联合国是当前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
 - 5.15 引述联合国宪章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规定，列举联合国的活动资料，说明联合国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 5.16 解析世界贸易组织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缘由，说明世贸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角色和作用。
- 6 欧洲联盟：显现世界多极化趋势的重要角色
 - 6.17 归纳文化、历史和地域等因素，理解欧盟形成和发展的条件。
 - 6.18 概述欧元、欧洲议会的诞生，以及欧洲联盟有关机构的设置，解析欧洲联盟的性质，探讨其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凡了解高中阶段中共党化教育以往历史和教学内容的人，看了这样两个新课程模块的安排，都会有为之一振的感觉。1949 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不要说中学生，就是大学生也被

长期剥夺了正面、系统了解西方政治制度和经济主张的机会，社会处于极度封闭的状态。事实上，这种封闭和信息、知识封锁，正是毛泽东与农业乌托邦幻想相结合的极权主义政治得以肆虐一时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后，人们有了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在正式的学校教育中，国际社会的主流文明及其建构原则却一直未能纳入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公共教育部分（在中国，这个部分被称之为“政治课”，其实，它的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公民教育课”）的教学视野，这显然是威权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之一。可以说，这次把“走近经济学”和“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纳入高中“政治课”教学系列，是一个重大突破。虽然它们仍然是“选修课”，虽然在课程的具体设计和教学内容安排上仍存有某些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如“走近经济学”中关于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关于“马克思的降世”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等内容安排），虽然在新“课标”中，起草者还不敢忘记在这类课程模块的前头作些官样的声明（比如“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就作了这样的声明：“从我国国情出发，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是我国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提倡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明确主张”），但新“课标”所要传达的内在意向仍然是十分清楚而明白的，那就是要使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公共“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要让千百万中国的中学生系统地了解国际社会主流文明的建构原则，从启蒙角度看，这是中国实现民主化和制度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其他几门课的“课标”也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同样精神。我想，大概正是基于这种共识，新“课标”的起草者才会干出这样一件漂亮事来。

然而，后来公布的最终定稿在这两门课的设计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走近经济学”中关于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介绍，除保留凯恩斯部分外，被全部删除，却用大量篇幅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内容，课程名称亦被改为并不十分贴切的“经济学常识”；“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也压缩了原征求意见稿的课程内容，加上了“民主集中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一章，课程名称则被改为“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为什么要这样改？教育部基教司的一位官员曾这样解释：部分专家认为“走近经济学”的内容太多，学生没有时间学，与大学有关教学亦有重复之处，现在的讲法容易形成“夹生饭”。其实，这个说法亦是亦否。作为选修课，学生和教师本来就有选择的自由，“多”与“少”并非没有取舍的空间；只要合理确定知识介绍的层次递进关系和方法原则，“夹生饭”问题完全可以避免。经济学模块作如是改变，显然还有未能明说的原因。至于变“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为“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内容上也作出重大调整的缘故，教育部的官员倒说的很直白、很干脆：“西方国家形式”删掉一部分，就是怕学生西方的东西学多了，会认为中国的制度不好。原来的征求意见稿体现国家意志不明确，经过部长办公会讨论，认为必须体现、加强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所以有了现在的更改。

原来如此！

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在最后定稿的政治课“课程性质”中，要删掉“扩展国际视野”一说了！

最后定稿的“经济学常识”与“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两门课不但在内容编排上，而且在叙述语言上，都有很微妙的变化。为了方便读者比较，也把最后定稿的这两个部分附列于下：

最终定稿“经济学常识”中的教学内容安排
<div>1. 古典经济学巨匠的理论遗产</div> <div>1.1 简述斯密所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阐释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div> <div>1.2 简述李嘉图有关国际贸易中“比较成本”的理论观点。</div> <div>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div> <div>2.3 简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主要过程，了解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div> <div>2.4 理解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意义。</div> <div>3. 走进现代市场经济</div> <div>3.5 运用“罗斯福新政”在经济活动方面的重要实例，解释“凯恩斯革命”的涵义。</div> <div>3.6 了解西方国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模式。</div> <div>4. 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初期探讨</div> <div>4.7 了解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阐释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有关论述。</div> <div>4.8 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践，理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主要观点。</div> <div>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div> <div>5.9 阐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创新及其意义。</div> <div>5.10 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div> <div>5.11 理解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div>

最终定稿“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中的教学内容安排

1. 各具特点的国家形式和国际组织
 - 1.1 比较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区别，说明政体与国体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理解国家管理形式的多样性。
 - 1.2 比较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区别，理解国家形式既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又包括国家结构形式。
 - 1.3 引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组织迅猛发展的资料，说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2. “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以英国和法国为例
 - 2.4 简述英国议会被称为“议会之母”的缘由，了解英王在国家生活中的角色，明确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性质。
 - 2.5 简述法国总统、内阁、议会的产生及其职权，比较法国民主共和制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异同。
3. “两党制”“联邦制”“三权分立”——以美国为例
 - 3.6 评述“驴象之争”的典故，结合实例，揭示美国两党制的实质。
 - 3.7 了解美国联邦制的特点。
 - 3.8 简述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典型国家，分析“三权分立”制的实质。
4. “民主集中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 4.9 归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理解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4.10 分析我国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的关系、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阐述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 4.11 比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特点，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
5. 日益重要的国际组织——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欧洲联盟为例
 - 5.12 列举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阐释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 5.13 评析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阐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
 - 5.14 解析世界贸易组织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缘由，举例说明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角色和作用。
 - 5.15 概述欧洲联盟的诞生和发展，解析欧洲联盟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总之，在最后定稿中，西方政治制度和国家组织的“性质”、“实质”一类又成了高中课堂上必须向学生灌输的东西，同时要让学生相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这样，才能体现中共一党专制的“国家意志”！

现在，让我们把视角重新拉回到对“课标”的整体比较。“课标”两个文本对政治课“课程目标”的不同界定，再一次证明了专制意识形态力量对改革意向的否定。

我们先来看看“课程目标”中的“总目标”定义：

“课程目标”中的“总目标”

征求意见稿	最后定稿
本课程以加强高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任务。帮助学生学习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经历实践探索的过程，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具备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应有的自主、自立、自强的能力和态度；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情感；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显然，在最后定稿中把党文化作为“总目标”的根本，与“征求意见稿”中淡化这类意识形态诉求形成明显反差。

与“总目标”相对应，“课标”把政治课的“分类目标”区分为“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3个部分。下面是第一部分的比较：

“课程目标”中的“分类目标”（“知识”部分）

征求意见稿	最后定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识。○ 了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常识。○ 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常识。○ 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理解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和民主生活的基本要求 and 规范。○ 把握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知道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理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意义。○ 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理解当代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获得正确选择人生发展道路的相关知识。

两个文本比较的结果同样是突出了党文化，对征求意见稿中后两条的修改、尤其是删掉“现代社会”这个用语特别显得意味深长。再看“分类目标”中的“能力”部分：

“课程目标”中的“分类目标”（“能力”部分）

征求意见稿	最后定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提高参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实践能力。 ○ 训练理论思维的能力，能够理性面对各种社会和人生问题。 ○ 具有辨识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能力。 ○ 为未来的创业需要，培养自主学习、选择、探究的能力。 ○ 发展采用多种方法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收集、筛选社会信息的能力。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提高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面对实际问题，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能力。 ○ 提高主动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 ○ 提高在社会生活中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能力。 ○ 培养为未来生活而自主学习、选择、探索的能力。 ○ 增强依法办事、依法律己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 发展采用多种方法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收集、筛选社会信息的能力。

除右栏第一条外，这个部分的比较尚未显出太大差异，叙述还算相对中性化。更大的反差出现在“分类目标”的第三部分：

“课程目标”中的“分类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部分）

征求意见稿	最后定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理解生命的内在价值，懂得生命的宝贵，珍惜生命和个人荣誉，维护人格尊严。 ○ 热爱生活，亲近知识，亲近他人，亲近自然，培养高尚、丰富的生活情趣。 ○ 对一切未知世界具有好奇心，尊重科学，培养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 ○ 在勤奋学习、认真做事中磨砺意志，调控情绪，增强自我接纳水平，形成正确的自我认同。 ○ 始终憧憬未来，对个人发展抱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祖国命运，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志向。 ○ 关注社会发展，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诚实守信，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法制观念，培养公民意识。 ○ 热爱集体，奉献社会，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倡导团结友善的精神。 ○ 乐于学习，尊重科学，追求真理，具有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

<p>有信心，对未来职业选择抱有恰当心态。</p> <p>○ 关注现代社会的变化，自觉遵循和维护社会秩序，积极思考、主动表达，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p> <p>○ 对祖国和人类社会进步抱有乐观态度，在尊重和理解各民族文化价值的同时，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感。</p>	<p>○ 热爱生活，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p> <p>○ 热爱和平，尊重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培养世界眼光。</p>
--	--

应该说，左边征求意见稿中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课程目标”的描述乃是现代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最为集中的体现，是“课标”文本中最为闪光的部分之一。而右栏则大多是了无新意的意识形态词句。不是说右边的内容都不对，而是说在专制主义语境中，这些表述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涵义。右边对左边内容的颠覆说明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事实，那就是专制主义力量仍然在阻止新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民主时代要求的人格精神的构建。

二 心态记录

由于笔者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所以，我把这次参与“政治课”新教材的编写，看作是一次现场观察威权主义条件下中国教育领域的众生相、体验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与中共党化教育的传统势力进行博弈的好机会。当然，就我个人而言，生平第一次参加中学教材（且还是高中“政治课”教材）的编写，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动机：一是希望为我们的中学生作点什么（我承接的是“走近经济学”部分内容的编撰，读者已经知道，这门课在征求意见稿中已经为“作点什么”创造了条件），再一个就是用编撰收入来支持我自己的学术研究。

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所接触到的编写队伍同仁、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以及我能理解并感同身受的“课标”起草专家们的一个共同心态，那就是“如何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既定约束条件”是我所在的出版编写队伍的一个公开使用的语句，大家对这个语句的所指都心照不宣。同仁们很清楚地意识到，“约束最强的课程，也是贯彻公民教育理念最困难的课程”，这里当然首先指必修课中的“政治生活”和选修课中的“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后者在最后定稿中被更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常识”，且被调整为选修课的第一模块），这类课程向来是中共党化教育最集中的体现者。其他课程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同一问题，没有哪一门课可以完全摆脱官方教条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工作显然具有过渡性，不可能彻底。但由我们做，也可能做得好一些，希望这套教材能有更多的东西保存下去，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是大部分同仁具有的共识。

说到这里，也许需要交待一些背景情况。在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使用的教材的“审定权”，一向是由官方垄断的。教育部有一个“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司各类中小学教材的审定工作。教材的组织编写和出版，则长期由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垄断。这次新“课标”的推出，伴随着一个重要的改革，那就是允许有条件、有财力的出版社参与新

教材的编写，最终由教育部审定的教材也不再局限于一套。这就是说，将会出现一个由不同出版社提供的多种教材同时出现在市场上供学校和学生挑选的局面。虽然这些教材依据的是同一个“课标”，但在教材的呈现形式上却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为教材的编写者和出版者提供了一个参与竞争、大显身手的机会。应该说，这种安排本来体现了中国教材编写和出版领域的进步。就“政治课”的编写而言，这次就有全国 10 余家出版社参与了进来。

再来看看我所在的这支教材编写队伍的情况。由于我们这支队伍是由外地一家出版社组织的，编写队伍成员由北京的和外地的两部分人组成，大多是高等院校的教师（来自科研机构的只我一个），年龄最大的 55 岁，最小的约 30 岁，年轻人基本都有博士学位，中年以上大多有教授、副教授职称。为什么要请大学教师来编写中学教材？出版社的领导讲得好：就是希望本套教材能推陈出新，自成一体，不再照搬过去教材的思路。出版社方面特别强调，新教材要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社会探究能力的培养，形式不必统一，以为学生创造主动的学习空间为标准。在教材的呈现形式上，出版社和编写组成员也动了不少脑筋，比如，采用主、副文搭配结构，主文要“科学、严谨”，副文要“生动、活泼”，课后练习的设计要有深度空间，案例要注意经典性和贴切性，等等。总之，大家确实希望能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把事情尽可能地做得“好一些”，尤其在仍以征求意见稿为标准从事编写时，同仁们的干劲更足，工作更努力。

但是，整个工作在进行中仍然遇到了诸多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大家很快发现，有些属于“约束底线”的东西是无法突破的。比如，各门课（尤其是必修课）中都有一些体现“三个代表”之类党的意识形态的必讲的东西，或是有形无形中受其约束的东西。无论你想怎么淡化它，这种意识形态暴力事实上仍然存在。它对教材编写的约束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教材正文的阐释，还是课后练习的设计。比如，在“走近经济学”第 3 课介绍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后，我曾经设计了这样一个课后练习：

中央电视台 2004 年初报道：截止到 2003 年底，全国各用人单位累计拖欠民工工资 1000 亿（全国民工约 9400 万）。温家宝总理甚至亲自出面为民工讨要工钱。

组织一次社会调查（比如，到学校附近的建筑工地，了解民工的劳动和收入情况），看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我们理解现实生活有什么帮助。

这个练习的本意是提倡学生把课堂学到的知识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学会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周围的社会。但是，用剩余价值理论直接比照“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这在过去的政治课乃至任何其他课程的教材中，都是从来没有过的。更何况这道题包含着这样一个潜台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至少还承认资本家要付给工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有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劳工拿不到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引证的材料出处也有足够的权威性，但我很清楚，这样一个课后练习几乎没有希望通过第一道“关卡”——这套教材自己的编辑班子的审查。果不其然，在初稿完成“送审”后，一位受托参与审稿任务的中学政治课教师就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此类练习内容“与国家意志相悖”！显然，人们很清楚，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的国度，是不允许把马克思主义的枪口对准自己的！

写作者、审查者、出版者自己充当自己作品的“检察官”，这是中共自建立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政权来中国文人的常态。威权主义并没有改变这个现实，只是使它变得更为精巧。在这些场合，我们不但可以领略到仍然实实在在存在且发挥作用的专制主义的制度性钳制力量，而且可以体验到由于这种强制所产生的心灵奴役。事实上，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约束底线”的客观和主观基础。

编撰工作遇到的第二个障碍是，教材审查体制的官本位特征往往强化了其意识形态功能，并使教材改革的努力付之东流。

读者已经看到高中政治课新“课标”的最后定稿是如何取代了本来蕴含着极大改革空间的征求意见稿。这个决定是由教育部的部长办公会最后作出的。据教育部基教司的有关官员讲（因为这位官员是应我们这套书的主编之邀向编写组成员们介绍课标更动情况时讲的，信息当属真实）：部长办公会强调，高中政治课绝不是一门单纯的知识课，而是承担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教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不能与中央精神出现任何不一致的地方，这也是“课标”最终稿有较大改动的理由。原来的“课标”体现党的意识形态要求比较隐晦，出发点是想缓和学生的逆反情绪，部长办公会讨论结果，认为这种作法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最终稿在意识形态表述上更加鲜明，用表态的方式说明课程的性质。学术中无定论的、或与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肯定不能进教材。教材审查的三条标准（是否超纲漏纲、是否适合于教学、知识点布局是否合理），首先注重的是第一条标准。部里特别强调，政治课对于一些基本的政治观点就是要灌输，这是“政治模块”各门课程的重要特点。

显然，最后定稿对征求意见稿的否定，是教育部长官意志的结果。笔者不清楚这种否定的背后是否还有更高层的意见在发挥作用（据知情人讲，六四后这么多年来，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课内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批准。但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次高中政治课“课标”的定稿有更高层意见的参与）。有人问“课标起草专家组是否换了人，由另外一组专家重新起草的政治课课标？”回答是“并没有换人，还是原来那批专家写的，他们必须按照部里的意见进行修改。”我们可以推想这些可怜的专家是怎样硬着头皮完成这件“任务”的！

在如今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运作体制中，有一个很奇特、又似乎很正常的现象，那就是执行者往往既是专制旨意的消极服从者，又是使专制旨意得以贯彻的积极使动者。“消极服从”意味着执行者内心对其执行使命的不一定认同，就如同课标起草组的专家们在面对教育部的要求所呈现的心理特征那样；“积极使动”则是从其客观效果言，不管课标起草组的专家们是否情愿，最后定稿毕竟是通过他们的手修改出来的。其实，又何止课标组的专家，教育部的官员也同样如是。给我们“传达”教育部“精神”的那位官员一方面在大谈“课标”修改的必要，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加上的东西不得不进去”，似乎颇有些无可奈何，他甚至谈到“作教材，怎么不让人家抓住辫子，是个技巧”，其内心所指，也已经十分清楚了！

这种在权力面前双重心理、双重人格的存在是当今中国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典型现象。在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时代，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专制主义与乌托邦的联姻使普通人对“革命理想”的认同具有真诚感；未来的、真正的民主社会，也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人们已没有必要屈从于强权的压力。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过渡性。“消极服从”可以发展为一种反抗的艺术，“积极使动”也可能堕落为专制体制的自觉帮凶。这就看每个人所具有的“道行”了！

再来看看我们这个编写班子。最终定稿出台后，大家的反应可以用“非常强烈”4个字来形容。至少就大部分北京同仁来说，都认为这件事情再作下去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大家曾坐在一起认真讨论了“何去何从”的问题，但最后的意见仍归结为继续与出版社合作，把这套书编完。毕竟，教材主编和各模块的分主编与出版社之间是有合同的，中途“撂挑子”意味着合同违约，这不但会伤害与出版社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相互信任关系，也会给所有人带来经济上的损失。

谈到“经济”和“收入”问题，自然把话题引入编撰工作遇到的第三个障碍，那就是在当今威权主义条件下从事此类教材的编写，势必使编写者经历利益驱动和学术良知之间的内在紧张。

出版教材能赚大钱，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学生，一旦某家出版社的教材样稿被教育部看中、批准，就将意味着出版社将会财源滚滚。正因为如此，在聘请有名望、高水平的主编，组织高水准的教材编写队伍方面，各“竞标”出版社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其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付给高报酬。以我们这支编写队伍为例，各课程模块的分主编只要拿出合格的样稿，就可以获得出版社方面数万元人民币的报酬；如果样稿通过了教育部的审定，被定为正式教材，则报酬还要翻几翻。对于如今这个灯红酒绿、到处都充斥着“买车”、“购房子”热流的城市消费社会来讲，金钱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家庭的诱惑力都不可小觑。当然，如果我们是凭本事经商，凭能力挣钱，买座金山也无可指责——只要这个钱来得正当。就编教材来说，大概编写外语或数理化之类教材的老师们也不会有什么额外的精神压力，因为他们编写的是地地道道的科学。唯独“政治课”不同。在一党专制的威权主义社会条件下，“政治课”的许多内容并不是科学，而是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是为论证当权者的权力合法性服务的。这一点，我相信参与此类教材编写的人心里都清楚。那么为什么还要作？除了上文分析过的“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做得好一些”这个值得肯定的动机外，利益驱动也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因素。然而，既想挣钱，又想坚持学术的纯洁和公正，坚持对得起自己的社会良心，在编写“政治课”教材的实践中是很难协调一致的。凡是遇到两者发生冲突、或有可能发生冲突时，往往是后者要让位于前者。

也举个小例子：读者已经知道，选修课模块之一“走近经济学”在最后定稿中变成了“经济学常识”，其中有一课谈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为避免“染指”这类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课程部分，我本来已经请别人代劳这一课和下面几课的撰写，但写出来的东西问题很多，仍需要修改。在对毛泽东的“探索”的叙述中，我坚持要把20世纪60年代毛对商品生产问题的理解和失误写入教材，并作为单独一个小节来写（当然，这是和“课标”的要求有出入的，因为“课标”只要求阐述毛泽东50年代对“十大关系”的讨论，而在我看，这显然有“替尊者讳”之嫌，偏离了市场经济这个主题。更何况，没有毛泽东的失败，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一部中学教材应该把这个逻辑说清楚）。但是，在初稿审定时，我的意见和审稿小组的意见发生了冲突。审稿小组认为没有必要大谈毛泽东的失误，这样作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可能招致部里评审时对整个教材的否定。后来，在我的坚持下，双方作了些妥协：保留相关内容，但不再作为单独的一节，以减少其冲击力。同仁们的意见很明确：如果因为这样一个环节教材被“枪毙”，受损失的将不止是一、两个人，而是整个出版社和教材编写班子！

我相信，其他各门课程的编写一定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这既说明了在这样一个工作团体中利益关系的复杂（编写组每个成员之间以及和出版社之间都有利益上的相关性），也说明了这种整体性的利益关系和学术良知、社会责任感之间可能、乃至势必存在的张力性质。这是一个可悲的现实。它深刻地体现出威权主义政治控制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和结构上的冲突。

我们甚至可以由此联想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威权主义借助金钱的力量使知识界就范。当然，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大学，在科研机构，只要承担了弘扬“主旋律”的“课题”，就有了大把大把的经费。不少知识分子的堕落就是由此发生的。这个问题促使我们对人性、对威权主义条件下人性的扭曲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主题。我想说的其实是这样一点：不管是政治课教材编写中出现的利益与良知的冲突，还是权力利用利益诱饵对知识界的围捕，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那就是金钱在当今的威权主义社会

里发挥着重要的、既通过经济领域本身又溢出纯经济领域以外的政治功能。研究当代社会变迁的学者对此不可不察。

三 结 论

本文旨在记录笔者的一段经历。就当代中共党化教育的演变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之进行的博弈而言，这段经历所反映的只是一个个案。可以断言：中共党化教育的解构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是一个互动的、互为条件的过程。“解构”的真正前提是中共党化教育“底线”的突破，而这又有赖于民主化实质意义上的进展。当然，另一方面同样成立：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推进必须建立在最广大的中国公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而这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在这个艰难而曲折的行进过程中，知识分子将会有所作为，他们的灵魂也将不断受到涤荡而渐次升华。

（最后给读者提供一条信息：据知情人讲，2004 年夏北京的国家教育部在审定高中政治课教材时，只通过了一家出版社的送审稿，包括我所参与的那家出版社在内的其余 10 多家出版社全部名落孙山，造成经济上的大赔本。更为离奇的是，被通过的只是必修课的 4 门教材，6 门选修课教材的审定不知什么原因被搁置。新教材将于 2004 年 9 月起在 4 个省进行实验，2007 年全部推开）

（本文作于 2004 年 8 月底 - 9 月初，首刊于《当代中国研究》2005 年第 2 期）

为青年女教师卢雪松叫好

因为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告发，继而遭学校停课处罚。——这就是前不久发生在吉林艺术学院青年女教师卢雪松身上的事情。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一方面对卢雪松遭到的不公正感到气愤，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高校还有卢雪松这样的青年教师而庆幸，而高兴。

卢雪松在学校停了她的课后写给校领导的信中说：

“我 1996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随即来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我只是一个企盼社会进步、政策开明、文化繁荣的年轻公民，我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在工作岗位上，我深深感到学生们创造力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与人文关怀的缺位。我能够理解，在一个填鸭与灌输的教育传统中，在一个迷恋整齐划一、恐惧活泼生动的文化环境中，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与发展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我所能做的，就只有承担启蒙的责任，锻炼清醒的心智，激发创造的激情。我相信，一个优秀的艺术工作者必是一个真实的人，清醒的人，坚定的人；一个对未来有理想、对现实有反省、对社会有责任的人。

我所承担的《中国电影史》和《传播学》课程，对教学内容，授课方式和辅助手段都作了精心安排。我认为我的教学实践应该会有益于学生们完整地认知百年文化艺术的兴衰史，清醒地洞察当下文化环境的幽微，明确一个艺术工作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我认为，对于真实的历史与现实，要敢于面对，这是良知；要作出自己独到的判断和抉择，这是智慧。因此，我在课堂上充分尊重同学们的个人观点，只要言之有据，持之成理，我都给予肯定评价。因为我相信教育不是灌输和愚弄，而是师生共同的探索，共同的成长。经过数年实践，我亲身见证了同学们能力的提升、思维的解放和性灵的绽放。对我的努力初见成效，我很欣慰。

我认为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更多缘自于虚伪、麻木和冷漠，这与百年来的文化异变有关。我们更愿意说那些我们内心并不相信的话，通过“表态”换取安全；我们更愿意在别人的苦难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因为否则就可能轮到自己；我们不信任别人，别人常常意味着一个庞大而无形的巨网的一个网结；我们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能够有勇气和智慧听从内心召唤，堂堂正正做人。这也应该是一个七八千年流光溢彩的堂堂艺术大国为什么百年来艺术萎顿的原因。一个艺术人，虚伪、麻木和冷漠怎能不损害他的真性情？进一步说，那面具背后的恐惧与仇恨怎能不损害他的真性情？我不能忍受这种状态在自己身上继续，更不能忍受再这样伤害我的学生们。我要尽自己的努力，和我的学生们一道，探索回归真实之路。这就是我的艺术自救的种种努力的真实动因。”

这些文字出自一位年轻的大学教师之口，着实令人感动。记得前些时参加一个大学人文教育的座谈会，与会同仁多对今日中国大学教育的人文缺失痛心疾首。会上有人谈到在学校里给学生放林昭的纪录片，引起学生的震动。但也有不少人对这样作究竟能有多大的社会结果表示怀疑。毕竟，在今天党化教育和党文化的氛围里，很多教师不敢真的和学生敞开心扉，用自由的心灵去和学生交流、对话。像胡杰拍的《寻找林昭的灵魂》这类纪录片，揭开了党

专制历史上十分惨痛的一页，这是今天的当政者非常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书店、音像店里买不到此类音像制品，电视台更不可能播出它们。这就是大家担心的理由：靠不多几个人的卑微努力，能扭转几十年专制教育造成的心理-思维定式和既定格局么？

然而，这正是卢雪松案例所要回答的东西：卢老师以她勇敢的行动告诉我们，历史是可以通过每一个人出自良知的行为加以改变的。个人的存在和力量虽然有限，但当每一个个体都能听从内心的召唤，拿出勇气和智慧，堂堂正正做人，它就能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就能对改变专制主义的现实产生影响。卢老师自称“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其实，在专制主义社会中，“政治”是无所不在的。一个人要堂堂正正地生活、做人，就不可能不与以说假话为准则的专制主义“政治”发生矛盾。我们捍卫自身良知的行为，就是同专制主义作斗争的锲而不舍的“政治”行为。

相信在我们的大学里，仍然保留着做人的真性情、为师的真道德的不会止于一小部分人。我就曾听说北京某所高校的一位讲政治课的教师，在“毛泽东思想概论”这门课的“课件”里加进了许多介绍现代民主宪政知识的内容。我还亲眼看到了这些课件。这位老师也是在用自己一颗深藏的自由跳动的心面对自己的学生啊！不过据我了解，这位老教师已年过5旬。卢老师则要年轻得多。如果我们有更多年轻一代的高校教师、中学教师自觉冲破党文化的层层蛛网，作自己良心的守护者，勇敢承担起启蒙和人类自由精神传承的使命，则我们的社会就会进步得更快一些，更坚实一些。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更加有希望。

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还想就卢雪松事件中的另外两个方面——告密者和惩罚者——再罗嗦两句。在任何社会中，告密行为都是可耻的，因为它超越了人类伦理的底线。我们这个社会曾鼓励告密，风行告密。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受指责的，与其说是那位告密的学生，不如说是使告密成为可能的制度。至于惩罚者，在这个案例中，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不过是在任何其他场合都可以看到的对被认为是违背了“党”的“旨意”的行为的组织惩罚而已（这种组织惩罚是通过行政方式实施的）。这个事实意味着，要杜绝这类非法惩罚，归根结底要改变我们这个现行的不合理的体制。

（作于2005年8月3日，首刊于《真话文论周刊》网站）

中国私立大学的过去与未来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卓达大学所作的学术讲演 时间：2004 年 11 月 10 日）

很高兴有机会与同学们谈谈私立大学这个话题。卓达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在座的同学都是私立大学的学生。今天到会的大概有四、五百人，可见同学们关心这个话题。我本人也参与过创办私立高校，也曾在卓达大学工作过，对私立大学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今天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大学？什么是私立大学？第二，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历史。第三，目前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对未来的展望。

首先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大学就是让人接受知识的地方。这个回答固然不错。但学习知识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就业？也对，也不对。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贫困地区，家长含辛茹苦供同学们来读书，当然希望今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的前程。但仅仅这样想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换一个角度，从社会、而不是仅仅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从社会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大学又是干什么的呢？大学在社会中的功能是什么呢？1998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巴黎召开了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为了 21 世纪：视野与行动》和《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这两个文件关于“高等教育的使命与功能”的界定是这样的：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乃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具体来说，高等教育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的公民，他们能融合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要通过学习不断适应当前与未来社会所需的课程，使他们获得适当的职业资格，包括高水准的知识与能力…”。大会还提出高等教育应当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功能与道德作用。高等学校及其师生“在尊重道德规范和科学知识的严肃性的同时，应当能够完全独立与负责地发挥其基本职能，对伦理、文化、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行使一种智慧权威。…这种社会所需要的权威，当有助于社会思考、理解与行动。”为了做到这一点，高等学校必须“无条件地享有学术独立与自由，作为整体的权利与义务，要充分体现对社会的全面负责。”应当“通过其智慧才能和道德威望，积极地维护和传播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教科文章中所载录的和平、公正、自由、平等和团结等观念。”“通过经常分析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倾向，加强其预测与批评功能，从而构成一个预测、预警与防范的空间。”

简单地说，大学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公民社会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顾名思义，公民社会首先是指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公民不同于臣民。臣民在主子面前没有说话的权利；公民则是自由的。自由的公民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公共领域”，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就他们关心的各种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政。这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最直白的解释。当然，自由并非抽象的存在，历史永远是具体的。使公民作为公民集合在一起的前提是他们已经被承认具有独立的个人存在的资格，而这是一系列政治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公民还要有必要的经济自立能力，如果一个人连肚子还填不饱，他们似乎很难对其它事情发生兴趣。以上说的是公民自由要以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为前提；反过来说，高质

量的公民自由又会促进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从结构上讲，现代文明社会由三个部分组成：以宪政民主为特征的民主政治结构，诉诸市场原则的市场经济结构，体现公民社会原则的社会整合结构。我把一个国家走向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过程称为制度的现代化。大学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制度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前些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制度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公民社会重镇的大学”。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但标题被改为“大学的深层温度”。文章从结构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大学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政治永远与权力相关，而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现代民主政治关于权力制衡的设计，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把这些丑恶的东西减小到最低限度。然而，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今天民主制度相对发达、成熟的国家，官场丑闻仍不绝于耳；至于那些有着更长封建历史、更沉重的专制传统包袱的国家，滥用权力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其次，如果说政治领域中对利益的追逐还要采取相对迂回的形式（统治者毕竟没有忘记他们理论上仍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末在经济领域中，人们对金钱的赤裸裸的崇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之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对“剩余价值”的追求理解为是资本存在的全部根据；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则把“利润最大化”看作厂商经济行为的自然前设。诚然，现代社会巨大的物质财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没有市场经济，人类可能仍然沉醉于中世纪小农经济田园牧歌般的酣梦里。然而，这个觉醒的代价又是沉重的。弥漫于世纪末的对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惊恐就是上述代价最生动的写照。贪婪，这个被制度化的市场机制尽情释放出来的经济推动之神，如今正作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负面存在，日益显示其本来面目。

那末，人类能否战胜贪婪？仅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自身能量恐怕不够。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看，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运作都是“以成功为指向”的“战略行为”，属于“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范畴，说得通俗些就是“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评价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这里所遵循的只是强者的逻辑。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固然对“强者逻辑”的制约，但不能指望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的现代化如果只有这两个维度，其结果显然将是一个跛脚的、残缺不全的现代化，甚至是一个不断产生罪恶的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一个平衡机制，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制度设施。这就是公民社会。它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如果说，政治行为中对权力的追逐、经济行为中对金钱的追逐很有可能象两匹烈马，把制度现代化的战车引入歧途，那末公民社会就应该象一条强有力的缰绳，以社会良知的名义，矫正制度现代化战车的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适合人性发展的目标。

这就是公民社会独有的功能。说大学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就是说大学在发挥公民社会的上述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如果同学们理解了这一点，那么就会懂得，我们上大学并不是仅仅为了今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大学也不能只教给学生谋生的本领。对同学们来说，知识、技能的学习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成人”，知道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并具备承担这种责任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远大志向，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口不谋而谋天下”的宽广胸怀与气魄。这样，不管学生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他（她）都不会忘记作为人、作为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要求；他（她）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才能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

“大学”如是，那么什么是“私立大学”？所谓“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它们的区分根据只是办学经费来源的不同，公立大学由政府财政拨款，私立大学办学的经费则来自企业的投入或公民、社会组织的捐助、支持，比如卓达大学就是由卓达集团出资办的学校。在功能和大学对社会应该发挥的作用方面，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没有任何区别。事实上，有些私立大学在成为“公民社会重镇”、成为一个民族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中坚力量方面，干得极为出色。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与日本庆应大学被并称为日本私学的“双雄”。早大的前身是成立于1882年（明治15年）的东京专门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始人叫大隈重信，前一年在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大藏大臣的职位。为了积蓄力量，实现自由民权的政治理想，大隈和自己的追随者决心创办一所“学问独立的学校”。办学开始时的艰难可以想象。东京专门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只有10个人。在开学典礼上，学校创办人说：国家的独立基于其国民的独立；国民的独立基于其精神的独立；而精神的独立则有赖于学问的独立。欲使其国独立者必先使学问独立。为了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早稻田大学有意识地把专门为日本培养高级官僚的东京帝国大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努力培养日本社会中官僚以外的各界领导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政治、舆论、文化以及经济方面，早大培养的人才灿若星河，忠实地实践了建校初期的思想。今天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美国前20位最优秀的大学中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大概只有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等不多的几所是公立。这充分说明私立大学在创造人类文明、领时代风气之先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史。令我们感到骄傲的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虽然并不长，但它的起点很高。经光绪皇帝奏准，由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的现代大学，建于1895年。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则是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1904年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清华大学最初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11年设立的；而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其前身则是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不要看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比欧洲晚了数百年，在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把握上，对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追求上，中国第一代现代大学事业的开拓者却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勇气与胆略。就私立高等教育而言，当时最著名的私立大学除南开大学外，还有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张伯苓办南开、陈嘉庚创厦大，都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从结构上看，在20世纪上半叶那段并不寻常的年代，是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三家联手，共同推进了中国年轻的高等教育事业；在弘扬现代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方面，中国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让我们来看这样几组反映那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统计数字：192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主要分布情况是，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7所，私立大学13所，教会大学17所；1935年，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53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51所；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公立大学的数字为39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27所。可见，这是一个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格局，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平分秋色，携手并进，这样一个局面是给人以鼓舞的、令人难忘的，虽然好景不长，毕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制度现代化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私立大学经历了一段从被迫停办、到恢复、到再发展的曲折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改朝换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52年下半年起，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结构改造，史称“院系调整”。在这次调整中，私立大学全部被改成了公办。其中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保留原校名，但经过合并、扩充被改

为综合大学。而原南开的工学院与津沽大学的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大学。其他一些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也都作了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则被撤消校名，各系科并入同地区其它学校。至此，存在已近三分之一世纪的中国私立大学似乎已经“寿终正寝”，要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平线上彻底消失了。

中国私立大学确实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从 52 年算起，到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中国大地上重新出现民间办大学，其间整整空了 30 年！这几乎与中国现代私立高等教育的早期历史一样长！我们需要检讨的是：对于新中国的执政者而言，不能允许私立大学继续存在的根据究竟何在？

院系调整的需要显然只是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因为，假如执政者认为私立大学的存在仍有必要，则完全可以拿出基于此种认识的、不同的院校调整方案。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以为，对当代中国教育史上这个重大历史变故，应该从新政权的整体建国战略、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和执政者的意识形态需要等多方面更深入地挖掘之。

比如，从整体建国战略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一直把“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尽管从今天的眼光观之，那一代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似乎过于天真，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早期共产党人追求理想的真诚。《共同纲领》中鼓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战略的第一步。早在 1945 年，毛泽东就明确讲过，新民主主义只是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共产党人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果然，从 1953 年中共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私有制的革命一浪高过一浪、铺天盖地般袭来，私营企业不存在了，变成了“公私合营”，后来则干脆成了“国营”。能判断私人老板身份的只剩下那可怜巴巴的“定息”。个体农民不存在了，经过土改刚刚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中国农民被告之集体经济有更大的优越性，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几亿农民终于被引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城乡小手工业者不存在了，他们也被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员。还有城市商人、小摊贩…统统不存在了。那么，惟独私人办学能够存在？！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社会的大气候，正可谓：国内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当时不可逆转的真理，大学自然也要归于这个真理的大旗之下。

再如，还要考虑 50 年代的国际背景。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冷战局面，确曾给新中国执政者的选择以十分强大而又微妙的影响。平心而论，虽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霸主，美国则代表着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但作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却远谈不上愉快。毛泽东建国后首次出访苏联的失败，说明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宿怨与现实利益考量对双方都是一个远较意识形态重要的砝码。然而，恰在此时发生的朝鲜战争改变了整个国际关系的形势，美国开始奉行对华“遏制”战略，迫使中国人更紧密地向苏联人靠拢。越来越多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对各行各业的工作、建设进行指导，从五年计划的制定到工业产品的设计都打上了浓重的苏联烙印。教育也不例外。事实上，“院系调整”就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全面仿效苏联的产物。其结果，不但中国的私立大学不复存在了，而且，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中的许多优良传统，如大学自治（虽然是有限的）、通识教育等也被拦腰斩断，代之以高度计划的、专业划分与人才培养高度专门化了的苏式高等教育体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铲除私立大学是当政者意识形态的需要。毛泽东早就讲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这是中国帝王“文治武功”古典治国智慧的现代翻版，当然，也是赤裸裸的专制逻辑。那么，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不是培养“笔杆子”的地方吗？难道在那些旧教育遗留下来的大学里，在那些“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能培养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笔杆子”么？这显然是新政权既不

相信也不能容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执政者没有激进而高远的公有制社会发展目标，即便当时没有“一边倒”的、急迫的国际形势，中国私立大学也难逃在劫之厄运，因为这是一个专制社会的逻辑所要求的。中国国内出版物大多回避对这段历史的深入展开与评论，说穿了，原因即在于此。

总之，对中国私立大学的胜利围剿，完成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最终垄断。两次院系调整结束之后，根据1957年统计，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29所，分为综合大学、工业院校、师范院校、农林院校、医药卫生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艺术院校、语言院校、体育院校和少数民族院校等11类，分属高等教育部、中央各部委及地方政府管理。以后在中央与地方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上虽几经变动，但国家垄断高等教育的本质从未改变。

这种情形一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兴起，才有了变化。大家知道，1977年起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全国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制度。1977、1978、1979连续三年各大城市、各地考场人满为患，盛况空前。文革中被撤消、拆散的高等学校逐渐恢复（如中国人民大学），又新建了一批高等学校。到1981年全国高等学校达到704所，在校生总数127.9万人，比1976年翻了一番有余，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加了70%。如果使用更严格的历史哲学语言，我则要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乃是被延误了太长时间的中国现代化的制度重整。这将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一次由于积累了足够的能量而势必产生相当震撼的革命，它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根本性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改革设计者最初的预测。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就是最好的一例。曾几何时，人们还在争论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中国私有企业的迅猛发展，国有企业的“转制”，外国跨国公司的抢占滩头，转瞬之间就把那些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诡辩无情地抛在了一边。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提到议事日程。全国人代会的表决，出现了反对票，出现了不同声音；区县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已经进入操作程序；党政官员的腐败、权钱交易之风的蔓延迫使执政者自己都开始承认“权力监督”的必要。传媒也比过去大胆了，活泼了，不再是那么一副冷冰冰、木然呆滞的面孔…。总之，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百年来少有的、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有利于中国制度现代化重组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在呼唤自己的公民社会，正在呼唤与市场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应的社会整合机制的重塑，正在呼唤知识与法制的权威，也正在呼唤中国人曾经拥有、后来又被我们抛弃了的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理念！

这就是开放年代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需求。然而，开放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困境也恰恰表现在这里。我们看到，除了现存政治与意识形态框架对中国高等学校的制约之外，高等教育的计划经济模式与国家垄断体制严重束缚着中国大学事业的发展，而且和开放年代高等教育巨大的市场需求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刚才我们谈到，1981年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接近128万人，这已是截止到那个时候为止中国高校在校生的最大规模。同年中国总人口数是10亿零72万人，我们就打10亿。按照国际惯例，我们把18~22岁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段；再假设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0岁，这样，1981年处于18~22岁这个年龄组的青年人就达7100万（实际数字肯定比这个还要多，因为青年人口的比例高于中老年人口比例，而我们算的只是平均值，即该年龄组人口为全部人口的1/14）。128万比7100万，其结果，1981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8%，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80年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1%，其中，发达国家高达30.3%，发展中国家为5.1%，最不发达的国家则是1.9%。

平心而论，文革后从1978年开始，国家还是下大力气增加了教育方面的投入，但僧多粥少、缺米下锅的局面仍然无法根本改观。结果是苦了我们的同学们：年复一年，一拨又一拨的高中毕业生加入到高考残酷的竞争行列中，以争夺那有限的大学入门证，此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另一方面，公办高等教育又因其国家垄断的本性使然，势必存在机制呆板、

臃肿、有效资源潜力挖掘不够甚至资源闲置、造成实际办学成本上升、效益下降的问题。与所有的垄断行业、垄断部门一样，国办大学一旦缺乏来自同行的挑战，缺乏环境刺激与制度激励，其寻求自身变革的动力就会大幅度衰减。对中国的国办大学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与开放时代迅速变革中的社会一对照，这个问题就显得越加突出，越加不协调，从而越加凸显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迫切与需要。

其实，穷国办大教育，国家对高等教育大包大揽，从国际经验来看，本身就是愚蠢之举。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要使资源配置（这里，我们自然是讲教育资源）合理化，使总剩余（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最大化，从而使配置产生效率，则产品就应由最低成本的生产者提供，而由对产品评价最高的消费者消费。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一种不讲效率的经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也是一种不讲合理资源配置、不讲效率的教育。这对于一个大而且穷的国家来说，尤其显得滑稽。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让尽可能多的中国青年都有大学上？除了重整、挖掘公立大学的已有资源外，恢复、重建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传统显然是重要出路。还应该看到，重建中国私立大学不仅具有提供更多的就学机会这样的操作意义，而且有重大的价值和战略意义。从中国改革的全局看，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与箭在弦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正在召唤中国公民社会的重新启动；而重建中国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再度高扬现代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这面大旗。中国私立大学的重新崛起，应该有助于现代大学理念的弘扬。这听起来虽然显得有些理想化，但联想到中国私立高等教育曾经拥有的光荣传统，作出这样的期望并不过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重建取得很大成绩。从数量上看，截止到 1999 年，由“社会力量”举办的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达到 1240 所，在校生 118 万 4 千人。同期普通高等学校（也就是实施学历教育的学校）1071 所，在校生 408 万 5 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公立高校。实施“学历教育”的私立大学 1999 年有 37 家，如今这个数字大概已经有 100 多家（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

从生长模式和办学规模看，80 年代以来中国私立大学的重建大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从零起步，艰难成长”。如今很多赫赫有名的民办高校，比如河南黄河科技大学、西安翻译学院、北京中华社会大学等等，都可以归入这个行列。当年创办这些学校的开创者是一批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他们当中有老教师、退休的学校行政工作者、也有老干部。没有场地，没有教室，没有国家招生计划，国家没有一分钱的投入，在这样的条件下办一所大学谈何容易！《中国青年报》曾记载过黄河科技大学创办人胡大白的故事：1981 年冬天，时任郑州大学中文系讲师的胡大白和其他老师应学校安排外出讲学，晚上住在一间简陋的客房里。半夜，胡大白突然从胸闷气短中惊醒，她意识到是煤气中毒，挣扎着要去打开房门，不巧碰翻了一壶在炉子上烧的开水，这使她成立一个重度烧伤面积达 30% 以上的病人。胡大白不得不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年。三年过去后，民政部门给她送来了残疾证。几年的病榻生涯没有使胡大白心灰意冷。她看到，大量参加自学考试的人因无人辅导而在考场上败下阵来，所以决定举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1984 年，胡大白以 30 元起家，租教室，请老师，买教具，办起了自学考试辅导班。她的女儿和儿子还清楚地记得，那时跟着母亲满大街贴招生广告，每门课才收 10 元钱。1985 年 4 月，当河南省自学考试开考的 7 门课程公布成绩的时候，惊人的结果展示在人们面前：7 门课程前 3 名共 21 人，胡大白的学生占了 16 人；她辅导的 217 名学生，合格率达 90%。胡大白第一次成了新闻人物。没有几年的功夫，胡大白就将一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办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黄河科技大学。

这里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如今已改名叫北京城市学院）。我

与“海大”的创始人之一、“海大”常务副校长陈宝瑜教授有过一番长谈，据陈校长讲：当时开始筹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觉得在公办大学呆了20年，它的弊端看得太清楚了，统得过死，没有活力。所以才想自己办个民间学校，种块“试验田”，没料到搞起这么个学校如此之难！首先，为取得合法身份，我们过了三关：第一关是市委与市政府关，当时北京已有85所公立高校，凭什么还要办新校？我们就做了个调查，证明这些公办校的毕业生都往“上”走了，而海淀区乡镇企业、集体中小企业的在职职工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全体职工的0.4%！这样，社会需要填补毕业生“流向”的空白，成为我们说服市政府的理由。第二关就是钱，没有钱办什么大学？我们就讲：钱不用政府操心，我们能想办法。市府说：好，只要不向国家要钱，我们就同意你办。第三关是教育部，办学申请1983年2月份就递上去了，半年多没有音信，原来“上边”的担心是：民间办学还要有“学历”，根本没有相关的政策条文，更没有先例！没办法，我们与当时的市委常委、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同志商量，决定走“区办校助”的路子，就是以海淀区政府出面，三家重点大学（清华、北大、人大）帮助，这样教育部长何东昌才同意“试一试”，于1984年批准搞个“试验性的专科学院”，给了600名专科生指标。这就是迄今为止“海大”仍是“民办公助”办学格局的由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走彻底的民间办学是根本走不通的。但说是“民办公助”，国家并未给“海大”投一分钱。第一笔办学经费是从清华一个科研机构借的，5万块钱，因为它有独立账号。靠这笔钱，我们租了成府小学的几间房子，算是把学校架子撑了起来，那时，每个学生学费每学期50元钱，老师的讲课报酬每节课才2块钱。由于老师都是从清华、北大、人大请的，讲课质量很高，学校渐渐有了声誉。除学历教育外，我们也开始搞自考辅导，就这样靠自身滚动、积累、慢慢发展了起来，当然，海淀区政府对我们仍然支持很大，区政府曾实施“凡海淀区户口的学生到海大就读，不超过800人者，政府给每个学生每年补贴150元”的政策，虽然钱不多，表明了区政府支持办学的一份心意；到1989年，区政府又出面解决了学校的土地问题，使“海大”终于告别5年的租房生涯。尽管“海大”又经历过几次大的动荡（比如教育部承认学历，人事部却不给干部指标，弄的“海大”毕业生都成了临时工。学生很不满），但我们毕竟挺了过来。如今“海大”在校生规模一万多人，除主教学区以外，还有十几个教学点，已成为北京最大的民办高校之一。

听了陈校长的介绍，难免让人生出一番感慨。中国私立大学的复兴可谓艰难。好在90年代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有不少海外的实业家和国内企业的老板看好民办教育这个领域，投入巨资兴办新的私立大学。这样新时期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与80年代中国私立大学第一代创业者从零起步、艰难滚动、发展周期长、见效时间慢的渐进发展模式不同，华侨、港、澳、台的来大陆办学者和投资办学的国内民营企业一般都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在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可以做到高规格、高起点、一步到位。这样的学校可以举出很多，比如福建仰恩大学、河南升达大学、江苏硅湖大学、北京吉利大学等等。当然，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同学们正在就读的卓达大学。卓达大学是由卓达集团投资创办的大学。就时间而论，卓达集团迄今仍是一个很年轻的私营企业，1993年从房地产业开始起家，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兴建了卓达别墅区、面向知识分子与工薪阶层的廉价公寓书香园等，迅速崛起为河北省有影响的大型房地产企业集团。1999年夏，卓达集团做出一项重大决策：挥师北京，在中国的首都办一所真正的大学！这个大学不但要有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教学条件，更要有一流的办学思想。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先生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主张。比如，他提出“卓达大学的全部办学思想、办学宗旨、教育方针，概括起来十分简单：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社会”。我刚才来的时候听接我的老师介绍情况，我们卓达大学接收了一批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免费到这里读书，不但学费全免，而且每人每月还提供一定数量的生活补贴。在如今这样一个商业味道很浓的社会里，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

易的。杨卓舒先生提倡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是在自己什么都不缺的情况下想到天下所缺，在太平盛世想到危机将至，在绝大多数人认为已美满的生活中发现令人难以容忍的丑恶，同时，又能在废墟上看到希望，在一无所有时看到无限辉煌。理想主义引导我们的生活，代表着明天与未来。没有理想主义，生活将失去方向，社会将无以进步，人类将难以凝聚。没有理想主义，企业将没有远大目标，企业精神将难以建立，企业发展方向将无以与社会进步高度一致。自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大企业无不关心自己所处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这类企业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也自然把天下兴亡与自身盛衰相联系。”就办学而言，杨先生主张卓达大学要办人文学院。虽然他也意识到“办哲学人文学院，不好招生，学生毕业分配不出去。但卓达大学绝不能什么专业好招生、好就业，就办什么专业。卓达大学要让每个学生受到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熏陶和滋养，更为重要的是为整个卓达大学城注入一种文化，使大学城处处充溢着教化，充溢着哲学，充溢着人文关怀。”我记得在一次大学工作会议上，杨先生非常明确地指出：办哲学人文专业，根本是要再造灵魂。灵魂垮了，整个民族就垮了。从这种责任感出发，别人不办的，我们要大办、特办。这些思想我都很欣赏。我认为，在根本精神上，这些提法是与前边反复强调的大学理念、公民社会的原则理想完全一致的。虽然这些东西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而且，迄今为止，卓达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思想、以及体现这个宗旨的学生培养总体设计，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全方位地付诸实施，但能够提出这些想法就很可贵。它说明新一代私立大学的创立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历史目标 and 责任。

剩下的时间，让我们转入第三个话题，概略地谈一谈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目前还面临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中国私立大学的未来。

制约中国私立大学发展的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一个是对办学者而言的外部因素，一个是内部因素。前者涉及我们的宏观体制，后者主要指办学主体的内功。我们先来看前者。宏观体制包括许多东西，比如现存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和法规、政策体系。这些法规、政策是否适应当前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它们是促进了、还是阻碍着民间办学的发展？这需要认真进行梳理。我想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关于“国家承认学历”的问题。根据现行法规，中国私立大学分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两种，而迄今“国家承认学历”、纳入“计划内招生”的私立大学数量很少，绝大部分私立高校是实施“非学历”教育的。那么，作为一所学校，是实施“学历教育”还是实施“非学历教育”，到底有多大差别？这个差别又意味着什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前几年我还在一所民办高校担任执行院长时，曾与另一位副院长到河南省登封市、禹州市考察学院在这个地区招生的可能性。由于有省教委的朋友陪同前往，两个市的教育管理部门负责人接待都还算热情，但一说到我们这个学校是“非学历”校，人家就不由皱起了眉头。禹州市教委招生办公室负责人是这样介绍情况的：禹州由于拥有煤炭、钧瓷、烟叶、药材、铝矾土五大产业，在河南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名列河南“十八强”，家长送子女上大学的心情一般都很迫切；而且，随着用人单位标准的提高，“大专”学历吸引力已经不大，很多人把目光瞄住了“本科”，但必须是国家承认的毕业证，家长们才放心。登封市教委招办主任谈得更坦率：我们这个地方借助嵩山少林寺旅游胜地，经济发展也属河南“十八强”，但市里用人尚未打破计划经济的模式，必须有国家派遣证的大学毕业生才接受。而登封的老百姓观念多保守，从登封考出去的学生百分之八十毕业后都会返回本市。私立大学发不了派遣证，学生怎么可能去读呢？更重要的是，登封这个地方老百姓的人才观念、就业观念都比较落后，把上大学与就业划等号，认为通过人事部门分配、成了“国家干部”，才算“有身份”，大学才没有白读……

其实，这不光是老百姓观念落后的问题，而是非常实际地反映了中国的制度现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公立大学的毕业生确实都会得到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都会被“分配”到某一个部门工作，在工资、职称、户口“农转非”等方面享受相应“待遇”。改革开放 20 多年，经济领域的计划模式已经被打破，但教育领域却远非如此。迄今为止，人们只看到学生分配环节的计划经济格局被撕开了，公立大学的毕业生也开始走上“自谋职业”、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道路，但其它似乎依然如故。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非学历”私立大学不被承认的背后，乃是一个巨大的体制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高校中的“非学历校”只得组织学生去参加“国家考试”，以便学生能够获得“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这样，它才有可能招到学生。这样的考试包括“自学考试”和“学历文凭考试”，几乎所有的民办大学都在开设自考类专业，包括我们卓达大学在内。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民办大学都带有自学考试辅导班的性质。“学历文凭考试”还处于试点阶段，不是每个学校都可以办，必须经过审核、批准。我现在想提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请同学们思考：为什么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要“国家”承认，才具有合法性？“国家承认学历”这个获得法规性认可的事实，其内在合理性又如何？

如果只是从国家考试才能保证教育质量的角度来寻求“国家承认学历”合法性的辩护，那么这只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而已。我可以论证为什么以应试教育为中心的自学考试与文凭考试并没有真的提高教育质量；更何况还存在着大量无须通过“国家考试”、国家照样也承认其学历的“普通高校”（其中绝大部分是公立大学）。另一种辩护来自下列担忧：即一旦没有“国家认可”的强制性规定，就会导致滥发文凭的混乱现象，使大学文凭丧失其应有的严肃性。这个观点乍一听似乎有道理，细想起来仍属似是而非。市场有市场自身的逻辑，教育市场本身在其运转过程中自然会淘汰不合理的教育服务供给方。只要把市场的规范条件与游戏规则制定清楚了，其余的事情应该让市场自己来处理。这就如同足球比赛，“国家”的任务只是制定规则，而不是亲自充当裁判，或挑选选手。

说到底，“国家承认学历”的现行制度框架乃是体现了大一统国家体制的权力特征，它仍然是国家“严格控制”私立大学发展的基本政策格局的产物。而据我看，这种制度构建的内在弱点与中国开放的总趋势是不相吻合的，与中国现代大学制度重构的总目标也是不相吻合的。把私立大学的考试权、毕业证书颁发权集中在国家手中，势必大大弱化私立大学作为公民社会成员的社会结构性功能，也有悖于大学独立、自治的现代大学理念。讲得更透彻些：毕业证书发放权以及与此相关的考试命题权、阅卷权应属一个合法办学主体的基本办学权范畴，它是不应该被剥夺的；至于它的“含金量”如何，只有社会才是最权威的评判者。这个“社会”包括了家长、用人单位以及一切可以对学校的办学质量做出评价的团体与个人。政府在评价某一个学校办得好坏方面，往往倒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政府得到的信息通常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政府以行政方式介入本应由学校自己或社会、市场决定的事情，其结果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再举一个我认为对私立高校带有歧视性质的规定，这就是“称谓”问题。熟悉民办教育的人都知道，在很多“非学历”私立高校的称谓中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校名里总要加上“研修”“专修”一类的字眼。比如卓达大学，根据北京市教委批准文件，我们这个学校的名称是“北京卓达经济管理研修学院”，而不是“卓达大学”，因为我们这个学校还没有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的资格。即便那些有学历证书颁发资格的私立学校，校名前边也要有“民办”二字，如福建有个华南女子学院，其全称乃“民办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在 1987 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就曾颁布文件规定：“社会力量办学学校的名称，应体现其类别、层次，需名副其实。”1994 年，国家教委又颁布一个文

件，专门就天津第二教育局关于“社会力量”举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名称问题的请示做出批复，规定民办非学历校的名称可以为××进修（专修、培训、自修、补习）学院或中心，但不能称大学。我揣摩发布这个文件的动机，一是为使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有所区别，二是为使私立校中的“学历校”与“非学历校”有所区别，如此才能体现办学“类别”与“层次”，使其“名副其实”。如果从国家一统体制对“学历资格”认定的严格掌握这个传统看，通过“正名”强调上述“区别”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再加上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一些办学热衷者于“拉大旗做虎皮”，动辄把学校的名称搞得大大的，越“响亮”越好，以利招揽生源、扩大影响，在这个背景下，严格规范办学层次与学校名称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很多私立高校的一线操作者仍然认为这种称谓上的规定乃是对“民办”大学的歧视。在我和王桂兰博士于2000年搞的一个针对民办大学校长的《访谈问卷》中，专门有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名称须冠以‘专修’、‘研修’、‘培训’等称谓的要求，您认为是否合理？”结果有80%的校长认为“不合理”。虽然那次参与问卷调查的校长不多，但这个比例仍然能反映一定问题，一种情绪。我以为，不应该否认根据不同办学层次对学校类别予以适当划分的合理性，也没有必要否认这种划分应在名称上有所体现，如实施两年制大专教育的还是称“学院”更恰当，本科以上教育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学”。但是，一定要通过“民办”、“研修”、“专修”之类字眼把公办校与私立校区分开、把学历校与非学历校区分开，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中国20世纪前半叶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中，好像还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当代国际高等教育也没有提供相近的经验。我还以为，如果对学历颁发资格的国家控制及与此相应的教育整合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那么作为其结果的国家教育法规关于私立高校称谓的种种限制自然也是不合理的，不管有多少似乎能证明其合理的现实根据。就实践结果而言，国家一统体制下对私立大学的“另眼相待”，势必导致权力机构本身乃至整个社会对“民办”高校的歧视。称谓上的歧视不过是众多歧视现象中的一种。

至于民办高校内部存在的问题，当然也可以举出很多。比如，目前大部分私立大学的管理还不是很规范，有不少学校缺乏骨干教师和优秀的行政管理者，学校投资方和管理者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理顺。有些民办学校一心钻在“钱眼儿”里，甚至干些坑蒙拐骗的勾当，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损害了民间办学的声誉。这是大家都在谴责的现象。在加强私立大学的内部管理方面，我们还要炼“内功”，这些我就不多讲了。面对同学们，我倒想讲一讲和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有关的问题，这就是校园文化与学生自治。从教育学角度看，“校园文化”之重要是一个本来无须更多证明的话题。对于跨进大学校门、正在进入成年期的男女大学生来说，成百上千青年人聚在一起的集体生活是一种与儿童和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完全不同的经历与感受。一方面，离开父母的呵护，每一个学生必须学会独立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事务，学会自主、自立，学会在自主基础上的选择；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同学的交往，又会使作为个体的学生接受更多的信息，丰富其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因为他的同学可能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更重要的是，这种交往将提高学生的理性沟通能力，促进其心理的成熟与个性社会化的完成。这是仅就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而言。在大学中，还有一种重要的交流，就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不要以为师生之间的交流仅仅局限在课堂上，那就错了。组织良好的课堂教学固然是老师与学生对话的重要场所，但远远不够；宿舍、饭厅、图书馆的走廊、球场边的座椅，都是教师与学生谈心的好去处。从现代大学的人格本位教育高度言，校园文化的根本使命是陶冶学生的心灵，锻炼学生的自治能力，养成自主、自立、民主、宽容的胸襟和刚正、坚毅而又善于合作的良好气质，为将来进入社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奠定坚实的人格基础。

就重建中的中国私立大学而言，不可否认，许多办学一线的校长、管理者深深懂得校园文化对学生的重要，但下面这些不利因素往往制约了他们的才智与想象力的发挥：第一，许

多院校的设施简陋，连校舍、教室都是租的，至少在空间意义上，这样的学校根本谈不上有“校园”。但是，营造一个集体性精神自由空间是需要一定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作为前提的，这种尴尬处境使得不少有才华的校长深感“无米之炊”带来的苦楚。第二，硬件设施比较好的学校（无论是第一代创业者艰苦奋斗打下的基础，还是第二代创业者挥斥巨资置下的校产），又往往缺乏校园文化应有的气氛，尤其是人文气氛。这与学校专业设置的偏狭有关（中国的私立高校多开设应用性专业，很少或几乎没有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专业），学生们有地方打球，开联欢会，但更高层次的精神沟通（学术演讲，各种类型的学生结社）则明显缺乏。第三，大量兼职教师的存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师生交流的重要障碍。我想就此多说几句。大家知道，构成当代中国私立高校的一大特色是很多院校没有或只有很小的专职教师队伍。兼职教师过多，与专职教师不成比例，这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私立大学重建所特有的社会条件促成的。学校解决不了教师的住房、职称之类问题，自然也就不敢聘用“专职”的教员。然而，对于一个大学来讲，这种状况是非正常的，对学生培养是不利的。即便是网络时代，也永远替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切磋与沟通。我们卓达大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专职老师，这很好。但并不是每个民办大学都能做到。

再来说说学生自治。校园生活的主角是学生。福建仰恩大学的建校宗旨我认为很好，它突出地表明了人格本位的学生教育理念：“学会做人，笃诚守信；学会做事，创业有成”。这个学会“做人”、“做事”体现在学校日常管理和学生活动的各项细节中，用仰恩大学一位负责人的话说：“一个学校的全部学生活动由学生自己组织，学校就算办成功了。”一般来讲，学生活动的组织者是校团委和学生会。在仰恩，学生会的角色比团组织重要得多，大量的学生活动都由学生会主持。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学校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掌握一种乐器，并组成学生交响乐团，经常给校内和本地居民演出。有些教学环节，也通过学生自治的方式来安排。比如，为了强化素质教育，仰恩大学不再要求学生通过国家的英语四、六级考试，而是制订仰恩大学自己的四、六级实用英语考试计划，并编写了相应的教材。仰恩基金会要求这个本校四、六级考试要高于国家水平。为使学生达此标准，学校每个学期都要举办三次英语演讲比赛，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各班则每周有1~2次英语角活动，学生会在这些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组织者角色。由于我手头掌握资料的有限，肯定还有更多样、更优秀的学生自治活动存在于今天中国的私立大学中，有待人们去挖掘。不过总的讲应该承认，中国私立高校的校园文化和学生自治目前还处于较低水平。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有多种原因。从办学者这个角度看，出于谨慎、“怕出事”而对学生活动持消极态度可能是原因之一，其结果，在学生管理上往往是严格纪律管束有余，鼓励个性发展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心态可以理解，因为它再次牵扯到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待遇”上的某种不平等。这里所谓“待遇”指学校一旦有“事端”发生，来自政府、社会的截然不同的反映。随便举个例子：假如国办校发生学生致伤、致残事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虽不是好事，但终不会给学校的正常办学带来什么影响；私立高校要是碰到这种事，麻烦就大得多了。再假如不小心失了一把火，对国办校就是烧掉几间房子，具体责任人承受行政或纪律处分而已，而民办校恐怕连牌子也保不住了。事实上，每个一线的大学校长头上都永远悬着这把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人产生学生活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让学生“自我管理”就更觉放心不下了。和同学们谈这些问题，是为了让大家体会到干成一个事业的不容易。当然，学生自治还是应该提倡的。这对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有很大好处。记得2000年1月我率领卓达教育考察组访问深圳大学时，曾与该校党委宣传部的赵晓明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赵老师以十分有力的方式强调了大学学生教育中变学生依附型人格为独立人格的重要性。学生既然已经满18周岁，他们就是国家公民，就要具备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行为能力与责任意识。大学不应再是“保育院”，只充当“保姆”角色，而是使学

生学会如何做公民的训练基地。赵老师还认为：必须改变传统大学对学生的“管理”方式，变“管理”为“指导”、“服务”。深圳大学很早就设立了“学生心理指导中心”，同时设学生工作部，专门为学生服务。应该说，这是一种体现了开放式教育思想的学生培养模式，符合现代大学理念中人格本位教育的核心精神。

总之，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重建虽然还面临许多问题，但它毕竟是一条已经驶出港湾的船，路途艰险却前程灿烂。关于如何促进中国私立大学事业的理性发展，我在2003年发表的、和王桂兰博士合作的一本书——《重建中国私立大学：理念、现实与前景》（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提出了10条政策性建议，不妨把这些建议的标题列在这里，供同学们思考。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把这本书找来读一读，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就有。

这10条建议大多是关于宏观政策改革的。它们是：

第一项建议：积极推进私立高等教育的立法工作，使民间办学与政府办学在法律地位上具有实质意义的平等。

私立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应在求民间办学与政府办学具有真正平等的法律地位。强调真正的平等，当然绝非空穴来风。这里的意思是：“平等”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口号上，而必须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予以体现。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现实生活中还有诸多“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用隐蔽的手段破坏公开制度规则的现象，则私立高等教育立法就更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反复实践的系统工程。

第二项建议：逐渐缩小对私立高等教育“管理”的国家一统体制的作用范围与“计划经济”成分，使私立大学合法身份的认可从政府“批准”向社会“承认”过渡。

国际众多经验表明：私立大学办学的合法身份、证书发放等由“国家认可”变为“社会认可”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是变革国家一统体制、保障大学独立、确保大学的教育教学内容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依靠“公共领域”和民间力量使高等教育保持其内在统一性的一贴良方。当然，与看病一样，当病人的肌体过度虚弱时，药下的不能太急，否则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在目前中国私立大学自身成长仍不够成熟，社会大语境中亦存在多种不健康因素的条件下，这个私立高校合法身份由国家认可走向社会认可的过程，宜分两步或更多阶段性步骤实施为佳。比如，可以考虑暂时保留目前实行的国家“办学许可证制度”，也就是说，一个新的私立大学之合法办学身份的获得，仍需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但既然承认了人家的合法办学权，政府也应相应承认办学单位有自主安排教学、自主组织考试、自主判定学生的学习成绩、自主颁发本校毕业证书的权利。至于这个毕业证国家是否承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可以暂且不承认，让社会去鉴别，但不能连“毕业证书”都不让人家发，因为这是对合法办学主体基本办学权利的剥夺。更进一步的动作则是在社会语境相对好转、私立大学本身的运作也走向成熟时，使“社会认可”走上日程，同时变办学合法身份的“政府批准”为“政府备案”。完成这个步骤将意味着政府职能较彻底地从垄断型“管理者”转变成了服务者，这将是中國高等教育宏观“管理”领域的一场革命。

第三项建议：尊重大学教育、学术独立的原则，形成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兼容并蓄、宽容异见与鼓励多元化的格局。

我想再次强调：作为知识传承之所，大学之责乃在于向学生、向社会提供开放的普世化文明教育。“普世化”的意思就是说：大学要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汇总起来传授给学生，而不能局限于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一个党派、一种“主义”。世界是敞开的，学生的心灵也必须是敞开的；惟有此，人的潜能的展开与生成才会成为一个全方位的过程；他

（她）才会具有包容这个五彩缤纷却又复杂怪异的世界的能力，教育作为理性的文化再生产也才会真正获得创造性的张力。目前要做的则是：扎扎实实地进行中国公民的启蒙教育，使现代宪政精神与公共理性更深地扎根于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中国公民的心灵中。这是中国所有大学、包括私立大学责无旁贷的任务。

我们期待着中国走向一个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开放、更加宽容的时代，因为“众口一词”的群氓文化只能是文化的死亡，它是绝对不能汇入制度现代化之人类文明主流的。但同时，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战胜威权主义将是一个艰巨、艰险的过程，它需要勇气、毅力，也需要艺术。好在中国人并不缺乏这种“艺术”的天赋。

第四项建议：创造条件，疏通渠道，鼓励形成多元化的中国私立高等教育融资机制，逐步建立合理、健全的私立大学公共产权结构。

只有建立起真正公共化的大学产权结构，才能最终解决私立大学结构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多解释几句：我们发现，现今中国搞的比较出色、办学主张与办学实践颇具叛逆性的那些私立高校，其产权结构几乎都是单一投资主体型的，这势必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不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因为其成败荣辱往往系于单个企业本身的兴衰、甚至系于投资者一人之身。“老板”个人的任何偶然变故都可能影响乃至危及整个学校的命运。这是极可堪忧的组织结构形式。可怕的是，我们很多私立高校、包括那些办的相当出色的私立高校，其组织结构都未出其右。说的形象些，这是埋在中国私立大学发展道路上的定时炸弹，不加以排除，迟早要给这项事业造成损失，甚至重大损失。正因为此，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推动私立大学产权的公共化，应是保证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策。

第五项建议：作为前一项建议中有关形成多元化融资机制的应有之意，政府自身应明确承诺从经济上支持私立大学的义务，这不但构成私立大学融资渠道的一个新来源，而且有助于形成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平等竞争的新格局。

第六项建议：改革人事制度，建立教授自由流动的体制，使教授在大学之间有更多选择的余地，这不但有利于建立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之间，以及各个私立高校之间合理的人才竞争机制，也有利于真正的、卓有成效的教授治校制度的形成。

第七项建议：解放思想，大胆向前看，在办好应用型专、本科私立高等学校的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向现代研究型大学发展。

从弘扬现代大学理念的根本精神、建设真正高质量的公民社会系统、为中国制度现代化提供具有民间思想库性质的研究组织意义上说，在未来中国私立大学队伍中出现一批以学术型、研究型为主干的新型高等学府，实乃发展之必须，形势之必须，中国未来前途之必须。当然，这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准备和积聚、历练过程，目前条件还不充分。事实上，实现这一目标，不但要求私立大学本身有足够程度的发展，而且要求整个社会的制度现代化水平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要求政府改变目前只把民间教育视为国办教育“补充”的陈旧观点和把私立高校的办学层次局限于以专科教育、高职教育为主的政策格局。简言之，成就中国私立研究型大学，需要整个社会（包括政府与民间两方面）解放思想，共同创造条件。这个共识形成之日，才能谈得到中国私立大学向世界名校看齐的问题；而唯有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有了实质意义的进步，思想开放与学术自由成为华夏大地之现实时，中国私立高等院校中出现东方之“哈佛”，东方之“牛津”、“剑桥”，东方之“斯坦福”，才能从梦想变为事实。

第八项建议：积极推动“中间地带”发展，鼓励高等教育中“公立”部分与“私立”

部分的融合交叉，鼓励公立院校本身的改革、改制，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办学格局的形成，同时警惕私立高校中的“学历校”向传统体制的回归。

所谓“中间地带”，指纯国家办学与纯民间办学之间带有各种结合特征的办学形式。历史地看，这种结合曾有过某种无可奈何的味道（如北京海淀走读大学不得不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近年则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寻求二者的结合，尤其是公立院校，趋向于把引进“民办”机制视为自身改革的重要内容。更彻底者，甚至主张通过改变产权、隶属关系、董事会组成等把原来的“公办”变为“民办”。我以为，在未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除了比较纯粹意义上的私立高校外，这个“中间地带”将是极有生命力的一块民间办学生长领域，正是在这个领域中，有可能完成公立大学“转制”的变化过程，并减少这种转化将要付出的制度成本。

“警惕私立高校、尤其是私立高校中的学历校向传统体制的回归”说的是一种相反趋势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由于到目前为止，“学历校”在政府管理、专业设置、招生、收费等诸方面还有大量“计划经济”的制度要素，一个私立院校一旦获得“国家承认学历”的“殊荣”，被纳入“计划招生”范围，就马上面临着被传统体制同化的危险。如果办学者再缺乏创新意识，囿于国办校办学的老经验，则极有可能形成除了投资者不同外，其他与国办校并无多大区别的局面。如此，我们的私立高校无非成为三流公立大专院校的补充而已。这种可能性值得引起中国私立大学办学者的高度警惕。

第九项建议：加强私立高校彼此之间以及私立高校与包括媒体、其他公共机构、研究咨询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形成有利于促进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共领域，探索植根于民间的私立大学行业整合模式，在完善行业内部自律机制的基础上，有效地维护私立高等教育整体的合法权益。

新闻媒体、各种民间或半官方的民办教育研究与咨询机构组织，都可以成为促进中国私立大学行业整合的有效力量。一方面，通过揭露各种教育腐败，它们可以帮助私立大学更好地进行行业自律；另一方面，媒体、各类公共研究咨询机构本身又是公民社会的构成部分，与作为公民社会重镇的大学一样负有维护社会正义、抨击社会丑恶的使命。在当代中国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失衡、金钱和权力成为社会运行的支撑点与大语境的情形下，中国私立大学与媒体及其他公共机构联合起来，以公共理性、社会正义的形象申扬于社会，将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大环境向健康的方向转化。

第十项、也是最后一项建议：深入展开、推进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使中国私立大学重建的伟大事业建筑在更具有前瞻性、客观性的科学认知与战略设计基础上。

我想，如果这些建议都能落实，我们私立大学的未来就将充满希望。让我们共同为此而努力。谢谢大家。

（本文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第四部分

建构一个符合宪政民主原则的现代国家

双轨共和制：关于中国宪政国家结构改革的一种设想

现代宪政国家结构形式可以从两个角度予以界定：在公民权利语境内，它是指民权在不同范围内行使的结构性安排；在政府施政意义内，则指国家机构体系中纵向配置国家权力行使权且规范其运作程序的制度框架或模式。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的前现代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自辛亥革命成功以来，为了寻求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合理形式，学者和政治家们作了大量的研究与实践探索。民初关于“单一制”和“联邦制”的论争，“联省自治运动”中对自治问题的探索，孙中山的“均权”学说和地方自治思想，国民政府制宪时期关于界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反复斟酌，都代表着 1949 年前人们为解决这个问题付出的种种努力。共产党在大陆掌握政权后建立了以党专制为基础的单一制的政权体系，但在行政“集权”和“分权”的两难中，也作了艰苦探索，走了不少弯路。改革开放后民主化诉求涌动，官方对六四民主运动的镇压并没有使那些独立的、具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停止思想，反倒促使他们更深入地思考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包括民主化进程中的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比如，在单一制框架内，近年来就有吴国光提出的“县政中国”¹¹¹ 和王思睿提出的“州政中国”¹¹² 等不同方案；在联邦制框架内，则有诸葛慕群的联邦中国方案¹¹³ 和吴稼祥的“中华第三共和国”构想。¹¹⁴

本文愿意在同代学人上述贡献的基础上继续工作，就未来宪政中国的“政治设计”奉上绵薄。我的基本主张是：传统的单一制和联邦制都不足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鉴于中国既是一个缺乏民权、自治传统的国度，又是一个内部情况极其复杂的大国，可以考虑构建一种兼具联邦制和单一制特征、吸收了二者优点又对二者弱点有所克服的混合体制。由于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词来概括，姑且称之为“双轨共和制”的宪政国家结构形式。

超越“单一制”和“联邦制”

经典意义上的单一制指中央政府掌控行政、人事、财政大权，地方政府仅仅是中央政府

¹¹¹ 见吴国光“‘县政中国’：从分权到民主化的改革”，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 年春季号（总第 84 期），页 34-42。

¹¹² 见王思睿“州政中国：大民主中的地方自治”、“中国行政区划的重心：省还是府州”等文，载北京社会经济学研究所“改造与建设”网站。

¹¹³ 见诸葛慕群《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明镜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特别是该书第一章“国家结构：从单一制到联邦制”。

¹¹⁴ 见吴稼祥《联邦化：中华第三共和国之路》，明镜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的延伸，没有或很少自主权。经典意义上的联邦制则正好相反，联邦体系由那些自身具有独立政治生命的单位所组成，在法律上，这些单位（不管它们被称作“州”、“邦”或别的什么）不能被中央政权消除或轻易改变。如果我们用“集权”“分权”这样的字眼，那么最初的“单一制”几乎都和“集权”相关，而“联邦制”几乎都体现着法律“分权”的现实。

各国采行“单一制”或“联邦制”，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生成语境，这里不必细论。有意思的是，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的分野似乎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模糊化，单一制国家通过地方分权或自治有了较多的“联邦”色彩（如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而联邦制国家通过加大中央政府的权威，又似乎具有了某些“集权”特征（如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国）。今天，在很多场合，人们已经不大说的清楚联邦体制下的“自治”和单一制下的高度“分权”究竟有多少区别。它们可能都意味着地方领导人的直选而非任命、和中央政府分享的财政权力以及对地方事务的更多控制。这个趋势表明，治理的多元化、传统的国家结构形式的某种分解和再融合，已经成为一些大国改善国家治理结构的主动选择。

现在让我们来看中国：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奉行单一的中央集权传统，前现代的皇权时代如是，今天的“共和国”依然如是。党专制体制内的“制度化分权”能否真的解决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析分，至今仍是个疑问。在这个背景下，许多学者提出“联邦中国”的设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除非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很难找到“联邦”实体的现实依据（至于把一个统一的中国人为划分成各个“主权邦”然后再进行“联邦”，显然更有些滑稽和非历史的味道）。“分权”“自治”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地区利益的膨胀及其体现的“集体行为的逻辑”势必造成一系列“公用地的困境”，此类问题的解决又必须依靠超越地方利益的上一级公共权力机构的介入，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介入，而不能仅仅指望地区间的“协作”或“谈判”。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不能在传统的“单一制”或“联邦制”的单一轨道内考虑问题。如果说国家结构形式的调整、治理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今一些中等规模以上国家的现实，那么中国——由于它的巨大的人口规模、极不均衡的地区发展水平、复杂的民族生态状况和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政治实体并存的现实——更有理由、也有足够的必要去考虑设计一种更复杂的、超越“单一制”或“联邦制”单一逻辑的制度体系。笔者所谓“双轨共和制”就是对这样一个制度体系的初步构想。

“双轨共和制”的基本含义

可以用 12 个字概括“双轨共和制”的基本含义，那就是**分级自治、多种形态、适度集中**。

分级自治：自治是公民权利的直接体现。本文把自治定义为一定区域内的公民依法对境内公共事务的自行管理与处置，包括自主进行不违背国家宪政原则的地方性立法、自行选举区域行政长官和议会议员、自主决定地方财政的使用、对区域内的公共事务自行做出安排等等。“分级”意味着自治的多层次性。鉴于中国人口众多，同时考虑到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行政区划传统及其体现的区域人文内涵，也兼顾近年来经济发展带来的区域经济整合关系的变化，我主张把自治分为 4 级，即省自治、市（地、或州）自治、县自治和乡（镇）自治。理想状态下，各级自治体在各自的范围内通过公民直接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议机构成员和行政长官。省、市（地、州）、县设议会，有立法功能；乡（镇）的代议机构可称“议事会”，对乡

（镇）行政机构行使监督权，但无立法功能。

多种形态：基于中国多民族共存、多种政治实体共存的现实，自治的形态也应该是多元的。比如，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的区域自治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汉族地区的地方自治，香港、澳门和统一后的台湾在自治方面也肯定会有不同于大陆其他省区的特点。严格地说，自治共同体的多种形态的并存乃是自治原则和精神的必然结果：既然自治体现着自治共同体范围内公民的集体权利，他们当然有权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区域治理形式，只要这种选择不与国家的宪政原则相抵触。但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以及台、港、澳作为政治实体在近现代史上形成的特殊性，迫使我们必须要着力强调自治之多种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的**政治蕴含**。

适度集中：即便是在联邦制下，军事、外交之类事权通常也是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的。我所谓的“适度集中”乃在于强调这样一层意思：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要成功面对全国性公共问题的挑战，化解地区间发展差异太大造成的种种难题，就必须**依法**保留中央政府处理与地区有关、但又事关全国的那些公共事务的足够手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里指省级政府）的关系，既是合作关系（在自治范围内，中央政府有义务支持地方政府依法自行处理本地区事务而不得随意干涉），又是领导-被领导关系（在超出地区范围的全国性公共事务领域，地方行政长官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调度指挥；他可以被中央授权、接受中央政府委托完成在本省区内发生、但事关全国的公共事项，同时又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这个原则也适用于省以下各级行政长官之间在处理跨层级公共事务时发生的关系。

在以上描述中，显然，“分级自治”和“多种形态”更多体现着联邦制建构所特有的**分权**特点；“适度集中”则继承了单一制政府结构的某些元素，特别是**集权**元素。但这里的“集权”将是“适度的”，它是在新的制度框架内的“集权”，受到法律的明确限定，不会再重蹈传统中央集权制的复辙。在宪法政治意义上，无论“分权自治”还是“适度集中”都是民权的制度体现，只不过范围不同：“自治”体现的是区域性民权，“集中”体现的是全体国民的民权（最高行政权的行使得到了全体国民的委托）。而在政府建构意义上，“分权自治”和“适度集中”又的确代表着对两种不同建构传统的有意识吸收和扬弃。这样，这个共和政体既是“双轨”的，又是在新的制度框架内融为一体的，所以称之为“分级自治、多种形态、适度集中的双轨共和制国家结构形式”。

有了这个总体说明，我们还要就这样一个构想的某些细节再做些讨论。

“县政论”、“州政论”和“分级自治”

吴国光的“县政论”主张“虚省实县”，在县级实行自治，最终“废省”而建立起中央与县两级政府架构。这个思路是吴 90 年代提出的“制度化分权”主张的延伸。我以为，强调“县”在中国目前（以及历史上）作为基层政权单位的重要性，确有其独特意义；县制在

中国历史上能够历久不衰，自有其深刻的理由。¹¹⁵ 县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性政治实体**发挥作用的基层政权建构（乡、镇远不具备这样的综合性特征）。今天党专制语境下的政治腐败在县一级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和弥漫性规模，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这一级权力所具有的如下特征：既相对远离中央政权的监控，又相对接近自己的“子民”（在腐败环境下，这意味着这一级政权有更多直接鱼肉乡民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主化应该重视“县政民主”，在程序上也应该把“县政民主”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这些，我都是同意吴国光观点的。吴的问题在于“虚省实县”的设计会带来一系列治理上的难题，因为中央政府不可能直接面对上千个县级政权单位（即便像吴国光设想的那样把县的规模扩大，使全国的县的总数减少到 1000 个左右，这样的“两级政府架构”的实施仍然是不可能的）。

与吴国光不同，王思睿的“州政论”主张设立两级自治单位，其中，“州”（地、市）为上级自治单位，“乡”（镇、街道）为下级自治单位，而“省”、“县”暂时保留为非自治的地方行政体。这样一个设计突出了“州”在国家-地方政权建构链条中的地位，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经济整合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对政治整合的要求（近些年来，省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传统地级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正在加强，“市管县”体制也提高了这些城市在地方政府过程中的重要性）。在这个背景下，将“州”（地、市）作为未来国家宪政结构的一个自治层级，显然有充分的根据。但该方案把省、县列为非自治体，理由并不充分。比如，关于“省”，王思睿强调“省不是自治团体，不是法人，而具有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自治联合体的双重地位。”但什么叫“地方自治联合体”？王并未给出说明。在王的方案中，省无独立财政来源，其收入由中央拨款和地方自治拨款两部分组成，并分别支出于中央、地方自治体委办的事项。中央委托事项暂且不论，地方（州）委托的只能是超出州范围的公共事务。这种下对上的委托从利益关系角度看，似乎并不合理。无论从民权建构意义讲还是从利益关系角度讲，应该是省政府受全省民权委托、代表全省公共利益处理省范围内的公共事务才更合理些，但这将意味着省级本身也是自治体。至于“县”，王思睿主张县政府采用“双重职能兼行架构”，县长由州任命，既负责上级委托事项，又负责执行县参议会决议事项。这种“双重职能兼行架构”的设计在功能上很接近本文的“双轨”化设计，只不过在理论上不承认“县”的自治地位。而“县”无独立财政来源，将使传统上作为综合治理单位的县级政权的运作遇到诸多困难，县参议会的存在也将流于形式。更重要的是，县长不直选，是这个方案的一大弱点。我想再强调一遍：中国的民主化，应该从老百姓直接选举他们的“父母官”开始。而这必然意味着“县”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础性自治层级。

王、吴二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均反对省级自治。为什么？说到底是因为担心地方权力膨胀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中国历史上由于诸侯割据造成的内乱确实留下了太多惨痛的教训。但我以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得依靠未来宪政体制的制度安排，而不是靠简单的“虚省”或者“废省”。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省一级建制仍然是必要的。从文化上看，“省”所代表的区域性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人文内涵。它不应该、也不可能被轻易抹去或中断。从政府建构角度看，省又是重要的战略规划与领导单位。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保留两级（中

¹¹⁵ 谢庆奎曾这样概括我国县制发展的历史和特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县级行政区的名称，有 59 个县名同秦汉以来使用的县名完全相同。县制所以常青不衰，是因为县的设置不是一种权宜的或任意的措施，而是由于经济、政治、行政等种种因素结合而成的。因此，县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团粘结构的稳定社区，能够在任何国家制度下，都以不可轻易分解的行政实体而发生作用。”（转引自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页 360）

央和省级)宏观战略部门有其合理性。省级自治既是区域性民权行使的最高形式,又是沟通中央政府与基层自治体的有效桥梁。当然,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过大对中央政府的可能威胁,适当地缩小目前省的规模是必要的。在严格界定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法定权限的同时缩小省的规模,增加省的数量,使中国省的总数达到50个左右,就有可能在实行省级自治,完善省级自治体的民权建设的同时,有效地防止地方割据或分裂倾向的发生。即便局部出现这种倾向,也不致对中央政府造成真正的挑战。

这样,在讨论“县政论”、“州政论”的同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论证了县、州(地、市)、省各级实行自治的必要。至于最基层的乡、镇自治,由于它是公民权利体现的最具“面对面”特征的舞台,又是所有较高层级自治的基础,重要性自不待言,这里就不再多论。

“分级自治”有利于创造地方治理的多样性,有利于改变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传统和“子民”心态,有利于促进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公民对每一个自治层级公共事务的参与,都意味着公民自身公共品性的提升;公民参与的公共事务的层级越高,公民的视野和胸襟也就越开阔。总之,自治意味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意味着民权共享基础上的协调,而不再是专制意义上的统治。这都是政治哲学范畴内的常识。当然,也许有人从操作角度置疑“分级自治”,因为它有可能增加政治运行的成本。我以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但并非无从解决的问题。党专制造成了庞大的官僚体制和行政冗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未来的宪政体制中,将不再有党专制意义上的“党”的系统及其分系统(比如政协、妇联、青年团之类),仅此一项,就将大大减少各级政府中“吃财政饭”的人。行政机构也将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进行构建。司法机构主要是改变运行体制,强调司法独立性。唯一需要加强的是代表民意的代议机构,因为议会不再是“橡皮图章”和党专制体制下的养老部门,各层级自治体的议会或议事会都将由、或主要由专职议员组成,同时配备必要的辅助机构。总之,只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理顺各层级自治体之间的关系,做到立法明确,事权范围清晰,清除冗员滋生的土壤,政府高效运行并不是不可企求的。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分成2000个左右的县级自治单位,300个左右州级自治单位,50个左右省级自治单位,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治理格局。¹¹⁶且这样一个格局体现了对现存行政区划体系的大体承续,只是改变了其建构原则,在过渡上也将比较方便。

在“分级自治”体系中,一个公民将参加各个层级的选举活动,占用时间较多,这是一个问题。假设未来的国家级领导人也由全民直选,这将意味着每个公民理论上都要参与5个不同层级的选举投票。解决办法是,可以考虑在任期时间(从而也就是换届选举时间)上做出合理安排。比如,设国家、省级领导人和议员任期5年,州(地、市)和县级任期4年,乡(镇)级领导和议事会成员任期3年,则全国和省级的换届选举可同时举行,州(地、市)和县级的换届选举可同时举行,各层级自己组织自己的竞选活动,但选票可以印在一张纸上,从而方便选民投票。这当然只是一种设想。只要大的框架确定,相信实践本身会找到更多解决问题的办法。

为什么要强调“适度集中”?

“适度集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必要,前文已有述及;现在我想把讨论再往深处

¹¹⁶ 当然,这是就全国而言,分为4个自治体层级比较合适。具体到某些地区,也可因地制宜。比如北京作为直辖市,自治层级分为3级亦可,即市(直辖市本身)、区(县)和街道(乡、镇)。

拓展，从**利益的政治哲学分析**角度看看为什么要强调“适度集中”。

“利益”是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向度。“分级自治”意味着每个层级上的每个自治体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事实上，“分级自治”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一恰恰是利益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与公民权利相联系的利益诉求通常是以政治形式表达的经济诉求。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个自治共同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会衍生出极其复杂的性质：它们既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相互抵触、相互冲突的一面。利益从来就有自我膨胀的本性，民主政治并没有消除这种本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治共同体既有可能与它的同一层级的其他自治共同体产生利益上的冲突，也有可能比它高一层级的自治共同体产生利益上的冲突。前者作为冲突具有水平排斥性质：一方所得造成另一方所失，比如一个城市只允许卖本市企业生产的啤酒，或者它的出租车行业只允许使用本市生产的车种。这种贸易壁垒势必造成其他拥有啤酒企业或轿车生产企业的城市的经济损失。后者作为冲突具有垂直同心性质：自己的暂时所得造成包括自己在内的更大共同体的长期损失，比如一个地方对矿藏的盲目开采或者对植被的生产性破坏，可能造成更大区域内生态环境的灾难以及治理这种灾难的费用的成倍增长。这样，地区利益的多中心倾向、分离倾向和冲突倾向，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认真面对、设法解决的问题。在发生冲突时，较低层级的公共利益服从较高层级的公共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要遵循的原则。

问题是如何把这个原则化为实实在在的宪政制度安排。除了诉诸自治行动者的理性协调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沟通、谈判化解彼此间利益上的冲突，达到“双赢”结果外，必须估计到有大量问题是无法通过此类协调、谈判得以解决的。这意味着必须确立这样一个概念：民主政治框架内的国内治理并不排除**强力**的运用，只要这种运用符合国家公共利益的最高要求。这一点与今天的全球治理不同（目前的联合国仅是一个政府间的协调机构，而不是全球公共权力机构，所以无法拥有公共权力机构意义上的强制力）。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的这种区别，恰恰证明了双轨共和制中除“自治”这一“轨道”外另一“轨”——也就是“集中”之“轨”——存在的可能；建立在利益分立基础上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可能导致的各种负面结果，则证明了双轨共和制中另一“轨”存在的必要。在制度层面上，强力的运用主要表现为依法确立不同层级政府间在处理跨层级公共事务时的行政委托-代理和指挥-服从关系。比如，在治理一条跨省河流的污染时，中央政府可以委托省政府完成本省内河段的治污任务，同时负监督之责。再如当发生了事关全国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地方行政机构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并对中央负责。通过建立全国性的财政转移支付系统和利益转交系统以实现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支持，也体现了中央-地方关系中这种行政委托-代理和指挥-服从关系的性质。

需要强调的是，行政强力所指涉的对象只是那些跨层级的公共事务。换言之，凡属某一个层级范围内的公共事项，皆由该层级的自治共同体自行处理（过去那种“每级政府都管所有事情”的现象不应再继续下去）。行政强力也不仅仅存在于中央政府对省政府的关系中；任何一级政府对它的下一级政府，在跨层级公共事务范围内，都应该享有这种行政强力。

这样，在加进了“适度集中”这层制度安排后，“分级自治”实际意味着：每一层级的自治都只负责治理本层级内的公共事务，它的行政机构同时接受上一级行政机关的委托完成与本层级有关而又超出本层级的公共事务，还要对下一层级内发生、但涉及本层级的公共事务负行政监督、指导之责。也可以这样来表述“双轨共和制”下各级行政机关的性质：省、州（地、市）、县三级政府作为行政机关，都担负着双重任务。首先是自治范围内的任务，包括完成地方民权委托处理本级自治区域内的公共事务和对下一级自治机构完成跨层级公共事项的行政监督，在这两个方面，行政机构都将对本级自治机构的选民和代议机构负责。另一项任务是接受上一级行政机关的委托，完成在本自治区域发生但超出本自治区域范围的

公共事务。在完成这项任务时，政府是对上一级行政机关负责。议会里可以扯皮，行政上不能扯皮。各层级议会间并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它们都是民意的代表机构；各层级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在处理跨层级公共事务时却必须有一个上下级的委托-代理和指挥-服从关系。这就是“双轨共和制”的基本精神：既强调自治，也强调集中。自治以加强民权，建设发达的地方政治；集中以化解矛盾，成就完善的大国治理。未来的中央政府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设立参、众两院制度，对全国选民负责。这样，在源头上就最终确立了“适度集中”的合法性依据。

关于自治的“多种形态”

前文已经指出，所谓自治的“多种形态”，除了民权基础上产生的自治之多元性的一般含义外，笔者主要指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形成的几类特殊地区在自治问题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首先是民族地区的区域自治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 50 几个人数较少的其他民族。这些民族的人口总和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 6%，但居住地域面积却达全国领土的 64%。显然，处理好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全局问题。历史上汉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源远流长，错综复杂，有战有和，共同走过了多少个世纪光阴。尽管近百年来民族融合在大部分地区发展迅速，但仍有一些民族保留着鲜明的宗教传统与文化特色。如何在现代文明和民主制度框架内理顺汉民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理顺中央政府和民族区域自治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解决。西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 世纪 50 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产党北京中央政府曾制定并实行了较为审慎的西藏“和平解放”政策，但 1959 年发生西藏“叛乱”和“平叛”、达赖喇嘛出走、西藏转行激进的“民主改革”后，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工程对雪域高原的藏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¹¹⁷ 为了挽回这种破坏造成的恶劣影响，中央政府 20 多年来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西藏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西藏的人权状况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是尊重藏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落实藏区政治上的高度自治。年已七旬的达赖喇嘛近来在国外不断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希望西藏享有更高度的自治。他甚至表示“倘若我们不再是难民且能生活在民主的西藏，则我不认为在我过世后应该要有继承人”。¹¹⁸ 笔者相信，西藏问题在宪政民主框架内的解决，将为中国境内汉、藏两大民族的和睦相处和共同发展创造真正的前提，藏区的自治也将为其他民族地区的自治提供有益借鉴。

第二类特殊地区指港、澳。这两个地方在近代皆有外人占领并实施治理的殖民历史。1997 年和 1999 年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均规定港、澳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港、澳甚至拥有超出联邦制国家的州政府的某些权力，比如货币发行权、独立征税权和某种程度上的外交权。在未来的中国宪政国家结构中，港、澳地区的高度自治将真正予以兑现。至于两个基本法中所说的“一国两制”，由于中国宪政民主制度的最终确

¹¹⁷ 十世班禅喇嘛在 1989 年初去世前就曾说过：过去 30 年为了在西藏实现社会主义，付出的代价、造成的祸害比得到的好处严重得多。（参见金钟为降边嘉措的著作《悲剧英雄班禅喇嘛》写的导言“十世班禅喇嘛的命运”，香港开放杂志社 1999 年版，页 37）

¹¹⁸ 据博讯新闻网 2005 年 6 月 27 日报导：“达赖最大胆建议：愿成末代达赖”。

立，这个提法也将自然失去意义。

第三类地区则指台湾。台湾与港、澳问题不同，它是中国内战的产物。国共两党的武力纷争导致主权的分裂，在海峡两岸有两个政权都宣称自己代表中国。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没有结束这种纷争，因为两个政权的分立仍然是事实。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方面的两大变化令人瞩目：一个是台湾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在建设一个宪政民主体制方面，台湾远远走在了大陆的前面；再一个是“台独”倾向的增长，这种增长给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带来了新的挑战因素。从根本上讲，台海目前的对峙不符合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正如吴稼祥所指出的：“两岸花钱买外交，也花钱买军火，花掉的是两岸人民的福祉，买来的是两岸人民的相互仇恨和可能的毁灭。”¹¹⁹ 统一才是两岸最好的选择，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统一？我以为，从大陆方面说，改变现行政体的专制性质，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民主宪政改革，才是为两岸统一创造了真正的前提条件。在一个共同的宪政民主框架内，两岸究竟是以何种具体形式完成统一大业（“邦联”、“联邦”还是本文“双轨共和制”意义内的自治体建构），都可以商量，可以从容设计。只要宪政民主的大原则确定下来了，其他问题相信都不难解决。近来台湾各在野党纷纷组团访问大陆，增进了两岸之间的对话、沟通，是一件好事情。当然，也不排除台海形势向更危险的境况演化的可能。还是那句话，要遏制台湾岛上的“台独”倾向，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关键。只有在大陆开始了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情况下，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才会获得强有力的民意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法统之争，也才会找到化解的出路。可以想象，统一后的中国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国号”——比如，可以仍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台湾方面接受的话；也可以借鉴吴稼祥的提法，改称“中华第三共和国”，以示对“中华民国”（中华第一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第二共和国）的继承——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在国家宪政结构中都将保留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如果它是双轨共和制下的一个自治体，那么在较长时间内，台湾的自治在法律上有可能拥有更多的“特权”（甚至比港澳拥有更广泛的自治权力）。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一种必要的过渡。什么时候台湾的自治不再需要这种“特权”，就将意味着20世纪中国国家分裂这段历史被彻底翻了过去，中国的宪政民主体制也走向完全成熟了。这当然是我们大家都盼望的那一天。

（本文作于2005年7月底至8月初，首刊于《真话文论周刊》网站）

¹¹⁹ 吴稼祥《联邦化：中华第三共和国之路》，页190。

“中国文化战略”：概念辨析与制度前提

1. 问题提出的被动性

“中国文化战略”的提出，据说是鉴于全球化进程中“价值冲突”的凸显，尤其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与扩张。由此，与其说这个拟议中的“战略”设计是主动出击的结果，不如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应对”意义上的被动反应。

文化，如果不加定义，很容易变成一个大而无当的词。事实上，“中国文化战略”中的“文化”主要指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化”，也就是，（1）这里的“文化”指文化产品，人类精神劳动的凝结；（2）这个产品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成为人类劳动交换的一部分。

如果从上述角度理解“文化”，则当今中国文化产业的“被动”甚至尴尬甚至确实是一个事实。让我们随便举两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以兹证明：北京每年的金秋书市都是京城文化生活的一大景观。然而，稍事观察不难发现，书市上各摊点堆积如山的图书多是传统“经典”，四大古典小说不知被多少家出版社反复印制了多少版。当然，也不乏现代作品，但在书市里转上3个小时，却很难看到现代作品中的精品，无论是文学，还是其它。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人与文化产业极没有出息的一幕：靠贩卖古人的智慧为今人做门面；装帧日益精美的现代作品却无法掩饰其内在的贫乏。再举一个音像业的例子：现如今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中学生对“美国大片”都情有独钟，说起历届奥斯卡获奖影片亦如数家珍。道理很简单：美国大片的VCD、DVD在中国到处可以买到，盗版盘上市比正版盘还要快，还要早，且价格便宜得出奇。去年我到美国作3个月的短期访问，怀着想做一番比较的心情到美国音像店里转了转，结果大失所望：不像服装超市，在音像店里几乎见不到什么“Made in China”的中国货！当然，美国人文化生活中，也有其非常贫乏的一面，这与他们的历史过于短暂有关，也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以及由此而生发的自傲心理有关。但无论如何，就“文化产业”而言，美国更多的是“输出”而非“输入”，中国更多的是“输入”而非“输出”，尽管我们还常常自诩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大国！

说人家是“文化霸权”？也不尽然。既然是“产业”，这个文化产品的交换过程自然要遵循市场规律。当消费者拿钱去购买一种消费品时，没有人强迫他去这样做。他是出于自愿而完成其购买行为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消费者偏好的形成与不同产品的竞争力呈相关关系。靠产品自身的质量、信誉而获得的高竞争力与靠暴力强迫别人接受的“霸权”显然不是一回事。

当然，文化、精神产品与其他消费品确有不同之处：它是精神劳作的凝结，也是创作者自身所信奉的价值的载体。文化的传播（文化产品的消费）自然伴随着某种价值信息的传递。而当这个过程发生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当中时，就有可能（请注意：仅仅是有可能）产生某种价值的冲撞、交汇或冲突。

文化保守主义者总是喜欢这样看问题，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外来”文化视为一种威胁，而这正好与持“西方文化霸权”论调的辩护性的正统意识形态相吻合，似乎拒斥这种“霸权”是出于捍卫自身文化传统与“国家利益”的需要。

“国家利益”？这倒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在更深入地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今中国

文化产业的“被动”状态之前，我们似乎有必要就和“国家利益”相关的某些理论问题做个澄清。

2. “主权国家”：“全球化”视野中文明发展的内在张力

所谓“国家利益”以主权国家的存在为前提，而主权国家本身，严格地讲，乃是15世纪以来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产物。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与商业革命、启蒙运动不但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文明的理性化水平，而且创造出“民族-国家”这一近代政治-文化结构形式，并在18世纪到20世纪的300年内，演化成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交往组织框架。现代世界史，就是在这个组织框架内书写的。

与欧洲人不同，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人并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因为那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是欧洲人（以及后来日本人）的坚船利炮教会了中国人什么叫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西方价值”的拒斥就是有道理的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种更深邃的关于近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哲学**视野。

本节的副标题为“‘全球化’视野中文明发展的内在张力”，这里不必就“全球化”作过多的解释，这个词已经用得滥了。我只想简单地说：本文所谓“全球化”无非是指300年以来人类文明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真正构成文明进程之历史可理解性的最大难题，乃是这个进程内具的张力或二律背反，即同时存在着两种拥有哲学人类学依据的现实运动，而它们彼此之间又呈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状态。**

首先，“全球化”意味着在**制度现代化**基础上人类共享的某些最具根本意义的价值的一般化（现实化）趋势。比如，关于民主的概念，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民族公开坦言反民主，即便是骨子里专制透顶的政权也往往打出“民主”的招牌，这说明民主在当代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为全世界所认同的**普遍性价值**。当然，民主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它是与宪政体制、公民社会的发展、表达自由等制度设施相联系，并藉此得以体现的。人权的概念也是如此。“在每个人身上，整个人类拥有的一切都应该得到承认”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准则。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当今人类对“人权”之类概念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18世纪的卢梭和其他启蒙学者关于“人生而平等”的抽象界定，而更多地把人的权利，人的尊严的实现与每个人所处的历史境遇、文化背景相联系，从而赋予人权概念以历史性。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重要界定是：**既然每个人及其所归属的文化共同体都在一定的社会进化水平上体现着人类价值普遍性的内在要求，那么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人类价值的普遍性与一般化恰恰是通过不同的民族（文化）形式，在不同的社会进化阶段及向着更高的社会进化水平的运动中实现着自身。**以美国为例，美国《独立宣言》，这个体现人权精神的重要历史文献，在最初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曾囿于当时的条件而删掉了禁止奴隶贸易的内容，【1】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南北战争后，美国真正废除了奴隶贸易，这既是一个民族在实现人权的道路上取得进步的过程，又是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实践人类价值普遍性的过程。

现在再看“文化”与“文化产业”：假如以上关于“全球化”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对“外来”文化和文化产品采取拒斥的态度。如果这种“外来”品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普适性价值，那就不但不应该拒斥，而且应该张开双臂欢迎之，不管它来自何方，美国，欧洲，还是什么别的地方。**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价值冲突”，也没有必要去消极地“应对”。所需要者，应该身体力行者，倒是分享以别一种民族形式所体现的**

人类价值的共相，并将其融入本土文化的内在肌体，使它生发为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从而使人类价值的普遍性在本土文化形式的特殊性中再次得到确认。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么？

当然，人类的事务又是复杂的。我们就来看看文明发展之内在张力的另一方面：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与交往框架。就近代世界史而言，民主化的推进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可以被视为同一个过程的结果，但支配其行动的内在机制却大不相同：民主化进程更多地体现了人类“交往理性”潜能的增长（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而以“主权”概念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则是基于本土利益需求的某种功能体，它的存在本身就预先设定了不同民族国家利益的分立乃至对立。因此，民族国家的行为必定是遵循“目的合理性”规则的，即它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 200 年来，现代化的传播总是与赤裸裸的利益追逐纠缠在一起，或干脆就是通过后者进行的。现代化之先驱者，英、法、美诸国，既是率先以民族形式的特殊性实践人类民主、自由等价值普遍性的国家，又是现代主权国家框架内追逐自身利益的强者。这给现代史的分析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因为，在制度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的西方大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扩张行为，不但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自私性与不公正性，而且不能排除其利用文化手段增进民族国家利益的可能。

这就是现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理性与愚蠢是搅在一起的，高尚与卑鄙是搅在一起的。当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出兵海湾时，有人称美国的行为是正义之举，也有人讥讽“山姆大叔”此举不过是出于自身石油战略利益的考虑。同样的争论出现在对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的评价上。二者似乎都对也都不对，因为真理很可能更是二者的结合。总之，已经发展到现代文明水平的人类价值的普遍性与“主权”国家框架内民族国家间的冲突是我们一时还无法摆脱的现实（今后能否摆脱似乎也难定论）。如果说，对于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要制定什么“文化战略”以“应对”外来的挑战，这倒似乎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但是，本文宁愿强调逻辑上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以文化相对主义或“民族国家”利益为幌子，抵制汇入人类文明的主流。就中国而言——我们已经看到——这已经不是什么“可能”，而正是今天的现实。当政者的正统意识形态常常故意混淆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与本土政治民主化这两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事情间的界限，借口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而维持国内的威权主义政治，拒绝——至少是拖延——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事实上，正是这种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体制的长期延续导致了中国“文化产业”内在生命力的贫乏。

3. 症结所在：中国文化产业内在生命力贫乏的制度原因

这里需要就“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作出简短的定义。“极权主义”是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类型，指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全部垄断并实施控制；威权主义作为现代专制主义的另一个类型允许一定程度的经济、文化开放，但仍然保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请注意，以上定义的着重点是作为客观实存的制度形式与结构特征，与当政者的自我认知并不是一回事，与被治者对它的认同（合法性）也不是一回事。举例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按照这里的定义，呈现出典型的极权主义制度特征，但毛泽东本人却一直相信他是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前无古人的关于一个“完美社会”的现实可能性的实验；而且，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执政者通过自身显

示的高度社会动员的能力证明了在被治者那里获得的合法性——尽管严格地说，这种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意义的民本主义基础上，而非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然而，无论如何，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专制主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一片颂歌声中，使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文化跌入无底的深渊。任何真正的文化产品，都必须、也只能是作者内在精神生命的表达。试想：当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被要求只能用一种思想思考、用一个腔调讲话时，又怎么可能还有“文化”？

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市场化道路，“文化”作为一个“产业”也迅速膨胀起来，尤其是那些**有利可图**的行当，——这倒与市场经济的本性相吻合。但真正严肃的、有份量的精神产品仍极其难觅。那些揭露社会深层问题，反映作者独立思考的剧本、影视作品，那些思想敏锐、但带有“异端”色彩的学术作品，往往在层层严格的“送审”、检查制度下被“枪毙”，或软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俗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媚俗文化）的充斥市场，充斥街头，充斥银幕，甚至充斥网络。**这似乎正表明了当代中国威权主义体制所独有的文化特征：表面的文化市场繁荣与内在文化生命的枯竭并存，且前者正是对后者的掩盖。**一方面，威权主义需要制造歌舞生平的气氛以证明“国泰平安”；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任何“异端邪说”破坏“国家的稳定”。——当然，这种逻辑本质上讲仍旧是专制主义的逻辑。

现在要问的是：即便我们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这种“逻辑”真的有助于提升或实现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么？否。当一个民族内在的生命活力、文化创造力被自己的制度扼杀时，它怎么会符合民族的“国家利益”呢？当民族最优秀的大脑被禁锢起来，不允许思想更不允许表达时，这种人为制造的群氓状态又怎么会提升“国家利益”呢？

如果我们站在人类文明的普适性价值立场发问，则问题就更大了：构成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创作、文化产品“生产”之前提的，是对个体自由的**价值承诺与制度承诺**，而后者恰恰是数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一个文化群体要真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可能无视这个事实。否则，就真的会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那样，被“开除球籍”了。

中国文化的衰落与文化产业内在生命力的贫乏源于我们自己的制度——这就是本节的基本结论。至于当代中国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本身的由来、根据及其历史可理解性，这里只能简短地说：它既与特定条件下一代人的选择有关，也与我们的历史传统有关。是的，可能是由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群体过于古老了，我们在享受这份古老带给我们的荣誉之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扭曲是一个更加硕大、复杂的课题，此处就打住不表了。

4. 重建公民社会：“中国文化战略”的制度前提

我所理解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化制度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组成部分。制度现代化的另外两个结构部分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从功能上讲，公民社会被赋予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内在使命；从人类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讲，公民社会又是与人类物质再生产同样重要的人类精神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我们可以把出版、传媒系统和教育、科研系统理解为公民社会的两大“硬件”系统，它们大体涵盖了“文化产业”所指称的行业范围，尽管是从不同角度予以定义的。当然，还有一些行业没有包括进去，比如艺术作品的生产（演出业），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资源产

业，等等，但它们同样是精神再生产的重要领域。

根据本文提供的有关人类文明发展之内在张力的解释框架，我个人并不反对“中国文化战略”的提法——既然我们还要面对“主权国家”分立乃至对立这样的现实。但更重要的应该是认识到：这个“文化战略”的大方向乃是走向与人类文明主潮的同一。那么，什么是当今人类发展的主潮？民主化（包括民主化的价值准则与民主化的制度建构）、对个体的尊重（在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所谓个人与集体的对立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人的尊严与自由的不可剥夺、以及人与自然在更合理状态下的平衡发展。当然，“中国特色”总是要有的，而且非有不可，这就是体现人类价值普遍性的、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民族形式的特殊性。我们的文学、戏剧、音乐、影视，更遑论体现时代意识的哲学，都应该以活生生的中华民族的“这一个”堂而皇之地走进现代世界文明的殿堂。

那么，何以做到这一点？解构中国现存的威权主义体制是关键。“文化”及其“产业”不能是当权者意识形态的工具，这至少可以从两层意思上来解释：首先，建立在思想自由基础上的文化创作的多元化是文化繁荣的先决条件，也是文化的内在生命得以繁衍的先决条件。比如，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说这话的人是前两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裔作家高行健——“文学只能是个人的声音”；但我对他的下列感慨却深表赞同：“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2】其次，威权主义体制及其文化专制政策的结果，不但是对文化的扼杀，而且恰恰因此而损害了“国家利益”。我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就深有感触：这里接触到的，大量是关于中国否定性的报道。其实，这些声音也不一定都准确，为什么都跑到国外去讲呢？国内不让讲嘛！仍以高行健为例，他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回顾了作者文革时期的经历。我不认为他对文革的描写是全面的，虽然我承认作家有根据自己的感受描写任何对象的权利。问题在于这样的作品在国内发表不了，也就无法形成关于此类题材作品的正常的学术切磋与争鸣。结果呢？国外读者（他们通常对中国事物并不熟悉）只能从《一个人的圣经》这样的作品中，从一个被时代伤害了的个体对时代的过于情绪化的描写中（尽管作者自认为是冷静而冷峻的），获得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某种印象。——我担心，这样的印象很难客观、持平。

事情的逻辑就是这样：国内文化专制的结果势必造成国际文化市场的“一边倒”。从这个意义上讲，威权主义损害、而不是提升了“民族形象”，破坏、而不是捍卫了“国家利益”。这样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及其威权主义体制难道还应该继续下去么？

当然，鉴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不能指望变革在一天之内就告完成。所谓“解构”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相对艰巨的制度转型过程。作为也在从事精神活动、“文化生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我希望今天中国的执政者能审时度势，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摒弃“应对”式的僵化意识形态，逐步实现中国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制度重整，遵从文化生命成长的内在规律和文化产品生产的正常规范。如此，则将是中国文化之大幸，也是中国“国家利益”之大幸。同时，我想强调指出：文化变革及其制度前提——政治民主化——是全民族的事情，需要每一个公民来参与。一个民族只有越来越多的个体意识到自身承载的人类价值的份量并躬身实践之，这个民族才真正有希望。这也正是本文把“重建公民社会”理解为“中国文化战略”的制度前提的根本原因。【3】

注释：

【1】 参见卡尔·贝克尔“论《独立宣言》”，载《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北京，三联书

店 2001 年版，页 164。

【2】 见高行建“文学的理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载《一个人的圣经》“附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99 年版，页 470。

【3】 文化与文化产业既不应是意识形态的工具，也不应成为市场与金钱的附庸。这个问题对拟议中的“中国文化战略”同样很重要。但深入讨论之已偏离本文的主题，故从略。

（本文作于 2002 年 4 月，2003 年 6 月修改，首刊于《北京之春》2003 年 9 月号）

全球治理与民主

——兼论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重构

本文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政治维度**。在国内学术用语中，“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全球化问题的政治维度则多用“政治多极化”指称之。笔者以为，“政治多极化”概念的逻辑前提是对现存主权国家框架的非批判性认可，但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个主权国家框架本身及其蕴含的原则恰恰是已经被置疑的东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有鉴于此，我将引入“全球治理”这个近年来国际学界常用的术语，并赋予其更严格的哲学人类学含义。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全球治理代表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观，它的价值预设包含着对已经存在400年之久，既大大推进了文明世界的发展、又造成了当代文明诸多问题的主权国家原则的扬弃。

中国的民族国家战略也是在现存主权国家框架内形成的。而且，作为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大国（既拥有灿烂而漫长的前现代文明史，又曾在近代遭受列强欺侮），百年来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和民族国家战略的实施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烙印。那么，在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前提应该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对新的人类文明观的界定是站得住脚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外交”、“内政”政策又当作何调整？本文愿意就回答这些问题作出尝试。

一、全球治理：政治哲学视野中的人类新文明观

“全球治理”何以可能？根据何在？

俞可平曾把全球治理界定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¹²⁰ 作为一个描述性定义，这个界定还是比较准确而全面的。“治理”与“统治”不同，统治带有强制特征，治理则更多地指某种协商活动；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治理的主体则带有多元性（政府、非政府性民间组织、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协商主体）。治理又可分为“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治理是国内治理在国际范围中的延伸。”¹²¹

最后这句引文显然需要进一步讨论。事实上，当我们谈“国内治理”是一种**治理**时，我

¹²⁰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2年第1期，页30。

¹²¹ 同上。

们已经预设了某种**民主政体**的存在。因为只有在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统一于一个政治架构时，非强制的、以参与为特征的协商机制才可能建立起来并发挥效用。同时还应指出，民主政治架构下的国内治理，并不排除强力的运用，只要这种运用符合一国公共利益的最高要求。

“全球治理”就不同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全球统一的公共权力机构，还没有一个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相统一的全球政治架构；构成全球治理之国家角色的政府亦并不全是民主政府，这个事实意味着在以政府名义参与的全球治理活动中，政府的行动不一定代表该国公民的集体意志；更重要的是即便假设所有的国家都实行了民主政治，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治理就会按照合乎人类理性的最高要求顺利进行，因为**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可能冲突**并没有被消除。

不妨举个例子。污染和环境破坏是当今令全世界都感到头痛的问题，但对污染的治理“国内”场合和“国际”场合却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内”场合，对一条河流的污染治理也会遇到重重困难，河流上游城市对污染源的控制通常并不热心，因为这种控制不会使自己直接受益，反倒要由自己支付成本。但中央政府作为全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可以采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要求、引导、在必要时命令地方政府服从全局，哪怕牺牲某些地方的局部利益。而在“国际”场合，人们发现很难真正解决诸如空气污染物的越境排放、有毒废料的国际运输、濒危动植物种群的减少、全球臭氧层的衰竭等问题，因为此类问题都是跨出国界以外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解决之，也不愿意单独承担之。在联合国框架内形成的某些国际协议对协议签署国有一定约束力，但联合国没有权力命令哪一个主权国家在制止生态污染方面采取行动，尽管这种行动肯定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从理论上说，面对跨国问题时民族国家的本能选择，符合M·奥尔森所谓“集体行动的逻辑”。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强调没有人愿意付出成本在个人收益极小甚或负收益的情况下去增进所有人都会受益的公共利益。奥尔森曾以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个体厂商行为为例说明这个道理。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所有同一行业的企业对更高的产品出售价格有共同的利益，因为在这样的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肯定是一个统一的价格，除非这个行业中的其他企业也提高价格，否则单个企业不可能获得一个更高的价格；同时，这些同行企业对产品产出又有相对抗的利益，因为每一个企业都希望卖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谋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直到其商品售价低到接近其产品的生产成本为止。而当所有企业都增加生产时，势必导致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商品售价的行业性下降，从而导致整个行业的集体性损失。¹²² 这是一个两难。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个两难，企业通常会作出的选择。显然，没有哪个企业会主动停止自身的，通过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降低本企业商品售价而实施的牟利行为，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此类行为的后果是与整个行业的共同利益背道而驰的。一方面，企业会算这样一笔账：在完全竞争中每个单个企业是如此之小，以致可以忽略它的产出的增加对全行业价格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便单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会导致全行业的无形损失，但就本企业而言，行业损失分摊到自己身上的份额和利润最大化行为给本企业带来的收益相比，是无足轻重的。反过来说，一个企业如果因为预见到了行业产出的增加会导致价格的下跌而主动限制自己的产出，它蒙受的损失会更大，因为在别人不会作出相同的举动的情情况下实施如此“愚蠢”的行为，只会大大降低本企业的利润和利润率。

这是一个清楚的、关于企业**利害**的计算。本企业利益是全部计算围绕的核心。即便当计算的结果只是有利于本企业而显然对全行业的公共利益有损害时，按照这个计算实施行动仍然是所有企业的本能选择。

¹²² 参见M·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8~9。

现在，让我们把“企业”换成“国家”，道理似乎是同样的。国与国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地区的或全球的共同利益），也有利益不一致、乃至冲突的一面（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竞争往往构成这种冲突的背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学派都强调**国家利益**在理解国际关系构成和演变中的基础地位。现实主义视国际社会为一个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社会，在这种状态中，每个国家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求得生存和发展，所谓国际关系不过是追求“国家权力”和国家间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新现实主义虽然提出了体系结构的新概念，强调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但在民族国家中心论这个根本点上，新现实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却是完全一致的。¹²³ 问题在于，当自私的国家行为同样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时，它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¹²⁴

总之，如果说“是利益而非理想，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乃是理解国与国关系的箴言，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之间不会有真诚的互信”就将是一个可怖而又真实的结论。然则我们又如何理解今天的**全球治理**？在一个霍布斯式的国际语境中，在一个有条件利他主义和无条件利己主义成为支配性原则的国家行为框架内，全球治理是可能的么？如果我们沿着霍布斯的逻辑继续往下走，以协商而非强制为特征的全球治理就是不可理解的；面对奥尔森已经揭示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我们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如果全球治理是可能的，那势必意味着除了自私的国家利益构成国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力外，肯定还有**另一种力量**在发挥着作用。那么，这种力量是什么？它的基础又在哪里？

我们需要某种历史哲学，需要某种能够对迄今为止的集体人类行为和个体人类行为之动力学基础进行批判性检视和反思的**哲学人类学**。¹²⁵ 为了使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获得一个更坚实、更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理论平台，我们必须暂时离开那些具体的实践性话题，而把注意力集中于更具哲学性的抽象问题的阐述。

一个理解框架：

哲学人类学关于人性的基本设定和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

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代表着一系列从整体意义上研究人、理解人的

¹²³ 参见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页18～23。

¹²⁴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很多学者热衷于讨论的“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在世界无政府条件下，各国的安全和独立必须靠它们自己来保卫。然而，各国寻求安全的努力往往造成别国的不安全。当每个国家武装起来对付邻国时，邻国则会用同样的手段作出回应。竞争性的增强军备活动势必导致军备竞赛，而军备竞赛的结果会使所有国家的安全度降低，因为它增加了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潜在威胁程度。二战后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就是如此。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争斗中，两个超级大国都成了安全困境悲剧的牺牲品。（参见美国华裔学者熊玠所著《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余逊达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34～35）

¹²⁵ 有两位美国学者曾表达过类似的见解：“为了理解全球变革，我们认为一种历史主义的认知论和本体论是必需的。历史主义的理论目标，是以最接近事实的解释框架来认识人类团体面临新挑战时的变革模式，以及这些团体在霸权兴衰过程中的转型。”（参见Martin Hewson 和Timothy J. Sinclair 著、张胜军编译“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页50）

哲学努力。这种努力在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那里获得了早期的、同时又是权威性的历史形式。哲学人类学要揭示人的自然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而上本质，并反过来为所有关于人的具体科学提供统一基础。

我赞成哲学人类学的这一基本学术定位。在本文中，我将通过**生物性**和**社会性**这两个哲学人类学元规则的引入，为人类社会进化和当今全球治理的历史可理解性提供更为基础的人类学平台。¹²⁶

人类的产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生物性是人性的自然之根。这是一般常识都承认的东西。本文所理解的生物性则不但指人作为类在种系发生学上的那个原点，而且——更重要的一一乃是指人的一种本体性存在状态及其规定。作为本体论界说，“生物性”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概念，而是**哲学人类学**概念；但这个概念的抽象，又离不开百年来进化理论与生命科学提供的日益丰富、日益系统化的经验科学事实。

人的行为的**自私性**是本体意义上人之生物性的最普遍、最外在化的表现。就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都会验证这一点：当自己的所欲、所求与别人的所欲、所求发生矛盾或冲突时，我们会本能地产生追逐自身所求的心理意向，哪怕这种追求可能要以他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人性恶**是对这种现象的哲学概括。我在这里尤其想强调“意向”这个概念：说自私是人的心理“意向”或自然“意向”，表明“自私”与“不自私”并不全是主观选择的结果，也不全是逻辑判断的结果，而是有某种“前逻辑”的东西存在着，并发挥着作用。这是某种“深层结构”，是一般思维行程由以构成的自然基础，是一种以本能形式存在的东西。不管人类文明已经进步到如何“现代”的水平，我们仍然可以从人类个体乃至团体（包括国家）的基本行为模式中窥见到它的存在。

总之，**生物性**是人之本性的一部分，它不但代表着人类与自己的自然起点之间的联系，代表着自然强加给人的一种力量，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要素，它还制约着人类的行为，并以主观可感知的方式激发人的行为动机，使人类行为凸显其“自私的”、“为我的”乃至“唯利是图”的特征。千百年来，无论哪一个种族，哪一块地域，人类经过无数次繁衍和生命的代际相传，这个基本的事实却从未有所改变。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某种**内在于人的东西**，是人的本体意义上的存在状态之一，也是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力之一。

然而，仅有生物性，我们肯定不足以解释历史，甚至历史一天也不会存在。因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并非离群索居，而是社会性的集体合作。如果人们的行为只有“自私的”、“为我的”、只尚竞争不善互助、甚至具有狼一样凶残好斗本质的单一向度，则这个逻辑的推演结果只能是人类自身的毁灭。人类的合作也不能仅仅在蚂蚁或蜂群合作的意义上理解，因为后者仍然是基于纯粹生物学力量的本能行为，是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是纯粹服从自然界法则的结果。人类的社会性与此有本质的不同。**构成人的社会性的根本点是人的理性**，这既是一种只有人才能实施的文化创造行动，同时又是该行动的产物，是文明积淀——也即人类文化创造成果的代际累积——的产物。语言和经由恩格斯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劳动乃是文明创造之所以可能的重要支点，正是它们使人类摆脱了纯粹由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普通生物界，而成为这个宇宙里特立独行的一族。理性认知能力、理性判断能力、理性交往能力都是成熟人类个体之社会性的重要表征，社会性使人类学会合作，学会抑制自己的自然冲动，学会理性地反观自身、反观自己

¹²⁶ 在1988年出版的中文著作《经济行为与人》和1994年出版的英文专著《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社会生物学》中，我曾提出从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角度理解人性的哲学人类学学术构想。本文所述，可以被视为这个构想的进一步展开。

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从而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创造自由。社会性还使人类学会创设各种各样的制度设施以调节、整合人类的物质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整合体现在这些再生产过程中、并使之由以进行的各类人际关系，使人类个体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我们必须说，社会性也是某种内在于人的东西，是人的重要的本体性存在方式。¹²⁷

我把生物性和社会性理解为社会进化之哲学人类学的“元规则”，其意是指它们构成了历史运动之可见系列的更深层次的规则系统，是在历史背后起作用的更为根本性的东西。它们代表着历史深处最为隐秘的力量；除它们之外，我们不可能再发现其他始基性力量的存在。元规则系统构成历史解释的始基点，所有有关历史运动的现象描述的规则都可以从这个元规则系统中找到最终根据。当然，鉴于人的双重本性问题的复杂性，有些命题尚未得到足够的证明，这使本文关于哲学人类学元规则的论说仍带有某种假设（或假定）性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据此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判断一个学术命题的价值和可靠性，很重要的是看它的逻辑可接受性和科学可延展性，看它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概念问题时所拥有的战略价值。我深信，就人类发展的社会进化本质课题来说，哲学人类学关于双重人性存在的元规则论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武器。

社会进化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全人类普适的发展过程，它的基本逻辑有二：第一，既然是普适的，它对全世界所有民族都适用；各民族历史演进的具体差异无非是以正面（遵从）、或反面（扭曲）的特殊性证明社会进化本身的普遍性。第二，既然称“发展”，社会进化是有方向的，但又是生成性的，社会进化本身并无任何预定的或前定的目标。换言之，我所理解的“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遵从黑格尔的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但拒绝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目的论。

社会进化的两大驱动原则：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

社会进化在三个结构领域内进行：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整合结构。前两个领域变革的驱动力主要立基于利益原则，社会整合领域变革的驱动力则立基于公共理性原则。为了方便下面的讨论，这里需要就利益范畴和公共理性范畴给出一个简明的界定，然后将我们回到民族国家和全球治理的主题。

“利益”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是一个关键性、枢纽性术语，本文前面已经使用过它。在目前这个讨论阶段，我们可以把利益界定为表现为个人或团体动机的、人们在政治行为或经济行为中意欲追求的东西。抽象的、非历史的个体单独性存在，无利益范畴可言，利益总是预设了行为目标即包含一致一面、又包含冲突一面的某个范围的人类群体的存在。人们对自

¹²⁷ “显然，无论从逻辑角度还是历史-发生学角度，人的生物性都构成其社会性的前提；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提供对人的总体性解释。至于过去那种传统理论下的‘标准模式’，由于把人的‘社会性’不适当地置于凌驾一切的位置之上，结果，只能在导致‘社会性’与人的其他属性割裂化的同时，使这一本来带有相当多真理成分的命题本身虚无化。当然，另一方面照样成立：无论生物性对理解人的本质如何重要，却恰恰是社会性这个包容着种种人类精神文化、物质交往、理性积淀、价值追求全部丰富性的本质属性，才是人作为人、以人的名义立于宇宙的最终根据，人的生物性必须通过社会性得以升华。”这些写于1988年《经济行为与人》中的概括性文字，我认为基本上还是站得住脚的。

身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文明进化的根本原动力。

在以民主体制为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领域内，利益范畴既与公民权利相联系，又和公共权力的合理运作相关。利益表现为公民权利，说明利益获得了合法形态，这是近代史上的重大进步；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往往没有止境，且一旦利益与权力挂钩，以侵犯他人合法利益为特征的非法牟取利益的行为就会扩散开来，成为社会癌变过程的开始。为了防止公共权力被权力的本性所腐蚀，监督、制约公共权力受托者的行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也为了根绝权力腐化势将给社会伦理造成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后果，建构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以规范现代政治行为就成为必然。数百年来，特别是最近 100 年来人类的政治实践史已经为此积累了极为丰富、亦相对成熟的经验。民族国家范畴内的**宪政民主体制**就是这些经验的**结晶**。在经济领域内，利益范畴主要体现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可以把这个逻辑大体归结为四个方面：自主行动的个人，以谋取利润为目标的行为动机，实现利润手段的合理化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竞争体系。读者从中不难体会到马克斯·韦伯所谓“价值合理性”向“目的合理性”的转变，这的确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经济结构变迁意义上的巨大分野。这个转变造就出迥然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现代经济行为主体，也造就出迥然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现代利益格局。

从哲学人类学的本体层面看，作为本体逻辑的利益范畴一方面凸显了政治、经济行为中人的“自私的”自然本性的始基性存在，凸显了这种本性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巨大功能，同时也凸显了以现代制度形式呈现的人之理性、社会性对生物自然本性的制约和超越。不过，鉴于政治、经济领域之现代制度设计仍然必须遵循“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利益制约利益”的目的合理性原则，社会性在这两个领域对生物性的克服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后者的存在为真、且须加以利用的基础上。因此，这是一种“扬弃”。社会发展通过现代政治、经济制度设计所实现的人性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是**立足于自然本性的社会性**之超越。

公共理性原则是与利益原则并存的另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或范畴是通过公民的社会交往行为予以体现的。¹²⁸ 毫无疑问，社会交往行为要以公民的个人权利为基础，但公民权利通过社会交往行为所要表达的，却不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诉求，而是某种超越了一己利益的公共意愿或意志。一篇大学讲演、一部小说、一台艺术作品的公演，只要它传达了此时此地公众的所思所想，并符合了、代表着这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品本身就被赋予某种“形而上”的品格，发表作品的个人也在同时完成了某种**转换**：这部作品既是个人的声音，又是公共的声音；且首先是作为公共的声音，它才能真正引起社会共鸣。这样，公共理性范畴赋予社会交往行为的逻辑是：公民个人意志**直接**表现为公共意志，公共意志**直接**通过掌握了时代脉搏与社会发展趋向的个人意志加以表达，而不再借助那些体现了“历史的狡猾”之历史运作特征的中介形式。

公共理性同样表征人的社会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公共理性的本体论根据就是人的社

¹²⁸ “交往”（communication）本来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建构中的核心术语。在哈氏的概念界定中，与追求功利目标的“战略行为”不同，“交往行为”的目标是达至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在交往行为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世界是一个“生活世界”，其哲学根据是**主体哲学**向**互主体哲学**的范式转变（见 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Vol. 1), 1987 (Vol. 2)）。从直接动机看，这个形成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批判哲学构造意在为发达世界的“现代性”困局寻求出路；但鉴于哈贝马斯哲学蕴含的深厚的历史感，我以为在概念意义上构建社会进化和制度现代化的**抽象结构**模型并在**现象逻辑**水平上展示其内在关系时，哈贝马斯的工作对我们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所用的“社会交往行为”这个术语，其意很接近哈贝马斯的“交往”概念；但我只把这个词用于**现代公民社会**的讨论。

会性。然与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情形不同，现代公民社会之公共理性由以确立的哲学人类学元规则，不再是立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性，而是直接以社会性之本真面貌出现的社会性。换言之，社会性通过公共理性所表达的，乃是人的道德的、价值的、精神的存在。这些东西作为人的本体存在，具有更为根本的**独立意义**。不妨做个比较：在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解中，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¹²⁹ 要想取得较低交易成本的经济市场和有效的政治市场，则需要有诚实的、合乎理性的、“好的”道德行为准则。¹³⁰ 这些说法固然都不错，但它们基本上是一种功能性的论证，而非本体论论证。我要说的则是，人的社会性在本体论意义上本身就是独立自足的，它的功能性特征只能导源于其本体论特征，而不是相反。

就公共理性的内在逻辑言，公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主体，而且是作为互主体关系中的主体，作为民主宪政社会中的一员，参与公共领域的事务。换言之，当一个公民不是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经济人或谋求政治权力的政治人，而是作为与纯然个体利益追求相对立的社会公共利益之伦理主体从事活动时，他的行为中所包含的本体的、理性的、自觉的社会性之本质就得到了明白无误的呈示。再重复一遍：这种社会性不再是立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性，不再是虽代表文明的内在生长力量、但又不得不屈就于文明的历史形式的社会性，而是直接生发于道德理性积淀的社会性，是直接以自由法则立身、立言的社会性。

我以为，全球治理由以立基的、政治哲学视野中的人类新文明观，就建立在上述关于人的本体社会性的理解基础上。当然——前文已指出——社会进化既是有方向的，又是生成性的。下面，我们就将进入对民族国家问题的检视，全球治理中隐含的哲学人类学原则将会通过这种检视，以历史发生学的形式引申出来，

二、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与有限性

“主权”与作为利益原则体现的现代民族国家

现代民族国家是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组织方式。“国家”是个政治学概念，“民族”则是文化学概念，“民族国家”意味着某个政治-法律共同体和种族-文化共同体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统一。¹³¹

“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构成要素。近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主权说，由十六世纪的法国人让·博丹创立。他于1576年著《共和六书》，提出主权代表国家最高权力。鉴于当时的欧洲正是教会与君主争雄的时代，我国有的研究者指出当年博丹创主权说，其目的乃在为

¹²⁹ 参见D·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页48。

¹³⁰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页169。

¹³¹ 阿伦特就曾指出：“只有当民族归属和国家机构相互融合并使民族的思维一体化的时候，民族国家才能够成立。”（转引自川崎修著《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斯日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39）哈贝马斯则强调“在民族国家的自我了解之中，永远存在一种冲突：一方是平等法律共同体所彰显的普遍主义，另一方是共同起源、命运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所代表的特殊主义。”（参见《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70）

王权提供理论基础。¹³²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主权和领土、人口一起成为近现代国际关系框架内民族国家的三大组成要素，国家主权概念逐渐发展为国家间相互认可的核心。一般认为，国家主权有两大特性，一是主权的无限制性，一是主权的不可分割性。截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 20 世纪中叶，国家主权的这两个属性都没有遇到根本的挑战。

从本文逻辑着眼，我更想强调的是**主权所体现的民族国家范畴内的利益原则**。民族国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作为一个特定层次的人类利益共同体登上历史舞台的。无论在民族国家内部实行的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它**对外**都会以一个统一的利益共同体的面貌出现。事实上，民族国家作为**主权国家间关系**的确立，通常都会有利于、而不是有悖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认同。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建立的国家间关系框架在承认每个国家行动**自主性**的同时，也承认国家行为的**自私性**。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曾指出：

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描述了一种世界秩序的发展过程，在这种秩序里，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领土性的、拥有主权的国家，在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权威；国家在私下里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也会使用武力手段；它们致力于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合作却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它们还努力想把自己国家的利益置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之上；此外，它们都接受有效性原则的逻辑，那就是说，这个原则可能最后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承认——合适性成为了合法性。¹³³

总之，这既是一个各自独立的、至少在形式上平等的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社会，又是一个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征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对利益的追逐是所有国家间关系博弈的永恒主题，不管它们表现为有限合作还是不间断的冲突。如果说，在民族国家内部，基于利益追逐而产生的公民之间的冲突还有公共权力机关作为它的仲裁者，那么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框架内的国际社会场合，我们则看不到这样的仲裁者。文明必须借助野蛮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

征服者逻辑：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二律背反

200 多年前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曾言：“美洲的发现，经由好望角去到东印度的通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记载的两个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事件。它们的影响已经是非常之大了；但在发现以后所经历的两三个世纪的短时期内，还不可能看出其影响的全部内容。人类的智慧不可能预见到，这些重大事件今后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或什么不幸。”¹³⁴ 出言谨慎的斯密没有敢就地理大发现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作出明确判断。今天我们则可以断言，以地理大发现肇其始的，先是商人利益、后迅速演化为（上升为）民族国家利益的追逐者成为“未开化”地区的征服者，乃是把个体水平和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利益原则贯彻到底必然会引出的

¹³² 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页 33。

¹³³ 戴维·赫尔德（D. Held）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51。

¹³⁴ 亚当·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下卷，页 686。

结果。

纵观人类历史，不难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不同民族群体彼此相遇、发生关系时，民族群体只有利害的衡量，而鲜有克制自己利益冲动的道德理性。这似乎既可说明古希腊时代雅典的对外征服，也能说明近 400 年以降欧洲列强的扩张行径。据西方学者研究，现代国家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象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些城市国家的统治者都强调国家有独属于自身的利益。他们创造了国与国交往的外交程序，包括驻外大使的制度，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国家最“现代化”的行动则是他们的“帝国主义”的对外征服行动。¹³⁵ 后来在欧洲大陆崛起的专制王权国家继承了这个传统。民主制取代王权，并未改变“集权”的中央政府与国家“主权”同一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与“主权”概念相联系的国与国关系的性质，包括弱肉强食的征伐逻辑。

那么，这个史实意味着什么呢？它不但意味着“主权”与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利益才是导致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一个对内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完全可能同时执行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¹³⁶ 从时间上看，西欧民族国家成长和殖民扩张的黄金时代是 19 世纪，而这个世纪又正好是欧洲民主走向成熟的世纪。这两个历史概念在时空上的重叠是意味深长的。有些人否认民主国家也会对外侵略、扩张，如著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 J·罗尔斯。在他的《万民法》中，罗尔斯强调自由人民与传统国家间的差异“在于正义自由人民将自己的基本利益限于合理性要求的范围之内”，因此，至少在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为了使自己的论证首尾一贯，罗尔斯竟断言对外扩张的古雅典并不是民主政体，而是由 3.5 万名男性议员统治大约 30 万人口的独裁政体！¹³⁷ 这种理解的任意性和非历史性确实有些令人吃惊。

对内实行民主制度和对外执行扩张战略的共存，是被称为制度现代化先行者的那些欧洲国家重要的国家现象，也是社会进化在政治领域内的一个明显悖论。本文将此称为“征服者逻辑”，该逻辑凸显了政治文明发展动力所内具的二律背反。这就是：一方面，当利益表现为权利和对权利的诉求时，利益推动了民主，促成了以昭示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制的萌生与确立；另一方面，民主又在民族国家水平上强化了追逐利益的驱动力和实施这种追逐的能力，而据弱肉强食规则展开的“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又与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人类共有的普适价值相冲突。

这个二律背反的存在，证明了民族国家层面上确立利益标准所必然带来的局限性。虽然从历史哲学意义上讲，殖民者的经济图谋往往导致文明向不发达地区自然辐射的、不期然

¹³⁵ 参见爱·伯恩斯和菲·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 卷，页 125。

¹³⁶ “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体系的‘深层结构’之核心可以归结为一系列显著特征，主要包括：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关系和不同国家之间的非民主关系；在民族国家自身疆域内对责任和民主合法性的确立以及在民族国家疆域外对国家利益（和最大化政治特权）的追求；对所谓的‘自己人’实行民主和公民权利，而对那些国界之外的人则经常否定这些权利。”（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页 68）

¹³⁷ 参见 J·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31～32、页 55～56。当然，罗尔斯也谈到“现在已确立的宪政民主制民族从前也进行过帝国建设”，但他表示“在此我不能对这几百年间的事件作出解释”（同上，页 57）。总的来说，利益驱动与征服者逻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中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该书页 97 谈到自由社会有时也为财富而战并断言“这仅表明它们行事错误”时，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的社会后果，且至少出于建构更安全、更理想的投资环境之目的，“先进国家”也会注意乃至实施向“落后国家”的**制度输出**，从而——就象费希特所讲的那样——“间接地促进了整个人类的自我实现”，¹³⁸ 但就事情的直接起因言，以本国利益追逐为根本动力的经济扩张乃至领土扩张行为，毕竟有道德上**罪恶**的一面。征服者一方往往用自身经济、技术、组织建构的先进性证明征服是一种合理行为，是“有资格”进行“统治”的行为，其实，真正关键的东西还是利益。人类的相互征伐（不管发生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还是发生在势均力敌的大国之间），都曾付出巨大的生命和物质财产代价。20 世纪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代价的最近的、也是最为惨烈的例证。

民族主义问题种种

这一小节，我们来讨论主权国家框架内、与民族国家利益之争相联系的民族主义问题。

诚如前述，“民族”本来是一个文化学或文化人类学概念，这个概念承载了对拥有共同文化传统、使用同种语言、保留同样文化-宗教习俗的文化共同体的自然认同乃至崇拜。艺术作品往往是呈现这种认同或崇拜的最佳媒介。西贝柳斯的《芬兰颂》、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冼星海的《黄河颂》都是表达“祖国”情结的优秀音乐作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祖国”的热爱，对“家”和“家乡”的热恋，对本民族的赞美，实际上是一种全人类的共通情感。当我们聆听到“弗尔塔瓦河”那优美无比的旋律时，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也会产生由衷的感动之情。在这里，音乐所传达的审美的非功利性恰恰表达了全人类都有的对本土文化眷恋的纯真性。它可能是非理性的，但却绝对是真挚的。

民族主义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英国学者埃里·凯杜里指出：“民族主义是 19 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它自称要为适当的人口单位作出独立地享有一个自己的政府的决定、为在国家中合法地行使权力、为国际社会中的权利组织等，提供一个标准。简言之，该学说认为，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能被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¹³⁹ 根据这个定义，民族主义是和民族国家相联系的一种东西，**民族主义赋予“民族”新的政治内含，它或是表现为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据此表征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或是表现为民族国家催生的社会运动而具有某种思想动员功能。**而无论是上述情形中的哪一种，民族主义都会诉诸文化的同质性作为力量的源泉，同时也会诉诸民族情感中的非理性特质作为动员手段。

在为利益而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关系框架内，民族国家可以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先进的”（即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较前位置的）、并具有扩张倾向或者已经实行扩张政策的国家，一类是“落后的”（现代化的后来者）、且面临外来威胁或者已经被部分殖民化的国家。在扩张性国家中，其国内政治制度既有实行民主体制的，又有实行极权或威权体制

¹³⁸ 费希特把国家间的战争视为“将一种有生命力的和进步的原则引入历史”的机制。在他看来，人类往往局限于不同国度的片面文化，而将自己的文化视为真正的和唯一的文明。国家间的征服活动有助于提高人类整体的文明程度。战争结束后人们会发现，在任何时刻，文明的最高发展点总是处在暂时战胜其竞争对手的那种国家。（参见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页 47）

¹³⁹ 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页 1。

的；而在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中，绝大部分都保留着前现代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或者即便形式上已完成现代制度转型，骨子里仍然是专制主义。

与上述不同民族国家类型相联系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

对于那些“先进的”、国内实行民主制度而又对外实行扩张政策的国家来说，其民族主义兼有自由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特征。当民族主义表现为崇尚自由贸易、推进市场改革和经济全球化时，民族主义是体现自由主义原则的民族主义；当民族主义成为政府争夺海洋霸权和海外殖民地的动员手段时，民族主义又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事实上，欧洲的许多“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特别是大英帝国，其民族主义都有这样的双重特点。正是在这些国家身上，征服者逻辑获得了最典型的历史表现形式。

对于那些对内实行极权或威权统治、但又热衷于对外扩张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民族主义多带有沙文主义甚或种族主义的浓重味道，或干脆就发展为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19 世纪的沙皇俄国和 20 世纪的德、意、日法西斯诸国都可以划入这个范畴。这些国家并不是现代化的排头兵，它们也曾面临更先进的民族国家的威胁；存在于这些民族灵魂深处的、有关本民族天生优越的非理性情感以及那种被认为极其神圣的对本民族的忠诚感被天才的独裁者所调动，其结果是，它们的对外扩张和追逐利益的行为往往更加赤裸裸，更加肆无忌惮，它们对弱势民族的伤害也更加深重。

最后，对于那些“落后”的、受到威胁的前现代国家或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当然首先是与民族自强相联系的一种动员力量。无论这些国家是因弱小而落后，还是因传统而落后，民族主义都会自然成为鼓舞人们奋斗的精神源泉。不过，事情还有更复杂的一面。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通常都会引起社会内部的结构紧张，外来文化的冲击往往会加剧这种紧张，甚至导致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很容易成为当政者手中的政治整合工具。统治者从来都会宣称自己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乞灵于神圣的民族情感使之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是许多统治者的拿手好戏。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固然首先与追求民族解放或民族复兴相联系，但国家独立不一定就同时意味着国内公民的自由和独立。这里涉及熊玠所说的一个“历史嘲讽”，即非殖民化带来的自相矛盾的结果。“反殖民统治的力量有一个统一的信念是，只有在政治上独立，人们才能实现自尊；只有在领土上独立，国家才能构建发展的框架。但是正如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接近完成的非殖民化进程所见证的那样，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国家地位的赢得既没有带来发展，也没有带来自尊。”这是就国家而言。就个人而言，“自治的允诺之一是，在政治独立的自由气氛中，个人将会在充分享受他们的人权中，得到包括自尊的满足。但是在曲折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后出现的后殖民时代国家中，国际法意义上的个人命运仍没有改进。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自决几乎被降为国家实现狭隘政治目的的工具，而不

是把人民从强加的政治控制下解救出来的工具。”¹⁴⁰

这里，笔者还想就与“民族主义”关系密切的另一个概念“爱国主义”再写几行字。在常识性观念中，爱国主义向来是一个表征崇高的词汇。其实“爱国主义”不可泛泛而论。有本真的爱国主义，也有变了味的爱国主义，其性质要依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本身的性质而定。我以为，只有那种非功利的、纯粹与热恋自己的文化母体这样一种纯真感情相联系的爱国主义，才是本来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相联系的爱国主义是勇敢的爱国主义。与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相联系的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爱国主义。与专制主义和本土政治压迫相联系的、作为专制政权合法性论证和精神欺骗剂的“爱国主义”则是虚伪的爱国主义。与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相比较，那常常被压制的、对本土政治压迫的反抗，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显然，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样都被打上了过于浓重的政治印记。

如何超越民族国家水平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集体行动的逻辑”？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由大约 180 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共同体，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法律平等，被视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在社会进化意义上，民族国家作为较高层面的人类共同体之组织结构和精神建构原则，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现代公民权利概念、合法政府和有效管理概念、政教分离概念、民族文化和情感积淀成为“综合国力”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至少就起源或发生学语境言，都是和民族国家相联系的，也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发展起来的。有效的市场运作框架的确立同样离不开民族国家。即便是在最保守的意义上理解“市场守夜人”，政府同样要担当起市场游戏规则的制作者和保护者的职能；而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这些职能和相应制度安排所体现的，恰恰是人的本性中我们称之为立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性的那一部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人的本真意义上的社会性的公共理性也是在民族国家这块园地里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民族国家范畴内的公民社会。“治理”作为某种理性的协商过程，作为公民、社会团体和政府双

¹⁴⁰ 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页 173～174。埃里·凯杜里也认为民族主义和政治自由很难相互协调。他指出：“在任何情况下（这个状语表达的有些绝对——引者），民族政府和宪法政府都未必能够走到一起。希腊和巴尔干国家成功地摆脱了奥斯曼帝国获得了独立。这一所属地区的苦难是民族的苦难；他们被一个操有异国语言、信仰异国宗教的政府所统治。但是，他们赢得独立后一波三折的历史显示，民族自由并不是防止压迫和不公正的政府的保证书。”凯杜里甚至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并非是欧洲的统治在亚洲和非洲制造了贫穷、技术落后、人口过剩和专制传统——相反，而是这些方面使欧洲的海外统治成为可能；并非由于欧洲统治者在如此短暂的统治时期之后的离去，便可以改变这些地区的本质，将他们的贫穷转变为财富，或突然之间创造出法官的正直、政治家的稳健和热心公益事业的精神、公务员的虔诚。”（凯杜里《民族主义》，页 102～103）

边或多边的谈判、交流过程，它的最初舞台就是民族国家本身。

一句话，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现代化（包括器物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两方面），都是在民族国家这个历史平台上造就的。

然而，一旦我们把视角转向**民族国家间关系**这个更广阔的国际领域，民族国家行为所体现的社会进化意义上的**历史局限性**或**历史限定性**就暴露了出来。当世界被看作是一个由若干单个政治实体（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彼此都宣称没有高于自身主权的更高权力存在的、且各国都把自己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捍卫自己的利益乃是民族国家之天职）的这样一个场景时，这不是一个霍布斯式的国际社会又是什么呢？诚然，现代国际法承认每个主权国家身份上的平等，但这并没有阻止、更不能否定征服者逻辑的存在和盛极一时。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霍布斯的教导：“自然使人在身心两个方面的能力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个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个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向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正是由于人类个体本质上能力的平等，“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想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来自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由于人们这样相互疑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总之，“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¹⁴¹ 把“个人”换成“国家”，这段血淋淋的描写，难道不正是主权国家框架内民族国家间关系的真实写照？

对当今人类来说，成为问题的并不是是否承认国际关系领域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真，而是当人们遵循**利益原则**这个体现了我们这个物种的“自然法则”、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行事时，这个逻辑——就其展开后必然达到的终局而言——已经把**人类整体**带入毁灭。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人类已经拥有足够的毁灭自身的能力，这是冷战时代美苏核竞赛留下的遗产。当文明整体都归于毁灭的时候，再谈什么“适者生存”难道还有意义么？

当然，我们也可以退一步，仍把民族国家想象为和平的、只是在为经济利益而竞争的“企业”。这样是否就有出路呢？否。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已经充分证明了纯然从一己私利出发，人们之间不可能有真诚的合作，公共利益也不可能在个体主动承担成本（为集体而付费）的前提下实现。假如这个世界不存在“稀缺”问题，假如我们的地球真像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先哲所认为的那样有着“人化自然”的无限可能性，也许我们还可以坦然面对奥尔森揭示的逻辑真理而不必惊慌失措，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逻辑现实，而非**现实**之逻辑。但**今天的现实**已经实实在在地告诉人类：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是有“稀缺”问题的，它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有些则是不可再生的。如果说过去由于人类开采这些资源**能力**的有限，出现某些局部性的“公用地的灾难”还不足以成大患，那么如今市场经济和牟利原则在全球水平上的覆盖，已经导致各种类型的、且都是致命性的“公用地灾难”的成倍增长。这里不必细究是资本还是民族国家应该对此负责；事实上，在对外捍卫“权利”、牟取利益方面，民

¹⁴¹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页 92～94。

族国家往往是更加强有力的主角。¹⁴² 可怕的是，面对这种大家都在竭泽而渔而导致的“囚徒困境”，等待我们的，恐不是多判几年徒刑，而是人类整体的自我绞杀。¹⁴³

就一方面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制造出诸多文明困境这种双重意义言，民族国家所体现的“恶”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符合历史本身的辩证法。在哲学人类学层面上，我们这个物种所内具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本性——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也在民族国家水平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文明发展的二律背反，我们是否有出路？出路又在哪里？我想再一次强调前文已经表达过的观点：社会进化是有方向的，同时又是生成性的。它是一个不断向前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和纠错的过程。借助利益杠杆，民族国家获得了足够的生长空间和长足的进步，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而在民族国家成长中锻造出来的公共理性和各种表征人的社会性的更复杂、更合理、更丰富的制度安排，则为我们这个物种进入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更高的人类生存境界提供了可能，铺平了道路。这就是下一节我们要详细讨论的“全球治理”。本文所谓“政治哲学视野中的人类新文明观”也正是在这个语境下蓄积而成，并自然推出的。

三 利益原则的扬弃和全球公共理性的勃兴

可以把本文所理解的、构成全球治理之内在依据的人类新文明观概述如下：

¹⁴² 约瑟夫·凯米来里和吉米·福尔克指出：“主权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从地理上将国家从全球行动中隔离开。一个主权国家在其范围内作出导致全球环境恶化的决策，它可以用合法的主权选择进行辩护。其结果是，国家可以用远远超出其自身主权范围的方式破坏环境，国家可以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说因为它发生在主权管辖范围内，所以是正当的。美国和加拿大关系为此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例证。很显然，有一段时期，降落在加拿大东部的酸雨 50% 来源于美国。根据现行的国际法，造成跨国空气污染的国家有责任采取措施，降低对其他各方造成的影响。但尽管经过多次谈判，美国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特别措施，以减少排放对加拿大造成的跨国影响。”（约瑟夫·凯米来里和吉米·福尔克著《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李东燕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27~228）

¹⁴³ 安东尼·吉登斯曾言：“如果现代性延伸到全世界并且自相矛盾，那它就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哈贝马斯对此的解释是：“一方面，现代社会无法再把社会再生产的后果——它表现为系统化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外化，即不能再把这些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和社会，转嫁给子孙后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可以动用的外部资源越来越少，它必须日益依靠自己来再生产其基本条件。”当然，人们可以乞求于“反思性”来解决现代化的后果问题。“‘反思性’既可以从系统机制‘自我调整’（卢曼）的意义上理解，也可以从集体行动者的‘自我反思’，即自我感觉和自我作用的意义上理解。前一种反思性的例证是通过市场经济手段解决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后一种反思性即自我反思的例证应当是通过全球化市场的框架条件施加政治影响的方式补充全球化市场。系统论主张通过反思性的机制达到自愈。但这种设想是行不通的，因为只关心自身利益的社会子系统看不到它所引起的外在代价。”还是阿多尔诺说得对：“显然，部分的现代化有损于整体的现代性。”（参见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载《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页 87~88）

● 人类是一个整体。这不但基于“只有一个地球”这样一个无需讨论的事实，更基于一个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人类只有真正把自己当作**整体**，人类自身才有救，才有希望。

● 当今人类**社会进化**所达到的水准已经为人类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这就是**利益原则的扬弃**和**全球公共理性的勃兴**。

● “恶推动文明的进步”曾经是我们这个物种最为诡秘的发展法则，如今它已接近自身的**极限**。至少就政治领域言，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已经要求建立与它相适应的全球制度形式和新的交往准则。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讲，这些制度、准则所体现的更多是人的本真意义上的社会性，而不是（或不再是，至少不再仅仅是）立足于生物性的社会性。

全球治理的**历史规定性**正在于此。这束必将普照世界的光其实来自文明进化的深层力量和保存我们这个物种、保存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的自然渴求。从长远看，以各民族国家利益为轴心的主权国家体系必将被更能体现全球公共理性的政治框架所代替，世界秩序的性质和它被维持的方式都将因这种替代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替代过程完成之前的、可能是相对漫长的过渡期内，现存民族国家能否主动调整自己的国家战略，完善自身的民主制度建构，在抑制自私的国家唯我主义冲动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人类新文明的建设，就成为检验其**当代化程度**的标志。

现在，我想在刚才给定的理解框架内讨论全球治理和民主建构的几个具体问题。

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出现与全球治理

作为全球治理手段而出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既是现存主权国家体系的产物，又是**扬弃**这一体系的开始。

当代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最典型代表就是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这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大会上，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每个国家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同时又受其限制。但是，不要由此得出结论，似乎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时代已经完全取代了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逻辑。

由宪章（以及相关的文件）所设计的国际规制的图景是“国家仍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主权’”，但现在却被各种各样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在原则上服从于诉诸武力的严格约束；在压力下通过和平手段并根据合法的标准解决争端；对待其领土上所有的人，包括它们自己的公民，也被迫遵守“某些特定的标准”。¹⁴⁴

显然，这是一种有趣的、然而又是意味深长的制度安排。在联合国框架内，每个民族国家都是一个具有独立身份的行动主体，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要承担自己该承担的法律

¹⁴⁴ 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页 89。

义务。这有些类似于民族国家内部每一个公民既是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组成元素，又是独立自存的行动主体。然而，比较中的相似点也就到此为止，余下来的将是不同点：在联合国，虽然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只是为商讨、处理国际事务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政府间协商机制和体制，而不是民族国家范围内存在的公共权力机构，但联合国的存在本身及其建构原则，特别是这些原则的实施结果，却趋向于对各国主权的限制乃至**削弱**。在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不存在“削弱”问题，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公共权力的委托与受托的关系。在没有建立起全球水平的、全人类共享的公共权力机构和委托-受托关系之前，借助民族国家政府实现全球协商，是一种自然的、方便的组织形式。但不可以忘记：这只是全球治理的组织形式之一（还有许多非政府合作形式的全球治理），且是一种**需要扬弃、也正在扬弃中**的组织建构形式。

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公共理性和人类共同利益借助联合国这一组织架构已经获得重要的成长土壤，并结出某些果实。比如，认定侵略战争非法和集体安全框架的推出。据熊玠的研究，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前，人类就已经作出认定侵略战争为非法的努力。1928年《巴黎条约》（也称《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的签订，标志着人类历史上否定战争为国家间关系中的“政策工具”的第一次成功。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则强调自卫是一种可以单独或集体使用的权利。如果说单独自卫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自助”行动，那么集体自卫则拥有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的含义。“集体安全”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对非法使用武力行为的“群体反对个体”的回应，这里，“群体”指的是一个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个体”则指在群体中突然冒出来的挑衅者。¹⁴⁵ 1990年为制止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占领而由联合国授权实施的多国部队军事打击伊拉克的行动，可以说是体现“集体安全”和国际公正概念的一个现实例证。“9.11事件”后，全球针对恐怖主义形成的联盟在稍许不同的含义上提供了另一个例证：“基地组织”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政权，但同样是一个威胁人类和平的策源地。有人讲，“集体安全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世界政府之间的中间站”，这话可能夸张了些；但无论如何，说“集体安全体制意味着向背离体系无政府状态方向迈出了一大步”，¹⁴⁶应该是一种正确的、恰如其分的描述。

关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建构，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个例子：欧洲联盟。这个例子所涉及的虽主要是地区性治理而非全球治理，但它的实践所蕴含的某些原则性的东西却颇值得深思。

欧盟制度建构上的特点在于：它不但是一个依靠政府间协议组成的组织，而且建立了某些**超国家主权**的机构。专事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几位中国学者胡瑾、宋全成、李巍指出：“无论从机构和功能上看，欧洲联盟既具有超越民族国家主权范围的、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的机构，又具有履行超越国家主权范围的功能，**欧洲联盟具有超国家的权力**（——加重号为引者所加）。就一般的理论意义而言，区域一体化是主权国家在利益协调的基础上的结合，是以群体（一体化组织）行为代替或取代个体（民族国家）行为的一个过程。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发生部分的国家主权与权力向着一体化的组织转让的进程。这在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的发展进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欧洲联盟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体制化程度最强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从国家主权理论的角度来看，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进程就是各成员国的国家主权与职能不断让渡给超国家机构的过程，

¹⁴⁵ 参见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页67～69。

¹⁴⁶ 同上，页84。

而国家主权与职能的转让，也意味着超国家主权的机构与职能的形成。”¹⁴⁷

当然，在战后的欧洲何以能够形成这样强劲的一体化趋势，这本身就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当代史课题。从本文立论角度看，我们没有必要追溯导致从 50 年代欧洲煤钢联营到 60 年代欧洲共同体再到 90 年代欧盟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也暂且不去追问欧洲大陆上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大陆是否有启发性价值，我们只把注意力集中于一点，那就是在近年来的政治进展中，欧洲大陆通过一系列超国家的政治机构的建构证明了这样一点，即**主权国家原则的扬弃乃深深地扎根于当代人类的需要**，它的替代者（或部分，或完全）迟早将走上历史舞台，并将拥有不同的历史表达方式。我们看到，随着“申根协定”的生效，在申根国家范围内作为国家主权重要象征的国家边界已经消失，而代之以对外的共同边界。只要你获得一个申根国家的签证，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在所有申根国家穿行。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体验更能激发我们诗人般的遐想和哲人式的沉思呢？

各国政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的关系

不妨也从一个有关欧盟的事例讲起：2002 年 10 月 20 日，爱尔兰经过**全民公决**，批准了接纳中东欧 10 余个国家加入欧盟的《尼斯条约》，这使爱尔兰成为最后一个批准该条约的欧盟成员国。此事给我们重要启示。是否可以这样说：欧盟本身及其制度运作方式（包括**公民在其中的作用**）证明了民主制度框架内人类处理超国家范围事务能力的提高和人类理性的进步。而一个运转有序的地区性或全球性治理结构的存在前提是，该结构内的所有个体成员（民族国家）都实现了自身的**政治民主化**。

在政治哲学意义上，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200 年前康德在他的《永久和平论》中就提出，“永久和平”的第一项正式条款即是“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¹⁴⁸虽然康德对此的论证略嫌简单，¹⁴⁹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进一步推出“永久和平”的第二项条款，即“国际权利应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¹⁵⁰

实际上，这里涉及了三个层面的东西：公民个人权利、民族国家、全球治理。当全球治理是以政府合作的形式进行时，公民乃是通过他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来参与全球治理的。这样，所谓“各国政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的关系”实际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前提，那就是**背离个人权利的民族国家是否有权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答案显然是否定

¹⁴⁷ 胡瑾、宋全成、李巍著《欧洲当代一体化思想与实践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页 194。

¹⁴⁸ 康德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页 105。

¹⁴⁹ 康德对此的论证是：“如果（正如在共和制下它不可能是别样的）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对自己本身作出有关战争的全部艰难困苦的决定（其中有：自己得作战，得从自己的财富里面付出战费，得悲惨不堪地改善战争所遗留下来的荒芜；最后除了灾祸充斥而外还得自己担负起就连和平也会忧烦的、由于新战争不断临近而永远偿不清的国债负担），他们必须非常深思熟虑地去开始一场如此之糟糕的游戏。”（同上，页 107）简言之，如果是共和制，每个公民都要对进行战争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益上的损失**进行严肃考虑，而不会同意进行这种“糟糕的游戏”。用本文的语言说，康德这里的论证逻辑仍是在利益原则框架内展开的，尚未引出公共理性的原则。

¹⁵⁰ 同上，页 110。

的。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半个世纪前人类从战争的废墟中建构起以战胜国为核心的政府间全球治理的框架时，民族国家本身的政治民主化并不是当时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毋宁说，在那个时候，由于冷战的随期而至，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正在产生日益扩大的鸿沟。20世纪60~70年代在联合国框架内实施全球治理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这就是作为上个世纪遗产的殖民体系的终结。只是到“民主的第三波”（亨庭顿语）洪波涌起，特别是90年代初苏东集团“雪崩”、“柏林墙”拆除、冷战已成历史，民主作为制度现代化所拥有的普适性和全人类性才在全球水平得到揭示。

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极权）。为什么从社会进化角度看现代民主制要优于极权制？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制度结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表现为处理同样复杂的问题时交易费用的减少，或者用相对较少的交易成本处理更多的、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哲学人类学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结构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人可以借助该结构理性地处置人性之恶，使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即便立基于利益原则之上，仍不失其自由的美名和尊严。同时，以互主体为特征的公共理性的历史性积累，又使人的社会性的高扬不再是空泛的、抽象的，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历史存在形式和制度表达。所有这一切，都使现代民主制成为一个丰富的、包容了社会进化全部正面成果的历史成就物，这既是历史的进步，也是人性的进步。而极权制度本质上是前现代的，也只能是前现代的，因为权力的现代形式——公共权力——显然与极权的定义相冲突。从社会进化意义上说，专制主义的极权制度本来就是必须加以淘汰的东西。权力不应再是君主的特权，而是公民的奴仆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手段。

有一个事实可以简洁而清楚地证明为什么现代民主制优于极权制：纵观今日世界，真正具备自然生长条件的民主制国家并不多，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政治-民族共同体加入到以民主制度立国的行列中来。尽管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充满了曲折甚至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悖论，大方向却依然清晰可辨，且日益明朗。这是什么？这就是社会进化所具有的内在力量。从本质上说，民主制度的感召力导源于被赋予现代历史内容的人性需求；而现代专制主义，就此观之，则不过是人类为满足这一需求而进行的斗争中发生的某种扭曲，或生产出来的一个怪胎而已。

回到全球治理的主题。如果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世界政府”或某种形式的“全球公共权力”（这个“全球公共权力”肯定比今天的联合国拥有更多的实质性权威）是可以想象的，那么它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专制主义国家彻底退出人类历史舞台。唯有如此，人类才可能在一个全新的制度框架内平等地、理智地讨论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在仍然存在着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专制主义民族国家的现存世界内，全球治理势必会面临一系列只有在这个过渡期才会碰到的问题。这里仅举两例：

一是所谓“人权”与“主权”之争。二战以前，“人权”尚未进入国际关系学的词汇之中，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关注乃是联合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在民主制度框架内，不存在“人权”与“主权”的冲突，因为民主体制的本质决定了政府不能以“主权”为借口拒绝对人权状况的批评。所谓“人权”与“主权”谁高谁低、谁前谁后，纯粹是一个只有在专制主义语境内才会产生的问题。“从实证主义（即国家中心）国际法的立场出发，人权指的是保护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免遭其政府的侵害。人权与一国主权内在的冲突在于国外对该国公民人权的辩护”。¹⁵¹——上面这个定义强调了人权辩护的国际视角，这其实恰恰是全球治理的视角。如果说，从传统的主权国家角度看问题“人权”属于“内政”的话，那么从全球共同体的新价值观角度出发，“人权”恰恰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又因“主权”可能成为暴政

¹⁵¹ 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页134。

的工具而凸现出来。考虑到“主权”往往成为专制主义政权的保护伞，哈维尔所说的“个人权利高于国家权利，个人自由所构成的价值高于国家主权”¹⁵² 绝不仅仅具有理论层面的意义。一位中国学者曾言：“在个人与人类之间，有不同层次的‘人群’。强调个人价值与人类价值，相对减少对中间群体（家族、社区、地区、民族、国家）的忠诚与依赖，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¹⁵³ 尽管“人权”与“主权”之争可能还与文化、地区差异等有关，但政治哲学所揭示的人权问题的**反专制主义逻辑**却是清清楚楚、明白可辩的。¹⁵⁴

另一个例子是如何理解“国际干预”和它的合理性问题。人权批评也是一种国际干预，但还仅限于道德层面（有时附以某些经济“制裁”手段）；国际干预的更抢眼的形式是诉诸暴力。正如研究伦理学的学者廖申白所指出的：“对任何暴力的运用其自身都是一种恶。对于暴力的运用仅当它是为着和平的恢复，仅当它是制止一种更大的罪恶的唯一可能的手段时，才是可以辩护的。”¹⁵⁵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把以暴力为特征的国际干预再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针对专制政权发动的、带有内部屠杀性质的暴力行为所实施的国际干预。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实施的行动可视为这种干预的代表。¹⁵⁶ 当特别是以种族清洗形式出现的内部暴力呈现在世界面前时，以国际暴力形式对之进行干预以制止正在进行的杀人行径带有鲜明的人道主义特征，通常也会获得广泛的认可。更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第二种类型的国际干预，即当一个民族国家政权显然是一个专制主义政权，它不但对本国人民实施专制统治，而且潜在地构成对周边国家或世界和平的威胁，而本国人民显然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颠覆之时，用外力（国际暴力）**推翻**这样的政权是否合理？是否可取？2003 年发生的美英联军推翻伊拉克

¹⁵² 此语摘自哈维尔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论国家及其未来地位”。这篇充满激情的演说还谈道：“几代民主人士的启蒙努力，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世界人权宣言》的议决采纳，以及我们文明的全面发展，看来正逐渐使人类认识到：个人比国家重要得多（a human be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 state）。”“如果现代民主国家通常由以下特征所定义：尊重人权及自由、公民平等、法治和公民社会，那么人类由此而出发的存在方式，或者人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趋向的存在方式，将很可能基于以下特征而存在：对人权的全球性尊重、全球公民平等、全球法治和全球公民社会。”（见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页 58~61）

¹⁵³ 见喻希来“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载《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 2 期。

¹⁵⁴ 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通常指责西方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有 49 个亚洲国家签署的 1993 年《曼谷宣言》在重申人权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所有人权的广泛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的同时，也强调“有必要避免在实施人权中的**双重标准**及将人权政治化。”（转引自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页 141）显然，在这里，人权/主权的争论和文化问题、南/北关系问题搅在了一起。其实，文化问题可以借助哲学人类学与制度现代化的普适性及制度现代化实现形式的特殊性的“两分法”加以解决，南/北问题可通过社会进化与文明的进步来化解（征服者逻辑的自我否定），而人权/主权问题则必有专制主义语境的存在，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反对“把人权政治化”其实正是典型的专制主义遁词。

¹⁵⁵ 廖申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干预伦理”，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页 34~40。

¹⁵⁶ 关于科索沃战争和欧洲知识分子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可参见法国当代学者格鲁克斯曼的答记者问“以欧洲的名义阻止纳粹悲剧重演”（载《二十一世纪》1999 年 10 月号）。作者指出，当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犯下种族清洗罪行时，不能阻止这种罪行将是欧洲的耻辱。作者还批评当年的中国和美国没有阻止发生在柬埔寨的民族大屠杀，联合国也没有能阻止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美国总统克林顿曾向卢旺达人民请求原谅，因为美国没有能就这场屠杀采取干预行动。

萨达姆政权的战争就是这么个例子。这场战争由于并未获得联合国的授权而在发动程序上有“瑕疵”；发动者是否有本国“国家利益”方面的自私性考虑也引起了广泛质疑；实施占领一年、甚至在抓到萨达姆本人后伊拉克人的“反美情绪”似乎在日益高涨，所有这些似乎都给伊拉克战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打上了问号。然而，我们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发动程序上的“瑕疵”可能恰恰暴露了联合国作为民族国家间协商组织仍然未能摆脱的各个成员国（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自的**利益情结**，更何况还有历史事件自身在发生条件方面的种种偶然（比如，“斩首行动”作为伊拉克战争的发起点受到了一系列偶然条件和场景的制约）；美国人和英国人当然可能、或一定会有他们的“国家利益”方面的考虑，比如自己的安全和在中东阿拉伯地区推行“他们的”价值观，问题在于在这两个场合，美国人、英国人的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并无矛盾；至于伊拉克人的反美情绪，则恰恰凸现了**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杂性：美国人可能曾经指望伊拉克普通民众会伸开双手欢迎美英联军“解放”伊拉克，但“外国占领”仍然会激发伊拉克人的民族情感，在某些场合，这种情感所带来的对外国占领者的仇恨甚至可能超过对本国专制统治者的仇恨。这里，我们还没有谈到伊拉克复杂的教派力量完全可能利用民众的这种非理性情绪，从而使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总之，如果用人类社会进化的大尺度看问题，从全球治理这个当代人类正在努力争取的高标准和新标准看问题，我倾向于对第二种类型的国家干预取理解、支持的态度。我们没有必要再把自己囿限于传统的“主权”概念之内，而应该看到，结束专制主义，迎来全球民主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全球治理的前提是各国民主化的成熟，但各国国内都建立起民主的公共权力机构并不自然意味着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也不能涵盖全球治理的全部含义。我们必须继续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全球公民社会**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何增科给全球公民社会下的定义是：“所谓全球公民社会是指公民们为了个人或集体的目的而在国家和市场活动范围之外进行跨国结社或活动的社会领域，它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盟、全球公民网络、跨国社会运动、全球公共领域等”。而全球公共领域又是指“公民个人或集体活动于其中的国际公共空间，公民们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创办报刊杂志或出版书籍、建立网站等多种形式，就他们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或国际政策等展开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对话、讨论和交流，形成全球性观念意识、文化价值和国际舆论”。¹⁵⁷

这个定义当然还是描述性的。本文前边在讨论与利益原则相对的、作为社会进化两大驱动力之一的**公共理性原则**时，事实上已经给出公民社会的**本质界定**。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公民社会的这个本质界定是如何体现的。

在完成民主化建构的民族国家范围内，公民社会承担着三项重要的社会功能：

第一，是对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民主宪政之政治结构本身已经设计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以为达至这一目标的手段，包括竞争性政党制度、代议制度、分权制度、有限政府、文官系统和武装力量的政治中立等。但仅仅依靠这些来自权力内部的监督机制和反异化机制是不够的，权力还需要来自社会的监督。无论立法机构、行政机构还是司法机构，也无论它们是

¹⁵⁷ 何增科“全球公民社会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2年第3期。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还是地方或基层政府，作为受托权力机构，委托人对其进行批评、监督，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反过来说，哪里有关于国家事物的交流，哪里具有批评意识的公众也就成了作为公民的公众。“在‘共和制宪法’的前提之下，这种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成了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组织原则”。¹⁵⁸ 同时应予强调的是，**社会监督只有在非意识形态独断下才有可能**。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只有在非意识形态独断条件下，公民的**知情权**才能得到保障；而唯有当公民知道政府在做些什么，又是如何做的时，方才谈的上实施有效的监督。其二，这种监督不是通过选票进行，也不是通过利益集团的压力进行，而主要是用**笔**来进行。“笔”在这里当然不仅仅是书写工具，它是**自由意志**的象征，又是**公共意志**的象征。作为前者，“笔”表达独立公民的声音和要求，是公民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作为后者，“笔”表达公共理性的声音和要求，是公共领域之**互主体性**的体现。所谓“笔的自由是民权的唯一保障”，其意是指唯有通过“笔”对政府行为的公开监督，对任何可能存在的政府腐败的毫不留情的揭露，政府才不致于从公共权力的受托人异化为公众的统治者。

第二，是理性的文化再生产。读者已经知晓，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最根本的标志之一是臣民向公民的转变和公民权利的确立，公共权力的受托和正确行使都要以公民权利的行使为前提。但是，公民并不是天生就会行使他们的权利的；如果说行使权利之权利的获得乃是宏观社会变革之结果，那么行使权利之能力的获得则有赖于**现代教育之所赐**，而且这将是一个代代相传又不断更新、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过程。公民必须有拥有权利、使用权利的意识，同时还要有运用权利的**知识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以教育为手段的公民社会之理性文化再生产的目标乃是建立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文化-社会系统。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批评，对市场机制负面因子的节制与抗衡，是离不开这样一个系统的。

第三，是促进全社会的沟通、理解与社会自律。公民社会的这个功能意味着它能够以**非官方、非市场**形式实现社会资源的动员和整合，用公共理性的力量锻造为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在国家、市场力所不及或不宜由国家、市场力量染指的领域营造人类的**精神家园**。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小到社区内居民利益冲突的自我解决、自我调整，大到地区性和全国性的生态保护运动。还有女权运动、“少数者权利运动”（诸如老龄者、特殊爱好者、残疾人）、一些宗教或准宗教团体组织的活动等也都可以列入这个范畴。自治是所有这类活动的组织特征；行动的自觉自愿和义务性则凸显了这类活动的道德意义。这是一个在公民自我动员基础上实现的沟通、理解与行动过程，公共理性之互主体本质往往借此得到更为明晰的呈示。本文把此类情形称为“社会自律”，它以每个公民的个人自律为前提，又通过集体形式把个人自律外化、组织化、行动化。

现在，我们可以把上述民族国家范围内公民社会的功能作一个外推，把它应用于国际社会，我们会发现，**这种外推不会遭遇任何逻辑上的障碍**。原因很简单：立基于人的本真意义上的社会性的公共理性本来就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更广阔的人类存在领域。当然，全球公民社会既然是全球性的，在功能上也会生发出某些新特点。我们也来作一个简单的审视。

首先，在对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方面，诚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公共权力机构，联合国还主要是一个民族国家政府间的协商组织，但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同样需要监督，组成联合国的各国政府同样需要监督。而且，在全球治理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不但应受到本国国内公众舆论的监督，同时也应受到国际舆论的监督。应该承认，在政治行动范畴内，迄今为止的民族国家政府的大部分施政行为还没有突破利益原则的樊篱，每个国家行事的出发点还都是本国利益，即便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或促进全球民主化动机的国际干预

¹⁵⁸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页 124。

活动也往往夹杂有某些本国的“私心”，从而导致国际评价的复杂化。¹⁵⁹ 总之，奥威尔所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尚没有被超越，民族国家间实现的合作，从哲学人类学层面看，体现的仍然是立足于生物性的社会性。而**全球公共领域对全球政治生活的介入，将使作为社会发展驱动力的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在全球水平获得新的平衡**。公共理性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长、壮大、成熟，并最终为建立全人类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各自扬弃它们原来的历史存在形式、在人类生活的最大边界处实现**重合**（如果这种重合是可能的话）创造条件。

其次，在理性的文化再生产方面，全球公民社会也可以作许多事情。上面引述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定义并没有把教育机构的的活动列入进去，从本文角度看，这是不够的。我们已经指出，“理性的文化再生产”这个概念意味着教育的**现代功能**较之前现代教育有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它不但要完成传统价值中所有**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的批判性延续，而且承担着与现代文明相应的新价值、新思想的**启蒙与创新**使命。从实践角度看，借助教育实现的公民社会之结构功能不但表现为对政治领域内权力结构的负面因子有抗衡、遏制作用，而且对经济领域内市场结构的负面因子同样有抗衡、遏制作用。知识当然是获得财富的基础，但在一个崇尚资本原则的、唯利是图的社会中，金钱与良知发生冲突是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政府形式的介入、社会分配之“转交系统”的建立都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们都不是对金钱原则（市场动力学根据）的否定，而毋宁是对它的**利用**。公民社会则不同，理性的文化再生产所高扬的乃是使整个**社会精神系统**得以维系的**伦理价值原则**，全球所有的大学和各类教育机构对此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后，我们看到，在民族国家内部，公民社会的沟通、交往与社会自律功能可以在条件事宜时与政府施政功能及市场经济调节功能形成互补。这意味着制度现代化的三大结构在民族国家水平上既有**相互制约**的一面，又有**相互补充**的一面。而在超民族国家，也就是全球交往水平，自由公民之间的联系、沟通乃至组织化往往能够更加突出地表征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性功能。由于现代国际关系领域内主权国家框架的有限性，“公用地灾难”问题在国际层面通常比国内层面表现出更加复杂、更难以应对的特点，解决全球“公共产品”稀缺的希望除借助联合国之类政府间国际组织外，**全球公共领域**完全可能、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公民的自由交往是不受国界限制的，以互主体性为特征的公共理性在全球水平的宏场，可以借助其特有的融批判与宽容双重含义于一身的人类家园伦理，勇敢面对那些由于民族国家政府或企业的短视、自私造成的问题。这个全球“社会自律”的建立，虽然离落实尚远，但从制度现代化和全球民主化的大趋势看，却早已是题中应有之义。

康德在他的《永久和平论》中，也谈到了“世界公民权利”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已占上风的一致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而是为公开的一般人类权利、并且也是为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权利与国际权利的不成文法典所作的一项

¹⁵⁹ “在国际事务中，国家与政治集团的操作常常使这种情况（指国际干预行为——引者注）复杂化。一种极大的罪恶可能被故意掩盖，如果施恶者能够控制政治的话，无论这施恶者是一国之政府或某个政治集团。一种并不实际存在的或者较小的罪恶也可能被夸大，如果故意的干涉者认为干预是其利益所在并且仅仅考虑这种近前的利益的话。”（见廖申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干预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页37）

必要的补充。唯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自诩为在不断地趋近于永久和平。

160

我们显然是以康德为出发点、顺着康德的路走下来的。不过，本文关于全球治理所蕴含的人类新文明观的讨论，似乎已经证明现代人对“世界公民权利”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康德。

四 对中国民族国家历史及其价值预设的反思

上面三节集中讨论了全球治理中蕴含的人类新文明观。这一节和下一节，笔者拟反躬自省，谈谈我们中国自己。事实上，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本来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但由于本文对全球治理的政治哲学含义作了某些新的阐释，我们必须把这个大平台梳理清楚才能打扫自家的庭院。所以才有全文结构上的这种安排。

让我们先就并不算长的中国民族国家历史作一个简略的回顾。

中国前现代传统的遗产对现代主权国家建构的影响

中国作为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历史大约要从晚清算起。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都可以称之为前现代的中国。从主权国家建构意义上看，前现代中国传统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主要有两条：一是**华夏中心主义**的认知形态，再就是以**皇权制度**为核心的专制结构。

由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在讨论“中国的世界秩序”时指出：“在帝制时代后期，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是把安全和权力的实际现状与理论和观念上的中华中心论结合起来。中华中心论是中国文化优越性在制度上的表现形式，中国历代王朝对这一点的强调是不遗余力的，需知中华帝国晚期的纳贡体系就是为在礼仪上制度化地表达不平等和等级制而精心设计出来的。在纳贡体系的实践中，中国表现出自己是个中央之国，周围是一些文化低贱的藩属国，其统治者接受中国的册封，进而按约纳贡并与中国互市。”在中国人眼中，“世界秩序与其说是多国世界的秩序，还不如说是一种‘无邻邦帝国’的秩序，而由此产生的种种模式与其说是用来崇尚中国的优越文明还不如说是崇尚文明本身。”¹⁶¹

那么，为什么会如此？作为一种认知形态，这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中国人自己作了更深入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和古代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对“非我族类”的看法是既罕见又奇特的。区别中国和非中国的重点不在种族、血统，而在文化和道德。例如在董仲舒那里，华夷之辩就已被置于伦常道德之中。概括地说，中国文化的民族认同中包含着这样两

¹⁶⁰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页118。

¹⁶¹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33、35。

种东西的统一：一是高度的道德价值一元论，它是世界主义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另一个是道德被等同于儒家伦理，这意味着儒家文化、制度和伦常秩序被视为世界第一，远高于其他“蛮”、“夷”。这样，所谓“华夏中心主义”既是世界主义的普遍论，又是中国文化、制度最优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礼仪之邦”，是文明的源头和“四夷”效法的标准，在这种认知支配下，当然不可能产生华夷平等、国与国平等的观念。当中华文明十分强大时，华夏中心主义中的世界主义就得到充分展现，中国人可以超越种族、领土和宗教去表达一种普遍的“道”。华夏帝王并不在乎确定的领土和疆界，而满足于四夷向中央之国的称臣纳贡。中外关系的基础不是各国拥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外国只是中国文化教化的对象。贸易则是对狄夷的恩惠，因此非但不鼓励本国参与，还实行种种限制。而当中华文明走向衰弱时，华夏中心主义就会转化为极端排外主义，企图靠闭关自守维系内部的制度和伦理纲常不被侵扰。¹⁶²

至于皇权专制制度，则是中国前现代文明在政治领域的主要结构表现。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皇权至上与华夏中心主义实在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外的地方则是“天子不臣”，不是不可以归天朝统治，而是没有资格作天朝的疆土。我们看到，直到乾隆晚年，中国人还在沉醉于这样的思维定式，而全然不觉外面世界的变化和暴风雨的即将来临。人们所熟知的、围绕英国使臣第一次访华而展开的故事以及故事本身所包含的全部讽刺，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¹⁶³

民族主义与制度现代化普世价值之间的张力

鸦片战争始，“蛮”“夷”逐渐成为中国人眼中真正的对立物，并构成对华夏文明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伴随着变“天下”为“国家”的认识转变过程，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制度现代化意义上，古老中国与现代西方之间的对抗，乃是以历史特殊性形式表现的有关社会进化普遍性的对抗。19 世纪那些传统的士大夫想在承认西方

¹⁶² 参见金观涛“百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结构的演变”和葛剑雄“天朝心态中的开放观”，二文皆载于《二十一世纪》1993 年 2 月号。

¹⁶³ 关于这个故事的详尽叙述，可参看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物质之“用”的同时保留中国的精神之“体”，已被证明只是一种浪漫而愚蠢的想象。¹⁶⁴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误读，对西方文明所体现的人类文明共相的迟迟不理解，有着深刻的历史语境方面的原因，这就是“征服者逻辑”的存在。作为人类文明进化之二律背反在民族国家建构领域的主要表现，“征服者逻辑”在现代化“后来者”那里引发了复杂而不幸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9世纪最后20年满清帝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环境：英、法、俄、日等列强步步进逼，强敌环伺；随着缅甸、越南、琉球、朝鲜等藩属国的独立或被割让，华夏帝国的朝贡体系土崩瓦解。口岸经济的发展则带有越来越浓厚的殖民地特征。如果说这个过程有什么正面结果，那就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而不再是作为传统的中央之国）艰难地浮出水面——既然国际法已经成为国家关系的准则，那么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不断侵犯反倒形成了对中国剩余领土的主权承认。

从中国人自己这方面看，“征服者逻辑”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自强战略和防御型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中国的民族主义亦应运而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晚清以降的民族主义大体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自强，这与所有遭到“边缘化”命运的现代化后来者作出的选择是同样的（或近似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容易成为民族自强的精神驱动力。¹⁶⁵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则是文化上的保守性。我们看到，在主权国家的内部建构上，满清帝国一直无法摆脱这样的矛盾：它既是一个（或至少希望成为）对外保持独立身份的国家，又是一个对内继续皇权统治的国家。民族主义同样徘徊于这两者

¹⁶⁴ 有“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之称的已故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深入分析过19世纪中国的“体”“用”之辩。他指出：“作为中国思想中的一个易懂的、合乎惯例的观念，中国精神加西方物质这一谋求中国富强的药方，自从张之洞用体用模式对它加以表述后，它就从来没有失去其吸引力。但是，在更为严格、更为正式的思想中，捍卫中国文化的体用模式，其本身所包含的致命局限不久就暴露出来了。一些思想家逐渐认识到，如果说存在着与西方应用科学之‘用’相联系的‘体’，那它是西方的纯科学，西方的哲学、文学和艺术，而不是它们的中国对应物。或者作进一步的考虑，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看，应用科学和工业化是‘用’，但从普遍的社会改革的角度看，它们又是‘体’。当张之洞努力寻求西方的应用科学和工业化以保卫中国的精神遗产时，他没有认识到西方的应用科学和工业化是强大的社会催化剂，是具有破坏性因素的力量之一。”“‘体用’模式作为工业化运动的一件思想外衣而被广泛使用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将工业化作为一种价值来接受作内部的准备。这种准备的缺乏及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因素，是19世纪中国物质上的‘自强运动’失败的原因。”（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57、62）

¹⁶⁵ 如果从思想传播史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显得更为复杂而又饶有趣味。喻希来就曾分析过斯宾塞学说在英国本土的命运和传入中国之后命运的异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进化论对英国公众曾颇具吸引力，但由于19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打击和工人动乱的影响，英国社会中的乐观主义不见了，斯宾塞的学说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辉。“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后的命运却有所不同。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本意是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与19世纪末开始于英美两国的普遍反对斯宾塞主义的大背景是一致的。但是，严复在将其编译成《天演论》时只取了原著书名的一半，他对赫胥黎维护人类伦理观念、反对‘任天为治’放任主义的宗旨并不十分理解，反而对赫胥黎的批评对象斯宾塞颂扬有加。正如史华兹所说，严复发现斯宾塞而不是赫胥黎，满足了他亟感饥渴的理智上的需要。……斯宾塞一元论体系的宇宙整体使严复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像他的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不仅在寻求医治中国眼前的病害，而且在寻求一个清晰的、无所不包的现实梦幻。”（见喻希来“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之间而不能自拔。即便在甲午战败，民族存亡面临空前危机的情况下，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仍把希望寄托于大清皇帝，在君主立宪的制度框架内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谭嗣同等人的人头落地，改良派知识分子的希望终成泡影；而慈禧太后搞的那个清末“新政”的天折，则再一次证明了皇权体制内实现民族国家建设的困难，乃至不可能。

直到孙中山首创“三民主义”，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对外民族独立和对内民主政治**这两个方面才统一了起来。事实上，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就有“四纲”、“三期”之说。“四纲”是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三期”则指实施之阶段，即所谓“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会通过的《训政纲领》明确承诺，作为“约法之治”之训政时期，由国民政府行使“治权”（具体化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制度），“政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亦由国民政府训导，作为向宪政时期的过渡。理论上讲，所有这些不失为当时历史条件下促进中国制度现代化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它证明了当时一代中国人不但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且要建设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民族国家。这是对制度现代化意义上的民主宪政之人类普世价值的重要认可。虽然民国时代的民主实践很快被历史所淹没，但后人研究这段史实，终不免掩卷沉思，在慨叹历史无情的同时，生出进一步探究历史的冲动。

民族主义、新世界主义与激进意识形态的联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方面，亦走过了曲折蜿蜒的道路。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古老而又落伍的民族希图自强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冲动。但是，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具有浓烈的天下情怀。理解毛泽东的“世界主义”有三个必须注意的要点：一是呈现在毛泽东主观意识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理念，二是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上升的“中国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自我定位，三是隐含在这种自我定位背后的、作为**潜意识**存在的华夏中心主义的古老观念。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使毛泽东的世界主义具有了某种怪异而独特的特征。为了和前现代华夏中心主义中的世界主义内涵相区别，本文把毛泽东的世界主义称为“新世界主义”。在20世纪50~70年代，基于毛泽东新世界主义的**世界革命战略**和致力于本民族富强的中国的**民族国家战略**紧紧缠绕在一起，时而呈相互促进的关系，时而又呈相互紧张、相互矛盾的关系。

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的理解和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态度的变化。据中国学者杨奎松研究，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从1949年到1973年大致经历过四个阶段的变化：¹⁶⁶

第一个阶段（1949~1953），支持越南的抗法战争，根据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革命时需要外援，胜利时应当援外”）。在革命经验方面，毛泽东相

¹⁶⁶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态度的变化（1949—1973）”一文（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学术文库”网站）。本文对四个阶段的叙述从杨文；关于世界革命战略和民族国家战略的抽象及两相比较则是在杨文的基础上由本文进一步明确提出。

信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政权的道路乃是越南等亚洲国家共产党领导本国革命、实现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地缘政治显然不是中国抗法援越的首要考虑。在这个案例的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优先于中国民族国家战略。

第二个阶段（1954～1957），赞同和平和对西方作适当让步，提出“不对外输出革命”，认可“互不干涉内政”这样典型的民族国家外交政策纲领。这种认可既非毛的意识形态逻辑使然，也非毛颇为自傲的革命经验使然，而更多是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一种外交策略。毕竟，朝鲜战争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方面的巨大差距。争取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相对安全以保证中国迅速在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成为毛泽东优先考虑的目标。显然，这样的目标更多是民族国家性质的，而非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性质的。

第三个阶段（1958～1969），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反对越美和谈。导致毛泽东重新重视革命与战争问题的导火线是中苏分歧扩大、苏联走向“修正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主张。在毛泽东看来，否定革命，特别是否定暴力革命，无异于否定中国革命道路在落后国家的普遍适用性。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中心已经从莫斯科移到北京，“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穷得叮当响的中国居然向越南和其他同样贫穷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世界革命战略再度成为毛关注的中心。

第四个阶段（1970～1973），赞同越美和谈，主张结束战争。毛泽东重新回到比较灵活的态度上来，无疑是受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需要的极大触动。中苏在边界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苏联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的现实，迫使毛泽东改变中国的外交战略格局，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而美国为了摆脱在印度支那陷入的困境和对抗苏联的需要，也和毛泽东拍手即合。这种共谋是建立在利益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共谋。中国从此与“世界革命中心”的思想告别。

关于古老的华夏中心主义对毛泽东一代中共领袖、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影响，乃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以为，这种影响对毛泽东来讲未必是自觉的，但他的一些作法却似乎证明了这样一个逻辑的存在。而当毛泽东尽显其颇有天朝遗风的“大国风范”时，往往**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我们也来看一个例：1962年中印之间因为领土争端发生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翻开中国地图，西藏南部一块大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只标有稀稀落落的几个地名，这个地方如今为印度所占。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并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这条90年前由英国勘定的中印边界线本来是大英帝国扩张思想的产物，它把传统上属于中国控制的大片藏民区（也是西藏最丰富的资源区）划成英国的殖民地。但可能是担心合法性不足，英国政府并未批准附图上标有麦克马洪线的《西姆拉条约》。中国中央政府当然更不会认可这个条约。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即开始奉行北进政策，蚕食掉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地区。1959年3月印度总理尼赫鲁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中，进一步提出全面领土要求，同时印度边境哨所节节向北推移，甚至达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企图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国接受。这就是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的大致背景。显然，50～60年代中印两国围绕领土划分问题出现的争端，是典型的**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争端。战争以中国方面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奇怪的是胜利了的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及举措：中国军队一举南下收复的土地本来是传统意义上中国的领土，现在却把它主动放弃，军队又回撤到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高原地区，并且从这条线再往后主动后撤20公里，以显示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问

题的“诚意”！¹⁶⁷

如果找不到充足的证据证明毛泽东的作法有合理的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毛泽东在故意通过“教训”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其既拥有力量、又绝不以大欺小的“英雄形象”。把对手打倒在地再将其扶起，还把武器擦得干干净净的还给他，这是典型的强者对弱者的羞辱。毛泽东是否曾经沉醉于这样的自我欣赏我们不得而知，但毛的“大度”把 9 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 3 个台湾）又富含资源的土地拱手让人，¹⁶⁸ 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按照民族国家的逻辑是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的。**除了古老的华夏中心主义的“天朝”潜意识外，也许唯一能够解释得通的还是那个雄心勃勃的意识形态全球战略。

人权与主权：开放年代的新挑战

斗转星移，转瞬间中国已告别了那个红色年代，进入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新时期”。至少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不再以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角色出现，而更自觉地把自已定位在民族国家这个显然更合适的位置上。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毛泽东以冲天的豪情规划、实践其“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目标时，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恰恰处于最封闭、最保守的状态之中。普通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之外是什么样子，世界也不知道中国内部是什么样子。开放所必然导致的双向交流与沟通的扩大，使沟通双方、特别是中国人一方吃了一惊，大有如梦方醒的感觉。原来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竟与先进的发达国家有着这样大的差距！

于是，新一轮“自强运动”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 11 届 3 中全会提出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新的“自强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解释和合法性论证**。邓小平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准确地反映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焦灼心理，从民族国家及其传统基础利益原则的立场出发，这种焦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民族振兴的口号获得了国民热烈的响应，这甚至可以从人们对体育比赛（尤其是中国人的比赛成绩）的热切关注中，得到印证。¹⁶⁹

然而，新的问题很快暴露了出来：中国的旨在迅速实现经济增长的民族国家战略缺乏制度基础与体制上的保障。这可以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两个方面来谈。经济方面，传统的动员型和命令型计划经济只会造成短缺经济的后果，重新承认市场经济原则显然势在必行。准

¹⁶⁷ 参见李达南“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的起因和终结”，载《百年潮》2002 年第 9 期，亦可参见《中国共产党编年史》（6），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页 2397~2398。

¹⁶⁸ 从民族国家的逻辑着眼，这块土地的丧失确实令人痛心疾首。想一想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这个地区，海拔从 7000—8000 米很快下降到 1000 米甚至几百米，简直就是一个亚热带的生态聚宝盆。著名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突然拐弯，江水落差高达 2000 米，蕴含着多么巨大的水利资源！但这个大拐弯恰好被麦克马洪线拦腰切断。我们甚至可以沿着民族国家的思路考虑向那 9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移民。如果有几百万内地居民迁移至此，将西藏与印度传统上的联系断开，把西藏置于汉文明圈内，西藏独立将再无可能。

¹⁶⁹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 80 年代初的“女排热”。人们都不会忘记当年女排姑娘夺得“三大球”第一枚金牌时在全国引起的激动乃至狂热。在这个背景下，体育比赛已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赛事，而被赋予民族振兴形象展示与激励的政治功能。

确地说，中国人是在严峻的现实压力下重新认可市场原则的；中国只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却没有对市场经济的历史的、深入的、学理的反思。这决定了迄今为止**官方意识形态**对市场经济原则承认的不彻底性（比如，在今天的大学教科书中，对市场经济的标准界定多局限于“资源配置”，而回避其更具根本性的产权制度前提）。在政治体制方面，问题表现得更为严重。以**一党专制为特征的中国政治体制**是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一份沉重的政治遗产，邓显然没有足够的认知和勇气把这份遗产送入历史博物馆。与毛相比邓的不幸在于：在毛那里，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经济上的计划控制可以并行不悖，而在邓那里，继续维持党对权力的掌控和发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背景和多元民主制度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威权主义**社会总格局和权钱交易的腐败顽症就是这样产生的。

邓的不幸还在于：开放的中国面临的已经是一个开放的、迅速转变和进步中的世界。“冷战”正在或即将成为过去，制度现代化领域内政治民主建构的普遍意义正如市场经济建构的普遍意义一样获得了全球水平的揭示，**全球治理**作为人类的新文明观正在登上 20 世纪晚期的世界舞台。说得更为明确些，当中国人最终认定必须认真建设自己的民族国家时，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治理的时代。全球治理时代的世界带给中国的不再是“征服者逻辑”，而是**民主化的普遍要求**。当中国由于现存政治体制无法满足这个要求甚或有意抵制之时，则势必产生前文已经论述过的所谓“主权”与“人权”的冲突。

人们都知道，十几年来中国与西方国家围绕“人权”“主权”问题产生的争论，肇始于 1989 年中共政权对天安门公民维宪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由于这个镇压，中国共产党执政者遭到了全世界的一致谴责。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权者对这种谴责的反应：他们很直率地把谴责和来自外部的批评指责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把国际社会对中国公民民主诉求的支持斥责为“敌对势力”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如果说中共当权者的对内镇压行为体现了邓小平一代人陈旧的**专制主义政治思维逻辑**，那么邓和他的“接班人”江泽民拒绝外部批评的行为则体现了同样陈旧的主权国家逻辑：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都属于“内政”范畴，“外人”不得干涉。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共当权者是在有意利用主权国家的逻辑为自己的专制主义行为提供辩解和保护伞。

不应当否认，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参与国际范围的人权“对话”，较之过去全无人权概念或否认人权的存在，是一个进步；但中国当权者人权对话的策略却更多是**应对性的**，并无诚意真正接受国际社会捍卫人的政治权利和思想自由权利的基本准则。所谓“生存权”、“发展权”概念的提出，对于一个人均 GDP 仍然很低、又曾深受“征服者逻辑”之害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似乎显得有些道理；但当我们考虑到此类概念正在被政府用来当作抵制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领域人权状况批评的武器时，这个解释学分析马上就可以戳穿“生存权”、“发展权”之类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辩护内涵。**问题不在于抽象的“生存权”、“发展权”是否属于人权的范畴，而在于这些概念在专制主义应对策略内的使用必然产生的混乱效应。**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似乎是想用一种排序的方式证明“填饱肚子”比“思想自由”更重要，而回避了当今中国“填饱肚子”问题之所以仍然存在，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思想不自由（缺乏对权力的社会监督所导致的腐败往往造成对普通人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个应对战略则是对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公然蔑视，因为它可以把普遍人权解释成只是“西方”的价值观，甚至是“西方”实施“和平演变”的某种手段。

2001 年 4 月哈贝马斯来华访问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一场题为“关于人权的跨文化的讨论”的学术报告。在谈到“亚洲的价值观”时哈氏指出：“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习惯用‘优先’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基本权利**为其违反司法基本权和公民政治权的行为——西方对此予以了指责——进行辩护。这些国家通过家喻户晓的‘经济发展权’，认为自己有权‘推迟’实现宽容的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直至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准

允许其稳定地满足居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在他们看来，对生活在贫困中的民众来说，法律平等和言论自由似乎并不像改善生活条件的期望那样同等重要。但是，**这种功能性论证不能如此轻易地转变为规范性论证**（——加重号为引者所加）不言而喻，在人权的长期实施中，某些条件比其他条件更重要。尽管如此，这并不可以为一个专制的发展模式进行辩解，因为按照这个模式，个人的自由服从于父权制那里接受和注解的‘集体的福祉’。事实上，这些政府根本不保护个人权利，而是保护他们理应去履行的一种父权制的照顾。而在西方，从古典观察来看的个人权利被归结为生命和身体不受伤害权，广泛的个人权利保护和平等待遇权，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权。规范地看，‘优先’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基本权是不会得到辩解的，因为这些权利只是用于保证‘公正的价值’（罗尔斯语），即为平等的利用那种自由的和政治的基本权利的事实前提提供保证。”¹⁷⁰

这位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人权问题的分析和对“亚洲价值观”的批评，值得我们深思。

五 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预设应该是什么？

中国正在面对全球化，融入全球化。这个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有着鲜明的政治含义，那就是全球政治民主化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利益原则的扬弃和全球公共理性的勃兴。就中国而言，如果说前现代的华夏中心主义乃是世界各主要文明相互隔绝的结果，毛泽东的新世界主义是激进意识形态乌托邦和作为潜意识存在的中国前现代精神遗产相结合的产物，它们都具有某种“天下”眼光但都不是全球化，那么今天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则实实在在面临着走向全球的**机遇**和如何使自己融入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建设力量**而不是**阻碍力量**的现实挑战。

高扬全球公共理性与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统一

什么是“民族国家战略”？按照传统的理解，民族国家战略当然是指旨在实现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安排。“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显然是这种战略安排的**根本价值预设**。然而，根据本文前边的分析，这样的价值预设是成问题的，以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逻辑为基础，人类将无法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羁绊和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当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水平 and 全人类正在面临的资源、环境方面的空前挑战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就是**以人类的名义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考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

这应该成为人类考虑当代和未来所有问题的根本价值前设，更是人类考虑民族国家问题的价值前设。每个现存民族国家（包括它的领导者和它的公民）对此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利益原则的被扬弃毕竟需要一个过程**，这势必造成根本价值转换中的一系列紧张。每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民主化程度、理性处置国家间关系的能力的不同，各种地缘的、区域的、宗教的、种族的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冲突，都会给全球公共理性的形成造成压力。这种多重互动和博弈的复杂性，也许我们今天还难以想象，更不用

¹⁷⁰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哈贝马斯在华讲演集》，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页 8～9。

说去驾驭。这大大增加了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难度。

当然，**大方向是不容怀疑的**。由于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存在，我以为就中国而言，高扬全球公共理性与民族国家战略的统一应该是历史的**现实性、生成性和未来性**的统一。

就历史的现实性而言，应该承认过去百年来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艰难成长经历对当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影响，同时也要承认中国的传统政治文明对当代中国政治选择的影响。这些影响对全球治理所蕴含的新的人类文明观的认同来说，呈现出某种多面性。我们应该积极挖掘民族认知储库中有利于接受人类新文明观的那些东西，逐渐清理、淘汰那些与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相悖的东西。历史的现实性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当今世界毕竟还是一个建立在主权国家框架基础上的世界，这决定了利益博弈仍然是当今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内容乃至基本内容。在民族国家水平上突破利益逻辑的樊篱，需要极高的道德勇气和智慧，也需要民族国家间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合作与互动。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制定，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些**极其现实**的因素。

就历史的生成性而言，必须理解今天的民族国家已经不完全等同于 50 年乃至 100 年前的民族国家，新的人类交往原则正在生成之中、形成之中。用哲学人类学的术语来说，成为全球公共理性之“形而上”根基的社会性不再是立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性，不再是虽代表文明的内在生长力量、但又不得不屈就于文明的历史形式的社会性，道德和伦理作为本真意义上的社会性之体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战略，其着力所向，应该与历史的生成性和历史的方向性相一致。从实践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国家战略时，不能再**自然地**把本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的**唯一**出发点，而要时时自省到本民族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之间可能出现的紧张。能够通过“双赢”或在无法达致双赢的情况下自觉抑制自私的民族国家冲动以化解这种紧张，这样的民族国家战略才是无愧于当代人类文明进化水平的民族国家战略。这当然同样适用于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设计和制定。

最后，就历史的未来性而言，超越民族国家的，某种更合理、更有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的全球组织建构已经成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必然。当然，这种“超越”不一定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寿终正寝，但它一定意味着在新的全球组织建构中民族国家**角色和功能**的变化。也许，它会变成未来全球公共权力机构的一个层级，也许它以新的组合方式成为全球公共政治建构中的一部分。这里不是讨论未来历史之具体性的地方。我只是想说明，构建民族国家战略，必须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未来意识，必须有博大的胸襟和以天下为怀的气魄，还必须对对人类行为弱点的深刻把握。这样，一个民族国家之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才会有助于人类文明整体的推进。

以上谈的是一些大原则。下面笔者拟就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设计、实施和调整，再从**外交与内政**两个方面作些讨论。从实践意趋看，这些讨论当然带有**建议**性质。不过，我将把讨论范围限定在多少有些抽象的原则问题内，而把更具体的政策问题的研讨留给有关领域的专家。

外交方面：积极融入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建设性姿态参与、 促进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共同事业

所谓“全球政治民主化”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各民族国家国内实现民主化，二是国际关

系的民主化。这两个方面都与全球治理有关，都是广义的全球治理的内容。中国政府目前承认且在提倡“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但对各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化问题多以“他国内政”为由不与置评。我以为，作为具体外交政策由以制定的基础，这两个方面都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先来看与“内政”有关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化问题。这个问题，对当事国而言是“内政”，对其他国家来说则是“外交”。根据前文已经阐述过的原则，背离个人权利的民族国家没有资格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乃是当今文明人类达成的共识。因此，**每一个文明国家的领导者和公民都有从道义上关心那些尚处于专制政府压迫下人民的义务，都有批评、乃至在必要时通过适当手段合法地对侵犯人权的专制行为进行干预、制裁的权利。**在这些场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不适用**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它既是主权国家时代的产物（因此，一般地，它符合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框架内民族国家间关系的传统准则），又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收缩其“世界革命”战略，向担心被“输出革命”的东南亚周边国家示好的表达（因此，特殊地，它符合当时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中国确曾在几十年的外交政策实践中基本恪守了这一原则。但在全球治理时代，这种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无原则的“互不干涉内政”的**逻辑缺陷**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在中国政府的对外声明中，我们很少、或几乎没有听到过对哪一个专制政权实施国内政治迫害的谴责；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尊重各国人民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然而，谁都知道，在专制条件下，所谓“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是不存在的，因为专制者已经剥夺了公民的这种权利，而又常常用表面上的民主粉饰其专制的本质。这样，以“不干涉内政”为由**放弃对专制政权的批评，实际上等于放弃了世界大家庭中一个文明国家应负的责任，也损害了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应有形象。**

关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问题，可以包含多种指涉，比如，它可以指联合国组织构成、议事规则和程序的民主化。在这方面，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联合国体制显然有进一步改革、完善的空间。中国如能在这个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是极有意义的事情。“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还可以有一种指涉，那就是强调大国、小国平等，强国、弱国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抽象地讲，这个原则并不错，但它需要进一步分析。如果“霸权主义”指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以强凌弱，那它当然是需要谴责的，问题是这种体现“征服者逻辑”的民族国家行为在今天正在失去其典型性和合法性，时代毕竟不同了。如果“霸权主义”指的是大国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则问题又回到了我们刚刚讨论过的话题：只要被“干涉”的国家确实存在着对国内人权的严重侵犯，那么这样的干涉就非但不是什么“霸权主义”，而是体现国际公正的**正义之举**。更何况进行正当国际干预的国家，其行为也要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近来被频频曝光的美国军方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事情，就是一个好例。虐待战俘丑闻的发生并不能否定美英联军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在道义上的正当性，而这样一件丑闻能够被公之于众，且迅速进入公共权力机构的调查、听证程序，相关责任人将很快被追究，又恰恰证明了民主制度本身的优势。这里附带谈两句美国：这个迄今诞生不过两百多年的国家正在引领全球化的潮流，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美国文明之所以对全世界有吸引力，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以民族形式的特殊性体现了人类社会进化和制度现代化所拥有的普遍性。“民主”、“自由”、“人权”之类都是当今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它既不仅仅是美国的“价值”，也不仅仅是西方的“价值”，**只不过相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来说，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尊重人权、实践人权、建构保障人权的制度方面作得更好些罢了。当然，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认可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所有行为。在许多场合，美国的民族国家行为可能是自私的，这并不奇怪。突破利益原则的狭隘性对美国同样不是一件容易事。当美国民族国家行为的自私性损害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时，它也要受到指

责与批评。但我们不能把美国文明中体现的人类价值的普遍性和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某些特定行为混为一谈。

对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来说还要注意的一点是：不应该以“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名，拒绝吸纳国外民主建设方面的经验，拒绝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监督和批评。国内一些持“正统”观点的学者和官员可能认为，在当今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面，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是怎样在发展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欧各大国）国家关系的同时又阻遏其价值观的“渗透”。根据本文的逻辑，这个“很棘手的问题”其实是个假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必须走向民主，必将走向民主，而今尚在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化的艰难行进之中。继续坚持陈旧的、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自我定位是非科学的，也是没有出路的。正如同市场经济并没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一样，民主也没有必要非要贴上一个意识形态标签。如果说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需要“求同存异”，那么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更应该作的是“求”世界文明主流之“同”，而不是借“民主”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名义“存”自身意识形态之“异”。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对中国其实是好事。中国政府应该以真诚的态度参与国际人权对话，接受国际社会的人权监督，同时也以自己的努力，为国际人权事业作出贡献。这本来亦是全球治理的应有之意。

中国很重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并且在某些领域开始有所作为（比如近两年对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推动）。其实，用武之地还有很多：中东问题，国际反恐问题，区域合作和一体化问题，世界范围内的反贫困问题，合理保护全球资源问题，合法开发、利用外层空间问题，促进联合国协商机制的改善问题，探索新的区域或全球合作的方式与渠道问题，等等。笔者相信，一个实现了民主化的中国将更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建设性的大国作用。而如何实现内部民主化，正是我们下边要继续讨论的话题。

内政方面：理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公共管理机制，鼓励公民社会复兴，提倡健康、开放、自强、宽容的民族精神

我们一项一项来谈：

理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项已经进行了 20 多年、时断时续的事业，也是中国各项改革事业中的最艰难者。从建设民族国家和全球治理角度看，理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乃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因为它将促成一个完整意义上民族国家的诞生（不但是独立的，而且是民主的）。考虑到中国的幅员之辽阔、情况之复杂、民主建设条件之苛刻和进程之艰难，中国民主化的成功本身（也就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国家建设成功之本身）就是对全球治理的最大贡献。当然，我们还必须有这样的视界：根据人类文明进化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民族国家同样有其历史性和过渡性。它终究是要被更合理、更先进、更具有全人类性的组织结构形式所超越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实际上面临着双重任务、双重挑战：既要建设一个独立的（主权完整的）、公民又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国家，又要为扬弃这样的国家而努力。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当然是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在尊重公民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真正的多元民主宪政国家。但这显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

情。所谓**理性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着这样的意思，那就是必须充分估价改革条件的成熟程度、改革可能付出的成本和社会承担这种成本的能力与限度，采用适当的战略和策略安排各项改革措施的轻重缓急，使整个改革成为一个渐进的，同时又是层层递进、有着明确目标的过程。目前，加强执政党内的民主建设，在现有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内完善其立法与监督功能，在基层直接选举的基础上总结经验，逐步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层级，通过拓宽“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渠道为形成真正的政党政治创造条件等等，都是现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着力作的事情。民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则应该更大胆些、视野更开阔些。包括对未来适合于中国发展的民主政体形式、民主化的实现步骤等都应该进入现实研究的视野。毕竟，中国民主事业的成功依赖于民间力量与中国共产党内改革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中国现存专制主义体制的打破（比如，突破“报禁”和“党禁”），离了这两股力量中的哪一股都不行。

完善公共管理机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公共行政理念一直存在着某种缺失。¹⁷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一个有效的、廉洁的法治政府和行政管理体系方面，已经作出了巨大努力。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努力迄今收效甚微。行政机构的膨胀几乎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它一方面形成对国家和地方财政的巨大压力，同时亦势必加剧政府和公民之间的紧张（超编的政府人员的开支必须借助对辖区内普通百姓的掠夺才能维持）。公共行政投入的巨大成本和其产生的效益往往不成比例，吏治运行中的潜规则盛行，“内在制度”和“外

¹⁷¹ 有学者指出：“就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的整体理念而言，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服务行政（Service Administration）和法治行政（Administration of the Rule of Law）理念尚未真正转变和形成。与建国时期的政府职能和根本任务相适应、与传统政治学和我国独有的‘行政管理学’相适应，我国强调与信守政府作为国家的伴生物是一种凌驾于人民大众和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这种力量应当用以缓和冲突、保持‘秩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由此形成的政府公共行政理念是：公共行政是直接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忽视了公共行政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服务性作用；‘行政管理’主体与被管理对象（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关系，忽视了社会公众对行政活动的参与以及社会公众需求对政府行政行为的导向性作用；‘行政管理’的功能是对社会进行管治，忽视了社会和社会公众对‘行政管理’主体及其行为的制约与监督，忽视了‘行政管理’过程中公共责任机制的建设与发展，随之而来便是忽视了行政权的制约性、行政活动领域的有限性以及行政行为的依法性。”（蔡立辉“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行政模式的转换”，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页26）

在制度”的并存使公共行政中的渎职和投机行为大行其道。¹⁷²显然，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改革公务员任命和选拔制度、净化公共行政环境、提高对各种潜规则和投机行为的理性预期能力和防范能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公民对政府行政的监督体制才能逐步解决。

从全球治理角度看，**全球化和中国已经加入 WTO 的事实意味着中国公共行政的施政对象和施政环境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中国政府必须适应政府管理国际化的发展潮流。这是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一个方面。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毋宁是：要一视同仁地对待腰缠万贯的国外投资者和尚不富裕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在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和保护、监督政府的施政行为方面，穷人和富人、中国人和（来华经商的）外国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在一个有着长期“官本位”历史、迄今仍未摆脱威权主义羁绊的国家里，往往容易产生对**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漠视**倾向。人们记忆犹新的发生在 2003 年的“孙志刚事件”、2004 年初报道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和近来报道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同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说，一个公共行政体系只有在符合当代人类已经达到的道德水准的前提下合法地、同时又是充满人性关怀地面对它的公民，竭诚为他们服务又真诚地接受他们监督，它才能在树立起一个对本国公民而言的政府权威的同时，真正赢得非本国公民的尊敬与尊重。

鼓励公民社会的复兴：高扬公共理性精神，用人性中的自由之光驱散社会的丑恶，建构更能体现人的本真之社会性的制度安排，这是本文自始至终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基本主张。对

¹⁷² 德国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在他们所著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把内在制度定义为“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外在制度则指“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后者比较好理解，关键是前者。据两位作者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社会的内在运转所产生的制度不出自任何人的设计，而是源于千百万人的互动”。他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诚实社会中有个通行的规则，即不讲真话的人会遭到冷落。“这种习惯的起源无疑与谎言给人误导、增加他人成本和破坏信任这一事实有关。勿撒谎和勿机会主义地行事这一规则是靠将违规者逐出社会交往的方式得到维护的，它典型地属于一种完全非正式却非常有力的约束方式。”（见《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ocial Order and Public Policy*），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页 119～121）当然，我们也可以举一个反例，一个在**非诚实社会**通行的规则：讲真话的人无人相信；不讲假话就办不成大事。众所周知，这正是专制主义社会的现实。这种东西在专制主义的约束语境中，经由千百万人的行为互动，也会形成某种**内在制度**，某种无需明言、却人人都清楚且须遵守的**不成文规则**。

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也注意到了类似的现象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他把我们定义为“内在制度”的东西称之为“制度化实践”，“所谓制度化实践，就是在时空之中最深入地积淀下来的那些实践活动”，它具有“深层的”、“默契的”、“非正式的”和“约束力弱的”等特点；与之相较，那些外在的制度（比如以法律形式出现的规则要求）反倒往往是“浅层的”、“话语的”和“形式化的”，尽管它具有“约束力强”的特点。（参见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页 85～86）从本文的立场看，也许吉登斯对“约束力”强弱的规定需要修正：就中国现实社会运转呈现的历史经验而言，“内在制度”对行动者行为的“约束力”并不比“外在制度”弱，在一定意义上反而更强，因为恰恰是“内在制度”反映了社会运行最真实的本质，反映了社会行动者对既定体制约束的自然应变模式。从批判理论建构角度看，这种非见诸文字的、在许多场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表现为“软”约束而非法律文件等“硬”约束的东西，往往是思想者窥视社会、洞察一个社会肌体之**病理结构**的理想入口。对改革中的中国行政制度的研究当然也如是。

于一个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来讲是如此，对于那些尚未建立民主制度、或正在为此而努力的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公民社会是表征公民思想表达权利、实现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完成理性的文化再生产、促进全社会的沟通、理解与社会自律的基本制度平台。对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公民社会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重要链接，公共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必须据此得到证明。而从全球治理角度看，**一个国家内部的公民社会的建设又是该国公民参与全球公民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试想，一个公民尚未能有效地参与国内治理，他又怎么可能自由地参与全球治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民主化基础上完善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合法性关系建构与链接的公民社会也将有助于使国家成为公民个人与全球社会之间的合法链接。

20 世纪早期曾有过中国公民社会孕育、诞生和蓬勃发展的历史，后来被毛泽东的农业乌托邦极权主义可怕地中断了。本文说要“鼓励公民社会的复兴”应该是对这一段早期史实认可基础上的、政府应该采取的内政方略的准确表述。**从根本上说，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必须以改变执政党对公共领域的全面监控为前提**。中国共产党必须丢弃陈旧、僵化的政治思维逻辑，使《宪法》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和思想表达权真正得以实现。公共权力机关对舆论传播机构的管理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尤其要改变党的宣传部门成为媒体（电视台、广播电台、出版机构、网络公司）“太上皇”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面对种种“禁区”，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传达社会的真实声音、传播社会正义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这里不是探讨威权主义条件下的**知识社会学**的地方，我只是想说，这种由于专制主义的淫威导致的代价极高的游戏不应该永无结束。在教育领域，高扬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的现代大学理念，在普教系统、高教系统剔除“党化教育”的传统和制度性存在，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民间社团建设方面，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民间社团审批制度，允许民间自由结社。只有当一个政府不再把公民的自由结社行动和其他集体行动视为“威胁”时，才可以说这个政府是拥有**自信**的。而没有自信政府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连它自己都意识到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民主意义上的政府。

提倡健康、开放、自强、宽容的民族精神：发自内心的对本民族的爱是一种质朴而崇高的感情。然在全球治理时代，这种爱应该升华为与人类文明进化水平同步的、足以包容我们对整个人类的同情心和责任感的、非狭隘的民族精神。这样的民族精神是与全球治理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也是与人性的高贵、尊严相一致的。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以为中华民族应该提倡的新的民族精神包含如下要点：

这种民族精神应该是**健康的**。“健康”首先意味着民族精神的建构要和建设一个**民主**的民族国家相联系，而不再成为专制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手段。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向来缺乏民主的“基因”，通过不懈的启蒙（既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对我们的后代）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注入**自由主义**的元素，是当代人乃至下面几代人必须承担的使命。“健康”的另一个含义是建构中的民族精神不再囿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提倡对本民族国家的忠诚。从发展的眼光看，新的民族精神毋宁要和扬弃中的民族国家保持适度张力，对民族国家行为中可能暴露的自私性有充分的自省，而这自然意味着，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将成为全球治理的建设性因素。

这种民族精神应该是**开放的**。“开放”的反义词是封闭和保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封闭、保守心态面对民族精神建设的并不乏见。比如，一篇论“乐坛后殖民文化”的文章就曾指责西方以文化为幌子对中国实施的“软性侵略”，目的是窒息我们自己的传统音乐文

化。¹⁷³ 从学理上讲，这样的东西自然不值一驳。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新保守主义”倾向，持有此种倾向的人多为海外留学返国的知识分子或经常有机会出国研究的学人，他们对西方社会有自己的体验，往往得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有的甚至非理性地回归传统。显然，要建设开放的中华民族精神，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持有其他主张的知识分子之间还需进行更深入的对话。

这种民族精神应该是**自强的**。在本文已经就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作过追溯以后，再来强调“自强”问题是否有些画蛇添足？不是这样的。与官方一直在倡导的“民族自豪感”相反，目前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时尚”风潮和反映百姓生活的市井文化中，一股浮浅的崇洋媚外之风似乎有越刮越烈之势。北京宽阔的马路两侧到处充斥着“欧陆风情”、“美氏豪宅”之类的房地产广告；专事预告央视电视节目的《中国电视报》居然每期都有一个“国际版”的“娱乐周刊”，把各式各样的洋美女推介给中国读者。如此浅薄又如此深入的“西化”反映了威权主义背景下市场导向和消费潮流的低俗化，对体现人类新文明观的真正的全球化来说，这不啻是一种讽刺。面对这种充满着铜臭气息的民族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重谈民族精神建设中的“自强”问题，显然包含了文化、经济与政治诸层面的多重意义。

最后，这种民族精神应该是**宽容的**。中国自古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现代自由主义则强调宪政民主基础之上的多元主义和“重叠共识”。宽容是一种美德，一种境界，它同样可以转化为一种精神建构和一种制度安排。宽容既适用于世界各民族间的关系整合，也适用于国内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关系整合。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会支持境内的民族分裂活动，在一个走向全球治理的时代，主张民族分裂将更加不得人心。但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政治前提是民主化**，宽容则是对民主化的精神引申。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处理海峡两岸关系和港澳自治。在一个制度认同高于文化认同的时代，唯有民主与宽容可以为建构中的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提供动力。

（本文作于2004年5月，8月修改、补充，首刊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¹⁷³ 见1996年2月8日《为您服务报》刊登的“关于乐坛后殖民文化的十个问题”的对话录。黎萍写的文章“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载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服务中心“文库”网站）对此有详细讨论，可参考。



《观察》制作、收藏
2007 年，华盛顿